

云南民族大学保德学研究中心学术文库

云南国际型民族 文化人才选辑

主 编 苏丽杰 鲁建彪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云南民族大学傣傩学研究中心学术文库

云南国际型民族文化人才选辑



主 编：苏丽杰 鲁建彪
副主编：张 根 李应伟
编 委：李 礼 王 璐 陈晓娇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南国际型民族文化人才选辑 / 苏丽杰, 鲁建彪主
编. — 昆明 :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482-2385-6

I. ①云… II. ①苏… ②鲁… III. ①民族文化—人
才培养—云南省—文集 IV. ①K280.7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80947号

策划编辑: 张丽华

责任编辑: 张丽华

封面设计: 周 旸

云南国际型民族 文化人才选辑

主 编 苏丽杰 鲁建彪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云南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60千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2385-6

定 价: 35.00元

社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 65033244 65031071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前 言

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云南国际型民族文化专业人才是指在云南从事民族文化的學習、研究或实际工作，具有留学背景或具有国际视野、具有国际交流所需要的能力的各级各类民族文化专业人才。对高层次、有突出贡献、有影响的云南国际型少数民族文化专业人才成才规律的研究是一个崭新的亟待加强研究的领域，是文化战略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高层次领军人物和专业文化工作者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留学生是云南国际型民族文化人才的主体，真正意义上的云南国际型民族文化人才的培养的发轫也是从官派的第一批云南留学生开始的。

云南民族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国际型少数民族文化专业人才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新世纪，我国在人才问题上，“国内竞争国际化、国际竞争国内化”的状况日益明显，面临的人才竞争的压力更大。只有实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战略，才能在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目前，云南省人才总量不足、质量有待有效提升以及当今世界争夺人才的激烈竞争，都是“云南国际型民族文化专业人才”提出的现实依据。

一、云南国际型民族文化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

在新世纪新阶段，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云南国际型民族文化人才培养工作，加强对国际型民族文化人才培养的研究，有利于加强云南各高校与国外高校的交流与合作，借鉴先进的办学理念和管理经验，不断提高云南省高校的办学水平和质量，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提高毕业生就业率，对于办人民满意的大学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认真梳理总结云南近现代国际型少数民族文化专业人才培养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省国际型少数民族文化专业人才培养的政策条例和实践案例，认真总结云南省国际型少数民族文化专业人才成长的规律，以及他们对

云南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和贡献；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各个历史时期国际国内社会环境及社会政策对人才培养的重要影响的研究，进一步探索优化社会环境、制定有利于云南国际型民族文化专业人才培养的政策；通过对云南省近年来培养国际型民族文化专业人才的成功经验的总结，进一步提炼云南国际型民族文化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通过对云南省国际型民族文化专业人才的统计及研究，更好地服务于云南人才强省、民族文化强省战略的实施，更好地推进国家桥头堡战略和“一带一路”的战略建设；通过深入分析云南国际型少数民族文化专业人才的现状及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工作对策和措施，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云南国际型少数民族文化专业人才培养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和作用，用好现有的人才，培养和吸引更多的人才，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智力贡献。

二、加强云南国际型少数民族文化专业人才培养提出的客观必然性

（一）加强云南国际型民族文化专业人才培养是树立科学人才观、积极应对国际人才竞争的客观需要

当今的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越来越趋向于围绕人才和知识的竞争展开。这种竞争，对于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文化产业来说，既是有利机遇，又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培养继承和弘扬少数民族文化的高层次专业人才，实行民族文化专业人才“走出去”战略，有利于增强我省文化软实力，使云南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需要。因此，加强民族文化专业队伍建设和人才资源开发，正是应对国际人才竞争的客观需要。

（二）加强云南国际型民族文化专业人才培养是由国家发展战略和云南地缘政治、民族文化优势、区位优势决定的

云南地处我国与中南半岛和南亚次大陆结合部，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国境线长4000多公里。在云南与缅、老、越三国4060公里的共同边界上，有壮、傣、布依、苗、瑶等16个民族与国外同一民族在国境线两侧相邻而居，边境结合部具有山水相连、通道众多、民族相同、语言相通、风俗习惯相似、边民往来密切的特点。对于正不断加深与东南亚关系的中国来说，更重要的特点还在于，邻国与中国接壤的地区不仅民族比较多，且相对

贫困，与所在国政府的关系也非常复杂。这些地区是中国发展边贸的重点，同样也是未来中国—东盟交通网络的枢纽之地，有些地段甚至可被称为“咽喉要道”。当前，云南省正在加快建设面向东南亚和南亚开放的桥头堡，成为辐射东南亚、南亚的中心，成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系列的战略措施对于加快实现云南乃至整个祖国大西南的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这对于云南既是挑战，更是充满了无限的机遇。

建设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战略的顺利推进，不仅要依托于大通道、大基地所涉及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等“硬”的一面，更要依托于文化软实力。云南与东南亚、南亚各民族文化之间密切交流、相互包容，形成和谐相处、共促繁荣氛围的“软”的一面。“软”“硬”兼修，相辅相成，才能最终实现并持续发展云南的大开放格局。因此，培养既懂中国文化、云南文化又懂东南亚文化的大批外向型人才，对于密切云南与东南亚的友好往来，使云南民族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三）加强云南国际型民族文化专业人才的培养是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深化同东南亚合作的客观需要

东南亚是世界上典型的多民族、多宗教地区，民族宗教问题错综复杂。东南亚地区的地理位置使东南亚各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格局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不仅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战略来说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深刻影响着世界各国的国际发展战略布局。云南地处祖国的大西南，毗邻东南亚、南亚 17 个国家，扼守祖国的西南大门，地理位置极端重要。云南是全国民族成分最多的省份。26 个民族和全世界各大宗教以及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宗教在此生存发展，使得云南省成为全国民族宗教资源最丰富也最需要深入挖掘的省份。因此，为进一步推动与东南亚的合作，需要加大对东南亚民族与宗教问题的研究，培养高层次的民族文化研究人员。

进一步推动与东南亚的合作，需要加大对东南亚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培养大批云南国际型民族文化专业人才，特别是高层次创新拔尖人才。中国的研究机构应有更多投入，以提出更多更具操作性的建议。一些想要走出去发展的中国企业，也应更多关注有关问题。进入这一地区，既要考虑如何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也要考虑有可能面临的风险。我们只有把自己家门口的“环境”摸清楚，才有可能确保“走出去”步伐的稳健。

（四）加强云南国际型民族文化专业人才的培养是云南党外知识分子暨无党派人士的发展现状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改革开放的不

断深入，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国务院 2011 年 5 月《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的出台，为云南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式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云南省民族文化专业人才培养成为突出问题。根据我们所负责的《云南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研究》调查表明，截至 2009 年底，调查对象 6573 人中少数民族有 1552 人，从民族结构来看，汉族 4600 人，占 69.98%，少数民族 1552 人，占 23.61%，共有 26 种少数民族，但在云南的 25 个少数民族中，怒族、独龙族 1 人没有，有 14 个少数民族无党派人士不足总人数 1%。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及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和交锋，各国之间文化交流越发频繁，国家提出建设文化强国、云南省提出建设民族文化强省的战略目标，要提高民族文化自信和民族文化自觉，而具有浓郁民族特色和多元多彩文化的云南，却存在着高层次国际型民族文化专业人才的分布不均、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以及各民族文化存在逐渐消失、保护传承和弘扬后继乏人的问题。因此，如何培养、团结、凝聚云南具有国际视野、世界眼光的民族文化专业人才力量，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对他们在社会变迁、文明进步方面的特殊作用和影响、对他们成长成才成功的规律以及如何发挥作用的路径和方法进行探索和研究，对于培养国际型民族文化专业人才显得更加紧迫和重要。

（五）加强云南国际型民族文化专业人才培养是适应科学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对外开放的客观需要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关键是人才。对于云南民族地区来说，民族文化专业人才培养是关键。特别是他们当中拔尖的创新性人才和代表人士，更是我国人才宝库中最稀缺、最重要的资源和财富。努力建设一支宏大的富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民族文化人才队伍，是云南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建设任务艰巨繁重，云南国际型民族文化人才的培养任务更加艰巨和繁重，其地位和作用更加重要和突出。

加强云南国际型民族文化人才的培养就要把这一工作放到国际人才竞争的大背景下来认识，通过营造良好的发展和创业环境，为我国参与并赢得国际人才竞争提供坚实的基础和可靠的保证；要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目标中来认识，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

大的动力。

因此，加强云南国际型民族文化人才的培养工作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环境的必然要求，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的必然要求。要把云南国际型民族文化人才的培养工作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项重要任务，作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项重要任务抓紧抓好。

三、云南国际型民族文化人才的个体及群体特征^①

国际化人才，通常是指本土化的外籍人才和国际化的本土人才。国际人才重点聚焦外国专家、港澳台专才和出国留学回国人员（含入外籍留学人员），兼顾本土国际化人才。判断一个人才是不是国际化人才，应有五个关键标准：第一，是否具有良好的母语以外的跨文化沟通能力；第二，是否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全球思维；第三，是否通晓一般国际惯例；第四，是否知晓专业领域内的国际发展动态；第五，是否具有较强的创造价值能力，在“国际人才竞争国际化、国内人才竞争国际化”背景下，放眼全球去集聚国际人才的意义不同寻常。

（一）云南国际型民族文化人才是中华民族文化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其个体而言具有显著的特征

1. 民族型人才

其人才具有显著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同时，又具有社会性、国家性和通融性。作为云南国际型民族文化人才，首先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民族观，正确的人生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责任感。其次，要熟知云南民族文化或自身就属于某个少数民族，并对云南民族文化有深厚的感情，对云南民族文化有深入的研究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目前，全国民族类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平均比例低于60%，从而淡化了民族性，这是需要反思的，民族类高校的性质和办学方向目标决定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比例应高于这一比例。

^① 见张忠良等主编《云南民族文化探索》，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

2. 基础型人才

这类人才应具备的特征是民族文化知识结构基础厚、领域宽、学科全、知识新，研究民族文化的能力强，文字功底深。我们倡导在培养民族文化民族型、复合型、创造型等类型的人才时，也要注重培养一部分基础型人才，其道理显而易见。任何民族的文化发展要有后劲，离不开民族文化的基础理论的研究。如果忽视民族文化基础理论的研究，是一种见识短浅的表现，缺乏战略的眼光和科学的头脑。有成就的国际型民族文化人才都是把民族文化基础理论当作抢占民族文化制高点的基础和台阶。如果说我们要在民族文化研究方面，培养出大批国际型民族文化人才，那么，离开民族文化基础理论建设和研究，一切都是空话。

3. 复合型人才

复合型人才就是“专才”与“通才”的统一。复合型人才要求知识面广一些，知识基础扎实一些，工作能力、文字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强一些，综合、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高一些。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适应能力比较强，遇到棘手问题和突发事件有果断处理的能力。能适应国家桥头堡战略的建设需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需要，适应时代发展和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

4. 创造型人才

创新是一个国家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创新也是一个政党永葆青春活力的源泉，创新性也是国际型民族文化人才的显著特征。创造型人才往往具备很强的创新意识，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具有丰硕的创新成果。云南国际型民族文化人才既能立足和扎根于云南这一民族文化的沃土，又能积极吸收和借鉴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熟知民族特点及其发展规律，能够正确地、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引领民族和社会的发展。

5. 竞争型人才

除了具有复合型、创造型人才的特征外，云南国际型民族文化人才还具有强烈的锐意进取精神，他们不因循守旧，不安于现状，勇于突破困难，勇于攀登民族文化的制高点；同时，他们具有将民族文化推向外部环境开展竞争的思维、意识和竞争的知识、本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又是竞争经济，平等竞争的意识、原则、机制不仅贯穿于整个经济活动，而且贯穿于全部社会生活。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以培养大批竞争型人才、把民族文化的资源优势变成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为前提。我国少数民族大部分居住在陆地边疆地带，大部分少数民族没有竞争意识和能力。在全球化的大背景和

大趋势下，民族文化就需要敞开竞争，走向国际，竞争型的民族文化人才应运而生。

6. 开拓型人才

云南民族文化还有许多人们未发觉和认识的领域，需要开拓型人才去发觉，开拓型人才是思想性和技术性兼备的人才，他们既懂得云南民族文化的专业知识，又是各方面知识兼通的人才。他们具有发觉、开拓云南民族文化事业必须的厚实的专业业务基础。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有一批开拓型民族文化人才，研究本地区、本民族文化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在对云南民族文化现实状况有全面认识的基础上，明确云南民族文化开拓发展的薄弱环节和主攻方向。这样，才能有力促进云南民族文化的发展。

7. 涉外型人才

国际型民族文化人才区别于其他人才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其涉外性。这类人才应具备的突出特点是既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即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武装自己，又要有扎实的外语和计算机基础，熟练和精通至少一门外语，能够清楚地沟通交流。云南民族文化要走向国门、走向世界，离不开懂外语、懂经营的人才，会外语作为涉外型人才的基本特征，是云南民族文化研究、发展的载体和途径。

(二) 云南国际型民族文化人才是中华民族文化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其群体而言具有显著的特征

(1) 云南国际型民族文化专业人才群体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是具有鲜明“代表性”的群体，层次高、多领域且相对集中，他们都是党和国家最为宝贵的财富。

(2) 云南国际型民族文化专业人才群体是一个分布广泛的群体，综合性强、影响力大，他们既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祖国完全统一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发展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友谊的桥梁和纽带。

(3) 云南国际型民族文化专业人才群体数量大幅增加，队伍流动和分化加剧，学习交流的范围日益具有国际性，使他们成为世界各国人才争夺的重要对象。

四、云南国际型民族文化人才培养亟待解决的问题

国际型民族文化专业人才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政治力量，一个大有作为

的社会群体，更需要全社会的关心、重视、理解、帮助，需要党和政府给以关怀和政治上的教育、引导，将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战略进一步贯彻落实好，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择天下英才而用之。这是加快确立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布局，推进我国由人才大国向人才强国迈进的体制保证，有利于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有利人才支撑。因此，可通过以下方面加强云南国际型民族文化专业人才的培养：

第一，完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人才顺畅流动的制度体系。

第二，健全人才向基层流动、向艰苦地区的岗位流动、在一线创业的激励机制。我省作为欠发达的西部省份，一定要树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理念，打破户籍、地域、身份、认识关系等刚性制约，通过智力引进人才、人才创业、人才派遣等多种形式，实现高层次人才的柔性引进。要大力倡导服务基层、奉献社会的精神，鼓励年轻人到基层和艰苦地区锻炼成长。

第三，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曾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竞争，关键在人才，中国从13亿人中选人才，而美国从全球70亿人中选人才。这与我国人才引进方式单一、引进审批手续烦琐等不无关系，特别是对外国人才来华留华缺乏有吸引力的制度。因此必须主动适应开放性经济新体制要求，增强人才政策开放度，敞开大门，招四方之才。要完善人才评价机制，借鉴国际经验，研究建立各类人才能力素质的标准体系，通过业绩和贡献评价人才，依靠群众和实践发现人才。要持之以恒抓好“千人计划”等重大人才工程的实施，完善人才签证、绿卡等管理办法，研究制定国际技术移民、投资移民等法律，推动人才实验区建设等，大力吸引国（境）外优秀人才回国或来华创业发展。^①

^① 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年版。

目 录

前 言	(1)
-----	-----

第一编 荒漠独舞——边疆民族文化拓荒人

国学大师·姜亮夫	(3)
滇史巨擘·方国瑜	(18)
民研开拓·江应樑	(22)
民识第一·杨堃	(28)
世纪学人·马曜	(34)
民史肇始·尤中	(41)
南天一柱·汪宁生	(44)
滇史领军人·谢本书	(48)
基诺族之父·杜玉亭	(51)

第二编 文化诠释——边疆民族文化垦殖者

求是新天地·王天玺	(55)
傣王亦大家·刀世勋	(62)
民史育新叶·林超民	(69)
天雨流芳出人才·杨福泉	(71)
纳西学问开垦者·郭大烈	(76)
历史民族集大成·何耀华	(81)
阿佤山上光明使·王敬骝	(91)
彝族文化开拓者·陶学良	(95)
民族文博首创人·杨德璠	(98)
“三新”育英才·王叔武	(105)
民语老战士·陈相木	(107)

古滇思想者·余嘉华·····	(110)
滇边瞭望哨·鲁刚·····	(112)
白族凿空者·杨国才·····	(117)
民族有哲人·李国文·····	(123)

第三编 艺术空灵——边疆民族艺术传播者

三绝诗书画·周霖·····	(129)
藏族作家·丹增·····	(131)
以文化之·欧阳坚·····	(133)
一晚成古乐·宣科·····	(138)
影戏译制者·木光·····	(140)
滇画创始人·丁绍光·····	(141)
武旦大师·关肃霜·····	(156)
孔雀公主·刀美兰·····	(164)
以灵舞者·杨丽萍·····	(168)
竹楼追梦人·刘晓耕·····	(175)
泸沽有骄子·曹新华·····	(179)

第四编 民族骄子——民族文化人才传承者

民俗燃灯者·白庚胜·····	(185)
云南也有梦·纳麒·····	(186)
科技界的精英·彭金辉·····	(188)
民族学的领军人·和少英·····	(190)
具有学术魅力的大学校长·张桥贵·····	(192)
云南藏区的经济专家·王德强·····	(196)
云南本土文化的坚守者·王四代·····	(198)
滇旅、滇民引领者·花泽飞·····	(201)
小语种撒播者·杨光远·····	(204)
双语领头雁·刘劲荣·····	(209)
第一代佤族专家·赵岩社·····	(211)
中华武术的弘扬者·李德祥·····	(213)
傣傣学创始人·满希阿哆·····	(217)
后 记·····	(219)

第一編

荒漠独舞——边疆民族文化拓荒人

国学大师·姜亮夫

一、人物概况

姜亮夫（1902—1995），云南昭通人，原名寅清，字亮夫，以字行。一代国学宗师。著名的楚辞学、敦煌学、语言音韵学、历史文献学家、教育家。1902年5月19日（农历四月十二日）出生在一个以教书为生的知识分子家庭。



1921年，姜亮夫从省立第二中学毕业后官费进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前身）。1926年考取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班和清华大学研究部。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先生。1928年先执教于南通中学、无锡中学，后任大夏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及北新书局编辑，其间师从章太炎先生。1933年任河南大学教授。1935年赴法国巴黎进修，1937年经莫斯科回国，先后任职东北大学教授、英士大学教授兼文理学院院长、云南大学教授兼文法学院院长、昆明师范学院教授、云南省教育厅厅长、云南省军政委员会文教处处长。1953年任浙江师范学院（现杭州大学前身）、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中文系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长、博士研究生导师。曾获国家教委普通高校首届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一等奖等多种奖励。

姜亮夫历任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浙江省政协委员。

著有论文集《探戈集》，专著《初高中国文教本》《中国文学史论》《文学概论讲述》（4卷）、《屈原赋校注》《楚辞书目五种》《陆平原年谱》《张华年谱》《中国声韵学》《古文字学》《敦煌学概论》，编辑《中国历代小说选》《历代各文体文选若干种》等。

1935年，到法国潜心研究中国流失到法国的珍贵文物，进行拍片、拓摹、抄录共3000多张，1937年带回祖国。回国后先后在东北大学、西北大

学任教。1940年任云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昆明师院（后西南联大、今云师大）任教，因被特务盯梢，转到苏州任英士大学文理学院院长。1949年5月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1950年—1952年在云南革命大学高级研究班学习，1952年进云南博物馆工作。1953年起在浙江杭州大学，先后任中文系古籍研究室所长，博士研究生导师。

1955年任浙江省政协委员。先后著有《瀛涯敦煌韵辑》《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陈本礼楚辞精义留真》《屈原赋校注》《陆平原年谱》《楚辞书目五种》《楚辞今译讲录》《楚辞学论文集》《楚辞通故》《莫高窟年表》《敦煌学概论》《屈原赋今译》《敦煌学论文集》等1000多万字的研究著作。其中《楚辞通故》一书被海内外专家誉为“当今研究楚辞最详尽、最有影响的巨著”，荣获全国高校首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等奖。

姜亮夫先生是我国卓有成就的教育家，德高望重，20世纪80年代以来曾任屈原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会长、中国训诂学会顾问、中国音韵学会顾问、《汉语大词典》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先秦文学分支文学主编。他为弘扬祖国优秀文化，保留珍贵的文化遗产奋斗了一生，也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95年12月4日，姜亮夫先生在杭州病逝，享年94岁。这位几乎与整个20世纪相始终的文化老人，在学术与教学园地里辛勤耕耘了七十多个春秋，为我们留下了三十多部学术论著，数百篇学术论文，涉及中国文化史上多方面内容。其学术成就历来为学术界所瞩目，被尊为一代学术宗师。上海古籍出版社近年出版的“成均楼论文辑”分为楚辞学、敦煌学、古史学、古汉语等四类，这是姜先生创获最多的学术领域。

二、往事集略

（一）成为一代宗师

姜亮夫出生于昭通城内一个颇有名气的书香世家。家有兄弟二人，先生居长，其弟姜直清，字正夫，现在是一位退休老教师，昭通市政协常委。他的父亲姜思让，字叔逊，是清末京师大学堂学生，学法律，是维新人物。武昌起义后回到昭通，领导地方“光复”事业。护国运动中，在昭通领导募捐济军反对袁世凯。

12岁以前，姜先生在私塾饱读诗书，16岁以后就到了昆明，在云南第二中学、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四川大学的前身）、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班、清

华大学研究部学习。清华毕业后，1927年先生到了江苏南通、无锡做中学老师。1929年，到了上海大夏大学任教，之后在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东北大学、西北大学、云南大学、昆明师院、浙江师院、杭州大学等校任教授及系主任和学院院长等职。其中，曾两次受聘于云南大学，第一次是1941—1946年，第二次是1948—1949年，兼任文法学院院长。

姜先生除在校园内做教育工作外，还曾任北新书局编辑，《青年界》主编，1949年5月担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云南和平解放后，任云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处长。1953年国家教育部把姜先生调到了浙江师院任教务主任，从此定居杭州；因为身体的缘故，再没有回过云南。姜先生也曾担任过教育部顾问。在杭州大学，姜老曾担任过中文系主任、古籍所所长、博导。先后任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浙江省语言学会会长，《汉语大辞典》编委会、《汉语大字典》编委会、中国韵文学会、中国训诂学会顾问，中国吐鲁番学会语言分会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先秦分册主编等。

姜亮夫先生的大伯父思孝，字儒真；四伯父思敏，字勉之，都曾留学日本，他们和先生的二伯父思敬（字辑熙）既是地方上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也是昭通地方开办新学的老前辈。后来，姜亮夫先生曾这样回忆他的父亲：“我父亲是云南东部昭通十二州县光复时的领导人之一，年轻时，就接受梁任公、章太炎先生的影响，是非常爱国的人。他平常教我爱国思想，从小就要我读格致教科书等科学知识的书。”他还说：“我父亲有一件事情使我非常感动，他喜欢文天祥的《正气歌》，几乎每年都要写一次，并且都写成大的条幅，可以在墙上挂的。所以，我八岁时就把它背熟，父亲给我讲解。我一生之所以有一些爱国主义思想，恐怕要数父亲的影响来得大。”先生出生于这样一个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家庭和新旧交替的时代，使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民主爱国思想和文化熏陶。

（二）寻找文物 熬坏双眼

童年和幼年所接受的良好教育与熏陶，使姜亮夫有条件较之其他的同时代人在一个较高的基点上起步。1921年他考入成都高师。1925年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有幸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吴宓等一代宗师。自晚清以后，中国大量珍贵文物流落海外，仅在巴黎，姜亮夫所见的就有数千件。为了挽回散失的文物，姜亮夫毅然放弃其他方面的研究计划，集中精力，把一切可能接触到的中国珍贵文物拍照、拓摹、抄录带回祖国。姜亮夫节衣缩食，住的是最便宜的旅馆，早晚吃的是白菜煮大米稀饭，中午是在图书馆啃

干面包、喝白开水。拿破仑宫中收藏的我国圆明园珍宝，根本不让中国人参观。姜亮夫找关系，贿赂有关人员，才得到准许抄录拓摹。在巴黎国民图书馆，每拍一张照片要付14法郎，姜亮夫先后拍了3000多张，查找了流散在法、英、意、德等国的中国文物索引、目录，抄录、拍照、拓摹。



1935年，姜亮夫先生卖了几部书稿，筹款自费到法国留学。他本来是要到巴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但去了以后，在巴黎的博物馆、图书馆里看到了我国早年流散到法国的敦煌文物和经卷，痛心疾首之际，毅然放弃了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姜亮夫先生曾和自己的一些学生谈到过在巴黎博物馆里抄录、拍摄中国文物的事情。先生本没有多少积蓄，又是自费留学，那段生活过得非常清苦。姜先生早上从租住的屋子出发，带上干面包和白开水，坐车到了博物馆，在那里，他有一个固定的座位，坐下开始一天的抄录工作。中午时分，先生就着白开水吃点干面包充饥。打发了午饭后，接着工作，一直到晚上博物馆关门。回到家的姜先生，自己做晚饭，一般就是用菜叶和米煮点粥。先生如此亏待自己，却把省吃俭用下来的钱拿去拍照。为了抄录、拍照、描摹大量的青铜器皿、石刻碑传、敦煌经卷等中国文物，姜先生的眼睛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深藏在博物馆里的敦煌经卷，因为年代久远，上面落满了灰尘和污垢，有些地方几乎字迹全无。为此先生想了许多法子，他用小刀片轻轻地刮拭卷面，将线装书拆开放一张白纸进去临描。为了准确无误地把经卷上的文字带回祖国，工作进展非常缓慢，姜先生曾跟学生们说，有时候一天只能弄出一两行。而完成一部书稿的抄录，需要四道工序。等做完这项工作的时候，姜先生的视力下降了600度！再加上长年伏案工作，晚年的姜先生几乎失明，他的学生殷光熹说：“我们每次去看望姜老时，站在他面前，他不知道是谁，一定要先自报姓名。”

（三）乱世回国 结得美好姻缘

1937年“七七”事变前7天，姜亮夫归国回到北京。但从他回到北京的那天起，就不得不为保护从欧洲带回来的资料而焦心苦虑，颠沛流离。日军入侵华北，姜亮夫南下上海，“八一三”事变后，他从欧洲带回的一大箱

书籍、图片、抄本除 300 多张敦煌卷子外，全部在上海被日机炸毁。对于这些书籍、文稿，姜亮夫爱惜它们更甚于自己的生命。因为战争爆发，流散欧洲的祖国文物大有毁于战火之虞，身边的东西就可能成为孤本。于是在流亡逃难、躲避空袭之际，他都把卷子打成背包经常带在身边，一听到空袭警报，背起就跑，唯恐再毁于轰炸。

新中国成立后，姜亮夫完成专著数十部、论文百余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他在中国古典文献学、楚辞学、敦煌学、语言学、训诂学、工具书编纂等诸多方面都有重要建树。75 个春秋，他写下了 1000 万言，成就卓著，被尊为“一代宗师”。姜亮夫最重大的学术建树是以 180 万字的巨著《楚辞通故》为代表的一系列楚辞学论著，把楚辞研究从传统的章句之学解放出来，别开生面地引入语言、历史、哲学、地理、考古、民俗、博物诸学科文献，走上综合研究的道路，开一代研究之新风。《楚辞通故》一书被海内外专家誉为“当今研究楚辞最详尽、最有影响的巨著”。

姜亮夫也是卓有成就的教育家。从 1928 年起，他一直坚守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专业人才。1953 年后，他为杭州大学的学科建设做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如今姜门桃李已遍布天下。

1938 年，姜先生到了上海，与陶秋英女士完婚。关于这段完美的姻缘，他们的女儿姜昆武老师说，这是“典型的自由恋爱，而且是师生恋”。原来姜亮夫先生在上海持志大学中文系任教授时，陶秋英是他的学生。陶秋英原籍苏州，长于上海，是一位商人的千金，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攻中国古代文论。姜昆武老师说，母亲曾在云南大学中文系任过教授，是一位“古代文论专家”，擅长中国古典文学。父亲 1953 年调到浙江师范学院，也算是跟着母亲去的，因为是母亲先接到的调令。但后来为了照顾多病的父亲，母亲毅然停职回家做了位全职家庭主妇。夫人爱好书法艺术，精于山水画，她的山水画意境高逸，有书卷气，被称为“文人画”，自成一家。

姜老和夫人的恩爱，特别是陶夫人为姜老做出的牺牲以及事业上的帮助，在后辈晚生的眼中，尤其让人感动。殷光熹说，师母对老师非常关心，特别是在事业上给了许多的帮助，很多姜先生的著作都是夫人帮助整理、抄



录、校对的，就连他们的女儿和女婿也做了许多工作。殷老师指着姜老的二十四大本全集，感慨地说：“姜老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他们一家人的功劳。”

殷老师的这一说法，在姜昆武（姜亮夫先生的女儿）处得到了更为详细的印证。姜昆武，原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浙江省政协委员。她说，母亲从云南大学调到浙江师范学院后不久，就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全心全意照顾父亲，并帮助身体越来越差的父亲整理著作。而自己，也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做父亲的“小助手”。“我上小学、中学就开始帮忙了。那时候我母亲周末带着我去上海的一些图书馆，到了后她找作图书馆馆长的朋友找书、借书，找到一本就拿给我，让我在桌子上抄，制作小卡片什么的。别的我干不了，但会写字呀，虽然写得歪歪扭扭，也不管啦！只是到了高中，因为学业的压力，才没怎么为父亲做事情。”

姜昆武老师1966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中学教书，工作一直在浙江省内调动，直到1975年才回到杭州，陪在父母身边。从此接替母亲，做了父亲的主要助手。因为姜亮夫眼睛不好，那时候的书籍，又全是手工抄写的，错漏不少，核对整理起来工作很艰辛。最为困难的，还是整理姜亮夫在新中国成立前写出的书稿。因为几十年前姜亮夫找得到的资料，现在已经没有了，找不到了。有些资料可能是姜亮夫在北大或是清华看的孤本，但经过并校、分校、战乱等等变迁，上哪里找那么一本书呢？有时候上海、浙江一些大的图书馆都找遍了，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才能校出一个字。而姜昆武老师并不是姜亮夫的专职助手，她于1980年调入浙江社科院，除了上班，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在为父亲整理著作。不但自己成了业余助手，姜昆武老师的丈夫也加入了这个繁杂的工作当中。姜昆武老师说，爱人也是从事教育工作的，在一所中学里教地理，后来兼任了学校的教务管理工作。结婚后两个人的业余时间都投到了父亲的著作里。因为两人上学时学的都不是父亲研究的那个专业，对于很多参考文献的认知度就不可能和父母亲相比。有一次，已经怀孕五个月的姜昆武老师躺在床上，为了考证一句话的出处，又记不得到底在哪一章哪一节，就和爱人翻了一夜的书！姜昆武老师告诉记者，仅姜老先生的《楚辞通故》就有180万字，自己看一遍需要一年，而校对工作做了四遍，前前后后算起来足足要四年。尽管以这样严谨的治学态度来整理姜老先生的著作，但有些细节，还是没能考证清楚。在2002年底出版的《姜亮夫全集》，是按照“求全存真”的原则来的。父亲年纪大了后，写的工作也落在了后辈的身上。有一本作为大学教材的书，就是姜昆武老师根据

父亲的论著改写的，写好以后，读给父亲听，老先生听完再改。姜老先生的回忆录，也是姜昆武老师的丈夫根据姜亮夫的录音原稿写成的。姜昆武老师说，在给父亲当助手的几十年中，自己因为接触得早，主要就是整理文字、查找资料，而丈夫主要是干“重体力活”，做一些比较具体的事情。“比如我会告诉他需要哪方面的资料，要找哪一本书来，他就去找了。”姜昆武老师笑称爱人在《楚辞》里泡了三十年，退休后为《姜亮夫全集》的出版做了许多工作。

(四) 数载难归故乡 遗憾抱病江南

姜昆武老师是1944年出生在昆明的，2岁的时候，住到了上海外婆家。5岁时又回到昆明，9岁再次到了上海、金华等地，而更多的时候住在外婆家。姜老先生1953年到了杭州后，健康状况已经相当不好了。被问及姜老先生后来为什么再也没有回过云南，是否是眼睛的缘故时，姜昆武老师说：“那只是一个原因罢了，他那时候已经一身的病了。因为早年做学问太辛苦，什么胆囊炎、心脏病都有了，到杭州后养病就养了十多年。每顿饭就只能喝碗粥。特别是后来，一年倒有半年时间住在疗养院。”姜昆武老师记得小时候随母亲回上海，先从昆明坐飞机到南宁，再从南宁坐火车到株洲，然后到杭州，再到上海，“总共花了多少天我都忘了，只记得一路真是很辛苦，火车上颠来颠去的。这些都不说了，从昆明回昭通，那种路更不是我父亲能承受的”。



但在几十年的异乡生活里，姜老时刻都思念着自己的家乡。20世纪80年代初，云南举办一个全国古代文论讨论会，邀请了陶先生、姜先生和姜昆武老师一家人。讨论会定在下半年，但年初就提前通知了姜先生。“我父亲很开心啊，足足高兴了半年，我们也很想回云南来看看，可以带一个保健医生去的，但医生不同意。”于是姜昆武老师开始了与医生和父亲的两方面谈判。首先是和医生的谈判，只要有一丝可能，全家都想回云南一趟。医生说，路途的劳累先生还可以承受，但感情上的大悲大喜，他们就不敢保证了。那时候，姜老查出有陈旧性心肌梗塞，是在“文革”时期就犯下的病了，其中一根心血管已经阻塞了多年。家里人讨论认为，悲，父亲还可

以劝慰，女儿女婿孝顺，又有一个可爱的外孙女；但喜呢？三十年远离故土，回去看到自己的亲戚朋友学生，老人家的心脏怎么受得了？想来想去，还是放弃了吧。母亲和女儿一起给姜老做工作，偷闲找空地谈了半年，老先生也想通了，最后理智地接受了现实。

（五）感恩章王授业 古稀遍种桃李

医生和家人的担心不无道理，姜老一直是一位重感情的人。姜老曾跟学生们提起过自己一生中最伤怀的三件事情。第一件，是姜老多年来写的书稿遗失了一部分。《诗骚连绵自考》的第三册，在“文革”中遗失了，上面还有王国维先生的批语。最心疼的是一本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和廖秀平的《四先生合传》，在“文革”期间因怕惹祸事，被先生亲手烧毁了。事后先生非常后悔，提起来就很难过。第二件事情，是老先生在战乱年代遗失的书籍资料，姜老说，最可惜抗战年代放在上海的2000多卷古籍资料，全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毁了。第三件伤怀的事情，姜老每每提起，总叫人感动。老先生是一位非常重感情的人，特别对自己的老师，有着一一种难以割舍的情谊。姜老经常在学生面前谈到自己的老师，上课也好，闲聊也好，讲着讲着就会提到自己的恩师。姜老说对他影响较大的老师是：林山腴、龚向农、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陈寅恪、赵元任等几位大师，他们对自己的爱护和栽培，永世不敢忘。特别是王国维和章太炎的教导关爱，每每提起，姜老总是声音哽咽。

1979年，年逾古稀的姜老接到了教育部发给他的一个函，委托老先生办一个“楚辞进修班”。班里的生源来自全国范围内、重点大学里讲师以上的中青年教师骨干。在12个招生名额中，姜老“徇私”招了三个云南学员。他说：“我是云南人，要多为家乡培养人才。”在接到通知后，姜老激动得几天睡不着觉，他说：“教育部给我这么个重托，经过十年动乱，全国有水平的关于楚辞方面的师资力量更少了，楚辞教育水平下降了，为了国家的文化教育，我活着一天就要做一天的贡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也许是我最大的一次耕耘。”便打起精神，制订计划，准备参考书，拟订教学大纲，尽全力完成这一任务。

1979年9月，12名从全国各地重点大学里抽调的学员来到了杭州大学。

楚辞进修班的课程是这样安排的：每周有一个上午在教室里上课，一个下午，就到老先生家的客厅。老先生讲课，从来不带讲稿，每到上课，学员的录音机就摆满了讲台。姜老讲课还有个习惯，他喜欢闭着眼睛讲，思路异

常清晰，头头是道，一副超脱自然的样子。

每讲完一课，老先生会问：“听懂没有啊？”然后开出一串参考书目，要学员下去自学。老先生的参考书目有必读和选读两种，他要求学生在必读书中选择一本精读细读，然后写出论文或者学术报告，给老先生过目，他仔细看过后会给出意见。他说：“搞学问么，人人都可以搞，我建议你们要发挥自己的优势。才气大的人，可以从文学方面发展；才气一般的人，可以从训诂、义理方面发展。取长补短，学有所成。”

先生住在校外，到学校上课要经过一段坑坑洼洼的路，很不好走，特别是到了江南梅雨季节，更是泥泞不堪。为了方便姜老到校上课，杭州大学决定每周先生来校上课时，派一辆专车接送，同时进修班的学员中也要安排两人到家里搀扶先生。有一天，两个接先生的学员到了，校车却久不见来，眼看上课时间快到了，屋外又下起了倾盆大雨。先生执意要冒雨前去上课，一路上，两个学生撑着伞，搀扶着先生高一脚低一脚往学校赶。当三人冒着风雨来到课堂上时，所有人感动得热泪盈眶。在进修班 12 名学员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日晚饭后，会有一名学员陪老师到户外散步。趁散步的机会，姜老会给每一个人开点小灶，指点迷津。一次在散步的时候，姜老就对殷光熹说：“你们云大来的两个人，一个能苦干，一个是巧干。当然苦干加上巧干就更好了。”当时殷光熹就领悟了，那是在指点自己。因为殷光熹正是“苦干”那一个。“我听老师一说，就明白自己整天埋头苦读，在方法上还是不对，之后就 very 注意调整学习方法，果然进步很快。”

到了 1980 年 7 月，进修班圆满完成了学业，结业时间快到了，大家还是没有决定好向姜老表达微薄谢意的方式或者礼物，先生却提前派家人来通知同学们到杭州一个非常有名的酒楼赴宴，“那个酒楼的名字我记不得了，但在当时可是杭州数一数二的地方。先生真是最重师生感情了。”回忆起往事，殷光熹无限感慨。那天吃饭姜夫人并不知道，姜老由女婿陪同，因为按先生的健康状况，她是不准老先生出门参加宴席的。晚宴非常丰盛，大家频频举杯敬酒，先生端坐中间，异常高兴，鼓励同学们回家后要努力工作。姜老曾在课堂上说：“我这一生结了两个大瓜：一个就是《楚辞通故》；一个就是办了你们这个楚辞班。”殷光熹给记者看了姜夫人送的一幅山水画，还有姜老先生裱好后送给自己的一幅书法。这四行诗是摘引楚辞诗句书写的，字里行间流露出殷殷关切和对自己学生的成才厚望。

三、研究领域

(一) 楚辞学和敦煌学

姜亮夫的学术视野极为宏远，研究范围极为广阔，李学勤先生就此有“宽无涯涘”的评价。据《姜亮夫全集》前言所举，有楚辞学、敦煌学、语言学、历史学四大方面，“而在这些方面他都有为学人所必读的重要著作，其贡献之大，乃世人共见”（见李学勤《姜亮夫全集序》）。而据姜亮夫先生自己说，史学是他创立学术功业的长期实践的一个“中心”。在《史学论文集序》中，可以看到他这样的话：“我一生治学至杂，但也有个不太明显的中心——古史，往往被楚辞、汉语、敦煌、文学等冲淡，而史学的问题自‘五四’以后，非常庞杂，学说纷起，新材料也时时发现，我在这潮流中，追逐不已，为许多科学性强的学说所震撼。”于是，“下决心走朴学道路，与史学正式接触。曾发愿注《后汉书》，但王先生昆明湖之痛第一想到屈原，所以廿八岁写成《屈原赋校注》，从此对古史接触多了，于是才扩大为古史学的研究”。他还写道：“总的说来，治史是我的治学目的”，“志趣所在，主于古史与近世史”。姜亮夫先生在《楚辞通故·自叙》中又说道：“要之以语言及历史为中心，此余数十年根株所在。”

对于位列《姜亮夫全集》中第一种专著的《楚辞通故》，姜亮夫先生曾经说：“全书似当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归趣。然予于马列新说不练达，无真知，若徒衣被华采，而运不中程，则对学术为伪妄，为不忠实，以媚世冒不诚之罪辜。余钝根人也，性躁而疏，亦颇知其率直浅露，勿事于佞张，其有未达，愿学焉而已。”“辩证唯物主义非强学不可知。余学之不专，敢以真诚为言，虽愚暗莫能通达，浪费精力时间，乃至纸笔、物质，不能不深自检束者矣！”（见姜亮夫《楚辞通故》1卷第2页、第5页）这是1976年秋天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留下的文字，由此可以察见学者深心的“真诚”和“率直”。那么，在这里，姜亮夫先生所谓“运不中程”的“程”，指的是什么呢？“程”在这里，应当是指学术的法度、程式、规范、原则。

《孟子·离娄上》开篇就写道：“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汉代学者赵岐解释：“离娄，古之明目者。”“公输子鲁班，鲁之巧人也。”“虽天下至巧，亦犹需规矩也。”孟子接着又说：“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规矩，方圆之至也。”以“目力”和“规矩”的结合，则可以不穷其用。孟子



以工匠技术为喻谈政治文化，《孟子·告子上》又记录了他的名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赵岐注：“大匠，攻木之工。规，所以为圆也。矩，所以为方也。诲，教也。教人必以规矩。学者以仁义为法式，亦犹大匠以规矩者也。”孟子在这里所讲述的道理，是直接的政治范畴的王道主义或者道德范畴的“仁义”精神的宣传；然而从学术层面来理解，或许也可以借用以强调学术“法式”或者学术的“程”的作用。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一六《试文格式》中就有这样的论说：“孟子曰：‘大匠诲人，必以规矩。’今之为时文者，岂必裂规偃矩矣乎？”我们面对现在的社会文化形势，其实同样也可以看到“今之为时文者”中颇多“明目者”和“巧人”“裂规偃矩”的行为，即对于学术原则和学术规范的破坏和违背。久已成为中国学术优良传统的“法式”和“程”或说“规矩”，最主要的是实学的原则。在关于《楚辞通故》一书总体学术宗旨的陈述中，姜亮夫先生有“以实证定结论，无证不断”的说法。对于这一原则，姜亮夫先生以为“似颇合科学律令，与辩证唯物主义相表里者”。这种科学风格在空疏之风有所上扬，学术泡沫充溢书市，“徒衣被华采，而运不中程”者大有人在的今天，应当有益于指正学术途径，净化学术气氛。姜亮夫先生在《楚辞通故·自叙》中说，他生平治学，在于“以语言、历史相关合，求所以为国宣教，为青年做导游”。如果有一些青年学子能够有心继承这种实学传统，发扬这种实学精神，则可以不愧对老一代学者的苦心。那么，我们也许还可以借用孟子的话来形容这种科学的学术风格的传递：“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

我们强调“以实证定结论，无证不断”的实学传统的科学意义，并不是否定博采和创新。就姜亮夫先生的学术实践而言，是始终重视学术视野的扩展和学术方法的更新的。他所谓“五四”以后史学“学说纷起，新材料也时时发现”，自己曾经“在这潮流中，追逐不已，为许多科学性强的学说所震撼”的回忆，就是证明。李学勤先生总结说，“姜亮夫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广读马克思、恩格斯及摩尔根、穆勒利尔、梭罗、涂尔干等人的著作，并于1935年赴欧洲，于巴黎大学进修考古学。他与马伯乐、伯希和、戴密微、叶慈、翟理斯等英法汉学家结识，且在法京国民图书馆应王重民先生之

邀，检阅敦煌卷子，多有收获，足见他的学术，绝非闭门墨守者可比”（《姜亮夫全集序》）。姜亮夫先生自己也曾经说，他的古史研究，注意利用“我们考古工作大发达”的有利条件，成果中也“有些文化人类学的踪影”，他甚至主张“把自然科学许多要素尤其是材料引入人文科学，来对文史做一些具体分析”，这些都是传统史家无可比拟的。姜亮夫先生对考古文物的重视，特别值得史学工作者关注。他曾经说，当年前往欧洲，“本意想学考古学”，“我看了巴黎的四十多个美术博物馆，伦敦的大不列颠博物馆，加深了我如何用科学方法研究古籍的想法”，他甚至曾经准备“跟着到希腊、埃及去考古发掘”。姜亮夫先生在古史研究中，也注目“民俗史的舞台”，重视对“由礼俗转化为民俗”以及相反“借民俗可知礼俗的根源”等社会文化现象的考察。他回顾自己学术生涯时，所谓“余一生无他业，日与故纸堆为侣”，然而“生平治学方法，亦多所变革”的总结，应当说是符合事实的。正如姜亮夫先生自己所说，在追求“铢两悉备，确切深透”的基础上，“为新方法（综合）、新课题而努力，是余之愿也”。一方面求实，一方面求新，正是姜亮夫先生学术工作的原则。

（二）秦汉史研究

姜亮夫先生因楚辞学和敦煌学知名，然而对于秦汉史研究亦多有令专门治秦汉史者惊异的成就。姜亮夫先生自己曾经说：“秦代史中，我只写过一小本《石鼓文小考》及一篇《诅楚文考》，《诅楚文考》已入《楚辞学论文集》一书之中，《石鼓文小考》后来散入《读书朴识》中去了。”这两种成果，严格说来，应当说是“秦史”研究，而非“秦代史”研究的收获。姜亮夫先生这里的“秦代史”一语，体现出将秦史研究前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史的思路，在他的学术意识中大概早已形成。

有关两汉社会政治学术文化等方面的论著，姜亮夫先生说：“即以‘《史》《汉》优劣’一个小题而论，我同金鹤望先生有过讨论，因搜集一下过去的讨论，即得文至卅多篇，而一切分别专科，如《地理志》《河渠书》《艺文》《食货》等研究的论文也实在不少。我有过一本《读书朴识》，《史》《汉》的摘记为多，但都是语言文字考证为主，我已收入《商旧录》中。”《桓谭疑年的讨论》则收入《史学论文集》“还有《国策论》上下两篇，主要是说西汉以‘孝治国，加深了中国家庭的牢固性，东汉末以义气相尚，一方面成英雄割据，一方面也成为义气相尚的民风，乃至后世江湖义侠之所由，……”

对于也可以归入汉史研究成果的一篇早期文稿《曹子建与洛神赋》，姜亮夫先生有语极诚恳的回忆。他写道：“……残存一篇《曹子建与洛神赋》，金先生说‘思路奇古，未必服人之心’，不知何人说与季刚黄先生知道，他见我时说：‘你学胡适格式，他以类书为文，你连类书都未翻过。……’这是我一生受严师最重要的一次教诲，从此以后，不依靠类书，也知道了类书对做学问的限度。不知为何，近年来一位河南大学的同学把原稿送还我，我第一次重见此文，近来想想‘严师为难’，决定连这稿也烧掉，以求心之所安。”学术大师面对传统实学“格式”和“严师”“教诲”毅然焚稿以求心安的故事，可以看作学术史的珍闻，作为后生学子，读来不能不深为感动。

浏览《姜亮夫全集》，我们得知，《汉书》研究也曾经为姜亮夫先生所关注。《古史论文集》收入《汉书札林》，有关于《汉书》6篇的札记14条。题下有姜亮夫先生说明：“此余《读书札林》中之残留，全书凡4万余条，在抗战中曾应昆明师范主编之《文史周刊》之求，全稿予之。余遂去苏、沪间一年后乃归，则知为一族间人所据。云南解放后又见毁。此《汉书》笔记数十条，则录在《汉书》之眉者也。遭“文革”之劫，《汉书》失所在，不意女儿昆武为录者尚存，甚是珍惜，其实其不中程者尚居半数，以其灰烬不忍弃，遂全录入云。”作为世纪学者，姜亮夫先生生活和工作的大背景，是“百年间风云变幻，中国的学术进程也是一波三折，路转峰回”（见李学勤《姜亮夫全集序》）。我们不知道已经毁失的姜亮夫《读书札林》“全书凡4万余条”中有多少是“前四史”的笔记，是不是同样“《史》《汉》的摘记为多”，在感叹世势震荡的同时，自然也深深惋惜其中可能多有秦汉史研究心得的佚亡。而“其实其不中程者尚居半数”的自谦之语，对照姜亮夫先生“我们现在学术上的情形，自吹自打，腩不为怪的情形，如此其多，已大可怪”的批评，也可以引发我们深思。至于所谓“不中程”，是十分谦逊的说法。“程”，在这里，仍然可以理解为实学的法度和规范，即我们在前面说到的学术的“大匠”“规矩”。

四、教育生涯

（一）任 教

1940年，姜亮夫应邀到云南大学文法学院和昆明师范学院任教。在云大任教期间，姜亮夫主要开设“《尚书·尧典》新证”“古文字学”和“文学概论”等课程。其中“古文字学”课以甲骨文释词为主，先生积极耐心地

指导学生将甲骨文、金文、籀文、小篆分列排列，从字形形体异同，考察研究其源流演变。他以自己丰富的教学科研经验和渊博求实的知识深深地影响着学生，激发了学生学习钻研的兴趣。

1942年3月，熊庆来校长聘姜亮夫为文法学院院长。他积极投入到文法学院行政管理工作中去，并协助熊庆来校长推进云大的教学改革工作。他在文法学院采取了如下措施：①规定教师讲课，主讲教师主要是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只是帮助或协助教授批改作业。教授、副教授课堂主要讲授其研究心得和成果；②严格学院考试，提高学生素质；③开办讲座，培养和活跃学院的研究风气。上述措施实施后，取得了明显效果，得到熊庆来校长的赞肯，并在全校范围内推广，大大提高了文法学院乃至云大在国内外的学术知名度。

姜亮夫除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中外，还抽时间进行自己心爱的学术研究。他与文史系主任方国瑜通力合作，组建了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并出版了《文字朴识》一书，对西南文化的发掘整理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积极参与中国科学社社友会、中国天文学会等当时中国8个科学团体学术联合年会在云大举行的筹备工作，并任筹备委员。1942年7月，当时云南省主席龙云为提倡学术，促进科学教育事业，指令兴文、劝业两银行拨款项20万元补助云南大学，其中以10万元设立龙氏学术讲座。他在致聘开设的《敦煌经籍校录》系列讲座中，把自己在欧洲研究考古的方法和语言音韵学研究方法介绍到云南大学，开阔了云大师生的视野，增强了学术氛围。

（二）民主活动

姜亮夫积极参加各种民主政治活动：参加云南大学宪政研究会；西南联大与文艺壁报社在至公堂举行纪念鲁迅逝世8周年晚会，姜亮夫即席发表了精彩的学术演讲。1945年1月28日，姜亮夫在《云南日报》发表题为《“一·二八”所得到的》的文章，深刻揭露了日本侵略者从光绪五年侵占琉球以来近70年包括鲸吞东三省的种种罪行及其使用的种种卑劣伎俩，要国人时刻警惕日本侵略者使用“以华治华”破坏国人团结以达到其侵略目的的阴谋诡计。在当时起到了鼓舞民众、争取抗战胜利的巨大作用。抗战胜利后，姜亮夫经顾颉刚介绍到浙江英士大学任文理学院院长。

1948年初，姜亮夫重回昆明师范学院和云南大学任教授，主要著成《屈原赋校注》（7卷）和《屈原赋今译》初稿。这两本巨著后经三稿修正，于1987年由北京出版社再次出版，日本和我国香港、台湾皆有翻印本，且

被多所大学指定为本科生、硕士生必读参考指导教材。1949年4月，姜亮夫被前省主席卢汉任命为云南省教育厅厅长。9月9日，卢汉发动“九九整肃”，姜亮夫任“云南大学整理委员会”整肃委员，10月兼任云南大学校长。12月9日云南和平起义，又被推任为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文教处处长，主要负责维持云南当时的教育秩序和对旧教育的接管、改造工作。1949年12月25日，云南大学各部门陆续恢复工作，大多数师生员工积极参加了“保卫昆明”的有关活动。姜亮夫到云大接见“五联会”（教授会、讲师助教会、职员联合会、工警联谊会、学生系级代表联合会）代表，授意云南大学在过渡时期由“五联会”负责维护校务工作，并提出具体意见，希望云大能尽早尽快恢复学校秩序和开展正常教学科研工作。不久后在姜亮夫指导下云南大学成立了以秦瓚为主任的临时校务执行委员会，负责过渡期间云南大学的一切事务。

从1950年3月起，云南大学迈入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崭新时期，这与姜亮夫在当时所负责的云南省临时军政委员会文教处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同时姜亮夫自身也得到了改造和锻炼，从此走上了人民学者的光辉道路。

滇史巨擘·方国瑜

一、人物概况

方国瑜（1903—1983），字瑞臣，纳西族，教授，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五一街人。当代著名社会科学家、教育家，九三学社成员。1922年毕业于丽江联合中学。1925年在京师大学预科毕业考试期间，因患重病住院治疗并回乡休养多年。1929年秋后相继在京师大学、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师从钱玄同、章太炎、刘半农、余嘉锡、马叔平、陈垣、梁启超、赵元任、李方桂等攻读音韵、训诂、目录、校勘、名物、金石、史地、语言等诸门课程。毕业和结业后曾在京师大学研究院、私立民国大学、洛阳师范学院和云南大学历史系从事教学与研究。历任编辑、教授、云大历史系系主任、云大文法学院院长和云南通志馆的编审、审定、续修委员及云南省民委委员、全国人大民委委员、省博物馆筹委会副主任、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副所长、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副组长、九三学社云南省工委副主任等职。当我们回顾20世纪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方国瑜无疑是20世纪云南最了不起的民族史学大师。他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实事求是的态度、刻苦认真的精神，在中国民族历史、中国西南边疆史地、云南史料目录、东巴文化等方面都做出了震古烁今的杰出成就。



方国瑜毕生致力于云南地方史料的发掘、搜集、整理、校录、辨析和评说；开创了云南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和教学；开拓了中国西南历史地理的研究。人才培养和著述成果丰硕，被史学界誉为“云南地方史和西南民族史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人”。被著名史学家徐中舒称为“南中泰斗 滇史巨擘”。

二、往事集略

（一）学成回乡

1933年秋，长江第一湾的暑气未消，玉龙雪山已银妆素裹。刚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的方国瑜回到魂萦梦绕的家乡。他此次回乡的目的，是要揭开东巴象形文字及东巴文化的神秘面纱。东巴教是流行于丽江一带的巫教，其经书用原始的象形文字（东巴文）书写，多数东巴教徒虽滔滔念诵，却不解字义。方国瑜在导师刘半农的支持下怀着发掘、整理传统文化的志向，不畏山高水险深入到金沙江边的石鼓、巨甸等地考察，首次发现了纳西标音哥巴文摩崖。他虚心向东巴经师求教，潜心钻研，并翻译了东巴文记录的纳西传说《人类起源》及若干经书的章节。经过近半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纳西象形文字谱》的初稿。1934年6月，他满载纳西象形文字资料回到北京。刘半农先生不幸病逝，经董作宾先生介绍，他到南京向赵元任、李方桂先生学习语言学，用国际音标为纳西象形文字标音，编成既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翔实、科学的《纳西象形文字谱》。章太炎先生大为赞赏，欣然为之作序，称此书是研究纳西历史文化的“先导”。郭沫若、吴晗、胡厚宣、周有光等著名学者都认为该书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纳西象形文字谱》，不仅是一本语言文字学的工具书，也是一部关于纳西族社会历史的学术专著，获首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德国科隆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雅纳特教授不远万里到方国瑜门下求教，称他是“纳西语言与历史学之父”。方国瑜先生以求实独创的精神，把鲜为人知的云南纳西族象形文推向全世界。

（二）挑战先锋

方国瑜是云南学术界向西方歪曲历史的所谓学者发起挑战的先锋。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法帝国主义在侵占缅甸、印度支那以及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后，妄图进一步侵入我国云南边疆。西方一些“东方学家”对中国西南历史表现出“特殊的兴趣”。他们打着科学研究的幌子，想方设法收集我国西南边疆史地资料，歪曲历史，伪造史实，为侵略政策张目，干着分裂中国的勾当。把南诏说成是泰族建立的国家，就是西方学者分裂中国西南最卑劣的一个例子。他们精心虚构了一个泰族早期历史的线索，为西方殖民主义侵略云南“制造历史依据”，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方国瑜力



排众议，第一个向西方学术界发起了挑战。1936年他在《益世报》发表《夔人与白子》一文，以令人信服的缜密考究，用历史事实有力地戳穿了西方汉学家们编造的谎言。方国瑜的这个论点自1950年以后被学术界广为接受。连西方和有关国家也改变看法，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这一观点。1981年，一位年轻的美国学者在剑桥大学出版的《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一书中也认为：已经没有任何一点理由坚持南诏国是泰族王国的理论。相反，有更多的资料说明应该抛弃南诏国等于泰族王国这一早已过时的错误方程。方国瑜是在英法帝国主义觊觎云南，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关头，毅然改变研究方向转而考究云南史地的。他始终以学术为武器，为维护祖国统一、反对侵略而战斗。早在20世纪30年代，方国瑜就率先向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有关歪曲云南、贵州历史的谬论发起冲击，用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痛斥其谰言，证明早在公元前109年云南就属于中国汉王朝的一部分。20世纪70年代初，某些国家重弹伯希和老调，方国瑜冒着风险上书中央，揭露其狼子野心，为我国的外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为反对霸权主义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研究领域

1924年，方国瑜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1926年因病休学回家，1929年复学，次年入北京大学国家研究所为国学门研究生，同时在两个学校研读。先后师从钱玄同、余嘉锡、马衡、刘复攻读音韵、训诂、目录、校勘、金石、名物之学，又受高步瀛、吴承仕、黎锦熙诸人的指导，并从陈垣汉改读史学。193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本科，次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研究院编辑员、洛阳师范学院教师、北平民国大学国文系教授。当时北京大学研究所所长刘半农建议他回乡整理研究纳西象形文字。遂于1933年秋回丽江，到石鼓、巨甸考察，发现纳西标音文摩岩，向东巴经师学习，1934年回北京，适刘半农病故，经董作宾介绍，到南京向赵元任、李方桂学习语言学，用国际音标为纳西语标音，编成《纳西象形文字谱》，携往苏州趋谒章太炎求教。并在李根源建议下，于1937年9月到滇西边地考察，完成《滇西边区考察记》一书。

方国瑜1933年回滇时，适逢袁嘉谷、周钟岳、由云龙、赵式铭、方树梅等正筹办纂修《云南通志》，有意约他参与其事。回京时随带《云南备征志》《滇系》等书专心研究，又在南京历史语言研究所及南京图书馆纵览云南地方史料，奠定了从事云南地方史研究的基础。从1931年夏起，他先后任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系主任、文法学院院长。1938年后，又连年任云南

通志馆编审、审定、续修之职，撰写了《建置沿革》《疆域考》《金石考》《宗教考》《族姓考》诸目，并参加了全书的编纂和审定工作。抗日战争期间，他邀约凌纯声、向达、楚图南、闻宥等人编辑出版《西南边疆》杂志，同时任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主任，先后出版丛书 11 种。协助李根源编纂《永昌府文征》，任《保山县志》总纂，编成 30 余册。新中国成立后，方国瑜专心从事云南地方史、民族史研究。1954 年，参加民族识别的领导工作，1956 年参加全国人大常委组织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任云南省民族调查组副组长、云南民族研究所副所长。1954 年周恩来视察云南大学时指示，云大历史系应结合地方特点，加强民族史的教学与研究。同年秋在历史系开设了云南史籍评论课程，写成《云南史料目录解题》，开设彝族史、白族史等课程。历史系创办了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1963 年创设云南民族史研究室；1970 年根据周恩来指示编写《中国历史地图集》，方国瑜任西南组负责人；1972 年完成编绘工作；此后集中精力完成《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方国瑜先生强调，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他的这个主张在 20 世纪 50 年代被诬蔑为“史料挂帅”“史科即史学”的资产阶级观点，遭到不公正的批判。但他并不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意见，他引用马克思关于“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和毛主席关于“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地分析和综合地研究”等论述，证明自己并没有错，坚持把史料的收集与整理作为史学研究的前提，埋头从事云南史料目录的研究。他说，“盖高楼大厦先要有砖瓦，研究历史先要有史料，我心甘情愿地做个烧砖瓦的人，为别人盖高楼建大厦提供砖瓦。”他强调，有人是讲道理摆事实，先说道理再找事实；我是摆事实讲道理，从客观事实出发引出道理，实事求是是我们作学问唯一正确的态度，也是唯一正确的方法。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到 80 年代，方国瑜孜孜不倦地在云南史地学的田野里筚路蓝缕，开拓前进，是云南地方史、西南民族史、西南边疆历史地理诸方面不知疲倦、勇往直前的拓荒者和勤恳踏实的奠基人。他撰写了《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彝族史稿》《汉晋民族史》《滇史论丛》《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方国瑜文集》等大量传世之作。著名史学家徐中舒教授称他是“南中泰斗滇史巨擘”。

民研开拓·江应樑

一、人物概况

江应樑（1901—1988），男，教授，民族学家、教育家。祖籍广西贺县，出生于云南昆明，1932年毕业于暨南大学历史系，1938年在中山大学研究院攻读研究生毕业，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山大学副教授、珠海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所长，云南省政协委员、中国民族研究学会理事、中国百越研究学会名誉理事、中国民族学研究会顾问、中国人类学会理事主席团成员、少数民族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云南省史学会理事等职，中国人类学学会第一届主席团成员。主要从事民族学田野调查、中国西南民族与东南亚民族研究。著有《西南边疆民族论丛》《摆夷的经济文化生活》《傣族史》等。



二、往事集略

（一）穿袈裟的小学生

江应樑是江钟懋之子，江海清之孙，出生在昆明城南江府。江海清是原籍河南淮阳从宋代逐渐向南方迁移，清乾隆时由广东五华迁往广西贺县莲塘第三代江氏客家人；光绪初年，江海清从贺县走出，到贵州谋求发展。他以一介布衣的身份，追随西林籍广西同乡岑毓英，凭着擅常理财、精于计会的本事，深得岑毓英赏识。光绪九年（1883年），岑毓英实授云贵总督，江海清随同到云南任浪穹县知县。光绪十年（1884年）江海清在云南官场屡屡升迁，从五品衔的云龙州知州、沾益州知州，正五品的黑盐井提举司提举、石膏井提举司提举、白盐井提举司提举，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后，

已经升到了三品御道员。

江海清“发达”后，曾数次回贺县老家，因家族人口繁衍，他出资在老屋东南面另建一座围屋，兄弟六人共同享用，称为“新屋”，也就是现在的莲塘江家围屋。在昆明城南，江海清建有一所号称九厅十八井（天井）的大宅院，江应樑就是在这所大宅院出生的。

江海清有两个妻子八个儿子。原配韩氏生四个儿子，一直在贺县老家务农。云南籍妻子黄氏，又生有四子，江钟懋排行老二。同奋发图强努力夺取功名的江海清恰恰相反，江钟懋是个十足的公子哥儿，花钱如流水，最要命的是，江钟懋还吸食鸦片。江海清在广西贺县老家的围屋刚刚落成后撒手西去，江钟懋和他三个兄弟在变卖大宅院后，竟连回贺县老家的盘缠也没有了。那时江应樑刚上小学，就跟随父母住在一间简陋的屋内。江钟懋因为每天都要吸鸦片，虽然他找了一份到省长公署做录事的工作，一家六口人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不久，江钟懋得病，差事丢了，全家靠外祖父接济。

江钟懋 1920 年除夕晚上死去，外祖父出资安葬了他。不久，江应樑的母亲改嫁，母亲在改嫁之前，把二儿子江应槐送给乞丐收养所，把四女儿江应梅送给一个老尼姑，江应樑和三妹江应莲由五伯父江钟政照看。几个月后，心怀不轨的五伯父将三妹卖给了开木行的展家做养女，又过一个月，江应樑被卖给个旧矿主当砂丁，因为江应樑太瘦小，干不了重活没卖成。最后，江应樑愿到五伯父家附近开煤店的吴爷家帮忙照料店铺，五伯父就偷偷摸摸以三十块大洋的价钱把他卖给了吴家。

吴爷，名心圆，祖籍浙江钱塘。吴心圆幼年在昆明中法学校读法文，后来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父亲吴文镜在云南开了个煤柴店。江应樑去吴家时，这家煤柴店由吴爷照管。不久，吴爷的母亲去世了，吴爷就在昆明出家，法号月溪。江应樑跟随月溪师父住在灵光寺。在灵光寺，江应樑穿上了僧服，但每天仍旧到北区小学读书。这段时间，江应樑得到了师祖静安和尚和师父的关爱和照料。不久，师祖静安和尚圆寂。在北区小学最后一学期，月溪师父叫江应樑脱去僧服，换上学生装。

（二）滇西探秘

江应樑先生幼年坎坷，家境贫寒。但他好学上进，于 1925 年考入上海暨南大学预科，次年升入本科。大学期间，江先生博览群书，并撰文投稿，发表了不少文章。1932 年毕业后在暨大附中执教，1936 年，江先生凭论文《研究西南民族计划》考入中山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组，师承朱谦之和杨成志

先生。在中山大学研究院学习期间，江应樑先后到粤北瑶山、海南岛五指山、云南德宏傣族地区作田野调查，考察研究瑶族、傣族及黎苗关系问题，他在云南征集到大量的民族文物，拍摄了许多资料照片，撰写了《云南西部的“摆夷”研究》等多篇论文。他征集的民族文物和拍摄的照片在广州、香港展出后，受到学界和社会的一致好评；撰写的《云南西部的“摆夷”研究》作为毕业论文参加答辩并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被聘为中山大学历史系讲师，讲授中国民族史、西南民族研究等课程。

抗日战争爆发后，江应樑为中山文化教育馆撰写的《抗战中的西南民族问题》一书，作为该馆抗战丛书第53种出版。中山大学迁到云南澄江后，江先生也迁居澄江，此间他多次带学生到澄江、昆明、路南、武定等地作少数民族田野调查。1940年中山大学迁回广东，江应樑留在云南并接受了三个任务：一是到重庆为国民政府教育部开办的边疆民族训练班和边疆学校教授3个月的中国民族史；二是入大凉山调查彝族社会；三是调查西双版纳傣族。江应樑不畏艰险，深入大凉山腹地和西双版纳地区考察，顺利地完成了这三项任务。1947年2月，江应樑回到广州，受聘为中山大学、珠海大学教授，并兼任珠海大学文史系主任。在此期间，他根据多年的调查整理并出版了《西南边疆民族论丛》《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摆夷的经济文化生活》等三部专著。后两部书成为研究彝族、傣族历史文化的经典之作，现被不少大学列为人类学、民族学和民族史专业的研究生必读教材。

1937年，中山大学研究院为深入考察百越民族，与云南省政府洽商后，决定双方各出1000大洋为调查经费，派江应樑以“云南边疆民族考察专员”的名义，到德宏对傣族进行人类学考察。同年秋天，他从大理骑马抵达腾（冲）龙（陵）边区（今德宏州）的第一站芒市。

云南省德宏地区曾被视为化外之区，羸靡之地，由于边地僻远的地理环境，高山大川的阻隔，语言的障碍，加之烟瘴丛生和土匪出没，使得这里长期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状态，极少有外人能进入这个区域。人们将这里视为畏途，“要进夷方坝，先把老婆嫁”“只见娘怀胎，不见儿上街”等民谣就是真实写照；就连天不怕地不怕的马锅头也不敢在夷方坝过雨季；设治局的官员们只在旱季下坝，雨水落地前就匆匆搬往气候凉爽的山区办公。然而在学者江应樑的眼里，德宏却是一块宝地。当他看到不同民族的人们穿着自己独特的服饰，在同一个街子上出售各自独特的物产，他惊叹道：“街子天就是一个民族和人种的博物馆！”

德宏地处中国内陆与南亚两大文化板块之间，受这两种文化的辐射而又

有着自己独特的文明；这里有着特殊的延续了600多年的世袭封建领主政治体制；这里处于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时期，工商业刚刚萌芽；这里南传佛教、基督教、大乘佛教等与原始宗教奇妙共处，外来文字竟然嬗变成了自己的民族文字；这里拥有迥异于汉族地区的丰富多彩的风俗习惯，还有奇特的傣、景颇、德昂、阿昌、傈僳、佤及汉等原住民族混而不合又相依相存的社会现象……这些都让江应樑深深地感到德宏是研究人类学的宝库。

他在芒市、遮放、勐卯、陇川、干崖、盏达、南甸7个土司区考察了5个月，经昆明转回广州时，抗日战争的烽火已烧到南方了，他在日机轰炸中写成《滇西摆夷调查报告》20万字的书稿。1938年8月广州沦陷前，他随中山大学迁入云南。不久他又以中山大学研究院和云大特派民族调查员的身份参加了当时中央振济委员会和云南省政府组织的社会、民族、地质、生物、气象、农业、水利、卫生等多学科组成的滇西考察团，再次到德宏做了为期数月的考察。1940年写成了《滇西摆夷之现实生活》一书。1983年底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力作《傣族史》。

摄影是人类学调查的重要手段，他在德宏考察期间拍摄了约500多张照片，真实地记录了德宏地区各民族社会生活诸方面的风貌，现仅存留162张。由于他拍摄的是滇缅公路通车前德宏的社会状况，所以这批照片有着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2003年12月，德宏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江应樑的遗作《滇西摆夷之现实生活》和《滇西土司区诸族图说》，这两本书的出版发行，使这些弥足珍贵的文字史料和照片得以面世和流传。

1948年10月，江应樑受云南大学聘请，任云南大学教授，先后教授文化人类学、傣族史、彝族史、彝族社会、暹罗史、中国民族史、民族史等专业课程。江先生上课以调查所得的事例为题材，内容翔实，讲解生动，深受学生欢迎和喜爱。同时，他还深入滇南进行民族调查，根据丰富的调查资料写成了《滇南沙甸回族农村调查》。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江应樑

1950年江应樑参加了中央民族访问团并任团委，到云南武定、丽江、维西、芒市等地访问；1951年赴京出席第一届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1953年云南大学院系调整后，江先生转而研究民族史。他把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与民族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发表了《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结合》《人类学的起源及其在我国的发展》等文，出版了《百夷传校注》《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官与土司》等两部著作。“文革”期间，江应樑被诬为“牛鬼蛇神”并

遭迫害。1979年江应樑参与筹建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历史研究所并任所长。1984年，江先生被聘为云南大学博士生导师，带出了一批优秀的博士研究生，其中包括云南省第一位研究民族史的女博士方慧教授。同时他的巨著《傣族史》出版，该书是他长期从事傣族研究的结晶，荣获云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1951年9月，江应樑应邀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民族教育会议。1951年9月20日到达北京，26日在怀仁堂听周恩来总理做报告，9月28日，听朱总司令讲话。10月1日，在观礼台看新中国海陆空大检阅，看四十万人民大游行，看见了毛主席，看见了中央各首长。这是江应樑平生最得意、最光荣的一件事。

1952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江应樑每次运动都被波及。思想改造运动，他由洋楼搬到了土坯房；肃反运动，他被停止了一切学术研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江应樑还是做着梳理史料、汇集史籍的工作。1956年3月到5月初，他写成了8万余字的《明代云南土司土官考》。从5月中旬起，他动手撰写《傣族史稿》，到年底，已完成六章。

1956年11月30日，他又恢复了十余项“本兼各职”，费孝通率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云南民族调查组”到昆明，江应樑参加调查研究工作，并负责傣族研究。他与历史系一些教师前往河西（今通海县）下渔村调查，认为下渔村村民是元初进入云南的蒙古族大军的后裔。回到昆明后，他写成《云南蒙古族》一文。

1957年“反右”运动，江应樑在沉默中奋发，9月16日，他准备撰写《彝族社会》，三个月后，《彝族社会》已全部完稿，计7章，17万字。他抓紧一切时间，从事著述，三度修改了《傣族史稿》，完成并两次修改《彝族社会》，撰写《暹罗史》《中国少数民族近代史》《百夷传集解》《中国少数民族史》（未完稿）及数篇论文，总共近200万言。

1965年，江应樑成为云南大学最先被“打倒”的“反动教授”，罪名是“组织云大三家村”，他挂黑牌、戴高帽、坐“喷气式”、游校、游街；造反派登堂入室、扫“四旧”、抄家，甚至拳脚相加，江应樑痛失已完成的《西南少数民族图集》《百夷传校注》和《傣族史》三部书稿和几十年来他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时拍摄的几千帧资料照片。

1976年粉碎“四人帮”，江应樑开始着手再写《百夷传校注》。

（四）思为梁，应为梁

《百夷传》是明代初年一本史料价值很高的历史文献，记载了500多年

前居住在今天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境内的傣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历史、地理、政治制度、生活习俗等情况，由于此书是作者亲历其境根据见闻写下来的真实事物，所以 500 多年来，一直是地方史志、私家著述广为抄录引用的第一手材料。1978 年初，江应樑完成了《百夷传校注》著作，随后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百夷传校注》的成就主要有二：其一，追溯本源，厘正了几百年来对此书的种种混乱甚至错误的认识。其二，广泛引用古今文献和自己田野考察的资料，探索百夷民族在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习俗等各方面 2000 多年来的发展迹象，并探究壮、傣诸族在族属上的关系及其与古代越人的渊源。

1982 年底，他又完成了《傣族史》的写作。《傣族史》自 1983 年出版，被公认为是傣族研究史最权威的著作。

把人类学和民族史结合起来研究少数民族，是江应樑一生从事研究的最大心得。在《百夷传校注》的写作中，他就是用人类学的方法来校注古籍，到写《傣族史》时，他把文献资料和自己十几年的田野考察结合起来，公开提出了将人类学与民族史研究结合起来的新方向。但这远远不够，他希望这种方法成为一种新的学派，让更多的人用这样的治学方法去研究历史，解决现实。

晚年的江应樑先生不顾年迈体弱，在他的学生林超民博士等人的协助下，从已经发表的百余篇文章中挑出 22 篇经典论文整理成《江应樑民族研究文集》。同时，他还组织编写《中国民族史》。终因积劳成疾，于 1988 年 12 月与世长辞，享年 79 岁。江应樑一生教书育人，笔耕不辍，为云南大学培育了一批博士、硕士研究生和中青年教师，对中国的民族研究，尤其是西南民族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民识第一·杨堃

一、人物概况

杨堃（1901—1998），字象乾，男，汉族。著名民族学家、民俗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又是教育学教授。曾用名杨赤民，笔名有张好礼、杨念基等。1901年10月8日生于河北省大名县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在县里当公务员。杨堃12岁（1913）由私塾转入县第二高等小学，15岁入大名“直隶第十一中学”，几乎年年获奖学金，“五四运动”中上街游行，抵制日货，1920年考入保定直隶农业专门学校留法预备班，结业时名列甲等第三，1921年8月被保送入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杨堃自幼喜欢民间故事和历史读物，这可以说是他后来成为民族学家的滥觞。



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84年，他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7年，他在民族研究所离休，但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兼博士生导师。1998年8月，他在北京病逝，享年97岁。

二、往事集略

1901年10月8日，杨堃出生于河北省大名县一个农民家庭。12岁入大名县第二高等小学，15岁入大名中学，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产生了“新学”可以救国的思想，认为西方的社会学或许是救治中国社会弊端的良药。1920年，杨堃高中毕业，考入保定直隶省立农业专门学校留法预备班，1921年暑期，预备班结业，杨堃以名列甲等第三的成绩留学法国里昂的中法大学。1923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改名杨赤民，不久，国共第一次合作，杨堃加入国民党，被选为国民党驻法总支部里昂支部的宣传委员，后又被选为驻法总支部代表大会里昂支部代表，在巴黎召开的代表大会中被选为驻法总支部宣传委员。当时，杨堃参加了很多政治活动，到处宣传中国革命。中

法大学社会系设在哲学系，杨堃觉得记笔记有一定困难，因此，便决定先学理科，取得了理科硕士学位。1926年暑假后，杨堃转入文科，从师汉学家古恒教授，着手准备撰写文科博士论文。他在校求学期间，还积极投身革命活动。1923年，他经郭隆真介绍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改名杨赤民，并且有幸结识了名震京津的女界风云人物张若名。不久，国共第一次合作，他加入国民党，被选为国民党驻法总支部里昂支部的宣传委员。1926年9月，他作为旅欧华人代表之一，到日内瓦国际联盟会所，宣传北伐战争，拥护广州革命政府，反对北洋军阀政府。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以国民党名义声讨蒋介石。“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杨堃立即退出国民党，并与人一道解散了国民党驻法总支部和里昂支部，为了能继续撰写博士论文，不致影响自己学术上的深造，杨堃接着退出了共青团。他在博士生导师古恒的建议下，专心致志地攻读博士学位，不再从事政治活动。

1928年底完成博士论文初稿《祖先崇拜在中国家族、社会中的地位》。接着杨堃赴巴黎大学进修，师从著名汉学家、社会学家、神话专家葛兰言教授，随后又到巴黎大学民族学学院攻读民族学、体质人类学、语言学和史前考古等学科。同时，还在巴黎高等学术实习学校听“原始宗教”课，又在巴黎民族学博物馆实习。1929年撰写《在法国怎样学社会学》，同时撰写《法国社会学家访问记》。在法期间，杨堃曾利用假期到欧洲各国旅行，参观了几个较大的民族学博物馆和民俗学博物馆，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增强了研究民族学和民俗学的兴趣和信心。1930年，对他来说，是双喜临门的年头，5月30日，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家族中的祖先崇拜》通过答辩，获得了里昂大学文科博士学位；次日，他与里昂中法大学同学张若名女士结婚。不久，张若名女士也以《纪德的态度》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获得了法国文学博士学位。

为了报效祖国，1931年，杨堃和张若名夫妇顶着“中国第一对博士夫妻”的光环回到北平（今北京），轰动了社会，受到了学界的热烈欢迎。杨堃先在河北大学农学院任教，接着先后在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中法大学孔德学院社会科学系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等处任教，主要讲授社会进化史、社会学、普通人类学和民族学诸课程。任教期间



杨堃除阐述法国社会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外，也将自己观察和访问的体会加选了讲义和论文之内，并运用法国民族学派的调查方法指导学生进行实际调查。回国初期，先后翻译了《法国现代社会学》《汪继乃波民俗学》《中国古代的节气与歌谣》等论著，先后参加《鞭策周刊》《西北研究》《社会学刊》等刊物的编辑工作，为《社会学辞典》（孙本文主编）撰写民族学、民俗学等方面辞条数万字，1934年，杨堃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族学会，后任民族学会《民族学报》的编委。1937年，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授原始社会学、当代社会学学说等课。接着，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民俗学、民族学论著，如《社会学文存》（1938年）、《中国家族中的祖先崇拜》（1939年）、《中国儿童生活之民俗学的研究》（与张若名合作，1939年）、《葛兰言中国学研究导论》（1939年）、《社会发展史鸟瞰》（1939年）、《民俗学与民族学》（1940年）等。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大关门，杨堃到北平中法汉学研究所作民俗学专任研究员，负责民族学小组工作，担任《民俗季刊》编委，撰写发表了《民俗学与社会学》《灶神考》等论著，后因人事关系辞去专任研究员职务，到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1947年寒假，到云南大学任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开始民族学的三地调查工作。1947年暑假，加入云南地下党领导的群众组织——“新民主主义者联盟”，被选为“新联”教授会小组长。抗战胜利后，杨堃的主要论著有：《论中国的母系社会制度》（1945年）、《我国民俗运动史略》（1948年）、《云南农村》（1949年）等。

1947年初，杨堃和张若名夫妻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聘，举家南迁昆明，到云南大学执教，杨堃任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张若名为中文系教授。当时，国共两党进入决战阶段，蒋家王朝已走向没落和覆灭。杨堃看清了时局，思想转变很大，他还聘请了留苏进步人士赵岑记为社会学系教授，组织师生学习俄文、政治经济学与新哲学。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们夫妇谢绝了里昂大学的聘请，毅然留在国内，满怀信心地等待新中国的到来。

新中国成立后，杨堃致力于建设新中国的民族学。1951年暑假，与刘尧汉带领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到武定民族地区实习、搜集了许多资料，撰写了调查报告。1953年，他转入历史系任教授并任云南民族史研究室主任。1954年，参加云南省的民族识别工作，写有总结报告。1956年参加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撰写了调查报告。1959年，参加了云南彝族简志的编写工作。1960年，参加四川大凉山彝族的调查工作，写有《凉山彝族的手工业》。1966年到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对哈尼族进行调查，写有《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哈尼族的宗教生活》的调查报告，十多年的

调查工作、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先后撰写了《什么是民族学》（1957年）、《试论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人类的学说》（1957年）、《关于摩尔根的原始社会分期法的重新估价问题》（1964年）等文。

“文革”期间，杨堃被抄家批斗、关牛棚。他的大部分图书资料、读书卡片和手稿都遗失了。尽管身处逆境，仍继续思考民族学的问题。打倒“四人帮”后，杨堃调到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工作，兼在北师大、中央民院授课，讲《民族学概论》。相继出版了《民族与民族学》（1983年）、《民族学概论》（1984年）、《原始社会发展史》（1986年）等专著，发表《论人类起源学的几个问题》（1979年）、《试论原始社会的分期问题》（1980年）、《关于神话学与民族学的几个问题》（1982年）、《中国民俗学运动史略》（1982年）、《民俗学和民族学》（1983年）、《民俗学的历史》（1983年）、《论神话的起源与发展》（1985年）、《女娲考》（1986年）等论文，杨堃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中国神话学会顾问、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等职。1997年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三、学术成果

杨堃在他漫长的民族学民俗学研究生涯中，考察了大量的民间文艺现象，并撰写了一批研究文章，对于民间文艺事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宗教、民俗事象中的民间文艺现象的考察，而尤以对神话的研究为最突出。

（一）对神话的界说、产生与发展及其神话与宗教的关系方面的认识

对于神话的定义与范围，学术界多以马克思那段关于神话的话为依据。杨堃在《神话与民族学》等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马克思关于神话的定义是从文艺的角度来下的，仅适合于原始社会的神话。他认为：“人类童年”时期（原始群时期）不可能产生神话，神话最早仅能产生于五万年至一万年以前，即旧石器时代晚期，亦即晚期智人时代。他以考古资料证明：原始宗教与原始艺术全产生于这个时期。由此出发，杨堃还对神话的发展、演变及消亡做了分析。他认为新石器晚期或石铜并用时期应是原始神话的发展期，这时的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反映在社会意识形态里，对当时神话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期是原始神话的衰亡期，它开始向传说与史诗过渡。到阶级社会后，原始神话并未消失，一部分记于统治阶级的“圣经”之内，一部分流传于民间，成为民间宗教的组成部分。

对于神话的消亡及其与宗教的关系，杨堃认为，任何民族，只要有宗教存在，就有神话存在，神话是宗教的一个组成部分，原始宗教有四个要素：神话、礼仪、巫术、圣物与圣地，阶级社会与宗教亦可归纳为四个因素：神话（“圣经”中的神话）、礼仪（祭祀典礼）、宗教人员及信徒、庙宇和寺院。任何时候，神话都是宗教的组成部分，只要宗教存在一天，神话就存在一天，阶级和宗教消亡的日子，是神话消亡的日子，在神话与迷信的关系问题上，杨堃不完全同意袁珂以“对待命运采取的态度”的区分法。他认为原始人的思想意识是一种尚未完全化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幻想征服大自然，另一方面也向大自然屈服，乞求大自然帮忙，这是原始神话产生的原因，也是原始宗教产生的根源。而宗教与迷信没有严格的区分，相信宗教的人都认为自己的宗教是真理，其他宗教则是迷信，因此，宗教与迷信同在，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迷信依然存在。杨堃不同意民间文学界那种认为“宗教是消极的，神话则是劳动人民的、积极向上的、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的看法。

（二）利用民族学知识和资料研究民间文艺学及原始意识形态

杨堃学术研究中一个明显的特色，是利用民俗资料，民间文艺资料研究民族学问题，同时利用民族学知识和资料来开拓民间文艺、民俗学的研究角度与领域。

杨堃在《女娲考》中说：“我发现，我们的民间文学工作者，仅知从民间文学的观点去调查传说，而不知从民族学的观点或民俗学的观点去调查这一民族、这一地区的风俗习惯和民间生活与民间文化的全貌，那就带有局限性，而说服力不强。”整篇《女娲考》以丰富的民族学资料和民俗学资料，纵横比较研究，深入浅出，洋洋洒洒，对母系氏族社会的意识形态作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得出“我国母系氏族社会的意识形态，便是以母系崇拜为主体，并以反映母系崇拜的图腾主义为基本内容”的结论。文中对女娲由来、女娲与蛙图腾、原始思维、女娲与伏羲等问题，均有自己的见解。1987年杨堃又写出了《图腾主义新探》一文，作为《女娲考》的续篇，在这篇文章中，他进一步论述了图腾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认为彝族、佤族的葫芦崇拜、鸟图腾、虎图腾等都是母体崇拜，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

在另一篇文章里，杨堃以“鲧腹禹”与“产翁制”材料，充分证明了民族学对神话学的贡献。他运用世界上许多民族的有关材料，证明“产翁制”产生的年代不可能太早，同时，又利用这些材料，去补充和分析了我国鲧禹神话的内容。在学术界，多认为“产翁制”发生于因对偶婚制而产生父

亲地位观念的中石器时代。杨堃对这种看法提出商榷，认为“产翁制”的出现比对偶婚制的出现要晚得多，它之发生与对偶婚制之发生没有因果必然联系。“产翁制”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之后的石铜并用期（亦即父权制初期）。这时，男子成为主要生产者，为产翁制这一上层建筑的产生打下了经济基础。为取代母亲在子女中的威望，男子便想方设法将生儿育女之功记在自己账上，这是“产翁制”出现的直接原因。他以美拉尼亚的仇布端安岛人和云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少数民族为例，旁证这种制度发生时代不会太早。反映在我国历史上，“产翁制”时代正是鲧禹神话时代。杨堃认为：顾颉刚、童书业等人研究鲧禹，皆未指出这是一则“产翁”神话，这是一个不足。他在以“产翁制”角度复述这个神话之后，运用民族学的有关知识和材料对鲧禹神话的内容进行了分析补充。他认为鲧腹禹是一种“产翁制”，而涂山氏的行为是一种“不落夫家”的习俗，对鲧变鳖、变龙、变熊等说法，对禹变熊、禹为石所生、涂山氏变石等等都进行了分析阐述。他通过民族图腾和社会习惯等方面知识作分析研究，对传说时代的古史，寻找出具相应的年代和当时社会历史的基本面貌。这种在经济基础变更中寻找原因，在社会劳动分工变更中寻找依据，运用民族学中有关资料来分析神话的方法与角度，为民间文艺学科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除此，杨堃在民间文艺史探讨和国外民间文艺理论翻译介绍诸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就。《我国民俗学运动史略》可说是中国民间文艺的一篇简史，尽管其中观点不无商榷之处，但其史料价值是比较大的，有的甚至填补了民间文艺史的空白，如对抗战时期有关民俗活动的记载。翻译介绍方面，有《汪继乃波民俗学》《中国古代的节令与歌谣》《论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派》等。在让中国学者了解国外民间文艺理论及国外学者对我国民间文艺研究状况，并借鉴其有益成分诸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

杨堃学贯中西，知识渊博，著作等身，是与吴文藻、费孝通齐名的社会学大师。他是我国民族识别理论的创始人，他提出的民族识别标准，成为我国民族划分的基本依据。他的《民族学概论》《社会学与民族学》等经典之作是我国著名大学和学术相关机构专业博士、硕士研究生“铁定”的必读书目。他以非凡的学识，顽强执着的敬业精神，为我国民族和民俗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世纪学人·马曜

一、人物概况

马曜，男，1911年10月11日生，云南洱源人，白族，云南民族学院前院长、名誉院长、教授。1940年西南联合大学中学教师进修班毕业，从事教育、民族工作和学术研究60年，是中国现代教育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和诗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云南大学副教授，中共云南省委边疆民族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边疆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云南大学教授，《思想战线》总编，云南民族学院教授、院长、名誉院长，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第一届会长。专于民族史和民族学，对云南民族史尤有研究。主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白族史》等。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民族学家。



二、往事集略

1927年秋，马曜考入大理省立第二师范初级部就读。在苍山洱海之间幽静的西云书院里他勤奋学习，锐意进取。可是这种安静的读书生活没有持续多久，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的恶风也波及到了大理。地方当局成立“清共委员会”，审查图书，控制学校，逮捕屠杀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大理师范具有进步思想的学生，没有被反动气焰所吓倒，他们奋起抗争。洱源县来的同学组成洱源旅榆同学会，一致推举马曜为会长。他们经常开会，研讨时事，抨击黑暗政治。他们排演的话剧揭露了三塔寺驻军欺压人民的事实。于是驻军百余人跑到学校，打伤不少学生和教师，造成了停课10余天。被激怒的马曜立即写诗作文，谴责反动军警，声援被打师生，开始萌发革命思想。1930年夏天，马曜和一些同学从大理步行到昆明求学。他考入云南省高级农业学校。此时的昆明，表面上因革命失败而显得寂静，但革命的火种仍在地下传播，革命的书刊仍在暗中流传。马曜在此初次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他还如饥似渴地阅读到五四运动以来的进步书刊与新文艺作品。这样他日渐形成了一个强烈的愿望——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他决心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193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到湖北襄阳国民党滇军范石生部队从事秘密策反工作，1937年鼓励、资助罗丰、唐维恭和柯贤廷等三人去延安参加革命。1945年竞选国民党参议员，1946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他利用国民党参议会积极开展反对内战、反对征兵、反对征粮、反对征税的斗争，抗议国民党血腥镇压昆明“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和杀害李公朴、闻一多。

1949年，马曜是地下党云南省工委直接领导下的三人统战工作小组成员，他多次奉命与国民党省主席卢汉谈判，敦促卢汉起义。

新中国成立后，马曜在民族战线上工作，是中共云南省委民族工作五人小组成员，是省民族委员会副秘书长，民族学院院长。1953年，马曜到云南潞西遮放剖析了41个村寨情况，他认为云南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绝不能照搬汉族地区做法，必须从实际出发。马曜认为，应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云南边疆的实际相结合，采取特殊的政策和措施。马曜意识到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主要矛盾不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而是民族的贫困落后问题。

他首先采取了通过民族上层人士联系群众，逐步达到依靠群众推动上层进步的工作方法，大力开展“做好事”“交朋友”的活动。在山官、头人和广大群众中大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和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切实解决群众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及迫切要求。

由于工作做得及时，广泛深入细致，在党的民族政策感召下，外逃的土司（如司拉山）山官、头人终于回来了，从而稳定了大批民族上层人士，避免了工作中的挫折。

马曜先生意识到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土地占有不集中，阶级分化不明显，他首先提出可不必划分阶级和重分土地，通过“和平共处”，“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和文化，通过互助合作，消灭边疆民族的落后和贫困。

马曜先生的意见为中共云南省委所采纳，1954年上半年王连芳同志受省委指派向中央汇报了“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的方案”和“直接过渡”的意见，当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同意云南省委意见，并责成云南省政府实施。

马曜先生的进步思想和民族政策，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很有创新意识，对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做出了重大贡献。实践证明，在民族地区不划分阶级和重分土地“直接过渡”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是云南边疆民族工作上的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创举，是正确处理共同性和特殊性的成功范例。否则在云南边疆 25 个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马曜先生也是一位诗人。他“受化于先君，十四学为诗”，其新中国成立前刊行的《花湖精舍诗初集》收录 1927 到 1948 年 21 年间的诗作，计 261 首，先后作于上海、庐山、福建、香港，大多写于云南。季羨林、罗庸、刘文典等名家称赞他的诗“品高学粹”“造诣精湛，深入化境”“缘情感物，芳烈动人”。马曜先生的诗，无论是感时伤世、赠友言志，还是叙飘泊生涯、写南天风光，都充满着爱国恋乡的深情。在外忧内患、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之际，诗人的忧患危虑，奔走呐喊，处处折射出时代的闪光，令人心灵震颤。

1930 年冬，马曜到上海求学，寻求救国真理。19 岁的苍洱之子，仗剑远游，既有一腔沸腾的热血，也有上下求索之彷徨，《病榻口占》之一，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下写成的。诗云：

海山一卧惊秋去，映眼溪光沐四围。
斜日新投红叶瘦，繁霜初点菊心肥。
梦余口角衔悲在，肠断乡音系鸟飞。
小案云回消逝影，垂杨雨雪足沾衣。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山河破碎、风雨飘摇，“边荒迷白骨，陋巷有寒衣”，深重的苦难现实，无时无刻不使马曜触目惊心。1936 年，他在忧愤中呐喊：

大地不平山突兀，苍天有泪雨滂沱。
欲将积愆浇江海，转觉波涛自此多。

1948 年，当时有“民主堡垒”之誉的春城昆明，学潮迭起。7 月 15 日，二千余军警逮捕大批罢课学生，制造了“七·一五”事件。当日，他写成《七月十五日即事》，借以抒发他内心无比的愤懑：

正气真存不帝秦，刀光剑影警鸡晨。
悬空万目睽睽处，知是田横五百人。

作为一位成长于茈碧湖边和洱海之滨的白族诗人，家乡美丽的山山水水，都使马曜魂牵梦萦。在他的诗里，他深情地赞美家乡的一草一木，倾诉着对家乡、民族的炽热感情（选自《苍洱杂咏》）：

江上桃花照眼明，江头落日半轮倾。暂欢若问经年别，指点苍山雪一茎。（之一）

孤村俯海簇榆枌，螺壳蜗涎篆梦纹。阖户苍山生眼底，朝朝目断望夫云。（之八）

云乡纷拥赤城霞，十九峰头是处家。百二雄关收夕照，江山终古即天涯。（之十）

马曜先生的一生，从一个白族爱国青年到慷慨激昂的社会活动家，再到垂范后世的博学鸿儒，走过了辉煌而坎坷的道路。季羨林先生称赞他为“云南学界领袖群伦”“道德文章并重”的大家。在后辈学人和学生眼中，他始终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先生和长者。

三、卓越贡献

（一）云南民族研究的开创者

云南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省份，然而省内到底有多少个少数民族，具体情形如何，以往的政府却从未组织过翔实的调查。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高度关注边疆民族问题，将民族工作视为边疆稳定、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少数民族识别和调查工作。作为云南著名的少数民族学者，马曜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省委民族工作五人小组的成员。1950年，他受命组建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任副秘书长。马曜先生深知民族工作的重要性，而且作为学者，他清醒地意识到这项重大的工程不可贪功冒进。他在晚年曾总结道：“民族调查研究一定要走在民族工作的前面。”这是一条基本经验，也是马先生从事相关工作之初就坚持的理念，马曜先生也为此付出了大量的艰辛劳动。

1953年6月，马曜率领工作组到德宏地区潞西县遮放区西山景颇族聚居区调查研究。在30多天的实地考察结束后，马曜先生结合以往的民族研究经验，于同年7月份写成了《从遮放西山区的情况看景颇、崩龙等族地区的生产问题》的报告（崩龙即今德昂族）。此后，他率领的工作组又在西山区调研40多天，写出了《关于遮放西山景颇族地区团结生产的初步意见》的

报告。在这两份报告的基础上，马曜先生向省政府提出，景颇族地区土地集中程度不高，阶级分化不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不是阶级矛盾，而是落后的生产技术和原始迷信造成的陈规陋习。因此，他建议在景颇聚居地区不搞土地改革，而是大力发展经济和文化，通过互助合作，消灭原始落后的因素，并完成某些环节的民主改革任务，逐步地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他提出的“直接过渡”理论，在云南民族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是切合当地民族社会实际的科学论断，极大地促进了云南民族社会的跨越式发展。1959年，他出任中缅勘界办公室副主任，亲率勘察队，跋涉在2000余公里长的中缅边界线上，饥餐渴饮，日晒雨淋，在极艰苦、极危险的条件下，完成了中缅勘界工作。

马曜先生的学术代表作是与缪鸾和合著的《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一书。长久以来由于受困于史料缺乏，史学界对于西周的社会面貌始终语焉不详。马曜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对西双版纳三十几个土司共奉宣慰使的政治结构深感兴趣，他认为这种结构与西周井田制极为相似。1963年，马曜与缪鸾和合作发表了长达十万字的论文《从西双版纳看西周》，引起学界高度重视。经过深入挖掘之后，这项研究成果于1989年以34万字的著作面世。著名学者朱家桢认为，这本著作继承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方法，对解开西周“井田制”之谜提供了一把钥匙。自从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后，以地下考古发现佐证书面文献的研究方式为我们揭去了罩在历史上的一层面纱。而马先生的这部著作，则是从民族学研究旁证历史的一次大胆尝试，是为人所乐道的“三重证据法”的一项重要成果。

除此之外，马曜先生还编著了不少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献。先生在任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常务副主任编委期间，组织编写了《白族简史》《彝族简史》等16种少数民族简史，17本各民族调查资料，6种民族语言志，约占全国“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三分之一。他主持编写的《云南简史》和《云南各民族古代史略》是在学术界影响较大的两部地方通史。前者于1984年荣获全国爱国主义优秀通俗读物奖，这也是云南出版的社会科学读物第一次获得全国性的奖励。他主编的《云南民族工作四十年》同样是云南民族学界的一笔宝贵财富。

作为一名白族出身的学者，马曜先生对于大理白族的历史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和精深的阐述。早在20世纪50年代，为纪念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他写下《白族对祖国文化的贡献》的论文，从古代洱海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白

族的正式形成、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族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城市的修筑以及白族在文学、音乐、绘画、雕刻方面的成就，白族善于吸收和融合其他民族的文化而创造出自己的民族文化、沟通东南亚、南亚各国与祖国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关系等方面，高度概括地总结了白族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和文化发展的重大贡献。在《论大理文化》中，他站在时代的前沿提出并回答了“大理文明的文化生态环境”的问题。2000年发表的《白族异源同流说》，则是一位耄耋老人对于白族族源的深入思考，充分表现出了一位不断完善和超越自己，不断推陈出新的学问大家的风范，为后来的白族学者树立了一个光辉榜样。

（二）在民族学方面首倡“直接过渡”

1953年，马曜到德宏地区潞西县遮放区西山景颇族聚居区长期调查，了解41个村寨的情况，同时结合过去群众工作实践，依据第一手材料，认为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绝不能照搬汉族地区的做法，而必须从实际出发，采取特殊的政策和措施。为此，他提出以景颇族为代表的边疆9个少数民族地区（包括景颇、傈僳、独龙、怒、佤、布朗、基诺、德昂及其他相关民族），由于土地不集中，阶级分化不明显，不应把土地改革作为一个革命运动阶段来进行，可以不重分土地，不划阶级，在国家帮助下，发展经济、文化和互助合作，逐步完成某些环节的民主改革任务，直接过渡，历史已经证明，对云南边疆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直接过渡，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正确的。

这个问题的提出，既有较高的理论价值，也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历史还说明，在云南提出这个问题的，首先应提到马曜。正如当事人，时任中共云南省边疆工作委员会副书记的王连芳在回忆录中就说：“怎样使阶级分化不明显的民族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民族部门和边疆地区的领导都不同程度地进行酝酿。这些酝酿和试验当然是一种新思想形成的必然过程，但我至今仍然认为，对这些地区实行直接过渡比较系统的正式建议，并促成其为省委的决定，则是马曜同志的贡献。”王连芳进一步说：“直接过渡的具体实践是从德宏地区开始的，不久由点到面开展起来。”

（三）在历史学方面首创“三重证评价”法

马曜在历史学研究中，首创了“三重证评价”法，成为运用民族学、民族史资料，结合考古资料、文献资料，研究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开拓者之一。

马曜与缪鸾和合作，进行多年的民族调查，发现云南大多数民族中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而且有亚细亚所有制典型的土地集体所有，私人占有的农村公社制度，在西双版纳傣族地区保存得最为完整。经过长时期的调查和研究，马曜与缪鸾和合作发表了长达 10 万字的《从西双版纳看西周》一文。该文通过对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的比较研究，明确倾向于西周封建论的观点，这是运用民族资料研究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一篇重要文章。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史学界的注意，老一辈史学家范文澜表示支持，宋蜀华、束世澂等学者也表示赞同。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吉林大学名誉教授匡亚明还说：“关于中国西周社会性质问题，至今尚有争论。如果现有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还不够作为解决问题的充分论据的话，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正和摩尔根所做的那样，马曜、缪鸾和二同志把建国前西双版纳所处的领主封建社会的活生生的现实丰富材料，从民族学的角度，向我们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解开西周社会性质之谜的钥匙，不也是同样可以说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贡献吗？”

马曜又经过几年的努力（缪鸾和同志于 1979 年去世），在原著基础上进行修订，补充了几章，终于完成《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一书，约 34 万字，于 1989 年出版。

马曜先生在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基础上，又加上民族调查资料、民族学资料，来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创造了“三重证评价”法。用“三重证评价”法论述西周井田制问题，成为马曜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重要依据。

四、部分著作

马曜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教育家和诗人，一生著作颇丰，主要有《云南古代史》《白族简史》《白族异源同流说》《庄蹻起义与开滇的历史功绩》《云南简史》《孔子评论》和《马曜学术论著自选辑》等 203 篇。马曜先生 2006 年 2 月 6 日逝世，享年 96 岁。

民史肇始·尤中

一、人物概况

尤中，男，云南宣威人，1927年4月生。中国民族史硕士，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民族史博士研究生导师。

尤中教授是中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20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秉承其深厚的学术传统，一生致力于地方史、民族史的研究，研究范围及于地方史、地方沿革史、云南民族史、西南民族史乃至中华民族发展史等领域，其中尤以民族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成就斐然，成为中国民族史研究领域之巨擘。

二、人物生平

尤中1954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后留校任教。先后担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主讲少数民族文学等课程。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审批准为中国民族史博士研究生导师。1983年至2000年间，共培养了20多名硕士、14名博士，还指导了美、日等国研究生多人。

三、主要任职经历及荣誉

尤中曾任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史教研室副主任、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所长，兼西南古籍研究所所长，中国百越民族研究学会副会长，《云南省志》副总纂，云南省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历史地理》《中华一统丛书》编委，云南省第六届、第七届人大常委。尤中教授自1954年执教以来，一直从事中国民族史的教学和研究，先后出版专著九部，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共计三百余万字。并主编出版学术刊物两种，参著、点校著作三部。1987年，被云南省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称号。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四、主编教材及研究成果

尤中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地方史、民族史的研究。研究范围及于地方史、地方沿革史、云南民族史、西南民族史乃至中华民族发展史等领域。

1989年以前，先后撰写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教材共八种，均已公开出版。其中本科生教材之一《云南民族史》，1995年获国家教委第三届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同时获云南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硕士生教材之一《中国西南民族史》，1989年获云南省教育厅科研成果一等奖；博士生教材之一《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1992年获云南大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此外，还公开出版了《尤中文集》《尤中诗文选集》《西南民族史论集》《夔古通纪浅述校注》等。主编的书刊有《西南民族历史研究集刊》《西南古籍研究》《西南民族史研究》《中国民族史研究》。参著有《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主编）、《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等。

五、媒体评价

史笔书尽往古事 留得宁静和淡泊

李沙青

“七十余年勤学业，文林跋涉未停歇，史笔书尽往古事，留得宁静和淡泊。”这是2005年3月25日，尤中自叙的一首诗，藉以表达其耗时51年之久的心血之作《中华民族发展史》完稿时的心情。这部460多万字的著作预计今年9月公开出版发行。

尤老已79岁高龄，仍精神矍铄，思路清晰。1954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并留校任教的尤中开始讲授云南民族史。本来，他的教学和科研方向只是云南民族史，但胡适的一句话“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给了他启迪和思考。他认为，如果只局限在云南这个地域范围内的研究，不可能把云南民族史讲清楚，因为云南各民族历史的发展，与全国各民族，包括汉族在内的历史发展不可分割，所以尤中就下决心要建造一座自己的金字塔。

几十年如一日，尤中始终坚持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在对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变化有深刻了解和正确把握的基础上，他先后写出了《云南民族史》《中国西南民族史》等8部著作，这些著作都以严谨的文风、独到的见解引

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其中，《云南民族史》获国家教委第三届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中国西南民族史》获省教育厅科研成果一等奖。而即将公开发行的《中华民族发展史》则被列入云南大学“211工程”建设项目，得到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金资助。有评价说“过去出版的各种中国民族专著，实际上都是讲述中国少数民族史，并不包括汉族在内。《中华民族发展史》则是阐述以汉族为主体的各兄弟民族的共同发展史，这在国内史学界实属首创，是迄今为止全国唯一的一部完整的、真实的中华民族史。”

秉笔直书，是史学传统，也是尤中的做人原则。他在中华民族史的园地里辛勤耕耘，辛勤教学。从1983年至今，已培养了20多名硕士生、14名博士生。今年是尤中先生从事学术活动60周年，“认认真真教了一辈子书、吃了半个世纪粉笔灰、写出了8部教材的教书匠。”这就是尤中对自己的总结。

链接：尤中，中国民族史博导，曾任云大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所长、西南古籍研究所所长等职，省第六、七届人大常委会委员。1987年，省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光荣称号，1992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出版了《尤中诗文选集》《西南民族史论集》等书。

（原载《云南日报》2006年7月28日，有删节）

南天一柱·汪宁生

一、人物概况

汪宁生，1930年出生于南京，原籍江苏省灌云县。曾在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任教。曾任云南民族大学历史系主任，考古学和民族学教授，民族研究首席科学家，世界人类学学者。他的名字被列入《世界杰出人物索引》《世界五千名人录》和《中国文化名人大词典》。对民族学和人类学有较深的研究。云南民族大学成立了长期以汪宁生为顾问的云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此举是该校之所以能加快民族学重点学科建设，提高学术创新能力，突出学科优势的一个举措。



汪宁生从事民族学及考古学研究五十余年，被评为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他著作丰富，重要论著约100万字，大都收入《汪宁生论著萃编》（上下）。他的丰硕成果受到国内外同行赞许；曾获美国著名的罗氏奖金；曾受聘担任德国海德堡大学客座教授和美国费城人类问题研究所荣誉高级研究员。

二、部分履历

汪宁生7岁时就读于南京建邺路小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其父因供职于当时国民政府经济部商标局而随迁至重庆，汪宁生祖母吴太夫人则率领全家辗转逃难于灌云西南地区农村各地。在汪宁生10~11岁时，因灌云县士绅不愿自家子弟入日伪学校，所以汪宁生进入私塾，学习《论语》《孟子》《古文观止》等古籍，同时接受了英文等课程的启蒙教育。这段学习经历，为汪宁生后来从事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及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奠定了基础。

1949年，汪宁生参加革命工作，同年考入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习，旋即被派往无锡农村参加土改工作。

20世纪50年代的北大虽经历次政治运动，但远绍清儒考证之学近接五四以后以科学方法整理国学之传统，北大的文史研究仍然扎实而厚重，北大历史系尤为中国古代史及考古史学界著名学者集中之地，汪宁生受业于向达、邓广铭、苏秉琦、宿白、阎文儒、夏鼐、唐兰等史学、考古学大师。

1952年，汪宁生任华东水利学院（今河海大学）职员。

1954年，汪宁生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考古学，从此确定了其今后的人生道路，北京大学的学子生涯影响了他今后一生的为人与为学。

1959年，汪宁生大学毕业，留校任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秦汉考古”课助教。一年后不满组织不尊重其学术旨趣安排其报考“隋唐史”研究生的行为，遂以“交白卷”方式表示无声之抗议，于是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工作。所谓祸福相依，这一变故，反而成就了汪宁生在中国乃至世界民族考古学、人类学领域的杰出贡献。从1960年起，汪宁生即参加由全国人大统一领导的云南民族调查组，到四川茂汶、凉山及黔西北、滇东北调查，此时他对民族调查毫无兴趣，但这段经历却为他以后的一生与民族学田野调查研究结下的不解之缘奠定了基础。

1963年，汪宁生回到中央民族学院，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汇聚了诸如潘光旦、费孝通、吴文藻、林耀华、闻宥、宋蜀华、马学良等民族研究领域的权威和著名学者，汪宁生因无课可上，便借暇饱览国内外人类学著作，并经常得到这些前辈学者的指点，不甘平庸、求知若渴的汪宁生吮吸着人类学养分，投身于民族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兴趣渐生渐浓：受顾颉刚《浪口村随笔》（1963年改名《史学杂识》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影响，开始关注运用今日可见之民族志资料与中国古史之记载以及现今考古之发现进行类比——验证、进而揭示历史之本来面目的民族考古学方法的学习、探索，并在以后的研究加以运用，为西南古史中一些疑难问题的解决奉献了他的智慧。

1964年底，汪宁生由中央民族学院调到云南省历史研究所工作，从此开始了他此后40多年从未间断的民族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田野研究。

1979年，汪宁生调入云南民族学院工作至今，为云南民族学院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发挥出了重要作用。

三、部分著作

《几个南诏城址的考察》一文为云南《学术研究》1962年第11期所刊载。

《释晋宁石寨山出土铜片上的图画文字》（载《文物》1964年第5期）一文，通过把铜片上的图画符号与中、外民族学，考古学资料进行严谨的类比后，形成这些符号“基本上仍是一种图画文字……仍属于原始纪事范畴，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文字”的结论，迄今为止尚无人能以令人信服的论据或论述反驳之。1965年在历时半年多的滇西南边境各县的调查中，发现沧源崖画。

1966—1975年，在不少人兴趣盎然于轰轰烈烈的“与人斗其乐无穷”之“革命”时，汪宁生却“难得糊涂”地潜心于汇集云南已发表之考古资料、调查搜集民族文物并着手从事德国学者利普斯之《事物起源》一书之翻译工作（1982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2000年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再版）。

1973—1976年间，参加编写《云南各族古代史略》，完成工作之余，忙中偷闲又完成了以后一系列重要论文初稿的撰写。

1976年，《八卦起源》发表于《考古》1976年第4期，利用凉山彝族等西南少数民族中流行的“数卜法”，推论《周易》中的八卦起源于“古代巫师举行筮法时所使用的一种表数符号”，从而推翻了伏羲画八卦的传统说法，也否定了近代以来八卦起源于龟卜兆纹、男女生殖器、上古文字等一些毫无根据的推测。

1978年，《试论中国古代铜鼓》一文发表于当年《考古学报》第2期，不仅回答了铜鼓源于木鼓的问题，而且确定了铜鼓最早起源于中国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和贵州省西部，其对铜鼓类型所作的“六分法”以及有关铜鼓发展演变问题的推论，在今日之铜鼓研究中仍有重大影响。

1979年《考古学报》第4期刊载其论文《晋宁石寨山青铜器所见古代民族考》。

1980年，汪宁生之代表作《云南考古》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1992年再版）。

1981年，《原始纪事和文字发明》发表于《考古学报》第1期，《释“武王伐纣前歌后武”》在《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

1984年在阿德雷得召开的澳大利亚亚洲研究会议上宣读《云南崖画》论文，不久又在墨尔本 La Trobe 大学作同样题目的演讲，该文旋即为澳大利亚《Rock Art Research》杂志所发表，此为云南崖画研究的第一篇英文论文。

1985年《沧源崖画的发现与研究》一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1986年在美国召开的“古代中国及社会科学一般法则”学术会议上宣读了《仰韶文化葬俗和社会组织研究》论文（后由美国《Eerly China》刊

载)，这是中国第一篇反对古典进化论的学术论文。

1986年8月参加在英国南安普顿召开的“世界考古学大会”，宣读了《云南青铜器上所见之古代族群》英文论文。

1987年，《从原始计量到度量衡制度的形成》发表于《考古学报》第3期，《谈民族考古学一文》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

1989年，引发了汪宁生良多感慨并引以为自豪的《民族考古学论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论集汇聚了他1989年以前的民族考古学研究成果，集中反映了他从事民族考古学研究在学术思想、研究方法方面的发展历程，记得论集出版后不久他曾说：“中国考古界能出版这样的论文集者不多啊！”（截止到1989年时）

1989年，《铜鼓与南方民族》（吉林教育出版社）、《中国西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云南民族出版社）相继出版发行。

1990年后，开始把历年利用民族志资料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心得，撰写成短文SLIP，以《古俗新研》专栏形式先后在《中国文物报》、中国台湾《大陆杂志》和香港《华侨日报·学林》发表。

汪宁生聪颖好学，思维敏捷，眼光独到。一生研究涉及崖壁艺术、南诏大理国诸城址之考证、云南考古材料的综合整理（特别是对云南青铜器的考释和研究）、西南民族历史研究等领域，所著与作，始终坚持“务陈言之尽去，乃他人所未发”的原则，对顾颉刚先生的教导“搞东西总是要事先把材料搞全”、为社会“做真实之贡献”奉行不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科学态度在他一生的为人为学中得到充分体现，他在民族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的独到见解，奠定了他在学术界举足轻重的地位。

汪宁生一生著述颇丰，称之为“硕果累累”或“璀璨夺目”亦不为过。迄今为止，已出版论文集4种、专著4种、译著1种、日记1种，发表论文数十篇（绝大部分刊载于今天我们孜孜以求的所谓“国家级刊物”上）。汪宁生是中国民族考古学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人物。

滇史领军人·谢本书

一、人物简介

谢本书，1936年（丙午年）5月出生，四川邛崃人，教授，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曾任云南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副教授、系副主任，云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等。现任云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兼云南省社科联副主席，中国史学会理事，云南省史学会会长，南京大学、云南大学客座教授，重庆市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广西民族大学汉族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南京郑和研究会特约研究员等。



二、谢本书教授科研风采录

创新，是科学研究的生命。只有创新，科学研究才有强大的生命力。谢本书教授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40多年来，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创新之路，取得了丰硕的科学研究成果，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注目。

谢本书教授15岁参加工作时只有初中文化水平，业余时间发奋学习，1954年考入云南大学，学习历史专业。在校期间学习刻苦，成绩显著，深受方国瑜、江应樑、张德光等教授的器重。1959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从事教学工作。他勇于开拓创新，主动承担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新课程的讲授，编写出了讲义。这本讲义得到著名历史学家黎澍的赏识，因此，谢本书被借调到北京参加高校《史学概论》教材编写工作。由于工作关系，接触过不少史学专家，如黎澍、翦伯赞等名家，他抓住机遇向名师学习请教，这也是他提高创新能力的成功经验之一。1972年应黎澍要求，谢本书被借调到北京参加《沙俄侵华史》编写工作，1974年又借调到《历史研究》任编辑。谢本书教授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由于黎澍研究员的两次推荐，

我从边疆云南借调到北京工作，合计时间长达六年之久，这对于我拜访名家、开阔眼界、搜集资料、吸收先进方法、从事研究工作，是很大的帮助。”

谢本书教授创新研究的第二个经验是坚持自学。他在《治学者，自学也！》一文中写道：“我虽然有一张大学毕业文凭，但是我仍然欣赏先辈学者们的经验之谈。学问是从自学开始的，没有自学也就没有真正的学问。所谓自学，就是要自己去学，有计划有目的有抱负地自己学习。学校的学习，严格地说来，只是为自学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一个人能否在学术上取得成就，与能否实实在在地自学，或能否善于自学，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因此，所谓治学者，在我看来，也就是自学也。”

学术研究要选择薄弱环节和空白领域，这是谢本书教授创新研究的第三个经验。要创新就得走自己的路，研究探索前人没有研究过的领域，如《北洋军阀》《蔡锷传》《护国运动史》《唐继尧评传》《西南军阀史》《龙云传》等，这些研究课题难度比较大，没有研究成果可供借鉴，资料只能自己搜集，自己研究，其研究成果都属于该领域的第一步。方向选准了，创新才能出成果。

要对读者负责，为读者提供最好的研究成果。写书、写文章要想到读者，要为读者提供有价值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材料、新启示，对读者有所帮助。这是谢本书教授的第四个创新经验。要创新，就要刻苦钻研，脚踏实地，严格要求自己，没有创新就不动笔。正是因为这种治学精神，谢本书教授出版的几十部著作深受读者的喜爱，显示出其学术成果的生命力。

（一）开拓创新结硕果

谢本书教授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40多年来，不断开拓创新，取得了一批又一批的丰硕研究成果。他的著述颇丰，涉及中国近现代史、西南地区史、云南近现代史、史学理论、历史人物、民族问题等领域。

谢本书教授先后出版了《北洋军阀》《话说北洋军阀》《李文学起义》《沙俄侵华史》《云南辛亥革命资料》《历史科学概论》《蔡锷传》《袁世凯与北洋军阀》《护国运动史》《唐继尧评传》《中国革命史》《龙云传》《近代滇史探索》《蒋介石与西南地方实力派》《卢汉传》《西南军阀史》《近代云南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斗争》《张冲传》《云南近代史》《西南十军阀》《历史文化资源研究》《云南抗日战争史》《云南民族政治制度史》《抗战时期的西南大后方》《近代昆明城市史》等50多部专著、合著，发表论文500多篇，总计900多万字。其中许多论著都属于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如《蔡锷

传》《护国运动史》《龙云传》《唐继尧评传》《张冲传》等。谢本书教授的论著视觉独特，富有新意；内容丰富、主题鲜明；资料翔实，准确可靠；通俗易懂，文字流畅。不仅受到专家学者的好评，而且受到广大普通读者的欢迎。

谢本书教授还承担了一些科研项目，如完成了云南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三个代表”与民族精神（2001—2003年）》等。

（二）把毕生精力献给学术创新事业

谢本书教授1999年退休以后，仍然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创新工作，退而不休，决心把自己毕生精力献给学术创新事业。退休以来，出版了《民国元老李根源》《战士学者艾思奇》《走自己的路——谢本书史论集》《救亡图存》（中国近代史话第七卷）、《捍卫共和》（中国近代史话第十卷）、《昆明史话》《世纪学人马曜评传》《腾冲史话》《枫叶如丹》《民国劲旅 滇军风云》等10多部论著和合著，发表了论文数十篇。

学术研究已成为谢本书教授生活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内容，生命不止，学术创新不断。他说：“特别是一些薄弱的领域，自己积累了大量资料，一定要出成果，做奉献。这也是自己的社会责任，不能忘记啊！”

谢本书教授在职期间，不仅出了大量的科学创新成果，还兼任过繁重的行政工作职责，如云大历史系副主任、云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云南省社科联专职副主席、云南民族大学历史系主任、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云南历史学会会长、云南省志副总纂、云南大学客座教授等。1989年谢本书教授被云南省人民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称号，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基诺族之父·杜玉亭

杜玉亭，生于1935年1月29日（农历甲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家在鲁西茌平县的贫瘠农村，世代务农。日本侵略军的暴行至今还存在他幼年时的朦胧记忆中。5岁时父亲杜希程参加中共抗日地方武装被捕，在敌人的毒刑下坚贞不屈，拒不招供。后来日寇又将祖父杜春阁抓去，老人家与父亲一同怒斥敌寇。最后，两人被活埋于一坑，壮烈牺牲。此时杜玉亭的三弟玉海尚未出世，一家难以生存，母亲只好将他寄养于外祖父家，读至小学五年级辍学，返家务农。1947年杜玉亭13岁时在解放区“大参军”运动中报名参军，经历淮海、渡江、解放大西南三大战役。1951—1954年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秘书处工作。1954年考入云南大学历史系。1958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1963年晋升助理研究员。1975年因“十年浩劫”造成的家庭灾难调至云南大学《思想战线》编辑部工作。1977年调云南大学历史研究所工作，1979年晋升副研究员；1980年历史所归属新建的云南省社会科学院，1983年晋升研究员。



1954年杜玉亭考入云南大学历史系，1958年毕业后分配于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旋即参加云南省少数民族调查组，从事彝、蒙古、基诺等民族的调查研究。1960年开始研究蒙古史。1966年作为中国科学院学术考察组成员赴坦桑尼亚进行社会历史考察。1983年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同年晋升为研究员，并兼任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目前侧重于云南蒙古族史和元代云南史的研究。主要论著有《忽必烈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发表于《历史研究》1978年第2期的《云南蒙古族简史》，与陈吕范合著由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出版的《元代罗罗斯史料辑考》，四川民族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忽必烈与云南》，《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刊载的《兀良合台出师安南考》，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出版的《蒙古史研究》等。

第二编

文化诠释——边疆民族文化垦殖者

求是新天地·王天玺

一、人物概况

王天玺，彝族，1942年10月生，云南云县人，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1966年9月参加工作。历任第五届中共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1995年8月当选为第六届中共云南省委常委；1995年11月当选为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副理事长；后任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至2001年12月）及《求是》杂志总编辑，现任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是中共十五大代表，第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求是》研究所所长。代表著作有《“三个代表”兴中华》《民族法概论》《宇宙源流论》《先民的智慧》《中国模式论》《中美关系论》等。



熟悉他的人说：“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那些看似枯燥的政治理论在他口中化为清泉，汨汨流出。神奇，出众，怎样惊叹都不为过。几个小时的讲话，没有讲稿和提纲，却毫不重复，没有一丝逻辑的混乱。做到这个层次实在不容易。”

熟悉他的人说，“他总是能够最快地找到解决问题的切入点，理论联系实际，准确而及时地选准方向。他研究生毕业后直接到中央工作，随后从中央到地方，接下来再到中央。而他大学毕业后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西部最不起眼的地方。”

熟悉他的人说，“奔忙几十年，现在，他可有自己的闲适了……下棋、打牌，他还自编了‘王氏运动法’‘王氏健身操’；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早已习惯了在休息时间与他一起来锻炼。”

二、往事集略及贡献

（一）建设磷矿，扎根基层

从贵阳出发，在山路上颠簸了五个小时之后，一车满怀豪情壮志、准备在基层大展身手的年轻人终于来到了名为“洋水”的夹皮沟。

就这样，毕业后，王天玺如愿以偿，与其他几百位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一起，到了“最艰苦、最边远的地方”——一座远在贵州深山的磷矿。竹子、泥巴和瓦片拼凑而成的房子，时时有不期而至的各色蛇类造访。

“当时生产不正常，我们就主动来到子弟中学做老师。磷矿没有高中，我们就自己办起了高中。不同专业的同学正好担任不同科目的老师。”就这样，闲不住的年轻人给当地留下了一所高中。这所高中成为他们留下的最宝贵财富之一。

1977年，他决定考研。那是“文革”结束后第一批研究生报名考试，积压了几届的学生蜂拥而至，竞争激烈可想而知。所幸，在生产一线，他一直为党内外同志讲解《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等课程，没有完全脱离理论学习。

而且，“我接受了师大良好学风的陶冶，接受了系统的知识教育。”说起自己的母校，王天玺满是感激。

“文革”后期，当大家沉浸在大串联的狂热之时，王天玺悄悄回到校园，一头扎进图书馆。他在不安分的校园里，静静读了马列著作，读了古典文献，读了《二十四史》《资本论》等经典著作。“我们年轻时遇到的‘文革’风暴，对国家来说，是灾难；对青年来说，可以看作是很好的锻炼。”

在矿场，王天玺一直与一线矿工工作、生活在一起。“这8年时间，是我认识社会非常重要的阶段。对社会最底层是什么情况，群众贫穷到什么程度，都有了直接的体会。后来在不同岗位上做领导工作，联系实际解决问题的思路都得益于此。”

“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有一种使命感，为社会做贡献的使命感。”后来的事实告诉我们，他的使命感与年龄无关。

（二）彩云之南，高山之巅

研究生阶段，因为理论功底深厚，文笔好，各方面表现出色，王天玺被选入全国人大参与起草《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了使起草工作更到位更顺利，他把世界各国的宪法全部研究了一遍。这为他专门从事民族法研究奠定了坚

实基础。

随后，他的专著《民族法概论》出版了，这是全世界第一本民族法学的专著，起到开创性的作用，被一些大学作为参考教材，也成为不同国家、地区间比较研究民族问题的必读书目，受到广泛称赞。

1992年，作为当时国家民委办公厅主任，王天玺接到一纸调令：调任中共楚雄彝族自治州州委书记。从北京到边疆平职调动，有的人不理解，他说：“首先，关于民族问题的法律、法令、政策文件的制定，我参与了一些工作，理论上比较熟悉，但在实践上尚缺乏印证；其次，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东西部的差距，西部能否更快地发展，怎样更快地发展需要研究；再次，1992年，全国的形势在发生最深刻的变化，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知识分子应该到实践的基层去参与改革开放的实践。”

他高高兴兴地去了。王天玺一到岗就开始了深入的调研，到各个区县。短期内，他掌握了全州的情况，在州委全会上确定了工作思路。新来的年轻书记讲话不用讲稿，这个消息经电台、电视、广播、报纸不胫而走。半年之内，新书记在整个州的威信就树立起来了。

确定工作思路的同时，州委起用了一批优秀的科技干部、年轻干部、少数民族干部，着实令人们耳目一新。全州第一位女县委书记上任了，她很快打开了工作新局面；全州科技大会召开了，一批科技人员得到重奖，边远民族地区掀起了科技热潮。

很短的时间内，全州经济和社会开始全面发展，财政收入翻了一番，一跃成为全国30个自治州中人均财政收入最高的州。

“知识分子一定要把理论跟实际相结合，按照实际要求做事，从当地实际出发，调动群众积极性。”毛主席曾经这样教导我们，而王天玺无疑是一位优异的践行者。

做州委书记不满两年，他便调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后来又担任省委副书记。做过老师的王天玺，在不同的岗位上不断发挥着自己的“特长”：让自己的思想、思路被大家广泛地接受。人人有向善、向上的渴望，如何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王天玺有绝招。靠着这个绝招，他的名字在云南家喻户晓。

“在省里的工作需要了解基层情况，又需要有大局意识，有宽广的视野。学理论，应该成为每一个人的内在需要。而理论水平越高，对全局的把握越准。”他起草党代会报告，在全国率先推出“建设民族文化大省”战略，并把它变为全省人民共同意志和共同行动。在工作中，他把发展战略归纳为三

个字：大、强、道。大，是指要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强，是要打造绿色经济强省；道，则指要打开通往南亚、东南亚的大通道。时至今日，这些思路依然对云南省的发展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东方之光，求是之途

2001年2月起，天玺出任《求是》杂志总编辑。深厚的理论功底，多年的一线执政经历，他的政治敏锐性带领《求是》翻开了新的篇章。

除了《民族法概论》《宇宙源流论》等多部专著，他还撰写发表了大量理论文章，如《光辉的建党学说》《伟大的理论创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路明灯》等。其中，他主持撰写并摄制的电视理论片《东方之光——“三个代表”与理论创新》，使用了文学艺术形象思维的方式阐释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时好评如潮：



“《东方之光》一片堪称思想力、感染力极强，理论性、导向性兼优的扛鼎之作。剧本起笔不凡，一开始就用充满激情的笔触，把歌颂太阳与理论创新巧妙地结合起来，展示了理论创新给人们带来的新意境，以及它带来的光明、希望、信心和力量……”

“解说词高屋建瓴、大气磅礴、妙语连珠，把一个历史跨度大、政治理论性强的文章做到这样具有可读性，足见作者的理论和艺术功力……”

“首先，用电视理论片解说词这一艺术形式阐释重大理论问题，是创新。其次，把理论问题用散文诗般优美的文字进行表述，是创新。最后，这种集知识性、理论性、艺术性、趣味性、历史性、现实性为一体的理论精品，以电视片的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使理论成果与现代媒介手段相结合的有益探索……”

《东方之光——“三个代表”与理论创新》解说词在《求是》杂志的发表，是理论宣传的创新，也是《求是》的创新。“真、善、美”的统一是王天玺对《求是》的要求。他确定了“奉献、创新、务实、求知、团结”的十字社风，有力地推动了机关作风建设。

此外，王天玺紧密围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亲自撰写的一批有深度的重要理论文章，在人民日报和《求

是》杂志发表后，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政治效应。党的十六大期间，他先后确定了16个重大理论课题，效果良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天玺是从“风口浪尖”上走过来的，他站在时代最前列，敏锐洞察了党和人民的主流思想。“宣传、理论工作如果脱离实际，群众便不会喜闻乐见；应该竭力从文章风格、编辑路数等各方面纠正。”杂志发行量创下近几年的最高纪录。

（四）师大的学生

“我是师大的学生。今天，如果我讲错了，请老师们不要怪我。”2002年，北师大英东学术会堂。时任《求是》杂志总编辑的王天玺回到母校北师大，为学校处级以上干部讲课。开讲伊始，他笑着对自己的听众们说。

当然，师大最优秀的学生没有讲错，他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为他的出色，更为他的谦和。

他说，师大学风好。他说，师大的师生关系好。他说，师大给了他完善的知识系统。他还说，师大也给了他终身相伴的伴侣。总之，他喜欢师大。

王天玺的爱人何老师，是比他晚进校四年的生物系毕业生。王天玺考研之前，她说：“你带不好孩子。我来吧。你去考。”实际上，她的专业是生物化学，更前沿，更需要科研积淀。

要从北京到云南了。她说：“你去吧。书生，应该去指点江山。家里再困难，我能撑起来。”当时，两个孩子都还小。

总之，在王天玺眼中，夫人是崇高的。

“推荐两本书给大家读：《易经》，东方哲学的集中表现；《小逻辑》，西方哲学的精华。”

“脑中应该有一轮太阳，即使遇到困难，也不能灰心，而是要冷静下来，发挥聪明才智。要有远大的目标，要从实际做起，要有实现理想的信心。”以他一贯的分析思维，王天玺学长这样告诉师大的学弟学妹们。

是的，脑中要有一轮太阳，就像《东方之光——“三个代表”与理论创新》的开篇：

“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历天又入海，六龙所舍安在哉？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元气，安得与之久徘徊？”

三、王天玺的“中国模式”

关于中国模式的探讨，首先要解答的问题是：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王天玺在《中国模式论》中肯定了中国模式的出现是一个客观事实。同时指出，

中国模式不是偶然出现的社会现象，而是中华文明 5000 年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革命胜利的自然成果。在他看来，中国模式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崭新形态。马克思认为，历史上的文明形态都是以对抗为基础的。他说：“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马克思对文明历程的观察是深刻的，人类经历过的奴隶社会文明和封建社会文明，都是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人类正在经历的资本主义文明则是“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中国模式创造的文明不是建立在对抗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和谐的基础上，这就是社会主义文明，这是区别于以往各种文明的崭新的文明。像中国模式这样的社会主义文明，当然并非某种偶然出现的历史幻象，而是在社会发展的大潮流中千锤百炼而成的必然的历史图景。和锤炼中国模式的是当今世界三大进步潮流：世界实现现代化潮流；社会主义胜利前进潮流；中华民族伟大振兴潮流。当代世界中如果有什么重大的奥秘，那么这三大进步潮流在中华大地上融合为一，共同锤炼崭新的社会主义文明，也是最重大的奥秘。

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模式？他用深刻而生动的语言对中国模式这个伟大的实践活动进行了科学的理论概括，在理论上澄清了中国模式的基本范畴。“模式”本身是一个高度哲理性的概念，它表明事物内在本质的全面展现，表明事物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具体统一，表明模式是可以借鉴可以学习的。中国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展现，是中华文明特殊性和人类文明普遍性的具体统一。他提出了以“一、二、三、四、五”五个字表示的中国模式图。这就是：“一”是一条道路，即中国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之路；“二”是实现两大目标，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振兴和社会主义胜利前进；“三”是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三者有机统一，实现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利益三者有机统一，注重改革、发展、稳定三者有机统一；“四”是实行四大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民族区域自治和基层民主自治；“五”是建设五大文明，即建设经济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按照一即是多，多即是一的道理，五大文明又总归为社会主义文明，从而回到中国模式的本质。可以说，用“一、二、三、四、五”五个字勾勒中国模式，是他对于中国模式最为深刻的见解，也是此书最大的理论创获。

应当说，有关中国模式的学术探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经验马克

思主义化的一项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客观地描述和揭示中国社会主义文明实践形态的历史运动过程及其本质与规律，而且还要客观地描述和揭中国社会主义文明理论形态的历史运动过程及其本质和规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模式论》是对此课题所展开的一项富有开创性的探索。

毫无疑问，该书对于中国模式的理论探讨，其根本的关怀是追寻中国梦。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以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人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迈入救亡图存的艰难之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远不如昔。今天，在全球治理中，摒弃西方政治负面遗产，为世界展示更符合国情的模式选择，为不少发展中国家所渴望。除“中国制造”外，中国的发展道路、治理模式鼓励中国提出更多“源于中国，属于世界”的倡议、构想和选择，丰富世界发展模式多样性。换言之，世界需要中国梦，中国梦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可以说，中国的政治模式已经和正在成就“中国梦”。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实现“中国梦”？首先需要过去的发展经验和教训进行梳理。王天玺的著作《中国模式论》无疑是对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的最佳理论梳理。从这部学术性和通俗性的完美结合的著作中，我们不难窥见他对祖国发展的拳拳之心，以及中国模式讨论背后对中国梦想的追寻。

傣王亦大家·刀世勋

一、人物简介

刀世勋，傣族，云南车里（今景洪）人，曾世袭车里宣慰使。1954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历任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云南省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理事。



二、往事集略

（一）正式袭位傣王

1943年，抗日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在中国的西南隅——云南西双版纳国民党政权和地方各派，对由谁来继承西双版纳地方政权的领主“召片领”和车里宣慰使（俗称“傣王”）的争论和活动，也在加紧进行着。

傣王，是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的直接统治者。傣王的设立，开始于元朝。当时，元帝封傣王为“车里宣慰使”，官位相当于元朝三品，地位较高，反映了朝廷对管辖西双版纳地区的重视。

当时的西双版纳领主刀栋梁无子，于是为了以后的传位，在周围亲信头人的建议下，准备按照家族长子继承的习俗立嗣。这时与刀栋梁同父异母的兄弟刀栋廷恰好生有一男孩，于是便正式过继给刀栋梁作为嗣子，成为“召片领”的正式继承人。这个男孩，就是刀世勋。

1943年6月，刀栋梁去世。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将15岁的刀世勋送到重庆中正中学读书，进行培养。1944年1月，由国民党云南省行营主任龙云，亲颁西双版纳召片领委任状，刀世勋从重庆乘军用专机飞抵思茅。2月，正式袭位，成为西双版纳地方政权的“召片领”，也就是最后一代西双版纳傣王。

（二）弃暗投明迎接云南和平解放

正式袭位以后，刀世勋仍需继续学业。1945年抗战胜利后，刀世勋又转学到了南京。其间，由西双版纳地方上公推他的二伯刀栋刚和生父刀栋廷联合代替刀世勋摄政。1948年，刀世勋回乡探亲后路过昆明，在车里县驻云南省参议员覃保麟先生的陪同下，拜见了云南省主席卢汉将军。卢汉语重心长地对刀世勋说：我们都是云南人，读书何必到外省去。省里有的是学校，你要进哪个，请覃参议员给办。还提醒他：后来南京情况不太好，你去了要后悔的。在卢汉的劝说下，刀世勋决定不回南京了。没有回南京，成为刀世勋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他向往光明的开始。

1949年秋，刀世勋在方国瑜和江应樑教授的帮助鼓励下，报考了云南大学社会系，进入该大学先修班文法组学习。

1949年12月9日，对云南、对全国都是一个值得纪念日子——卢汉将军率部在云南宣布起义了！这对刀世勋又是一个光明的号召和促进。他谢绝了朋友为他出资去国外的邀请，毅然参加了云南学联为迎接和平解放组织的宣传队。后来，1949年底又号召青年学生下乡工作，刀世勋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报了名，没想到，却被批准了。要走的时候，他犹豫了：去嘛，到什么地方都不知道；不去嘛，可又报了名。正在为难时，他当时的好友，后来的夫人徐菊芬出现在他的面前。她鼓励刀世勋：“去！我也报了名，不管到什么地方，我们一同走。”周围的同学也一再鼓励他，终于使他坚定了信心。第二天，刀世勋和同学们背着背包到富民县城，并被编入滇北区地方工作团第四武工队，开始在该县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征收公粮，迎接解放军的工作。后来，根据他的表现，当他被吸收参加共青团工作时，这位末代傣王才恍然大悟——原来动员并同他一起来这里的同学们，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他们对刀世勋最终走上革命的道路，起了很大的作用。

武工队的生活是艰苦的，实行的是配给制。行军时发双草鞋，住下来发块肥皂洗衣服。吃的是糙米饭、青菜汤加辣椒，这都是刀世勋从来都未见过、体验过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大家在一起分工搞各种形式的宣传工作，还轮流做饭、值班，刀世勋的心情，却比他当“召片领”的时候舒畅多了。

解放军进入云南以后，组建了西南服务团富民工作队。刀世勋所在的武工队也被编入工作队，并被派在队部做资料工作。这期间，他被批准加入了共青团。当富民县人民银行成立后，刀世勋又被派去担任了那里的政治指导员、团小组长。

三、从事民族工作

(一) 向陈赓请战，做民族工作

在富民县工作不久，一次刀世勋因病去昆明就医。在昆明，他碰到了同乡刀有良等人。他们对刀世勋说：“搞银行工作的人很多，搞民族工作的人却很少。你能不能给陈赓司令员写封信，调换一下工作呢？”对于如何做民族工作，有关方面能不能允许他做这个工作，他心里没谱。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情，给陈赓司令员写了一封信，将自己的情况作了一个简单的介绍。3天后，刀世勋收到了省军管会干部科的回信，请他到干部科去报到。刀世勋惴惴不安地带着卢汉主席给换发的宣慰使委任状和学生证等证明文件，到省军管会干部科报到填表，并交上了委任状。一个星期后，已担任云南省副主席的卢汉，代表省军管会领导接见了刀世勋，并和蔼地对他说：“你留下来不是很好嘛，要是你去了南京，我们今天可就见不着了！”又说：“工作先不要着急，我们会研究替你解决好的。现在中央民族访问团就要来了，我们也要做些准备，你和有良同志先做些翻译工作如何？”

以后，在卢汉的安排下，刀世勋先后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件和重要著作的傣文翻译工作。在翻译过程中，卢汉还对刀世勋说，译文用词要慎重，不能出原则性差错。并为刀世勋向富民县请了假。

1950年7月，中央民族访问团到达了昆明。副团长王连芳同志会见了刀世勋和在昆明读书的边疆少数民族学生。不久，张冲副主席从外地回到昆明，也接见了刀世勋。他对刀世勋说：“我和你一样是少数民族。你是傣族，我是彝族。现在时代不同了，全国各个民族，不论大小都要团结，谁也不能歧视谁，大家团结一致，力量才大。”他还对刀世勋说：“西双版纳的老百姓和头人，正在请军管会帮助寻找多年不知下落的小召片领，原来你就躲在这里呀！”说罢哈哈大笑。被张冲的情绪所感染，刀世勋也就不像当初那么紧张和拘束了。他对张冲说：“请转告他们，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好。”张冲最后又叮嘱刀世勋：“你参加工作的事我们会考虑的。你们现在的翻译工作做得不错，还是先搞搞翻译，把汉文文件译成傣文，让傣族人民都能看得懂。”

以后，为了继续学习、充实自己，在张冲的鼓励下，刀世勋积极参加了1950年的高考，并被云南大学社会历史系录取。

这年9月，张冲的秘书到云南大学找到刀世勋，告诉他思茅（今普洱）

地区赴京国庆代表团已到昆明，请刀世勋去见见他们。当刀世勋到达代表团下榻的住地时，张冲对他说：“祝贺你考上大学。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已被批准为西双版纳的首席代表，随西南民族代表团到北京庆祝国庆并到全国各地参观访问。”当时，刀世勋高兴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1950年9月30日下午，刀世勋随西南民族代表团乘飞机到达了北京西郊机场。10月1日，他又随各兄弟民族代表一起，登上了天安门东侧观礼台，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随后，又观礼了阅兵仪式和万众大游行。

10月3日晚，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在怀仁堂接见各民族代表团。召存信和刀世勋被荣幸地安排向毛主席献礼。献礼时，毛主席亲切地握住刀世勋的手，刀世勋激动得流下了热泪。那幸福的时刻，令他终身难忘。参加完国庆庆典和到各地的参观活动以后，刀世勋又回到了云南大学继续学业。

（二）参加土改和社会调查

1951年，云南省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刀世勋所在的学校与省市各大专院校一起首批参加了土改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集中学习，刀世勋被分配到蒙自县草坝大落鹭工作组。

大落鹭是彝族聚居的村落，生活很艰苦。土改队员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刀世勋所在的一个小组集中住在一户农民家里，然后再分别到各联络户的家里劳动和吃饭。开始的时候，刀世勋来到指定的联络户家，问主人有什么活需要做，人家说没什么活，然后指指灶上的大铁锅说，先吃饭吧！刀世勋打开锅盖，见里面煮着一锅红薯，正纳闷是怎么回事呢，那家人说：“能吃的吃，不能吃的丢猪槽喂猪，什么时候饿了就来拿。”说完，扛着锄头就走了。刀世勋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只得又转回住处找组长。组长是个区委书记，他对刀世勋说：“不要着急，因为群众还不了解我们，有顾虑，这就需要我们去做工作，多接近他们。”并且还提示刀世勋：“他的地在哪里？你去跟他一起劳动，聊聊天，慢慢会处得好的。”于是刀世勋来到地里找到那家人，见人家正在挖着长得稀稀拉拉的花生，就帮着捡花生。捡了一会儿，那人对刀世勋说，昨晚村长已经告诉说有工作队的同志到家来搭伙，家里也没有什么吃的，挖点花生回去磨个汤，好赖喝喝。刀世勋听了很受感动。

刀世勋在村里重点负责发动旧乡长家里的长工孙长锁。这个人平时只埋头干活，很少说话。开始，刀世勋还以为他从来就是这样。后来时间长了，经过深入地了解，才知道他主要是有思想顾虑，觉得工作队是外地人，总有

一天要走。自己土生土长的，工作队走了，惹恼了东家，怕饭碗保不住。根据这一情况，刀世勋就天天和他一起干活，谈心。经过做工作，最后在斗争会上，这个长工边哭边诉苦，教育了大家，对村里进一步发动群众也起了促进作用。

之后，根据工作需要，刀世勋又被调到建水县西庄工作组，先后在情况更加复杂的马街、汤伍村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克服了重重困难，顺利完成了任务，返回了学校。

（三）从事民族语言文字工作

1952年至1953年，云南省进行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刀世勋所在的学校学生也都参加了改造。他在党的教导和关怀下，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通过学习和结合自己参加土改工作的实际，思想认识有了提高，也彻底消除了一些不切实际的猜疑和顾虑，更加努力地投入到学习中去。

1953年初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成立之前，领导上曾征求刀世勋的意见，准备让他回去任副主席（即副州长）。当时刀世勋已经上三年级了，为了不中断学业，他没有回去。这时，又恰好赶上全省的民族上层人士到云南民族学院政研班学习，里面有很多人和刀世勋相识，他就经常去和他们聊天谈心，也做一些思想解释工作。

思想改造运动进入最后阶段。一天，工作组来了一位同志约刀世勋到翠湖散步，并问他有没有结婚的打算？刀世勋表示，父亲不在，他是1949底因不明共产党的政策才出走异国他乡的。何况现在离毕业还有一段时间，即便要结婚，也得和家里联系。工作组的同志表示，这些都不成问题，要有结婚的打算，就请写个报告好了。刀世勋和徐菊芬商量后，向上级打了结婚报告。很快，领导同意了他们的婚事，并且告诉他们，建议在云南民院的政研班结业前举行婚礼，这样也可以请许多老相识、朋友们参加。需要的东西可以自己准备，以后凭单据报销。1953年3月，在上级领导的关怀下，刀世勋和徐菊芬在共和春饭店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张冲副主席亲自主持，各级领导及在昆明工作、学习的西双版纳各族学员、朋友们，也都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1954年4月，刀世勋的父亲刀栋廷从国外回到了祖国。这时，刀世勋已参加了由他的老师、著名语言学家傅懋勤教授领导的西双版纳傣族语言文学调查组。于是，在政府有关方面的安排下，他一边去看望回国的父亲和亲友，一边继续进行语言调查。1954年底，已经从云南大学毕业的刀世勋，更

加坚定了从事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信念。在老师傅懋勳的帮助指导下，他来到了北京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并参加了由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中央民院语文系共同开办的语言学研究班。研究班的课程均由各专家、教授主讲。专业课还设有语音学、语法学、方言学、词汇学、普通语言学等课程。通过这段系统的学习，使刀世勋的专业水平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1956年初，在周总理的具体指示下，刀世勋参加了傣泰语言的比较研究，并作为代表，参加了同年召开的全国民族工作教育会议，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周总理握着刀世勋的手，详细地询问了他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情况，勉励他在民族语言研究方面做出新贡献。周总理的教诲，令刀世勋终生难忘。

此后，在傅懋勳先生的指导下，刀世勋和同志们一起完成了《西双版纳允景洪傣语音节结构》的研究；编写了《西双版纳傣汉词典》《汉·西双版纳傣语词典》和《西双版纳傣语描写语法》等专著。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刀世勋又感到北京距离他的家乡西双版纳太远了，很不利于研究工作，就向上级要求调回云南。1962年12月，他回到了昆明，被分配在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并参加了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工作组，继续从事傣语文的研究工作。在这段时间，他编写了《西双版纳傣汉对照简明词典》，编译了一批通俗读物。

“文革”十年，像刀世勋这样有特殊身份的人，不免深受迫害。他被指派到省民委机关的农场劳动。1969年9月，他又和在昆明工作的父亲和舅父刀福汉一起，被武装押送到西双版纳景洪县公安局接受审查。以后，他又被送到景谷县农村劳动改造。他和妻子花费多年心血搜集的语言研究资料、撰写的文章手稿、书籍等，全部被没收或丢失。在景谷县农村，刀世勋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在油灯下，利用身边仅有的一本泰、老文字的《毛主席语录》，复习泰文和老挝文，将两种语言的词汇进行对照比较，还补充修改了《西双版纳允景洪傣语音节结构》等论文。除了下地劳动，刀世勋还要和家人在一起喂猪、养鸡、种菜，生活虽苦一些，但能与家人在一起，多少也可以有所安慰了。

1978年，有关方面为刀世勋落实了政策，一家人又陆续回到了昆明。他和妻子徐菊芬被安排在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工作。他们的4个孩子，如今也都成了家，有的也有了孩子。家里逢年过节，老少三代齐聚，十分热闹。

现在，这位昔日的傣王还是全国政协委员，并担任了全国政协民族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政协副主席、云南民族学院（现云南民族大学）省民族研究

所的研究员、教授，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语言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云南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等许多职务。同时，他还受聘主编了《西双版纳傣、汉对照词典》《汉、西双版纳傣对照词典》，协助西双版纳州政府等有关部门制订了《老傣文使用方案》，还招收了国内外的专业研究生、博士生，并与人合作编著了《汉傣英电脑处理系统》，获国家文化部科研成果三等奖。他曾多次出访泰国，为加强中泰文化的交流及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了贡献。

刀世勋常常对子女和周围的同志讲：“我之所以能有今天，全靠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培养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

民史育新叶·林超民

一、人物概况

林超民，云南大学历史学、民族学教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85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先后任云南大学历史学系主任、西南古籍研究所所长、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云南大学副校长、巡视员。曾任中国历史学会理事，云南省历史学会会长。现任学术职务有：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汉民族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影视人类学会副会长、云南省国学研究会会长等。



二、主要著作

《林超民文集》（四卷本）和《中国民族史》《〈马可波罗行记〉云南史地丛考》《云南民族简史》《滇云文化史》等；译著有《南诏国与唐代西南边疆》等；主编《方国瑜文集》《史学论丛》《云南爱国主义丛书》《云南大学史学丛书》《云南大学民族研究丛书》《云南民族文化知识丛书》《云南乡土文化丛书》等；主编《民族学评论》《西南古籍研究》等研究集刊。

三、学术成就

（一）获奖情况

《中国民族史》获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首届郭沫若历史学优秀著作奖。2001年林超民主编的《云南民族文化丛书》（28卷）获得第五届中国民族图书奖。2003年林超民主编的《云南民族文化知识丛书》荣获第二届“云南文化精品工程”作品奖。2004年林超民编辑的五卷本《方国瑜文集》荣膺云南省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

1991年林超民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1992年被评为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3年获国务院专家津贴。1998年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2009年被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省社会科学联合会评为云岭大讲坛优秀演讲人。2011年被评为云南省归侨侨眷先进个人。2011年被云南大学授予“红云红河园丁奖·教育功勋奖”。

（二）主要培养学生

林超民教授培养博士37名，其中美国留学生2名，日本留学生1名，培养硕士40余名，其中美国留学生2名、日本留学生1名、泰国留学生1名。先后指导国外访问学者、高级进修生、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30余名。林超民教授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有四篇论文评为云南省优秀博士论文。现在指导博士研究生7名，其中一位泰国留学生、一位日本留学生、两位美国留学生。

（三）学术交流

林超民教授先后到美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泰国等访问讲学，为中外学术交流与理解作出贡献。多次到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浸会大学、澳门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清华大学”、成功大学、台南大学等访问讲学，努力促进两岸四地的学术互动。

林超民教授先后为我省大专院校、中小学引进教育基金一亿多元。除在大学建设教学楼、图书馆、医院、博物馆、实验楼外，还在中学建设图书馆、体育馆、教学楼等，在农村建设十五所爱心小学。林超民教授从自己不多的工资中拿出两万元设立“史学新叶奖”。

林超民认为，云南茶业界应致力于为把普洱茶从农副产品提升到文化产品的定位而努力。与普洱茶结缘，源于大学毕业后在勐海茶厂当工人。那时，他对普洱茶的种植、生产、加工、运输、贸易等各方面有了直接的接触和认识，又站在自己所学专业的角度上，把普洱茶文化和历史学、民族民俗学结合，先后发表了《普洱茶史话》《普洱茶与少数民族》《普洱茶散论》等论著。他认为：普洱茶不仅是少数民族生活中的必需品，更是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纽带和象征。

在普洱茶宣传上，林超民教授认为，普洱茶暂时是有茶类无品牌，产品定位更是只在农副产品，普洱茶的宣传与推广，一定要与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结合起来，并且一定要注意到其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紧密联系，少一点商业附会，多一些文化附加值。

天雨流芳出人才·杨福泉

一、人物概况

杨福泉，纳西族，云南丽江大研镇人，1978—1982年在云南大学中文系读书，获文学学士学位；2001年在云南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云南省东南亚南亚研究院副院长、云南大学博士生导师。



1995年12月—1996年5月获联合国大学博士后奖学金并到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访问研究。1983年—1985年，1986年—1988年获德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基金（DFG Scholarship），1983年—1988年在德国科隆大学从事为期4年的纳西族语言和东巴文化的合作研究。

1985年至今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从事民族学、人类学、纳西学研究；1996年以来，先后应邀到瑞士苏黎世大学民族学博物馆、瑞典国立远东文物博物馆（The National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学系（The 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 of Stockhome University）、隆德（Lund）大学东亚、东南亚研究中心、美国惠特曼（Whitman）大学和匹兹尔（Pitzer）大学、美国康涅狄格学院（Conneticut College）、纽约联合学院（Union College）、加州大学戴维斯（UC Davis）分校，意大利 Trento 大学、日本京都大学和爱知大学以及埃及、泰国、越南等国讲学访问。1999年至2001年任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云南项目文化顾问。先后被选为中国民族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西南民族学会副会长、云南省文联副主席、国际纳西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云南纳西学研究会会长、云南中华传统道德研究会副会长、云南省农村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

二、主要荣誉

1996 年被云南省人民政府授予“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一等奖）；1997 年被评选为云南省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第一层次人才；1998 年入选由国家人事部、科学技术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评选的“中国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才；2009 年获得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11 年入选“2011 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第三届“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

三、主要著作（按时间先后排序）

(1) 《现代纳西文稿语法分析和翻译》（英文、纳西文版），德国波恩国家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Stories in Modern Naxi*, by Yang Fuquan, prefaced and edited by Klaus Ludwig Janert, VGH Wissenschaftesverlage, Bonn, Germany, 1988）。

(2) 《火塘文化录》（主笔，与郑晓云合作），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1995 年重印。

(3) 《神奇的殉情》，中国香港三联书店 1993 年 4 月版，中国台湾珠海出版公司 1993 年再版。

(4) 《灶与灶神》，北京学苑出版社 1994 年版，中国台湾汉扬出版公司 1995 年再版，中国台湾云龙出版社于 2000 年再版。

(5) 《原始生命神与生命观》，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6) 《多元文化与纳西社会》，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7) 《秘笈古韵》，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9 年版。

(8) 《圣山下的古国：走进纳西人的心灵和家园》，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9 年版。

(9) 《生死绎影·魂路》，深圳海天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10) 《生死绎影·殉情》，深圳海天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11) 《绿雪歌者——李霖灿与东巴文化》，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12) 《古王国的望族后裔》，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2003 年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和云南人民出版社联合再版。

(13) 《寻找祖先的灵魂——重返纳西古王国》，中国台湾大地地理文化科技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1 年版。

(14) 《纳西文明》，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15) 《走进图画象形文字的灵境》，四川美术出版社 2003 年版；2007 年修订再版，书名改为《纳西古王国的东巴教——走进图画象形文的灵境》。此书获云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 2004 年度优秀成果一等奖”。

(16) 《古王国望族的后裔》，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4 年再版。

(17) 《神奇的东方大峡谷：虎跳峡》，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5 年版。

(18) 《纳西人的圣山与情山：玉龙山》，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5 年版。

(19) 《丽江大研：云南的世界名城》，云南美术出版社 2006 年版。

(20) 《纳西古王国的东巴教》，四川美术出版社 2007 年版。

(21) 《寻找丽江之魂——融入纳西古王国》，民族出版社 2006 年版。

(22) 《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 2006 年版。获云南省第 10 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入选《中国人类学民族学重要著作提要》。

(23) 《纳西族文化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获“第十一届云南图书奖”（二等奖）。

(24) 《依山傍水凝古韵：灵境丽江》，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7 年版。

(25) 《纳西族民族志田野调查实录》（收入杨福泉的 25 篇田野调查报告），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8 年版。

(26) 《玉龙情殇——纳西族的殉情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27) 《纳西凝古韵——山水丽江》，万里机构·万里书店（中国香港、中国台湾）2008 年版。

(28) 《西行茶马古道——滇藏之路探秘》，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29) 《丽江岁月与海外萍踪——杨福泉散文选》，（收入作者发表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种报刊的 77 篇散文），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30) 《杨福泉纳西学论集》，民族出版社 2009 年版。

(31) 《云南名镇名村的保护和发展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0 年版。

(32) 《东巴教通论》，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中华书局 2012 年版。

此外杨福泉还在国内外发表了 180 多篇论文，多篇论文在《新华文摘》

《民族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等国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其中 10 多篇论文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英国、德国、瑞士、荷兰、印度、泰国等国学术刊物和学术论集中发表。

四、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 “多元文化与纳西族社会研究”，最终成果为：《多元文化与纳西社会》，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获云南省政府颁发的“云南省 1996—1998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2) “中国原始宗教资料丛编·纳西族卷”（副主编），最终成果为：《中国原始宗教资料丛编·纳西族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初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再版。

(3) 东巴教通论，2005 年立项，2010 年完成，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等级，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五、主编的主要论著

(1) 《云南少数民族概览》（主编之一），74 万字，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2) 《丽江玉龙山区域农村发展和生态调查》（汉文版，副主编，中美合作项目），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3) 《中国原始宗教资料丛编·纳西族卷》（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与刘志武共同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4) 《策划丽江》（第一作者），民族出版社 2005 年版。

(5) 《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白沙乡白沙完小乡土知识教育的实践》，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科技出版社 2006 年版。

(6) 《纳西学研究论集》（第一辑），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7) 《远去的背影》（云南民族老照片学术画册），副主编、撰稿者之一，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入选新闻出版总署与国家民委共同组织的“首届向全国推荐百种优秀民族图书”；入选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名录。

(8) 《当代云南纳西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9) *Icon and Transformation: Imaginings in Dongba Art*（《图像及其变化——东巴艺术中的再想象》，与孟彻理、张云岭合作主编），Published by Sheehan Gallery Press, Whitman College, Walla Walla, WA.（华盛顿州惠特曼

学院西寒艺术馆 2003 年出版)。

六、翻译的主要著作

(1) 《国际东巴文化研究集粹》(白庚胜、杨福泉编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1995 年重印。

(2) 《中国西南纳西古王国》(主审校和部分章节、全部图片的翻译), 洛克(Rock J. F.) 著、刘宗岳等译, 云南美术出版社 1999 年版。

(3) 《纳西、摩梭民族志——亲属制、仪式、象形文字》(奥皮茨、伊丽莎白·许主编)(组织翻译、审校),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七、参与编写

(1) 《纳西族文化》(季羨林主编“神州文化集成”之一, 与白庚胜等合作), 撰写 4 万字, 新华出版社 1994 年版

(2) 《民族文化大观·纳西族卷》, 撰写第 3 章、第 18 章, 4.2 万字, 中国民族出版社即出。

(3) 《中国原始宗教辞典》(编委, 撰写纳西族部分 8 万字), 四川辞书出版社 2003 年版, 该书获中国优秀辞书奖。

(4) 《东巴文化艺术》(学术画册), 编委, 参与策划、摄影、撰文、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此书获第七届中国图书奖。

(5) 《云南丽江“工合”的历史演变和发展前景》, 中加合作研究项目, 撰写 3 万字。1993 年印。

(6) 《丽江古城》(车文龙等摄影, 杨福泉撰文), 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中国部分)系列画册之一, 中国画报出版社 1999 年版。

(7) 《丽江古城》, 卞志武摄影, 杨福泉撰文, 岭南出版社 2002 年版。

(8) 《边地中国》(与冯天瑜、邓启耀等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9) 《天雨流芳——印象纳西》, 车文龙摄影, 杨福泉撰文,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2006 年版。

(10) 《纳西族简史》(修订版, 参与修订、通稿), 民族出版社 2008 年版。

(11) 《中国象征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第二版。

纳西学问开垦者·郭大烈

一、人物概况

郭大烈，1941年生，纳西族，云南丽江市古城区宏文村人，云南社会科学院研究员。1964—1980年10月在楚雄州文教宣传部工作，1980年11月考入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任云南省社科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民族学常务理事、中国西南民族学副会长、云南民族学会会长以及各种顾问等职务。



郭大烈先后到过全国各省区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并到过日本、加拿大、泰国、越南等国进行学术考察，1988年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称号，1995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1996年评为省优秀共产党员，2005年获日本经济新闻社亚洲文化奖，2009年作为纳西族代表与其他人士一起受到胡锦涛接见。主要著述有用十年心血写成的《纳西族史》（获云南省政府优秀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以及合著、主编的《论当代中国民族问题》《云南民族政治制度史》《纳西族文化大观》《东巴文化论集》等10多种，1999年创办东巴文化传习院，以黄山小学为点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和各种活动。2009年云南省民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省民族学会共同创办《云南民族》月刊，任总编。

二、往事集略

1941年，郭大烈出生在云南丽江一个纳西族农民家里。1959年从丽江中学考入中央民族学院攻读历史学，5年的大学学习生活为他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历史学专业知识。在大学学习期间，他就曾经到北京郊区回族村镇和四川阿坝州藏族地区做田野调查。

是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的文章《麽些（纳西）民族考》开启了这位纳西族后生的满腔热忱，并促使他将此文用手记录下来。从这本书中，郭大烈

知晓了纳西族的起源和相关的民族历史知识，以及怎样发展成为今天这样一个民族。与其说历史学家的一篇文章开启了郭大烈的理想，还不如说是作为纳西人对自己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那种与生俱来的热情和灵感激发了郭大烈内心对本民族热爱之情。

郭大烈的人生当中有这样一段光阴是这样度过的：1964年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后，他到了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从事宣传和教育工作。那段时间社会陆续被“四清运动”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搅乱，然而，这些社会动荡并未曾使郭大烈产生丝毫思想上的动摇，反而更坚定了他求学、治学的信念和决心。

在禄丰县工作期间，他充分利用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优势，经常深入最偏远、最基层的彝族、傈僳族村寨作调查研究，收集了大量文献资料和珍贵文物。调查研究中，他力求实事求是，在禄丰期间就编写过《新编禄丰县志》及《恐龙之乡——禄丰风物录》。

1980年，正值“科学的春天”来临，郭大烈也有了新的研究成果，他在研究纳西族历史时十分注重木氏土司，并于当年发表了著述《丽江木氏土司概论》。同年，郭大烈考入了刚刚成立的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对于酷爱历史的他，此番犹如鱼入深潭，龙归大海。而当时的纳西族研究，仍然处于一个尚未被深刻挖掘整理、没有被进一步深刻认识的领域，郭大烈把满腔热情扑到研究本民族历史文化事业上。

在研究所工作期间，郭大烈的足迹遍布了滇、川、藏等纳西族曾经生活和迁徙途经的地方，并做了大量的翔实的田野调查笔记。终于在1994年，与历史学者和志武合著的《纳西族史》出版面世。这一年，距离郭大烈到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工作已经整整10年了，可谓十年磨一剑。

《纳西族史》是一部迄今为止体例最完整、材料最丰富、结构最合理的纳西族通史。内容从亘古蛮荒一直写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纳西族历史发展的每一个脉络都被他牢牢地抓住，每一个社会文化现象被他清晰透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用心血和汗水勾勒了一部完美的纳西族历史画卷。

在这部书的导论中他这样写到：“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古老的历史，而展现这些历史是最困难的，如果再现较为翔实的历史图景，那更是困难重重。”所以说，郭大烈会同和志武完成的不仅仅是一部民族历史专著，更是完成了一个民族和时代所赋予的期望和重托。可想而知，去追寻那些深匿于民间的一个民族支离破碎的历史片段，然后通过科学缜密的分析论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方能得出客观正确的结论，方能显现出一个民族悠久、灿

烂的历史文明。郭大烈，正是将这一梦想变成现实的人，并执着地坚守美丽的梦想，直到它变成现实。

郭大烈付出了10年的艰辛，然而同他一道撰写此书的著名学者和志武，最终没能看见该书的问世，于1994年12月带着遗憾走了。而为了这部《纳西族史》，郭大烈曾跟随马帮翻越雪山，深入中甸三坝，西藏芒康，四川木里、盐源等地，用艰苦的跋涉换取宝贵的资料。

付出总有回报，《纳西族史》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引起了海内外史学界和文化界的极大关注。而这部凝结他心血的《纳西族史》，则有着许多突出的特点：着眼于纳西族发展自身的历史脉络；客观叙述历史，供今人后人参考；总结经验，启发后人；坚持中华民族历史发展整体观；对纳西族社会历史发展重要问题有着深入探究……

此外，自1984年至2002年间，他先后主撰或主编有《中华民族知识通览》《云南民族文化变迁研究》《纳西族文化大观》《东巴文化论》《纳西族研究论文集》等10余部有影响、有分量的著作。

三、为保护和传承纳西族文化而不懈努力

郭大烈的治学格言是：“做学问，要甘于寂寞；为民族，要敢于呐喊。”多年来，郭大烈还先后为丽江市人民政府、东巴文化博物馆、丽江教育学院民族教育研究所担任顾问，以“关心不干扰，支持不包办，做事不谋利”的原则为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和传承纳西族古老优秀的民族文化而努力，而奔走。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报告发出了预警信号，目前世界上仍存在大约6000种语言，但其中的许多语言都面临灭绝的危险。作为一位纳西族的学者，郭大烈同样深有担忧。

特别是1999年，他以家乡黄山小学为试点，在丽江筹建纳西东巴文化传习院，进行纳西母语和东巴文化进入学校传承的实验推广，并编写了教材，组织教师上课。这个班的学生参加了丽江举行的国际东巴艺术节，从2003年开始，在周边农村和城镇推广，得到了丽江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的充分肯定。

郭大烈自1984年的17年里，一直担任民族学所的副所长、所长，长期坚守在学术的前沿阵地，期间承担过20多项国家、省、院重点项目，出版过60多种科研著作，培养了彝族、哈尼族、藏族、瑶族、拉祜族、独龙族、布朗族等10余个少数民族的科研人员，为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不愧为人师。可以说，郭大烈出色地完成了编著《纳西族史》等

艰巨任务，经历过漫长的 10 年，也倾注他内心深处的民族情感。

他说，虽然丽江地区目前面临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发展问题，丽江搞旅游开发，无疑推动了该地的经济发展，但外来人口的不断涌入，也对纳西族传统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他的一项调查显示，丽江古城纳西族小学生 70% 已不能够说母语，如白龙潭小学 570 个纳西族学生，只有 110 人会讲母语，仅占 19%。纳西族先后用象形文字——东巴字书写了 4 卷古籍，现已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但现在会释读这些古籍的人已寥若晨星。为此，郭大烈一面深入纳西族地区调查，写文章呼吁社会的关注，一面编写教材进行试点教学。

郭大烈说：“我的工作，一直都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如今妻子、儿女都在丽江教学，教授纳西族母语和东巴文化。”

四、行路万里，思考不止

在进行学术创作的同时，郭大烈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曾经先后对日本、加拿大、泰国、越南等国作过学术访问。

读郭大烈的著作，叙事明了，考证翔实，语句平和。见到他本人时，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文如其人”，没有夸夸其谈，一副谦谦学者之风。在采访过程中，生怕记者不能领会他的见解，不断地在纸上勾画出所表达的意思。

郭大烈说：“对历史文化的研究，不能光坐在书斋里查阅资料，还应走出去，到事件的发生地去思考、总结、升华。”

早在数十年前，他在北京听过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教授讲课，翦伯赞说他应邀考察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后，认为历史上呼伦贝尔是各个游牧民族的摇篮，他们在那里成长壮大，梳妆打扮；尔后到内蒙古大草原表演，威武雄壮，最后匆匆西去。1997 年 7 月，郭大烈到了呼伦贝尔也在思考这一问题，得出了相同的看法。

事实上，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曾经出现的一些强大民族，如匈奴、突厥、鲜卑、羯、狄、羌都曾崛起过，最后又逐渐消失。而纳西族为什么能在滇、川、藏交界的横断山脉夹缝中，在周围强大的民族夹缝中生存延续？纳西族文化为什么能在强势外来文化千百年冲击下而未失去自己文化核心特征呢？

郭大烈通过多年的研究、实地考察后认为，纳西族到现今为止都只有 31.7 万多人口，比起其他民族来说，相对弱小，不具备开疆立国的条件，历史上的纳西族善于处理民族关系，主动搞好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接受封赏和

统治。纳西族亲近自然，善于吸收各民族文化，如藏族的喇嘛教、汉族的佛教和道教，重组新的文化体系，而且特殊的地理位置，也使它能最终保持下来。

对于纳西族文化的特征。郭大烈阐述道：“我个人认为，至今纳西文化还保留着三种类型：以三坝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主导型，较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宗教上笃信东巴教，婚姻上确立一夫一妻制，死后火化；以永宁为代表的吸收变迁型，受藏传佛教影响大，保留走婚制，当前，由于旅游的发展，价值审美观念都发生了很大改变；以丽江坝子为代表的开放容纳型，善于吸收外来文化，但又未失去本民族文化特征，丽江古城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便是其文化成功延续的范例。”

自1989年云南民族学会成立以来，郭大烈先后担任副会长、会长，组建了彝族、白族、哈尼族等23个民族研究委员会。自2002年，他从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长的职位上退下来后，继续担任云南民族学会会长之职，为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继续努力着。“我大学毕业后，在基层工作16年，38岁时又能从事民族研究是幸运的，能把自己喜爱的专业——纳西学和民族研究当作自己的职业是幸福的。”回顾历程，现年69岁的郭大烈总结道。

历史民族集大成·何耀华

一、人物概况

何耀华，研究员，男，博士研究生导师，1937年7月27日出生，云南开远人。1964年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师从被誉为“南中泰斗”“滇史巨擘”的学术大师方国瑜先生学习，毕业后留云南大学任教。1985年经云南省人民政府特批，破格由讲师晋升为研究员，1986年被选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87年从云南大学科研处处长兼《思想战线》主编岗位调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1991年8月任院长、党组书记，2003年退休。



在长达5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何耀华在中国西南历史民族学领域卓有建树，在民族宗教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也取得了同行专家称道的创新成果。先后出版个人专著《武定凤氏本末笺证》《中国西南历史民族学论集》，主著、主编《西南少数民族风俗志》《西南民族研究彝族研究专集》《中国国情丛书》（《通海卷》《路南卷》《曲靖卷》）、《邓小平经济思想研究》《滇西北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国原始宗教资料丛编》《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36卷、《“三江”水能开发与环境保护》等26种，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史》《中国藏学》《世界经济》等刊物公开发表论文144篇，为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和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主要成就

（一）为建立中国西南历史民族学做贡献

多年来，何耀华试图让历史学和民族学在为民族现代化服务的基点上有

机结合起来，倡导建立中国西南历史民族学。他认为：“我国各民族的特点是历史地形成的，只有充分了解各民族的历史实际，才能真正了解他们的特点；只有真正了解他们的特点，才能把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建立在适合于各民族特点的基础之上。”（何耀华：《中国西南历史民族学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于是，他“坚持生活在少数民族中间，与他们打成一片，细致地观察他们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生活，体验其民族心理素质，发掘足以反映他们历史、现状特点的材料，然后辅之以历史文献进行综合比较，提出个人的见解”，他认为，中国西南历史民族学既要利用西南各族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志资料，又要利用现实的民族调查资料，立足解决各民族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揭示其发展规律。其方法论特点是将民族历史学和民族学有机结合起来，使其具有强大的认识功能和应用功能。《中国西南历史民族学论集》是他倡导建立中国西南历史民族学的重要论著，1988年9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曾发行至20多个国家和地区，荣获当年滇版优秀图书社科类唯一一项一等奖，1987年国家教委将其中一些文章作为民族学精品在全国高校优秀论文选中加以著录。在该书中，何耀华坚持一贯的宏观眼光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历史研究和现实研究相结合的学术思路，使该书所讨论的问题和所获得的结果都达到了较高的学术高度，在学科领域内具有规范性的方法论意义，“填补了中国民族学学科发展的空白”。对此，日本末成道男在其编撰的《中国文化人类学文献题解》中给予高度评价：“《中国西南历史民族学论集》是1988年从作者长达27年的历史民族学研究中收集的近十年发表的28篇论文。这是一部中国民族学复兴之后，实地考察又成为可能而积累起来的研究成果，它充分反映出作者的研究特点。论文中既有作者作为历史学家深厚功底的文献研究，又有作者为寻求新的资料和解释线索而到实地进行的考察。”〔（日本）末成道男编：《中国文化人类学文献题解》，东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同时，何耀华主张用历史民族学研究推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1981年11月，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在昆明召开成立大会及首次年会，会议倡导并在会后组织了多学科的“六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1982年5月，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队正式组成，何耀华任考察队副队长、冕宁雅砻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队队长，承担冕宁县里庄乡藏族纳木依人、拍木依人的考察任务。考察队克服了交通不便、酷暑炎热、生活艰苦等重重困难，取得了较好的调查成果。在他撰写的《雅砻江下游纳木依人、拍木依人和多须人》的

考察报告中,针对冕宁纳木依人、拍木依人和多须人的经济状况,提出“要改变纳木依人和拍木依人的经济面貌,应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引导他们采用现代农业的生产技术,加强科学种田和牧畜,克服农牧业的粗放经营……其二,发展多种经营……其三,因地制宜地建立和发展副业生产……其四,在农牧业生产自给有余的基础上,扩大剩余产品的再生产,建立商品市场,发展集市贸易,活跃山沟山地经济。”(何耀华:《中国西南历史民族学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5~326页)这些建议对改变当地经济落后状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由新西兰国际主义战士路易·艾黎发起,得到中国共产党和宋庆龄等爱国民主人士支持的国际工合(工业生产合作社)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抗日救亡的经济支柱。当时云南丽江也建立了36个工业合作社。1991年7月,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与加拿大温哥华西门弗雷泽大学国际交流中心在多次研究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共同提出《云南丽江工合的历史演变及发展前景》的课题,由何耀华担任联合课题组长。课题组认真查阅相关文献资料,走访20世纪40年代丽江工合的当事人,探讨与工合经济相关的教育、文化、科技、生态环境保护、丽江与加拿大的合作等问题,为新建工合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考。项目成果在丽江市实施后,受到丽江市政府和国际工合组织的好评。

1998年初,云南省政府与清华大学决定实施省校合作项目《滇西北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规划研究》。该项目同时被纳入云南省与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合作的滇西北大河流域国家公园项目。何耀华受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吴良镛教授委托,组建滇西北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为此,他利用历史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对滇西北藏族、纳西族、彝族、白族、傈僳族、怒族、普米族、独龙族聚居的15个县、市进行调研,他在系统论证滇西北的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历史发展进程、民族文化走廊、茶马古道、514年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理、新中国成立前“三江并流”区域的土司制、原始氏族制、奴隶制、封建农奴制及母系制的基础上,提出滇西北《走向21世纪的发展建议》及《建立大河流域国家公园的构想》。他主张提高山地农业的成长率、发育率,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以特殊政策加快发展教育,消除贫困,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实行滇西北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战略,把旅游业作为滇西北的龙头产业,加速城市化进程。(何耀华:《加快滇西北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载《云南社科要报》2001年第5期)对促进滇西北地区的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建设，加强民族团结，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具有重要的科学决策价值和指导意义，在中国科学院主持召开的该成果的评审会上，得到院士和专家们的充分肯定。

（二）在彝族社会历史上做出成绩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何耀华就以川滇大小凉山彝族作为研究对象，深入大凉山腹地进行田野调查，在昭觉、美姑、布拖与彝族同胞一起劳动、生活，全面了解凉山彝族的社会制度、历史和文化，对其社会结构、家支制度、宗教形态等进行考察。1979 年 12 月在中国民族学会成立大会上，他宣读了其对凉山彝族的家支进行探讨的《论凉山彝族的家支制度》，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关注，1981 年《中国社会科学》中、英文版作为中国民族学恢复后的首篇代表作予以全文发表，《新华文摘》进行了全文转载。

该文详细论述了彝族家支制度的构成、特点、蜕变、职能、长期存在的原因，提出用发展商品货币经济淡化和瓦解血缘纽带的主张。他认为“凉山彝族的家支是一种父系氏族组织，尚保留着许多古代父系氏族制度的特征。但它已不是原生形态即原始社会时代的氏族，而是次生形态即阶级社会中的氏族。它是由原生形态的氏族蜕变而来的。蜕变首先表现为统一的利益一致的原始家支，分裂成以阶级划分和阶级对立为基础的黑彝家支和白彝家支。黑彝家支是由原始氏族内部阶级分化产生的贵族阶级繁衍而来的，白彝家支则是由与其对立的被统治者滋衍的。其次表现为原始氏族的许多特点发生了适应黑彝奴隶主阶级压迫的变化。其最终结果是原始氏族机关变为黑彝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工具，即黑彝家支头人操纵的家支议事会，在对内和对外方面具有政权的职能。为什么阶级划分和不断激化的阶级斗争未能炸毁家支而代之以地域组织，并最终形成统一的政权呢？原因在于彝族社会经济的不发达，在于没有足以使血族团体导致瓦解的商品经济”。（何耀华：《中国西南历史民族学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45 页）因此，他提倡“用发展商品经济的手段，去解决前资本主义制度的残存形态，使少数民族摆脱贫困而实现现代化”。

该文写于 1979 年，在学术理论上重大突破，对解放思想、肯定商品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科学价值，受到民族学界的高度评价。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民族研究所胡庆钧研究员认为：“本文引用资料准确扼要；归纳论点鲜明突出；从分析家支的蜕变中，明确了凉山彝族家支的氏族制度的实质及其历史地位；对家支的职能及所以

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简单归纳，要言不烦，作者在前人基础上引申剖析，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一扫过去某些人对家支制度认识模糊不清的迷雾，因而做出了贡献。”（何耀华：《中国西南历史民族学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著名民族学家、云南大学江应樑教授认为该文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丰富和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当然，也有学者对这篇文章的重要论点，即用发展商品经济的办法来解决家支问题提出异议。一位民族学者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解决少数民族前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残存问题，不能再走发展商品经济的老路，因为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温床或同义语。”但是，任何具有科学价值的结论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1986年3月，中共中央在《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逾越的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时期，尤其是在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和现代化，迅速发展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实践证明，何耀华在论文中的论断是科学的、超前的，是经得起时间和历史考验的。

近现代以来，一些西方学者为实现殖民中国的需要，发表过不少歪曲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历史的论作。如有的称四川大凉山彝族是“独立罗罗”“未曾受中国人征服过”“凉山是在中华帝国腹心之地建立的国中之国”；有的虽然认为中央王朝征服过凉山，但说中央王朝对凉山的统治是“地地道道的外国统治”。针对这些谬论，何耀华在《凉山彝族与汉族的历史关系》《凉山土司考索》《驳所谓“独立罗罗论”》《关于元初罗斯土官宣慰使的设置问题》等论文中，追溯了从秦汉起历代中央政府在凉山地区的设治情况、历史上彝汉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血肉联系与发展，有理有据地驳斥了“独立罗罗论”和“外国统治论”。在刊载于《文史》第十五辑上的《四川米易萨连〈倮倮安氏纪功碑〉质疑》中，他审慎地判定了该碑的族属不是彝族而是傣族，纠正了学术界流传近一个世纪的错误结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何耀华在《武定凤氏本末笺证》这部集学术性、资料性和考证性为一体的专著中，开创了研究中国云南彝族部落史的先河。在这本著作中，他既用乾嘉考据学的国学研究方法和范式，对汉文文献中的疑点、难点和讹讹进行冰释，又运用彝文文献资料进行匡正，对南宋孝宗淳熙至清朝乾隆末600年间以罗婺部为代表的彝族部落史进行阐述和论证。罗婺部是宋朝时期“雄冠”云南东部三十七个少数民族强大部落的彝族部落，南宋孝宗淳熙时该部首首阿而能服其众，被大理国主段氏举为罗婺部长。此

前，罗婺部首领未见有汉、彝文史书记载，说明其社会经济发展尚处于落后阶段，自阿而后则有明确的系谱及史事之记录，何耀华以笺证体裁对彝族罗婺部酋长及其后裔凤氏进行的系统研究，拓展和丰富了中国史的内容，使彝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向纵深发展。该书论证科学，用工极深，考证规范，出版界、民族学界专家评论“为古籍史料的整理和少数民族部落进行系统的微观研究树立了成功的范例”。（李惠铨：《彝族史研究的新收获——读〈武定凤氏本末笺证〉》，载《云南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

（三）致力于建立和发展中国藏学

1983年7月，时任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副秘书长的何耀华，受会长马曜教授、副会长李绍明研究员的派遣，前往西藏拉萨，与藏族著名学者、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副会长平措次仁教授共同筹备召开全国首次藏族学术讨论会。经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多吉才旦书记和西藏自治区党委批准，全国首次藏族学术讨论会在拉萨召开。在会议上，何耀华首次提出在中国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藏学的主张：“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藏学，是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的一项光荣而迫切的任务。马克思主义藏学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方针。研究藏族的历史和现状。以唯物史观为武器揭示藏民族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规律；研究藏民族在缔造我们伟大祖国中的历史地位、作用和贡献；研究藏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包括语言、科学、文学艺术和宗教等等。当前特别要注意研究西藏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服务。”（何耀华：《为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藏学而努力》）与会者对他的主张不太认同，认为“藏学”是西方的提法，我们不能与之同流，否则就会被“藏独”分裂主义者利用。但此后不到两年，“藏学的故乡在中国”“藏学的中心在中国”已成为国家和学界的共识。

从拉萨回昆明后，何耀华坚持自己的主张，决定把藏学作为进行中国西南历史民族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展开研究，为此，他开始编写《藏汉民族关系史》，把它作为一门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课对云南大学5名博士研究生进行讲授。同时，在《中国藏学》《思想战线》《云南社会科学》等多种刊物上发表《古代羌人与藏区土著居民的融合》《从远古文化遗存看藏区与祖国内地的关系》《试论古代羌人的地理分布》《川西南藏族史初探》《论松赞干布统一事业》《论文成公主入藏》《论金城公主入藏》《西北吐蕃诸部与五代、宋

朝的历史关系》等一系列研究藏汉民族团结的学术论文。《从远古文化遗存看藏区与祖国内地的关系》通过分析青藏、川藏藏区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特征，指出其和华北、华南的同类遗存共同性多而差异性较少，说明它们与祖国内地的远古文化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他批驳英国学者黎吉生等认为“西藏人种不是黄种人，而是从西方迁来的异种人”的说法，指出西藏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表明，西藏人属于蒙古人种是无可置疑的。他认为：“从考古学的材料证明：从远古时代开始，藏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今青藏和川西高原地带，并与祖国内地各民族先民，结成一个共同发展的整体。”（何耀华：《从远古文化遗存看藏区与祖国内地的关系》，载《思想战线》1986年第4期）《川西南藏族史初探》讨论了川西南藏族的起源，证明该地区的藏族与西藏藏族同源；分析了雅砻江下游的拍木依人、纳木依人的源流及其与藏族的融合；研究了该地区藏族与汉族、彝族和西藏藏族的历史关系。《论文成公主入藏》论述了文成公主入藏的历史背景和过程，并对文成公主入藏使吐蕃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与中原地区的交流作了探讨，认为“文成公主入藏，使吐蕃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与中原地区进一步结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同整体”。（何耀华：《论文成公主入藏》，载《云南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论金城公主入藏》论述了金城公主入藏的历史背景，对金城公主的身世及其入藏的过程进行了探讨，认为金城公主“在藏维系和平友好，推动唐、蕃经济、文化交流的业绩，是有很多表现的”。（何耀华：《论金城公主入藏》，载《云南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西北吐蕃诸部与五代、宋朝的历史关系》以翔实的史料，对河西吐蕃、西凉吐蕃、唃廝罗部等与五代王朝、宋朝的历史关系进行了论证，廓清了这一段阙知的史实。这些论文对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和推进中国藏学深入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在中国民族宗教学研究上的建树

在多年从事田野考察的过程中，何耀华深深认识到，原始宗教的残存形态是研究宗教起源和宗教演化史的活化石，而研究宗教的起源及其信仰形式和内容的演化，同研究人类社会结构的演化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演化密切相关，与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连。因此，研究原始宗教不但具有科学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田野考察中他就特别注意原始宗教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先后写出《彝族的原始社会与原始宗教》《彝族的图腾与宗教起源》《彝族的自然崇拜及其特点》《试论彝族的祖先崇拜》《彝族

社会中的毕摩》《浅析纳木依人的本教》等论文。《彝族的原始社会与原始宗教》根据考古学资料对彝族的原始社会状况进行了分析，对广大彝区新石器时代墓葬、崖画反映的原始宗教、彝族远古神话反映的原始宗教做了研究，探讨了彝族的图腾崇拜遗迹、自然崇拜遗迹、祖先崇拜遗迹，对彝族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过的重要影响。此文已被收入 20 世纪中国宗教学的经典文库。毕摩作为彝族从事原始祭祀的祭司，长期被扣上“神汉”“封建迷信职业者”的帽子而遭歧视和打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何耀华运用宗教学和历史民族学的方法对毕摩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作出毕摩是彝族传统社会中固有的知识分子的结论。他的《彝族社会中的毕摩》发表后，在中国民族学、宗教学界引起重要反响。自然崇拜是原始宗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远古时代产生以来，就一直存在于彝族社会生产生活之中，并影响着彝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他的《彝族的自然崇拜及其特点》根据彝文典籍中关于自然崇拜的记述和新中国成立前彝族社会中的自然崇拜情况，对彝族自然崇拜的特点进行了精辟归纳，认为彝族的自然崇拜始行于氏族社会时代，而且是原始氏族最主要的公共活动之一；自然崇拜大都与农、牧业生产有关，是彝族先民适应自然环境，保护自然环境的产物。《试论彝族的祖先崇拜》《彝族的图腾与宗教起源》等则从彝族祖先崇拜的内容、形式和彝族图腾崇拜产生的原因等对彝族的残存的原始宗教进行系统研究。何耀华研究原始宗教的一系列论文，发表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初始年代，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它打开了长期以来不能认真研究的一个禁区，对我国宗教学研究世界三大宗教研究延伸到中国少数民族宗教研究起了推动作用。20 世纪 90 年代任继愈先生主编《宗教大词典》，他被选为 7 个副主编之一，并担任中国少数民族宗教的分科主编和主要撰稿人。1987 年以来，他与中国著名宗教学家吕大吉教授共同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七五”“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重点项目，两人共同主编并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29 卷，2008 年即将出版的 8 卷和计划在 2009 年出版的 6 卷，总字数将达到 1800 万。这套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宗教学家、民族学家共同完成的特大型学术基础性、资料性的成果，也是吕大吉、何耀华两主编 20 多年学术奉献的结晶之一。

（五）坚持以社会科学研究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20 世纪 90 年代后，何耀华把研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为主攻方向之一。在社会学、经济学研究方面取得众多成果。1996

年6月30日，他在给中共云南省委中心学习组做的《推进云南现代化建设的新思路》报告中提出我国第二次经济增长为投资拉动型，该论断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在1996年中国社会学学会学术大会上宣读《加快中国西部发展之探索——同心圆经济发展论》论文，提出“同心圆经济发展”理论。1997年12月，他在《云南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表现形式及其特征》中提出“四低四高”的论断，中共云南省委以其作为统一全省认识的新思路、新观点，经中共云南省第六次代表大会讨论，全体代表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该文“刷新了对云南省情的认识”；1998年，他撰写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云南省经济的影响》在《世界经济》1998年第11期刊出，获云南省政府经济技术研究中心、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藤腾副院长、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所长谷源洋等的高度评价，时任云南省长曾批示：“省政府办公厅以参阅件发全省各地、各部参阅、抄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研究室。”同年，他在《小城镇建设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对中国发展小城镇建设的有利条件、问题与对策做了全面论述，香港树仁大学邀请他在国际会议上发言。

何耀华是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的常务编委，他主编和主著《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中的《通海卷》《路南卷》《曲靖卷》，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云南大学副校长曹和平教授在云南财经大学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说：“这些书培育了一代社会学青年学人。”《通海卷》在1992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后，中共中央宣传部认为，“这样的调查对进一步认识国情、拓展和深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研究，以及形成科学决策，都有重要意义”。作为一本质量高、价值大的调查成果，“具有较高的社会研究价值和保存价值”，此书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二等奖，他个人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为“中国百县市调查先进个人”。

2004年9月，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会长何耀华主持组织权威专家和有影响力的学者76人，针对国际国内舆论对中国在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简称“三江”）建坝发电存在的广泛争议，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组织对“三江”水能资源与环境保护进行专题研究，并邀请美国权威水坝专家来传授美国在水坝水电建设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自10月11日起，初步成果陆续上报国家有关部委及云南省委、省政府和省委中心学习组以其作为学习参考资料。最终成果《三江”水能开发与环境保护》，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公开出版。由于专题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三江水能资源开

发与环境保护的研究成果陆续上网后，全国有 40 多家网站转载，多家报刊刊发，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时任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说：“‘三江’水能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事关云南快速健康发展、事关国家能源安全和生态安全的重大课题，各位专家倾心研究，写出富有科学理论价值和科学决策价值的文章，是对云南工作的支持。”据不完全统计，香港《文汇报》、香港《大公报》、《瞭望》《中国青年报》《云南日报》等数十家报刊对此次会议发表了报道或评论。作为专题研究和学术研讨会的组织者、领导者，何耀华积极撰文，在《加快水电开发和生态建设建立金沙江下游生态能源经济区》和《坚持科学发展观，合理开发怒江水电资源》中，他倡导建立金沙江下游能源经济区、要求合理开发怒江水电资源，保护好怒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对促进“三江”水能资源的科学开发和实现国家能源以及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鉴于何耀华在中国西南历史民族学、中国民族宗教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领域内做出的突出贡献，1986 年 12 月他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1987 年 4 月被授予云南省劳动模范称号，1991 年 10 月首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1 年美国版《世界名人录》（International Book of honor）为他立了传。1999 年，国际山地协会聘请他作为该会理事会常委（中心组成员）。2007 年 4 月，时任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云南省省长颁发聘书，聘他为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阿佤山上光明使·王敬骝

一、人物简介

王敬骝，研究员，男，汉族，1935年生于浙江省黄岩县的一个教师世家。他从小喜欢读书，17岁时就考上了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当时，正是国家为贯彻党的民族平等政策，要加强民族语文工作，他被调到新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学习民族语言。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从事民族语言研究和教学的艰难问学之旅。



二、提着脑袋学佤语

中国自古是多民族的大家庭，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究竟有多少种民族和民族语言还一时不甚清楚。王敬骝到中央民族学院后，听说我国对大多数少数民族语言过去并没有研究。特别是当他听说我国西南边境的佤族，由于地方偏僻、社会发展滞后，一直保持着“猎头祭谷”的原始习俗，全国无人敢去做语言调查，有关佤语属于南亚语系的说法，是从英国殖民者写的《印度语言调查》一书中录来的时候，他愤然了：佤族是印度的少数民族吗？既然中国过去无人敢去调查研究佤语，那么就让我来“舍命陪君子”吧！他选择了学佤语。

由于我国过去对许多少数民族语言缺乏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习民族语言的方法，可以说是非常特别的：它是让学生先学习普通语言学 and 语言调查等方面的课程，等学生有了一定的理论方面的基础后，再让学生直接去民族地区向群众学习语言，待学生学会民族语言后，再来帮助少数民族创制或改进民族文字。

为了使学生能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学校除了请本校的费孝通、林耀华、马学良等教授授课外，还专门请了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的罗常培、吕叔湘、傅懋勳、袁家骅、高名凯、王均等先生来上课。1955年暑假，

学校便借丁声树、李荣先生正在做汉语方言调查之机，请他们以民院语文系的学生为汉语方言的发音合作人，这样实际上也就给学生上了生动切实的汉语方言调查课。1956年3月学校又请罗常培先生主持在民院举办了全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训练班，使同学们有机会受到了当时中国语言学和民族学方面最好的教育。

在同学之中，王敬骝是以刻苦勤学闻名的，在北京求学的四年中，他连长城、香山等北京著名景点都没有去过，暑假寒假都是在学校图书馆度过的。除了授课老师的著作他必定要研读外，他还认真阅读了杨树达、闻宥、王力等先生的著作，并自学了傣文和缅文。因此，他的理论功底在同学们之中是比较扎实的。他在学生时代写的《黄岩话检拾》一文，就是在丁声树、李荣先生对他的家乡话做了调查后写出的，至今还被认为我国吴语方言研究的早期论著之一。

在民族地区实习，他更是认真刻苦，因此在实习结束回校之前他就能在县上的农业生产先进代表大会做口语翻译了。

从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毕业后，学校想留他读民族学的副博士研究生。他说：我是学佤语的，等我把佤文创制出来后再说吧。于是他就参加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来了云南。要创制佤文，必须对佤语进行普查。这在当时是一件相当艰险的工作。因为当时佤山有许多地方还“猎头”，中缅边境上还有残匪，而且许多村寨根本没有马帮能走的路。

从沧源到西盟的路上，护送佤语调查组的连队指导员规定：护送队伍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要保持在10米左右：太隔开了，怕路上林密草深，失去联络；太挨近了，又恐遭遇伏击。而且随时要提防马驮子翻了，把人带下悬崖。经过八个月艰苦卓绝的工作，佤语组终于完成了对佤语进行普查的任务，并于1957年初由王敬骝执笔写出了《佤语语言情况和文字问题》的调查报告，设计出了佤文。这一年王敬骝22岁。

三、佤山十八年

创制出佤文后，本来中央民族学院已通知他回校读语言学研究生。但他希望在回校之前，把佤语小词典编出来以供试验推行佤文之用。不想，这竟使他成了中科院民族语言调查队走“白专道路”的典型，接着就是辗转下放。“国家不是号召我们‘向科学进军’吗？想填补我国语言研究方面的空白，想为国争光，怎么成了‘走白专道路’呢？”王敬骝不管人家怎么看、怎么说，继续走自己认为应该走的路。他把下放劳动同样视为田野调查，到

苗族地区学苗语，到瑶族地区学瑶语，1962年他干脆申请调到阿佤山。在那里一待就是18年。

他到佤山后，把组织上交给的每一项工作都视为是可以为佤族人民服务，可以学习，可以“解剖麻雀”研究佤语和佤族社会的难得机会，积极工作，认真学习。

1965年国家提出要实行“两种教育制度”时，他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跑了87个寨子，使沧源佤族自治县20户以上的寨子都有了学校，并且办起了工读中学和农业中学。大、中专学校恢复招生后，他亲自组织和辅导佤族知识青年，积极推荐他们上大学，仅1975年沧源县就有16名知青被推荐上了大学。

在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进行阶级复查时，他不避政治风险为“班洪抗英事件”著名爱国人士“佤族三保”（保卫国、保卫厂、保卫民）的后人保洪忠以及其他许多佤族有影响人士落实政策。保洪忠后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任省人大副主任。

他走遍了沧源486个寨子，走到每一处，问到每一处。除了下乡向群众学习，他还认真从书本学习。边疆书少，他采取精读的办法。除了《诗经》是他精读的重点，他还把《说文解字注》和《说文通训定声》一个字一个字地做了卡片。

他17岁离家，32岁才结婚，16年中没有请过一天事假，结婚后，依然一个人住在县城。他把整个身心都扑在工作和学习上了。因此，他在佤语和佤族社会历史文化方面的知识被认为“比佤族还佤族”，并被佤族人民称为“巴诏”（意为智者、觉者）。

四、情注民族语

1979年底，在马曜等学术界前辈的关心下，他被调到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回到昆明后，他除了积极调查新发现的语言处，还自学了孟文、柬埔寨文、越南文、泰文、藏文、巴利文。在中国他是率先调查佤语、德昂语、布朗语、克木语、克蔑语、莽语、佻语，并写出调查报告和论著的学者，是中国孟高棉语族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除了孟高棉语族，他对南方的其他语言也有研究。如研究傣语的《西双版纳老傣文五十六字母考释》《傣语声调考》《傣语干支考原》《释阿銮》；研究白语的《南诏骠信与清平官赵叔达星回节唱和诗考释》《〈孔雀胆〉中的阿盖公主诗考释》等文，在这些语言的研究中同样被认为是具有开拓性意义的。除此之外，他自然也研究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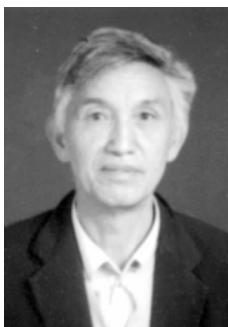
语，他写的《诗经释译》《汉语词族论集》，在汉语研究中也是很有新意的。2002年，他在第30届国际汉藏语会议上提交了《华夏语系说》一文，这是中国学者对中国南方以及南亚（东南亚）“华夏文化圈”内民族语言系属的一种新说，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注意。

由于他在佤语研究方面的成就，他被云南民族学院聘为兼职教授，帮助学校培养出了第一批佤族大学生、研究生。由于他在白语研究方面的成就，他被云南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帮助该校培养出了研究白语的硕士、博士。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给他颁发了政府特殊津贴，以表彰他在语言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

彝族文化开拓者·陶学良

一、人物简介

陶学良出生于宣威彝汉杂居的山村，从小就感受到彝族文化的深奥，在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55年考入高校，后转入云南大学中文系学习，接触到了大量的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深深被其吸引，在课余时间阅读了许多优美的民族民间叙事诗、民歌和民间故事传说，开始认识到云南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云南民族文化有深厚的底蕴，民族众多，历史悠久，是一块待开垦的处女地。特别是彝族文化的民歌、民族史诗、民间传说故事十分丰富，思想性、哲理性、民族性、审美性非常突出，很值得搜集、整理和研究。在大学学习阶段，他静下心来，博览了与云南民族文化有关的调查资料、文献和古书，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受到了启发，激发了学习和研究的热情。这为他从事民族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学毕业后陶学良留在云南大学中文系任教，讲授《文艺理论》《民族民间文学》等课。通过讲课和研究，已感觉到彝族文化的研究还是一个薄弱环节，研究者少，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也少，搜集整理的相关资料出版也不多。因此，彝族文化的研究有一定的难度。陶学良知难而进，立下雄心壮志，要在彝族文化的研究上开拓创新，做出自己独特性的贡献。他一直遵循“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治学原则，潜心研究学问，经常到学校图书馆、资料室查阅和摘抄有关资料。有时还到省图书馆借阅资料。经过长期艰苦的研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彝族文化开拓性成果。

1972年调到云南民族学院，讲授《写作》《民族民间文学》《彝族文学》《彝族文化》等课程。这样一来，教学与科研的内容和方向趋于一致，使他更加热爱彝族文化研究事业。云南民族学院有关彝族文化的资料也比较丰富，为他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陶学良的许多研究成果都是在

这个时期出版问世的。他带着教学中碰到的问题开展科学研究，在科研中取得的成果又应用于教学，提高教学质量。教学促进了科学研究工作，科学研究工作成果又推动了教学工作。他认为，高等院校教学和科研工作应当紧密结合起来，是培养高水平师资的一个有效途径。教师要努力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教师自己没有研究能力，怎能提高学生的能力呢？

陶学良教授忠诚于云南民族教育事业，在数十年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中，硕果累累，成绩斐然，1992年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是对他在民族教育事业和民族文化研究方面所做贡献的表彰和奖励。

二、博览群书 终生受益

陶学良教授与书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在工作之余总是手不释卷，孜孜不倦的阅读各种书籍，读书已成为他的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他上街连瓶矿泉水都舍不得喝，而在书店里碰上一本好书，花上几十元买下却毫不吝惜。为了读书和研究方便，他不断地买书。在他的书房里，书架上、桌子上、床头边都堆满了书籍。有时在地上摞成高高的一堆，看似有点凌乱，实际有条不紊。他要用的书马上能找出来。他读过的书大多都要做上记号，写下批语或者新观点，有时还将有关的参考材料夹在书里，这已形成初步的研究思路。他不但自己喜欢读书，而且还引导学生经常读书，把好书介绍给学生阅读。

陶学良教授讲课，古今中外旁征博引，他精辟独到的见解、丰富扎实的民族文化底蕴、幽默风趣的话语，都得益于博览群书。他认为，读书不只是增长知识，更重要的是发现新的研究领域，找到前人没有研究过的课题。

三、硕果累累 淡泊名利

陶学良教授潜心研究彝族文化，成果显著。1979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搜集、整理的彝族民间讽刺故事集《娃子的笑声》；1981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与郭思久合作整理的彝族史诗《查姆》；1981年，他与李德君合编的《彝族民间故事选》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他与郭思九合写的童话《聪明的小子罗牧阿智》一书于2003年出版。

陶学良教授参加了《少数民族作品选》《少数民族文学论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参加了《彝族文学》《毕摩文化论集》的编写工作。他担任《彝族文学史》的副主编，编写了唐代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彝族文学史部分，该书1991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他编著的《云南彝族古代诗选

注》于1989年12月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1994年6月，他和全宏模、陶应昌两位教授注释了《大山诗草》，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1997年出版了《爨文化椎论》，由于他多次下乡调查，本书出版后获得了学术界专家好评。刘尧汉教授对他说：“你真是彝族文化研究专家。”李明教授认为：“《爨文化椎论》涉及极为深远，论述精当，资料丰厚而翔实，诚为彝族文化发展简史。”日本伊藤清司教授称本书是“复活了神的化身”。

陶学良教授的研究成果多次获奖。《查姆》获1982年云南省民间文学优秀作品奖，《彝族文学杂俎》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成果优秀著作奖；《爨文化椎论》荣获首届中国民间文学山花奖、学术著作奖优秀奖。他任副主编的《彝族文学史》获第九届中国图书奖。

陶学良教授教学科研成就显著，但他淡泊名利，很少谈起自己的成就。有的学生和教师见面时称他为陶教授，但他说，你叫我老陶我就满足了。

民族文博首创人·杨德鋆

一、人物概况

杨德鋆，男，白族，无党派。1937年6月25日生于云南大理古城。1954年毕业于云南民族大学政训部民族理论政策专业（大专），同年留校任教。少时曾兼习绘画、书法、民乐。参加工作后，20世纪60年代初在职入中央文化部艺术局舞蹈（师资编导）基本功训练班学习，继而师从云南艺术学院著名音乐家林之音进修二胡。数十年来一直从事民族文化艺术教育、创作、表演、展示、研究，对云南民族文化艺术进行过广泛深入调查、搜集、亲历实践体验和系统性探索研究并为其宣传、保护、弘扬、发展作出贡献。任教50多年，在云南民族大学和云南艺术学院等院校先后教授艺术专业课和文化、艺术、民族理论课程近20门。创建云南第二座博物馆——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和云南最先培养少数民族音乐舞蹈专业人才的文艺班（民族艺术系前身）；曾任云南民族大学文艺教研组组长，云南省民族研究所艺术研究室主任，学术刊物《民族调查研究》创始人之一和主要责任编辑，《民族学报》创刊、实务编辑和装帧设计，《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封面设计，国家级刊物《舞蹈》专栏作家，云南省民委和文化厅合办赴京“云南民族民俗展览”学术顾问和撰稿，云南民族博物馆立项和筹备专家组副组长，西双版纳民族博物馆项目指导专家，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第5~11次评奖委员会委员，云南民族文化艺术研究会副会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与中国云南民族大学“云南民族文化合作计划”中方主要专家等职务。担任省职称高评委十余载。



杨德鋆现为云南民族大学研究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评审专家，国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审专家，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理事，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学会理事，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云南

省文物局专家组成员，云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云南省专业学位专家委员会委员，昆明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云南民族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指导专家，云南文化示范村“土风计划”指导专家，云南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顾问，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个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二、家世

杨德鏊出生在大理一个挂匾于清嘉庆七年（1802年）的名为“大春堂”的文化艺术气氛浓郁的著名中医世家，祖上医术曾获朝廷嘉奖。祖父杨锦既是名医，又擅长音乐，曾是当地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洞经音乐会鹤云会的会长和主要资金捐助者，为探求新医学科技，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前往国内多个城市考察，继而出游缅、印及欧洲，写成游记《芙蓉闲篇》。父辈三个弟兄皆为著名医生，都有良好的国学和音乐、绘画、摄影艺术修养，在悬壶济世之余热心倡导和支持地方文化建设。大伯父曾获云南省中医考试头名，长期荣任大理中医师同业公会理事长和洞经音乐会鹤云会会长，积极支持、资助中共地下党和“边纵”活动，新中国成立初以社会贤达和著名民主人士身份任大理县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二伯父留学日本七年余（归国后曾在上海《良友》画报任摄影记者、编辑）。由于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大春堂”在大理及滇西一带有口皆碑，被誉为“再生华佗”，门庭若市，登门者除普通群众外，各类著名人士很多。在这样的环境中，杨德鏊既受到优好的传统教育熏陶，又获得较多“海派”文化影响，从小视听广开，逐渐养成胸襟敞亮、眼界宽阔和喜欢思考探索的优点，在家庭良好的训导中获得多方面知识并练就多种才能。

三、人生经历

杨德鏊少时就读于大理县中心国民小学，作文、书法比赛名列全县前茅，1949年入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地下少先队。就读大理一中期间，任该校学生会初中部主席、学生代表，获评优秀学生、模范少先队员。1953年3月参加工作，从大理一中保送到云南民族大学学习民族史、民族理论政策并任文化辅导员，获一等模范辅导员称号，翌年毕业留校任教，至2000年6月退休，共计履职47年。其间，从1958年起兼任云南民族大学云南民族概况与民族政策教育展览馆（即博物馆）筹备组组长，完成从征集文物到设计制作创建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工作；1960—1961年入中央文化部艺术局舞蹈

(师资编导)基本功训练班学习;1962年在职在云南艺术学院进修二胡;1959年4月创立云南民族大学文艺班,任艺术教师和文艺教研组组长,同时负责全校外事接待演出;1979年8月起在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从事科研,任民族艺术研究室主任,硕士研究生民族文化通论、民族文化艺术概论、民族学与民族文化等课教师及《民族调查研究》《民族学报》创刊、编辑,至退休。退休后事业未辍,依然进行着宣传、保护、教育、弘扬、发展、研究民族文化艺术的工作,直到现今。

四、教研成果

(一) 教 学

杨德鏊先后担任汉语言文学、音乐、中国古典舞、民族民间舞、绘画、舞台艺术常识、节目创作排练、艺术概论、艺术史、舞蹈史论、民族文化通论、民族文化艺术概论、民族学与民族文化、旅游与民族文化、云南民族概况、民族政策、云南民族艺术概况、文物和博物馆学、文化遗产保护等课程教师。编写大量教材。培养大批学生。无论院校教育还是社会公共教育都倾心竭力,所教内容多属新创、原创,深受学生欢迎。此外,他还不时应邀举办讲座,选题别具一格,诸如《做文化遗产的知音》(2012年中国文化遗产日在云南省图书馆“云南文化大讲堂”)、《云南多样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弘扬》(2013年中国文化遗产日在澳门博物馆)、《文化知音与爨乡文化遗产保护》(2013年在“曲靖历史文化大讲堂”)、《云南非遗的多彩与不凡》(2013年在云南艺术学院)等讲演,被广泛刊载报道,影响绵延。

(二) 创 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杨德鏊先后创作舞蹈《双嘎光》(双人象脚鼓舞,傣族)、《猴子逗孔雀》(傣族)、《早晨》(藏族)、《阿细跳月》(彝族)、《藏族骑兵舞》《梯田拿鱼》(哈尼族)、《箴帽舞》(傣族)、《崩龙横鼓舞》(德昂族)、《朋友舞》(壮族)、《蝴蝶舞》(傣族)、《嘎洛拥双多》(双人孔雀舞,傣族)、《景颇山皮干》(景颇族盾牌舞)、《手巾舞》(壮族)、《景颇耍刀舞》(景颇族)、《阿佤象脚鼓舞》(佤族)、《藏族弦子舞》、《藏族铃鼓舞》(藏族)、《斗鸡舞》(布朗族)、《彝族烟盒乐》(彝族)、《嘎巴》(傣族鱼舞)、《鹤鹑舞》(拉祜族)、《跳瑶铃》(瑶族)、《赛鼓》(傣族)、《杵臼舞》(佤族)、《欢乐三月街》(白族霸王鞭八角鼓舞)、《蜻蜓舞》(傣族)、《青年花灯舞》(汉族)、《回族青年舞》(回族)、《苗族芦笙舞》(苗

族)、《哈尼乐作舞》(哈尼族)、《望北京》(彝族)等;歌曲、舞曲《我们生活多美丽》(傣族)、《瑞丽江早晨》(傣族)、《玉洱银苍组歌》(白族)、《我家住在独龙江边》(独龙族)、《节日欢歌》(傣族)、《杵臼舞歌》(佤族)、《红河滚滚船成排》(彝族)、《苍天大树根子深——民族团结歌》《欢迎新同学》《毕业歌》《望北京》(彝族)、《早晨》(藏族)等。1988年任云南民族艺术节顾问、策划、撰稿,为全省民族歌舞29个方队组成的大型文艺表演设计内容,撰写介绍;1989年任文化部与云南省文化厅联合举办的《东方彩霞——中国55个少数民族穿戴艺术表演》艺术策划、撰稿,撰写报幕词和宣传书稿;为第六届亚洲艺术节民族民间歌舞晚会《山水狂情》策划并撰写报幕词;1999年参与'99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大型文艺表演《天地浪漫曲》策划;2004年为全国民族民间文化(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经验交流会议民间歌舞晚会《彩云南现的地方》撰写报幕词并担任嘉宾主持,现场解说节目;2011年为庆祝云南民族大学建校60周年大型文艺表演《桃李芳菲》撰写报幕词和主题朗诵词《豪情岁月辉煌路》等。

杨德鏊的摄影绘图作品先后在《文艺研究》《云南民族学院学报》《舞蹈论丛》《民族艺术研究》《今日民族》《云南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民族调查研究》《勐腊》《西双版纳民族博物馆》《傣族谚语》等刊物书籍上发表数百次。其设计作品被《云南民族学院学报》《民族调查研究》《民族学报》《人文学刊》等和学校教材、工作文本封面设计、插图绘制所选用;并为《拉祜文化论》《云南民族史》《美学十讲》《德化碑》等书籍设计封面。杨德鏊还先后与画家陈雄勋合作创作大型丙烯绘画《在人类丰饶华美的广阔大地上》(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1981年)、《绿色勐腊历史文化传奇》(勐腊县民族博物馆,1993年)、《云南民族婚恋风俗史影》(昆明吉鑫滇味城,1994年)、《云南民族文物珍品》(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1997年)等,形式、内容、技法、风格独特,具有开创性。

(三) 科 研

60多年来,由于对各民族文化艺术及其历史状貌调查研究广泛深入且长期坚持不懈,杨德鏊有大量价值不凡的新发现,科研创见迭出,走在前沿,成果丰硕,多项成果填补了前人未曾涉及领域的空白,开垦出民族文化艺术和文化遗产探索的一条路子,研究成果在应用中产生了突出的社会效果。

1. 出版著作

杨德鏊出版著作《美与智慧的融集——云南民族艺术介论》(1993年问

世，2013年入选《云南文库·学术名家文丛》出版）、《版纳的彩色角——勐腊的乡土文化》、《纳西族古代舞蹈和舞谱》（合著、主撰）、《云南民族文物·身上饰品》（合著、主撰）、《云南少数民族织绣纹样》（合著、主撰）、《西双版纳民族博物馆》（主编、撰文、摄影）等。是《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词典》《中国舞蹈词典》《南诏大理国雕刻绘画艺术》《云南民族文化精粹》《云南特色文化》《中国少数民族美学资料初编》《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国历史大辞典》等书主要撰稿人（或图片提供人）之一。

2. 发表论文

杨德鏊先后在《文艺研究》《舞蹈》《舞蹈论丛》《中国舞蹈艺术》《舞蹈艺术》《民族艺术》《民族艺术研究》《艺术家》《中国工艺美术》《云南工艺美术》《新疆艺术》《思想战线》《云南文物》《今日民族》（原《民族工作》）、《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原《云南民族学院学报》）、《中国民族》（原《民族团结》）、《民族》《民族学报》《民族文化》《民族音乐》《北市国乐》（后名《国乐新丝路》）、《云岭歌声》《参政与咨询》《云南群众文化》《云南日报》《中国民族报》《民族文化报》等报刊和专题文集发表学术论文《铜鼓乐舞初探》《南方铜鼓的西渐》《凝结在纳西古老图画象形文字里的音乐》《宴舞类说》《南方羽舞》《象与象舞》《瑶族盘王节及其乐舞探说》《东巴古代墨迹蕴藏的纳西服饰写真史》《东巴跳神经典译注二种》《聚异凝彩南诏衣——唐代南诏服饰研究》《象脚鼓及其在民族民间舞蹈中的运用》《傣族壁画中的文身》《常在身边的福影——云南民族吉祥物简论》《云南少数民族艺术文物》《云南民族艺术节大型文艺表演述论》《百彩千辉融绣艺——“滇绣”概说》《教传薪之火永远旺炽》《做文化遗产的知音》《金沙江大湾的旋律——纳西音乐的乐彩》《酒歌：画意诗境唱人生》《谈骨乐器》《云南古代乐舞初探》《云南民族舞蹈分类略述》《艺林奇珍——东巴舞蹈和舞谱》《对泥土的深挚敬意——民族舞蹈研究随思》《东方彩霞——中国55个少数民族的穿戴艺术》《族属认同实践的范例——记贵州“南龙人”认同白族的一次历史性调研经历》《滇西边地大山中的满族——保山满族考察探析》《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中的美学资料》《〈金凤花开〉漾起的记忆涟漪》等200余篇。

3. 影视拍摄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杨德鏊担任策划、撰稿和指导，与云南民族大学教中心合作拍摄民族文化电视宣传、教学片《南土一珠——云南民族学院民族博物馆》《苗族花山节》《人类思维的古老辙痕——云南民族文字概观》

《晋宁观音洞壁画》《滇东北面具艺术》《探寻滇东爨文化》《姚安龙华会和古代文化遗迹》等，走在云南电化教育和影视人类学实践前列。

（四）成果应用

杨德鏊在文博事业上做出多方面贡献。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他为国家发现、征集、修复、抢救大量珍贵民族文物（总数在千件以上）；主持并从内容到形式、展具、绘画、雕塑、文字等亲手准仔细设计、制作、监制，创立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在缺乏参照的情况下摸索创造出展示地域性少数民族文物为主的特色博物馆新模式，让云南边疆少数民族文物第一次以永久正式陈列的方式呈示于“大雅之堂”，供五洲四海人士参观；1993年设计创立勐腊县民族博物馆；继而受聘为西双版纳民族博物馆项目顾问和指导专家，撰写筹建方案、文物征集提纲、陈列大纲和编撰设计画册、光盘、门票、宣传页等，为创立该馆付出大量智慧汗水；同时，受聘为云南大学伍马瑶人类学博物馆顾问专家，帮助指导该馆筹建和进行人员培训；应邀指导迪庆州博物馆新馆修改陈列内容和修订解说文字；为昭通市博物馆撰写筹备方案和陈列大纲。此外，1996、1997年先后为云南民族大学创立民族体育陈列室、艺术系民族民间艺术陈列馆。

杨德鏊还为云南民族传统文化发掘、保护、弘扬做出过贡献。研究成果被广泛使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除在学校担任自编教材的民族文化通论、民族艺术概论等研究生课程教学外，为培训国家文物局、省文化厅（文物局）所属文博业务人员，全省民族民间音乐集成、舞蹈集成编辑人员，民族民间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人员等，先后担任主讲数十次，撰写教材数十万字，收效明显。为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纲要的制定和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花费大量心血，做出显著成绩。

杨德鏊长期参加国家和全省性重要文艺表演活动创意、策划、指导、撰稿、实施、评论等，为发展民族文化艺术事业做出了积极又富有成果的贡献。

四、社会评价和获奖情况

（一）社会评价

报刊书籍和著名人士对杨德鏊的成就和贡献多有评述。多年前，《舞蹈论丛》《云南日报》《当代中国文博专家志》《中国舞蹈词典》《大理市志》等即对其有专门介绍。1988年著名舞蹈艺术家戴爱莲在给云南省民族研究所

领导的信中说，杨德鏊对东巴舞谱的发现和研究的价值很高，“很了不起”，她“很是敬佩”。《舞蹈论丛》对杨德鏊的研究评价是“填补空白”“具有开拓性”。2001年10月云南民族大学校庆50周年前夕，著名学者、原云南民族大学校长马曜教授从医院特意给杨德鏊写了一封亲笔信，信文说，“德鏊同志：民族学院五十周年校庆即将来临，由你一手创立的民族博物馆也将满二十周岁。它是边疆民族文化建设最先出现的一项有深远意义的创举，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你为民族文化艺术发掘、保护、研究、教育等方面所做的贡献，应该载入史册。”著名人类学家、云南大学伍马瑶人类学博物馆创建者尹绍亭教授在《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诞生记》中说，“在新生代学者中，像省外的宋兆麟，省内的杨德鏊等那样积累深厚、学识渊博的专家已是凤毛麟角”。杨德鏊亲手创建的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被国际知名学者誉为“开民族学博物馆的先河”（吴泽霖，1985）、“是国内第一流的博物馆，有不少国宝……形式设计新颖生动，是民族博物馆界的楷模”（宋兆麟，1996）、“一颗影响巨大的明珠”（马曜，2004）。美国知名人士基辛格参观后题词说，“既多姿多彩，又集中统一，富有独创精神”（基辛格，1985）。

（二）获奖情况

创作表演和学术成果获奖：①创作表演节目《嘎洛拥双多》（双人孔雀舞）获1959年云南省民间文艺会演优秀节目奖；②论文《铜鼓乐舞初探》获云南省1979—1989年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③著作《美与智慧的融集》获1996年云南省第五届优秀图书二等奖；④《云南少数民族织绣纹样》获1997年国家民委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⑤《纳西族古代舞蹈和舞谱》1996年获省教委高校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⑥电视教学片《人类思维的古老辙痕——云南民族文字概观》《晋宁观音洞壁画》《滇东北面具艺术》等于1994—1998年期间先后分别获省电化教材二等奖。

其他荣誉：2006年获国家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个人称号；同年获云南省文联从艺50周年以上艺术家荣誉证书和勋章；1956年评为云南民族大学先进工作者；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五次被评为云南民族大学先进工作者；2012年获昆明市文史研究馆先进个人称号。

杨德鏊长于书法，从其作品笔意可知他喜欢“墨风守舍”；信守“艺在水源处，常润芳草绿”；他爱的两句话是“鸟翼不知疲”“不懈是真才”——他的心智、意趣、步履痕迹和人生目标，仿佛都涵化于其中了。

“三新”育英才·王叔武

王叔武（1923年11月—2004年1月），安徽桐城人。1945年考入中央大学文学系，1949年寄读云南大学文史系毕业。先后师事汪辟疆、李笠、刘文典诸教授，学习训诂、目录及校勘之学，并承刘文典恩师指导之。

王叔武先后历任云南省西双版纳民族工作委员会委员兼政策研究组组长，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科副科长，调查研究室副主任；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云南民族大学中国民族史硕士生导师，曾兼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历史大辞典·民族史卷》编纂委员会委员、云南分编委副主编，《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委员，云南省地名委员会委员，云南省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云南省社会科学研究系列高级学术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委，中国民族研究学会理事，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顾问，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顾问、副理事长，云南省东南亚研究会理事，政协云南省委员会五届、六届委员兼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王叔武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家、民族学家、古籍整理研究学家、语言学家、当代教育家。他毕生都从事民族研究工作，他为人真朴，居实而不居华，自1951年调入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起，对云南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进行了深入实际的艰苦调查研究，先后参加并编写出版了彝族、白族、傣族、景颇族、阿昌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社会调查报告。1977年调入云南民族学院后，为该院民族学研究体系的建立呕心沥血地工作，并在省政府、省民委及院领导班子的关怀下成立了“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并为该所的发展贡献了毕生精力。他在学术研究工作中提倡“三新”即“新课题”“新资料”“新方法”，培养了一大批研究民族学的专业人才和专家。他在几十年的艰苦勤奋工作中给后人留下了极为丰硕的科研成果。

他的主要学术专著有《云南古佚书钞》《大理行记校注》《云南志略辑校》，合著有《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简史》《白族简史》《彝族简史》等；发表的论文有《关于白族族源问题》《十九世纪英、法侵略云南史述

略》《〈交广印度两道考〉辨误》《关于云南少数民族语地名问题》《云南少数民族源流研究》等数十余篇，一百多万字。个人简历曾入编《中国当代历史学学者辞典》《中国当代古籍整理研究学者名录》《中国当代教育家辞典》《中国高级专业技术人才辞典》以及《中华人物辞海·当代文化卷》（上册）等。

民语老战士·陈相木

一、人物简介

陈相木教授 1932 年出生于浙江义乌，他的性格中带有南方人典型的细致与温和。20 世纪 50 年代初，年仅 20 岁正在北京大学求学的陈相木响应党中央号召，毅然转校到中央民族学院佤语专业学习，从此开始了对民族语言学的不懈探索。四年的学习使他深深领略到语言学的神奇魅力，更认识到民族语言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他不仅埋头苦读，更重视社会实践。1955 年，大学三年级的他，参加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到云南进行为期近一年的民族普查。他深入佤、德昂、布朗山寨，与当地老乡促膝长谈，悉心请教，用心揣摩，为佤语、德昂语、布朗语的整理和推广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赢得了广泛的尊敬与爱戴。在几十年的岁月里，陈教授调查过云南 13 个民族语言，包括两个语系、五个语支，比较全面地研究了云南民族语言。他曾参加过云南民族语言普查，民族文字的创、改、选，民族文字的试验推行，民族文字方案的修改，民族语教材和词典的编写，民汉语的翻译，民族新术语的规范和民族语言的教学等工作。几乎全过程地参与了云南民族语言的各个方面和环节的工作，是云南民族语言工作的一名老战士。



陈教授在学术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认识到民族语言学的发展任重而道远，更重要的是这项工作使少数民族同胞通过其语言的变迁了解本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为民族语言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往事集略

数十年如一日的辛勤耕耘和艰苦探索使陈教授赢得了辉煌的成就和极高的赞誉。他 1980 年调入云南民族学院，为民语系增办的三个民族语言文学

专业做出了贡献，他组织领导了 48 门、74 册民族文字本科教材的编写，该教材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的“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为学校民族文化学院硕士点的建设与发展、民族语文人才的培养均做出了贡献。在学术上，他与人合作撰写了《德昂语简志》《西双版纳老傣文五十六字母考》等 20 多篇（部）论文和著作。在研究理论上，如音位系统的处理、民族文字的改革与使用、翻译理论、新词术语规范、民族语言的发展等方面，都有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新见解。他培养了数十名硕士生，还有大批本科生。特别是在佤语、德昂语、布朗语研究方面，陈教授造诣颇深。他编写了《现代佤语》《佤语语法》和《佤语语音及文字》等教材，对于佤语的研究和教学均有重要价值。陈教授并不因成就而懈怠，他以佤语的研究为基础，开始对孟高棉语族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丰富的理论素养使他一开始即从多角度、多层次高屋建瓴地深入研究探讨，奠定了他在孟高棉语族研究中的较高地位。他的成就为国家所认可，担任过云南民族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主任，享受国家特殊津贴待遇。

面对纷至沓来的荣誉，陈相木教授淡泊从容，他最在意的是民族语言学的发展，最兴奋的是民族语言学工作者队伍的壮大，最幸福的是自己沿着一条正确的学术道路，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贡献。

出于对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关怀，陈相木教授还对云南民族语言的使用和语言教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考察。他认为这是新时期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要团结一致、认真地去做。这个问题能说清云南民族语言发展的不同阶段，认清民族语言发展的大方向，统一认识、统一思想，对语言使用和语言教育有个前瞻性的认识。在认清规律、趋势的基础上，调整和制订民族语文政策。如民族语文、教育、人才培养、语言使用、语言教育、出版广播等工作应有相应的适合当前实际情况的政策，促进语文工作的发展。在语言文字工作中要根据实际和发展方向调整工作重心。做好了这一工作，将大大推动云南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发展人才培养，经济建设、小康社会建设、云南文化大省的建设、促进云南整个社会的大发展。近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培养从事民族语言教育的高等人才，为该领域的发展培养新生力量。在他们的身上，陈教授寄托了无限期望。

陈教授极为注重学生学术水平的增长与个人素质的提高。无论是进行社会调查，还是撰写学术论文，他都亲自指导，不仅仅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以高尚的人格力量感染他们，希望自己对民族语言学的赤诚能代代传承。如今，他的学生遍布云南各地，为云南的民族文化事业尽心尽力。他们深深地

敬仰着陈教授，浓浓的师生情情意悠长。

在民族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中，陈教授认为，首先要热爱自己的专业，因为它一定是科学的，跟国家建设密切相关的，应该摒除杂念，静心学习；其次从事民族工作应该怀着对少数民族最真挚的感情。陈教授多次深入民族地区考察，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对待学生则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用心关怀与引导，也要严格要求；对于学术，应选择正确的路子，处理好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重视理论，但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实践上，通过实践总结出理论，才能有特点和新意。而最重要的是坚持不懈，脚踏实地，注重积累，做勤奋的赶路人。

陈教授选择了语言学，终身挚爱着语言学，用一生的追寻开拓着民族语言学研究的新路，长期的努力奋斗，取得累累硕果。取得这些成绩，都是因为他始终植根于民族语言文化的沃土。

古滇思想者·余嘉华

一、个人简历

余嘉华，男，1939年生，云南丽江人。云南师范大学教授、云南民族文化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云南文化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有《大观楼长联及作者孙髯翁》，获西南地区优秀教育图书奖；《云南风物志》获云南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古滇文化思辨录》被称之为“辟一方研究天地，立一家学术之言”的著作。参与《云南先贤碑廊》《翠湖历史文献碑廊》的撰稿策划；参加编写过《云南古代文学史》《唐宋散文精华》等40余种大中型图书；主编《闻一多研究文集》《云南文化精华丛书》等。在报刊发表论文100余篇，如《滇文化与鸡片谈》被日本《比较民俗研究》全文译载，获省优秀社科奖。另有十余篇获多各种科研奖。《云南日报》《文艺报》《大西南文学》等十余种报刊发表过他著作的评论。《云南词典》《云南年鉴》《中国文艺年鉴》《中国对联大词典》等列有他著作的条目并提要介绍。他主持的云南地方民族文化1995年4月被评为校级重点学科。其小传被收入以中、英、韩等文字出版的30余种辞书中。



二、学术著作

主要研究方向：《大观楼长联及作者孙髯翁》（专著，198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5年收入《中国历史文化名楼：大观楼》一书）；《闻一多在昆明》（专著，198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初期时名为《闻一多在昆明的故事》，1997年重版时恢复原名）；《云南先贤碑廊》（参与策划并主撰，1999年立七贤庄内，首次以像传结合的方式为云南先贤立碑80万）；《昆明园林志·概况·园林艺文》（2002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担当诗文集》补辑点校（与杨开达合作，2003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及云南美术出版

社出版)。

三、主要研究成果

(一) 中国古代文学与云南地方民族文化代表性成果

《云南风物志》(主编、主笔,1986年出版,已9次印刷);《古滇文化思辨录》(专著,1997年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木氏土司与丽江》(专著,2002年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彩虹一片舞天鸡》(论文,载中国台湾《故宫文物月刊》1993年第9期,被日本《比较民俗学》1995年第3期全文译载)。

(二) 获奖成果

《云南风物志》获云南省1979—1989年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彩虹一片舞天鸡》获云南省1993—1995年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木氏土司与丽江》获云南省2001—2002年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李群杰文集》获云南省2001—2002年社科优秀成果荣誉奖。

滇边瞭望哨·鲁刚

一、人物概况

鲁刚，男，1951年生，云南昆明人，汉族，云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

1969年鲁刚作为知青下乡到西双版纳生产建设兵团，1982年云南师范大学毕业获史学学士学位，1987年云南民族大学毕业获史学硕士学位，1996年破格晋升为教授，2005年被表彰为“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员”，2006年获“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哲学社会科学专家”称号，2011年入选“第三届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名录。历任云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主任、历史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院党委书记等职，兼任云南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学会理事、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常务理事。



长期从事民族历史文化和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等热点问题的教学科研工作。历年来开设《云南民族史》《云南民族文化史》《民族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研究》《西南边疆社会问题研究》《西南边疆社会历史与现状》等硕士、博士研究生专业课程，指导培养硕士研究生100余人、博士研究生10余人。科研成果方面，自1981年以来共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6项、省部级和国际合作研究课题8项，成果5次以“优秀”等级结题，3次入选全国社科规划办《成果要报》，5次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调研》等密级内参；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60多篇，出版学术著作12部，其中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和《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各1部；获省部级优秀社科成果奖8项，其中一等奖2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3项。

二、学术成果

(一) 课题类代表性成果

(1)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跨境民族与云南边境地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问题调查研究》(项目编号 11BNZ007), 2011 年立项在研。

(2) 国家社科基金西南边疆重点项目《缅甸政治局势的演化与我国西南边疆安全 and 国家利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 B10004), 2010 年立项, 2012 年完成结题, 评定等级“优秀”。

(3)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近期中国社会问题演化的趋势研究——中缅边境地区毒品问题整体演化趋势及其对策研究》(项目编号 08BSH012), 2008 年立项, 2010 年完成结题, 评定等级“优秀”。

(4) 国家社科基金西南边疆一般项目《云南跨境民族中的毒品问题与禁毒工作调查研究——以新形势下的中缅边境沿线“金三角”北缘地带为重点》(项目编号 A080012), 2008 年立项, 2009 年完成结题, 评定等级“优秀”, 并由全国社科规划办以《缅北战乱对我国的影响和对策建议》为题刊发于《成果要报》2009 年第 65 期, 经中央高层领导批示后下发文件《关于云南民族大学鲁刚同志研究成果受到有关领导和部门重视的通报》予以表彰。另由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以《云南跨境民族毒品问题及其治理对策建议》为题刊发密级内参《边疆调研》2010 年第 1 期。

(5)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边疆民族地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社会稳定问题调查研究——以云南为例》(项目编号 05BSH034), 2005 年立项, 2007 年完成结题, 评定等级“优秀”, 并由全国社科规划办以《维护云南边疆稳定的对策建议》为题刊发于《成果要报》2008 年第 38 期, 中共云南省委主要领导作出重要批示。

(6)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云南沿边境民族地区毒品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1992 年立项, 1996 年完成结题后, 先是由国家社科规划办以《〈云南沿边境民族地区毒品问题及其对策研究〉分析了禁毒斗争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为题刊发于《成果要报》1996 年第 37 期, 后又由《光明日报》“理论与学术”版于 1997 年 1 月 18 日刊文予以专题介绍。

(7) 云南省社科基地研究项目《云南跨境民族毒品问题研究》, 2008 年立项(项目编号 2007JD—04), 2010 年完成结题, 评定等级“优秀”。

(8) 国家委托重大研究课题《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稳定与发展的主要问题

及对策研究》，云南分课题主要执笔人，1991年立项，1993年完成结题。

(9) 中国社科院重大课题 B 类项目子课题《云南边境地区社会稳定问题调查研究》，2003年立项，2005年完成结题。2007年9月由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中心以《应高度重视印支难民问题的解决》为题刊发于密级内参《边疆调研》第26期。

(10) 中韩国际合作研究课题《中越边界沿线边境贸易与国际合作研究》，2007年立项并完成结题。

(二) 论文类代表性成果

(1) 《边疆民族地区族际通婚的案例析——基于云南三个少数民族乡镇的田野调查》，载《西南边疆民族研究》(CSSCI 核心期刊) 2013年第13期。

(2) 《试论“边疆社会问题”的基本内涵与特征》，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CSSCI 核心期刊) 2012年第1期。

(3) 《怒江—萨尔温江上中游地区的旅游资源与开发》，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CSSCI 核心期刊) 2011年第6期。

(4) 《西南边疆民族宗教问题前沿研究——基于云南边境地区民族宗教问题的实证研究》，2010年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西南边疆重大理论问题学术讨论会”参会论文，中国社科院科研局《西南边疆调研》以《云南民族宗教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关于云南民族宗教问题的几点对策和建议》为题刊发于内参2011年第6、第7两期，国家民委主任作出批示。

(5) 《中越边界云南段沿线地区边境贸易与国际合作研究》，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CSSCI 核心期刊) 2009年第1期。

(6) 《大丽铁路中下段古籍文献资源及其保护与开发研究》，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CSSCI 核心期刊) 2009年第4期。

(7) 《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维护边疆稳定的时代内涵和历史使命》，载《思想战线》(CSSCI 核心期刊) 2008年第3期。

(8) 《论爨文化时期南中地区的夷汉民族融合》，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CSSCI 核心期刊) 2008年第4期。

(9) 《爨文化特色新探》，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CSSCI 核心期刊) 2007年第2期。

(10) 《中缅边境沿线地区的跨国人口流动》，载日本东京农工大学《途上地域人口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5期(日文版)，另载《云南民族大学

学报》(CSSCI 核心期刊) 2006 年第 6 期,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人口学与计划生育》2007 年第 2 期全文转载。

(11) 《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载《云南社会科学》(CSSCI 核心期刊) 2005 年第 4 期。

(12) 《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迁徙及其历史作用》, 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CSSCI 核心期刊) 2005 年第 2 期,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人口学与计划生育》2005 年第 5 期全文转载, 《中国高校文科学术文摘》2005 年第 2 期摘要转载。

(13) 《略论昆明古城的历史沿革、文化特色及其底蕴》, 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CSSCI 核心期刊) 2004 年第 2 期。

(14) 《西双版纳毒品问题考察研究》, 载《云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 年第 2 期。

(15) 《当代云南边境民族地区的毒品问题与禁毒斗争》, 载《中国边疆问题研究通报》第二集(1998)。

(16) 《云南边境民族地区外来流民的现状与思考》, 载《中国边疆问题研究通报》第二集(1998)。

(17) 《云南昭通东汉〈孟孝琚碑〉史料价值举隅》, 载《中国边政》第 141 期(中国台湾, 1999), 另载《贵州民族研究》(CSSCI 核心期刊) 1998 年第 3 期。

(18) 《从呈贡天子庙战国墓葬看滇池地区的古代社会》, 载《民族调查研究》1988 年第 1 期, 后入选《云南民族大学四十年校庆学术论文集》,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19) 《试论南中大姓的族属及其发展演变》, 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CSSCI 核心期刊) 1998 年刊庆特集, 后入选《云南民族大学五十周年校庆学术论文集》,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出版。

(20) 《爨龙颜碑补正》, 载《云南社会科学》1982 年第 1 期。

(三) 著作类代表性成果

(1) 《社会和谐与边疆稳定: 基于地缘、民族、社会和宗教的实证研究》, 2010 年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中国社科出版社 2011 年 3 月出版, 同年 5 月全国社科规划领导小组通报表彰。

(2) 《云南跨境民族中的毒品问题与禁毒工作调查研究》, 中国社科院方志出版社 2010 年 11 月内部出版。

(3) 《爨文化史》，合著第二作者，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出版，2006 年再版，2010 年入选《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

(4) 《永昌府文征校注》，执行副主编、执笔 30 万字、统稿 150 万字，云南美术出版社 2001 年出版。

(5) 《民族社会学概论》，合著执笔第九章“民族人口”4 万余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出版，2011 年再版。

(6) 《云南特色文化》，合著、执笔“爨文化——历史迷雾中的璀璨明珠”4 万余字，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6 年出版。

(7) 《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合著、执笔“西南汉族”部分 5 万余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出版。

(8) 《人文论丛》，全书主编兼社会学卷、旅游学卷主编，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7 年出版。

(四) 获奖类代表性成果

(1) 《云南跨境民族中的毒品问题与禁毒工作调查研究》，2011 年获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2) 《边疆民族地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社会稳定问题调查研究——以云南为例》，2009 年获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3) 《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迁徙及其历史作用》，2006 年获国家民委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

(4) 《略论昆明古城的历史沿革、文化特色及其底蕴》，2005 年获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5) 《当代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毒品问题与禁毒斗争》，2000 年获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6) 《中缅边境沿线地区的跨国人口流动》，2010 年获国家民委优秀社科成果三等奖。

(7) 《爨文化史》，2003 年获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8) 《永昌府文征校注》，2003 年获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集体）。

白族凿空者·杨国才

一、人物概况

杨国才，女，白族。1954年10月生于云南省大理湾桥，大理一中高中毕业后，考入云南民族学院，现为云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学报副主编、社会学博士生导师。大学毕业后，杨国才从事哲学教学工作，教哲学原理和欧洲哲学史。现任云南民族大学少数民族女性与社会性别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少数民族女性学、性别社会学和民族伦理学。云南省第九、十、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云南省民族伦理学会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20世纪80年代开始，杨国才从研究少数民族哲学、妇女的生活、生产起步，逐渐转为对少数民族地区妇女的生存与发展、道德规范、生育健康、教育、权益保护等问题的关注与研究。

她长期致力于少数民族女性学的学科建设，创建“云南民族大学少数民族女性与社会性别研究中心”。1999年起，在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硕士点开设女性学研究方向，开设女性学、性别社会学等多门研究生及本科生课程。在女性学教学与研究中，倡导社会科学与医学的结合，实现了高校、党校、妇联、社科院联动的局面。应邀在省内多家高校及妇联系统进行专题讲座。多年来，作为社会性别方面的专家，参与多项国际、国内项目的培训，多次对缅甸、越南等国家的医务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进行社会性别知识培训。

二、主要著作

主要著作有《少数民族生活方式》《智慧的曙光：宗教与哲学》《白族哲学思想史论集》《情系苍山 魂泊洱海——白族女性》《白族传统道德与

现代文明》《女性学学科建设与少数民族妇女问题研究》等，并参与组织编辑《以妇女为中心的生育健康》《云南女性文化丛书》《社会科学与生育健康丛书》《多学科视野下的艾滋应对》《少数民族女性学学科建设与妇女发展》。相关论文有《云南藏族女性的教育与发展》《扶贫开发与云南少数民族妇女的发展》《佤族女性气质与女性角色的建构》《云南怒江傈僳族妇女与宗教》《云南女性学学科建设的本土化尝试》《云南少数民族女性学的建构与发展》《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的内涵》《西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化中的技艺知识》《从服饰看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的多样与共生》《边疆少数民族妇女流动特征的变迁》等近百篇。

近年来参与、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等重要研究课题和项目有：《女性社会学视野中的少数民族妇女流动》《云南少数民族妇女的道德规范问题研究》《以妇女为中心的生育健康，以社区为基础的生育健康，传统文化与生育健康》《云南高校女性与社会性别学的教学与学科建设》《民间妇女手工艺口述史》《多学科视野下的艾滋应对》《高校社会性别教育与少数民族社区社会性别意识提升》《云南少数民族妇女的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研究》等。

三、《白族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介绍

20世纪80年代初，在几次全国哲学学术研讨会上，杨国才认识了肖万源、朱德生、葛荣晋、刘文英等全国著名哲学名流，他们鼓励她扬长避短，发挥学术优势，从事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于是她在云南省社科院韩敬研究员和云南师范大学伍雄武教授的指导下，开始从事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工作。三十多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表文章60余篇，出版了《少数民族生活方式》《智慧的曙光——民族宗教哲学探》《情系苍山 魂泊洱海——白族女性》等著作。她还多次在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上进行学术交流，1995年她在北京参加了世界妇女大会并在NGO论坛发表的演讲，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广泛关注。出于对白族文化的特殊情感和作为白族女儿的责任感，她选择了白族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建设关系的研究课题，先后历经10年的调查研究，写成了《白族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一书，由当代中国出版社于1999年9月出版。

白族的传统道德是在白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是维系白族共同体稳定与发展的重要保证。是白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杨国才有深厚的学术研究功底、扎实的理论修养和专业基础，通过对白族地区深入的民族学田野调查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经过长期的思考和

探索，写成《白族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该书分绪论、白族社会公德、劳动道德、贸易道德、恋爱道德、婚姻道德、家庭道德、丧葬道德、宗教信仰道德九部分，近30万字。在绪论中，杨国才把白族的道德概括为：① 团结互助，敬老慈幼的美德；② 群体内聚，维护统一的精神；③ 热心公益、保护环境的意识；④ 吃苦耐劳的爱岗敬业精神；⑤ 为人正直、诚实守信的行为准则；⑥ 公道办事、抑恶扬善的道德风尚；⑦ 恋爱自由的婚姻观；⑧ 夫妻互敬、家庭和睦的道德观；⑨ 勤俭节约、反对浪费。除此之外，还有尊师重教、与人为善、和睦共处、仗义疏财等。杨国才认为，白族的优良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建设基本上是相适应的，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的转化白族传统道德，使其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杨国才教授在书中从以下几方面全面分析了白族的传统道德，并提出了新时期白族现代道德的基本原则。

白族的社会公德作为白族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世代传承的特点，具有规范人们的行为、分辨是非、管理社会生活的作用，前举的群体内聚，维护统一，团结互助，敬老慈幼，热心公益，讲究卫生，保护环境等是其社会公德的主要内容。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白族现代公德应有以下基本原则：① 集体主义原则；② 人道主义原则；③ 公正的原则；④ 诚实守信的原则。白族不仅要保留传统道德中的优秀道德，更要学习和借鉴别人先进的思想来丰富和武装自己，实现白族社区内以社会风气、公共秩序、生活环境为主要标志的城乡文明程度的显著提高。

白族的劳动道德是白族先民在生产劳动中形成的职业道德，作者对白族先民诸多的劳动方式如采集渔猎、农耕、马帮、航运、编织、医疗及各种手工业等传统职业道德进行分析。白族传统中每一行业都有自己特殊的行业特点和本行业区别于其他行业的规范。总的各行业都遵循诚实劳动、认真做事，忠于职守和信誉，重承诺、讲义气，在自己的行业内，都以做好自己的工作为原则。作者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白族的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包括十项内容：① 热爱本职工作，勤奋劳动；② 热情待人，尊重别人；③ 刻苦钻研技术，精通本职工作业务；④ 诚实守信，遵守诺言和信誉；⑤ 认真履行职责，有责任心；⑥ 文明经营，优质服务；⑦ 珍惜时间，注重效率；⑧ 开拓创新，竞争进取；⑨ 公正廉明，不谋私利；⑩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白族现代职业劳动道德应遵循如下原则：① 以主人翁精神劳动的原则；② 靠劳动率先致富，带动他人共同富裕的原则；③ 依靠现代科技致富的原则；④ 现代文明优质服务的原则；⑤ 变小生产为大规模集约生产的

原则。

白族的贸易道德具体表现在传统贸易习俗、行规行话、商幌商联、商谚中。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气候的差异，白族的不同地区经济发展进程不同，新中国成立前，有的地区封建经济得到充分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已出现，有的地区还停留在氏族公社和奴隶社会经济阶段，因而，在商贸方面，表现出来的贸易道德具有古朴的原则和特色。新中国成立以来，白族地区商品经济有了飞跃的发展，但始终保持着白族传统道德中坚持品牌质量、重诺言、守承诺、讲信誉、重交情、讲良心的贸易道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白族现代贸易道德建设是白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必须遵循集体主义原则、义利并举的原则、平等互利的原则、竞争的原则、照章纳税的原则、诚实守信的原则、依法签约的原则、变粗放经营为集约经营的原则。

白族的恋爱道德是白族社会伦理道德在男女恋爱中具体规范的体现。它贯穿于青年男女相识到相爱的全过程。如在对唱情歌中，就可以识别对方才智及道德修养；在吹奏乐器时，就可以检验对方的机智与技能；在劳动活动中，可以观察对方的勤劳与否；以物传情就可看出对方是否真诚和心灵手巧等。在多次接触观察中，可以发现对方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白族传统的恋爱道德表现了自由恋爱、勤劳勇敢的择偶标准和爱情忠贞专一等特点。白族的现代恋爱道德要求男女平等、自由恋爱、婚姻自主。其基本原则就是要坚持志同道合、自主自愿、对爱情的忠贞专一。

白族的传统婚姻道德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白族的婚姻经历了血缘婚、亚血缘婚、对偶婚、一夫一妻制等阶段。传统婚礼有过抢婚、逃婚、哭婚、掐新娘等多种方式。传统婚姻道德有恋爱自由、婚姻不自主，男子上门从妻居，寡妇转房再婚等特点，与此相适应还有重视生育、承担责任、赡养老人、家庭和睦、婚姻稳定的道德特征，它要求人们婚前守贞洁，婚后诚实、奉献、有责任感。社会主义阶段，白族的婚姻道德必须遵循如下原则：① 遵守并执行《婚姻家庭法》的原则；② 男女平等，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原则；③ 夫妻相互忠诚的原则；④ 实行计划生育和生育健康的原则。

白族的家庭道德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和发展的，用以规范、调节、约束家庭生活、家庭关系、家庭成员行为的道德准则。主要表现在严格家教、尊老爱幼、礼貌待人、忠诚厚道、团结互助等方面。治家以勤俭为先，持家以稳和为先，发家以教育为本。这几方面相结合，形成了白族传统家庭道德的特征。白族现代家庭道德应遵循如下原则：① 夫妻平等，互敬互爱的原则；② 父母抚养教育子女的原则；③ 敬老和养老的原则；④ 树

立正确人口观；⑤ 建立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的原则；⑥ 处理好家庭间各种关系的原则。

白族传统丧葬，经过土葬、火葬等阶段，葬礼由简而繁。丧葬习俗体现出来的道德观念，在白族社会生活中是一种重要的行为规范。表现在：① 以忠孝为轴心，孝不孝看奔丧；② 厚葬久葬与薄葬并行；③ 以教育为目的：葬死人给活人看。新时期，白族人民转变旧观念和传统道德，不断破除旧的丧葬习俗，提倡节俭、文明办丧事，改革土葬，积极推行火葬。

白族传统社会是一个具有多元宗教信仰的社会，人们曾信奉原始宗教、佛教、道教和本民族的本主信仰。释儒道“三教同源”“万法同宗”，三教相融合，是白族宗教信仰的一大特点。崇拜本主是白族崇拜中最根本的特征。白族的宗教信仰是一种现实的、实用性很强的宗教。它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宗教信仰的作用，可以强化民族意识，增强民族的内聚力，维护民族的共同利益和发展，同时，体现在白族宗教信仰中的伦理道德观念、行为规范也会形成根深蒂固的民族传统精神。

总之，该书是一部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白族学专著，被著名民族学家马曜先生誉为“白族学研究中的凿空之举”。

四、播撒爱心

2006 年底的一个夜晚，在通往滇西北高原千山陡峭的大山深处，气温骤变，寒气袭人，但在崎岖不平的乡村道路上，在一条条弯道相连、七上八下，平时连班车都很难通行的“搓板”式的山路上，越过一个又一个的坑坑洼洼，一辆越野车在不停地星夜兼程、全速前进，在奔往怒江大峡谷、大理、丽江贫困山区中最贫困的一批中、小学校、为贫困山区的学童们不辞辛苦地送去捐资助学的善款。坐在车中的两位“领头人”，一位是年过五旬、我国著名的少数民族女性学研究专家、云南民族大学女教授杨国才；而另一位也同样年近五旬，是翻越了千山万水远道而来的马来西亚著名华文传媒——《星洲日报》的女总编萧依钊。两人并肩坐在车中，眼睛却紧紧地凝视着前方，她们希望车能够跑得再快一些，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目的地，见到大山深处贫苦的孩子，把凝聚了无数马来西亚华侨爱心的善款，及时送到孩子们的手中。

用跨越千山万水的捐资助学“爱心接力赛”来比喻她们之间的真诚合作，可以说是对此最贴切而又最准确不过的形象概括了。从去年底到今年的9月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马来西亚《星洲日报》5000多名来自社会不

同阶层的热心读者，以无私的大爱，朴实无华的行动，为我省边远贫困少数民族地区涉及 14 个州（市）的 5000 多个家庭中的 5000 多名想读书又因贫困原因面临失学的（大、中、小）学生，先后两次及时送来了总额超过 400 余万元人民币的助学善款。这些由涓涓细流、一点一滴所汇集起来的笔笔捐款，积少成多，携带着中华民族传统历史美德中最珍贵的爱，形成了“正义至上，情在人间”的爱心大传递，感动了云南的山山水水，连接起了滇马两地素昧平生的许许多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年龄层次、不同职业的人们，成为了我省 20 多年来在开展捐资助学活动中最感人、最打动人的记录之一。

民族有哲者·李国文

一、人物简介

李国文，男，汉族，生于1950年，云南省临沧人，研究员，现任云南民族大学图书馆馆长。致力于少数民族哲学、少数民族文化研究30余年，以对东巴教及东巴文化的研究著称于学术界，成绩斐然。



李国文出生于临沧地区永德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喜爱读书。由于家境贫困，小学5年级时曾短期辍学在家，放牛、割草、砍柴、帮助家里做农务。后经老师上门做工作方得以继续回校读书。初中期间，他即到离家20余公里的地方住校上学，每天自己做饭做菜，常年徒步往返于人烟稀少甚至有野兽出没的山路中。艰苦的环境使他少年时期就懂得了求学的艰辛，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质。李国文很聪颖，细于观察。初中阶段，耳听眼看，自己琢磨，学会了吹笛子。正是这一特长，使他因一个偶然的机，穿上了军装，走进了军营，成了一名小战士。当兵五年，他随部队辗转于云南、贵州等地，不断自学。既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又培养了自立、自强的精神，也造就了求实、守信、严谨的作风。1973年退伍回乡务农，后因少时扎实的基础、部队的经历和自己的争取得以在县武装部谋得临时宣传文书一职。同年，经县及专区的推荐、审核，进入云南大学政治系，攻读哲学专业。在校期间，他如饥似渴地读书，遨游于知识的海洋，没有节假日，没有寒暑假。每天除了寝室、教室，就是图书馆。1976年，他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留在省城昆明，从此开始了他的漫漫研究之路。

二、投身“田野”，勤于思索，勇于创新

李国文出生和生长的临沧地区是个少数民族文化丰富的区域；参军期间，他到过的很多的省、市也都是多民族居住地区。从小耳濡目染，青年时

期的实践、体验，使他对少数民族文化有了浓厚的兴趣。三年的大学生活为他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哲学基础。到了历史研究所后，他勤于研读，很快以敏锐的眼光选择了纳西族和东巴文化作为其科研的突破口和领域。作为一名汉族研究者，他坚持学习民族语和民族文字，打牢民族研究的基本功。他自学了纳西语，学会了用国际音标和新拼音文两套系统注、读纳西语。随后，他以惊人的毅力走遍了丽江的村村寨寨，记录了数十本田野调查笔记；访问了上百位老东巴，请他们诵读《东巴经》，而自己则一一记音。调查、采访空闲之余，他一一描、摹、学习东巴象形文字。久而久之，他掌握了东巴象形文字从读、写到释义的整个体系，有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田野调查方法，也成了一名不是纳西族的纳西族，不是东巴的东巴文化学者。在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李国文以哲学的方法分析、探讨了东巴文化和纳西族先民的思维方式，撰写了《古代纳西族哲学思想初探》《从象形文字看古代纳西族时间观念的形成》《从象形文字看古代纳西族空间观念的形成》《纳西族象形文字东巴经中的五行思想》《纳西族东巴文化中的阴阳观念》《纳西族先民对宇宙结构的哲学思考》等文章，提出了“少数民族也有哲学史”的观点，开了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先河，引领了国内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为在中国哲学史中增加进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的内容打下基础。并以《东巴文化与纳西哲学》《天·地·人——云南少数民族哲学窥秘》《人神之媒——东巴祭司面面观》《东巴文化辞典》等个人学术专著奠定了其在东巴文化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约1981年，云南省成立社会科学院，他先后在宗教所任室主任，社会所和哲学所任副所长。

三、脑不停思，手不停书，耕耘不息，硕果累累

李国文长期深入少数民族地区，从未间断过田野调查，收集第一手资料，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和方法进行分析、研究。汇集上述成果，自1980年至今，他先后撰写并在国内外各级刊物，包括国家级刊物上公开发表了《纳西族象形文字东巴经中关于人类自然产生的朴素观》《古代纳西族动物崇拜型的原始宇宙观》《古代彝族自然哲学之探讨》《原始思维研究必须掌握第一手资料》《论哈尼族社会中的原始宗教》《云南少数民族创世纪中关于世界形成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等学术论文60余篇；出版《通向彼岸的桥梁——云南民族宗教信仰》等5部个人学术专著；合作出版《彝族俐米人民俗》《先民的智慧——彝族古代哲学》《古老的记忆——云南民族古籍》《纳西族文化大观》《云南省志·宗教志》《智慧的曙

光——云南少数民族宗教哲学探》《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中国原始宗教资料丛编·纳西族卷》《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哈尼族卷》等学术著作 21 部；担任主编、副主编出版《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知识丛书》《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纳西族卷》等三部著作；独立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巴文化与纳西哲学》；主持完成国家“八五”项目《中国原始宗教资料丛编·哈尼族卷》；参与完成国家“八五”及“八五”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大辞典·纳西族卷》《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观》《宗教辞典》《中国原始宗教资料丛编·纳西族卷》；参与完成云南省政府“七五”重点项目《云南省志·宗教志》；参与完成云南省政府下达课题《九十年代云南农村居民社会生活保障问题研究》《开放与探索——德宏边境口岸社区管理研究》《云南宗教现状与对策研究》等。在其众多成果中，《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通向彼岸的桥梁——云南民族宗教信仰》获全国第五届民族图书类奖三等奖；《先民的智慧——彝族古代哲学》获云南社会科学成果著作荣誉奖；《东巴文化与纳西哲学》《东巴文化辞典》获云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科研成果专著三等奖；《纳西族古代哲学思想初探》获云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论文三等奖；《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宗教论稿》和《云南少数民族》分获云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科研成果集体一等奖、三等奖；《天·地·人——云南少数民族哲学窥秘》《人神之媒——东巴祭司面面观》获云南省教委科研成果专著三等奖。正是李国文吃苦耐劳、不懈科研的精神，严谨治学的作风、扎实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功底、丰厚的学术硕果，使他在 2000 年获“云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称号。2002 年，他被美国传记研究所国际研究理事会提名入选为“2002 年杰出人士”，并入选“名人录”。2004 年，又获得云南民族大学伍达观奖教金教学科研“杰出奖”。同时，他还坚持对外学术交流，1996—2002 年曾多次受邀出访日本、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讲学、交流。

四、为人师表，言传身教

1994 年，李国文调入云南民族学院，任科研处处长，对学院教职工科研成果管理、科研奖励、出版资助等科研工作进行了规范和改革。1999 年到院图书馆任馆长至今，鼓励馆内职工多作科研，多学习，勤于用脑，勤于动手，大兴图书馆学习、科研之风。常年以来，他始终坚持做人 and 做学问的统一。2001 年兼任宗教学专业硕士生导师后，他更是以自己的言行，教育研究生；以自己孜孜不倦做研究，耕耘不止求学问的精神影响学生。他经常拖着

疲惫的身体，带病坚持工作、坚持上课，甚至在病床上、在输液中为学生审改论文、教导学生。他以自己的人格魅力、科研精神、学术态度为民族大学研究生的培养做出了杰出贡献。

第三编

艺术空灵——边疆民族艺术传播者

三绝诗书画·周霖

“玉龙雪山高插云，虎跳峡水响若雷。”云南西北高原的雄峻山川润育了一位杰出的文化人——周霖。

周霖，字慰苍（1902—1977），纳西族，是我国著名的书画家、音乐家和诗人，生前曾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和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副县长，被认为是“云南现代画坛的代表人物”。周霖先生有着广泛的艺术修养，他虽以善画而知名，但他的诗作水准更在其书画之上，其淡雅萧疏、清幽绝尘的风韵素来享有“得香草美人之意”的褒评，其代表作《渔隐杂咏》堪称诗坛一部难得的逸品。而他的绘画却又能每含诗情，清风遗韵，有玉树临风之态，极受世人推崇。



1963年金秋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纳西族画家周霖作品展览》曾揭开了中国美术史上一页新的篇章。由于这是中国美术馆建成后所举办的第一次个人画展，展出的又是来自边疆少数民族画家的作品，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被称为美术界知音的陈毅元帅和黄镇同志亲自指导画展的筹备工作。展览会上，陈毅元帅高度评价周霖先生是“我国少数民族中难得的画家”，郭沫若激动之余现场题诗一首“石鼓声闻到凤城，龙潭风物活生生。山泉引自源头处，天外飞来有鹳鸪。”以表示对这位“诗书画三者并列”的兄弟民族画家卓越艺术成就的推崇。著名画家冯健吾（画坛怪杰石鲁胞兄）也以“郑燮三绝诗书画，周老豪端倍有神”的律诗相赞。

周霖先生的一生创作了2000余幅作品，先后于1963年出版《周霖画辑》（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出版《周霖画集》（云南人民出版社）。他1961年为北京人民大会堂云南厅创作的巨幅国画壁挂《金沙水拍云崖暖》曾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誉……这些都是他留给后人最值得珍视的宝贵精神财富，也为我们多民族祖国的画坛增添了一树艳丽的奇葩。

应该说周霖先生是一位典型的诗酒风流的雅士，在朋友们的印象中他是

位和善亲切的文人。教学之余只要有一支香烟在手，一本好书相伴，他就很满足了；而每当酒酣耳热之际，他总喜欢随手拿来尺素一帧无拘牵地率性挥洒点染些小品，多有神来之笔。这批意境高妙的小品共集有一百多幅，1963年在全国巡展期间曾深为潘天寿、吴作人、刘开渠、秦仲文、吴镜汀、王雪涛、郭味渠、潘洁兹、郁风等耆宿所激赏，推许为“作品精纯地体现了中国文化‘蓄素葆贞’的艺术正则，堪称现代中国画中不可多得的妙品。”当代纳西族学者和中孚先生就珍藏有他的一幅小品《秋江归棹图》，那远山荒渚，水波浩渺，槎杈秋树之间有扁舟一叶，一位隐者伫立船中，欲渡还止。意境超脱，虽仅尺幅而意纵千里，真切地体现了他那个时期疏朗的艺术情致。时隔50多年，今天欣赏起来，不由得心中顿然生出了“剩看一卷萧疏画，合化荒江烟雨飞”的惆怅感受。

藏族作家·丹增

一、人物概况

丹增，男，藏族，1946年12月出生，西藏比如人。13岁到内地求学，毕业于西藏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和复旦大学新闻系，曾供职于西藏日报社、西藏自治区文联、西藏自治区文化局，历任记者、记者站站长、记者部主任、副总编辑、区文联副主席、区文化局局长，1983年任中共西藏自治区省委常委，1985年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曾任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2001年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2002年4月调任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2006年11月再次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任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现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被聘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特聘教授、西藏民族学院特聘教授、联合国世界文化艺术发展基金会名誉主席兼艺术顾问、世界华人协会顾问及印度亚洲电影俱乐部终身会员、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佩敦罗治市荣誉市长，北京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顾问、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云南文化顾问、浙江省文化创意产业实验区高级顾问，先后获评“2006年文化产业年度十大人物”“2007中国创意产业杰出贡献奖”“2009年亚太文化产业成就展特别荣誉奖”。2010年5月，分别率中国文联代表团访问韩国和越南等国家和我国台湾。在我国台湾出席了“台湾（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60周年庆典和台湾鹤山二十一世纪国际论坛，成功在10多个国家文艺家代表出席的论坛上发表演讲，并获“鹤山文化艺术勋章”。



丹增是中国的著名作家，他的报告文学、小说、散文、理论著作等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先后多次获得重要奖项，丹增同时也是一位具有文化战略眼光的领导，致力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他为文化产业发展所做出的贡

献以及取得的成绩，使他在 2005、2006 年接连被评为中国文化产业人物，并荣获 2007 年中国创意产业杰出贡献奖。

二、主要作品

代表作有报告文学《来自世界屋脊的报告》《太平洋风涛》，小说《神的恩惠》《江贡》，散文《童年的梦》《生日与哈达》，专著《文化产业发展论》《文化慧眼读云南》《为了人人都享有的权利》，电视剧文学剧本《司岗里女人》《驼峰飞虎》等。其中，小说《神的恩惠》获“中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太平洋风涛》获“亚州华人文学奖”，散文《童年的梦》获“十月文学奖”并入选《建国 60 年优秀散文集》，《生日与哈达》获“2009 年中国优秀散文奖”。《文化产业发展论》2005 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在文化产业研究界产生了较大影响，2008 年由人民出版社再版发行，不少著名高校及文化产业研究机构把该书作为教辅读物；《为了人人都享有的权利》列入人民出版社重点出版计划；《驼峰飞虎》获“云南省文学艺术创作奖励基金奖”，美国康纳出版传媒公司签约用英文出版，并准备搬上电视荧屏。

以文化之·欧阳坚

一、人物简介

欧阳坚，白族，生于1957年9月，云南剑川人，管理学博士。1974年8月，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前卫公社插队知青；1977年3月，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工人；1978年9月，云南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1982年8月，云南省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工作；1986年4月，云南省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办公室主任（其间：1986年9月至1989年3月云南省社科院东南亚经济史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9年4月，云南省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兼所长助理；1990年7月，云南省社科院办公室副主任；1991年6月，云南省计委综合处副处级干部、副处长；1994年12月，云南省计委规划政策处处长；1996年8月，云南省计委主任助理；1997年6月，云南省计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其间：1998年9月至1999年1月中央党校地厅级干部进修班学习）；2001年6月，云南省丽江地委书记；2003年5月，云南省丽江市委书记；2004年11月，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兼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办公室主任；2005年11月，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委员（2006年1月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委员（2006年4月任）；2008年3月，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委员；2008年5月，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成员；2008年10月，文化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成员（2009年2月免）（2007年9月至2011年5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专业学习，获管理学博士学位）；2011年9月，甘肃省委副书记，党的十六大代表。



二、欧阳坚谈改革（访文化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欧阳坚）

记者：过去一年，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取得了哪些重大实质性进展？为什么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取得多项重大突破？这对于今后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有什么样的启示作用？

欧阳坚：在改革基础相对薄弱、改革进度相对滞后的条件下，2009年，文化部系统文化体制改革进入了由试点先行、稳步推进到攻坚克难、全面推进的新阶段。国有文艺演出院团体体制改革全面启动。2009年确定转企改制院团172家，目前已完成转制的达70余家，超过了过去6年的总和；文化部直属单位转企改制也实现新突破，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动漫集团有限公司3家文化“央企”同时成立；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进程明显加快，北京、上海、浙江等7省市全部完成综合执法改革，全国333个地级市中，已有62个组建了市级综合执法机构。此外，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创新稳步推进，文化产业发展迈出了新步伐，政府职能转变有了新进展，中华文化“走出去”取得了新成效。

回顾过去一年的工作，我们有六个方面的深刻体会：第一，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是文化体制改革开创新局面的根本保证，必须紧紧依靠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在大局下思考、谋划、行动，才能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第二，不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是文化体制改革开创新局面的基本前提，必须在总结经验中不断有新的创造，在学习既有典型中不断有新的提升。第三，统筹改革和发展是文化体制改革开创新局面的重要方法，必须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带改革，增强改革发展的互动性、均衡性和协调性。第四，沟通协调、形成合力是文化体制改革开创新局面的有效途径，必须充分协调各方关系，凝聚各方共识，取得各方支持，才能形成推进改革的强大合力。第五，依法行政、规范运作是文化体制改革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必须在法律和政策框架内妥善处理好利益关系，使改革的过程成为尊重民意、凝聚人心、增强生机与活力的过程。第六，建设学习型组织、不断把握新规律是文化体制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有力保障，必须大兴学习之风，把学习的成效转化为深化改革的自觉行动，才能逐步提高推动文化科学发展的实际能力。

这些体会，既是2009年改革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下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遵循。我们将在实践中坚持行之有效的制度和办法，并不断加以丰富和发展，努力走出一条文化系统改革发展的新路子。

记者：当前，文化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在由点向面铺开过程中，还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文化部今年将重点抓好哪些工作，促使文化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

欧阳坚：与中央提出的目标、任务和要求相比，与其他领域的改革进展相比，文化系统的体制改革工作还相对滞后，容不得丝毫自满、松懈。要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我们的思想观念还需进一步解放，体制机制还需进一步创新，政府职能还需进一步转变，人才队伍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强。

今年，我们要加快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步伐，促进文化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推动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动漫集团有限公司完成人员身份转换、资产划转、社会保障衔接等转企改制后续工作，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同时，还要推进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文物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紫禁城出版社等文化部系统出版社转企改制。此外，要深入推进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着力培育演艺领域市场主体，加快推动市场发育相对成熟的歌舞、杂技、曲艺、话剧、地方戏曲等国有院团的转制步伐，重点选择一批基础较好、自身积极性高的地区，开展全面转企改制试点工作。今年还有几项主要工作，就是全面推进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着力创新文化市场管理模式；深入推进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着力创新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积极创新文化“走出去”新途径，不断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记者：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为发挥文化产业的反周期调节作用，促使文化产业逆势增长，文化部都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怎样的成效？经过金融危机的洗礼，我们是否可以乐观地认为，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欧阳坚：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更加凸显。发展文化产业，正好契合了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战略选择的新形势。在国务院公布《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后，文化部抓住机遇，先后制定了《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和《文化产业投资指导目录》，开展了动漫企业认定工作，实施了原创动漫扶持计划和原创动漫推广计划，启动了国家级动漫产业综合示范园区和中国动漫游戏城建设项目。

此外，文化部还为文化企业搭建投融资平台，拓宽资金渠道，分别与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至今已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银行推荐了47个文化产业项目，涉及资金76.03亿元；

与几部委近期将下发金融业支持文化产业的政策性文件。会同相关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支持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的指导意见》，发布了《2009—2010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目录》和《2009—2010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目录》。目前，文化产业投资和文化资源开发热潮持续升温，新兴文化业态迅速兴起，产业集群化趋势日渐明显，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投资格局正在形成，可以说，文化发展势头十分喜人。

至于文化产业是否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我想用一组统计数字来回答。2004年至2007年，全国文化产业增长速度在17%以上，比同期GDP增速高6个到8个百分点。2008年至2009年，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文化产业逆势上扬，增速更加强劲。北京、上海、广东、云南、湖南、深圳等省市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超过5%，成为当地经济的支柱产业。比如，湖南省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1990年的1.4%上升到2008年的5.1%。近5年来，深圳市文化产业增加值以年均约20%的速度增长，占全市GDP比重约7%。云南省2009年文化产业增加值达360亿元，占GDP比重近6%。

记者：贯彻落实国务院公布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是今年文化部的重点工作之一。文化部将采取哪些措施保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良好势头？在解决影响和制约文化产业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培育大型骨干文化企业等方面，有何具体设想？

欧阳坚：我们要牢牢抓住贯彻落实《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这个纲，以解决影响和制约文化产业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为重点，在抓宏观、抓重点、抓政策、抓落实上狠下功夫。要结合本行业和各地实际，制定《规划》实施细则和配套政策，把《规划》确定的各项政策转化为具体的思路、项目和工程，大力实施“骨干企业带动战略”“科技创新推动战略”“产业集聚发展战略”“文化品牌塑造战略”“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和“文化‘走出去’战略”。

具体地说，我们今年将重点抓好这样一些工作：一是做好“十二五”文化产业规划的编制工作；二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培育骨干文化企业；三是建立健全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扩大文化产业的投资规模；四是加强文化产业基地园区的建设和管理，增强规模效益和集聚效应；五是加大政策引导，实施一批重大文化产业示范项目；六是推动文化产业重点领域加快发展，培育新兴文化业态；七是完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八是刺激城乡居民文化消费需求，加快培育文化消费市场；九是加快人才培养，

强化智力支撑；十是扩大对外文化贸易，加快中国文化“走出去”步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注重文化产业的科学发展，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发展的目标和重点，把握节奏，统筹兼顾，均衡协调，突出优势，力争实现文化产业的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

一晚成古乐·宣科

宣科，男，音乐民族学家，1930年生，藏裔纳西族，云南丽江人，教会学校毕业。现已从丽江地区实验中学退休，从事音乐研究。



一、人物简介

宣科早年求学于昆明教会学校，挚爱并长期研究音乐，“大器晚成”是学术界对他的共识。由于有着多民族的血统，故富有颖悟的天秉和进取的气质，不仅具有运用多种语言的能力，还惯于以多民族的不同方式理解和思考问题。他在饱经忧患之后所表现出来的振作有为的生活态度，及锲而不舍的求知精神，为世人所瞩目。

二、家族简介

宣科的祖辈，是明朝嘉靖年间从安徽宣城充军到云南鹤庆的汉人，曾祖母是纳西族，祖母是康巴藏族的公主。他的父亲宣明德聪明过人、记忆力非凡，能说7种民族语言，是纳西族第一个会说英语的人。

三、成就及影响

1957年他遭受无妄之灾，关进了监狱，一直到1978年才重返故土。有人说宣科去坐牢，像是进了一次美容院，二十余年之后出来，他依然生气勃勃，青春焕发，丝毫看不出一个获释囚徒的沮丧。牢狱生活没有击垮他，是因为音乐始终呵护着宣科的心灵。积蓄得太久，所以便聚集了足够的喷薄气势。重获自由的他精心炮制《音乐起源于恐惧》，在《天津音乐学院学报》《中国音乐研究》等刊物发表之后，在音乐界引起了轰动。他以翔实的资料、独特的见解、有力的论据，向早已成定论的音乐艺术的起源论发起了强劲的挑战，他新奇的观点为人们打开了另一种独特的视角之窗。不仅在国内引起

了轰动，而且也在国外音乐理论界引起了轰动。他更成功地论证了流传于丽江地区的《紫薇八卦》是唐朝皇帝李隆基亲自谱曲的宫廷音乐，与已失传900多年的《霓裳羽衣曲》为同期御制；论证了《浪淘沙》是南唐后主李煜所作……他潜心发掘和研究纳西古乐，在纳西古乐被世人认知的同时，宣科也获得了世界性的声名：英国的牛津大学、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伦敦大学，国内的中央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学院等十几所大学和音乐协会请他去讲学。他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登上牛津大学讲台的第一位中国大陆的学者。

四、社会评价

“大器晚成”，这已是学术界对他的共识，由于有着多民族的血统，故赋有颖悟的天秉和进取的气质，不仅具有运用多种语言的能力，还惯于以多种民族的不同方式理解和思考问题。束发之年，到昆明教会学校读书，才有了接受更广博的中西文化的机遇。所以他研究民族问题和语言问题时，便现身说法，如数家珍，而非客边的走马看花或主边的囿于偏见，这无疑是个极不易得的优势。

五、作品成就

《活的音乐化石》即《音乐源于恐惧论》，载1986年《天津音乐学院学报》第四期。该论文曾被欧洲中国传统音乐学会译为英、荷等文字，作为学会年会向国际音乐民族学家们的交流文件。并由荷兰莱顿学院及荷兰驻我国特命全权大使发出给宣科的邀请文件。后又被日本学习院大学教授生明庆二在其《传承机能音阶论序说》中大部分引用和给予很高的评价。

《白沙细乐小议》载1984年云南《民族音乐》。

《白沙细乐探源》载《民族音乐论集》一书（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

《热美蹉的来历经之研究》分别见于1989年第四期《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云南艺术学院学报《艺舟》1990年院庆专辑、1991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东巴文化论》，云南丽江市志办公室出版《丽江志苑》。

影戏译制者·木光

木光，男，纳西族，1929年出生于云南丽江木府，丽江木氏土司第48代传人。大专学历，电影技术专业高级职称，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特约研究员。

曾先后担任政协云南省第六届委员会委员，第七、第八届常务委员，临沧地区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临沧行署文化局顾问。现为丽江文化研究会名誉副会长，临沧市丽江文化研究会顾问。



木光同志曾长期在临沧边疆民族地区电影行业从事少数民族语影片的译制、发行和放映工作。因工作业绩突出，1984年，应邀光荣出席国家民委和文化部联合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发行和放映表彰大会，受到乌兰夫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木氏土司”和“徐霞客”，已在报刊和杂志公开发表相关文章数篇；曾历时10个春秋编著《木府风云录》一书，该书于2006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其分别以“木氏土司”和“徐霞客”为主题的著作和文章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好评。

滇画创始人·丁绍光

一、人物概况

丁绍光，1939年生于陕西，祖籍山西运城。他是以中国现代重彩画之神韵领世界画坛之风骚的、杰出的现代艺术家。11岁时就显示出非凡的创造力和才华，曾任教云南艺术学院，开创出闻名中国现代画坛的云南画派。现定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



1962—1980年，丁绍光任教于云南艺术学院。1979年为北京人民大会堂创作大型壁画《美丽、富饶、神奇的西双版纳》，同年出版《丁绍光西双版纳白描写生集》。1980年7月，赴美定居。1986—1996年在世界各国举办个人展400次以上，作品收藏遍及五十个国家及地区。各国报刊、电视、广播、书刊杂志专题介绍上千余次。1990年在日本世界艺术博览会上，被选入《自十四世纪以来百名艺术大师》排行榜，名列第29位，是唯一入选的华人艺术家。1993—1995年，连续三年被选为联合国代表画家。

1993年，联合国向全球发行丁绍光作品《人权之光》限量出版画，纪念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1994年，联合国向全球发行丁绍光作品《母性》限量版画，纪念国际家庭年。1995年，联合国向全球发行丁绍光作品《宗教与和平》限量版画。联合国邮政局向全球发行丁绍光的作品《西双版纳》和《催眠曲》《和平，平等，进步》《文化与教育》六幅作品的邮票，以纪念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首日封和邮票在日内瓦万国宫博物馆永久珍藏。联合国连续三年撰文向世界160个国家介绍丁绍光的艺术与生活。1995年，联合国在艺术与集邮项目总结报告中提名表彰了联合国成立50年来29位当代艺术大师，丁绍光是其中唯一的亚洲艺术家。1998年他第四次受邀创作了《美丽的梦》以纪念联合国人权宣言发表50周年。由联合国世界联合会向全球发行限量丝网版画，联合国邮政总局发行首日封。1999年4月30

日，旧金山市长宣布每年该日为“丁绍光日”。2001年再次受联合国少年儿童基金会委任创作《童年》，并向全球发行限量丝网版画为联合国少年儿童基金会义卖。

二、往事集略

（一）童年时代

丁绍光的艺术道路并不平坦。丁绍光的原籍是山西。1939年10月7日，丁绍光出生在陕西城固县。丁绍光的父亲丁俊生，母亲李湘君，他是这个家庭中的第四个孩子。丁俊生当时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1946年随政府机构举家迁到了北京。丁绍光七岁时在古都北京开始了他的学业，并走进京城的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之中。

1948年，丁俊生赴南京就职，把最大的四个孩子托给留在北京的老人，带着两个幼儿上路了。这一去，成为长别，越走越远，就在同年12月，丁俊生到了台湾。丁绍光自九岁便离开父母，开始自立。

（二）少年时代

丁绍光自幼便具独立个性。他总忘不了离去的父母，深深怀念他们，看到同学们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在羡慕之余，也感到落寞。

读小学之后，丁绍光10岁便阅读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开始接触传统文化。从书本里他开始认识世界，也认识人生，读书滋养了他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这些文学经典作品帮助他思考，引导他进入了发挥想象力的世界。

丁绍光由喜爱文学开始，进而对绘画产生浓厚的兴趣，他不仅在绘画中找到了寄托和抒发感情的方式，而且寻得适合发展自我才能的专长。11岁的丁绍光深深爱上了绘画，并将绘画作为他终生从事的职业。

1954年，丁绍光考入了北京第八高级中学读书，遇到了循循善诱的美术教师雷健农。在雷老师的指导下，丁绍光开始了较有系统的正规绘画基本训练。

1957年的夏天，丁绍光高中毕业，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选择装潢设计专业就读。

（三）丁绍光的爱情故事

1. 情定版纳

20岁那年，丁绍光被下放到云南的西双版纳。这里到处是亚热带森林，山峦秀丽，飞瀑奔流。丁绍光很快就爱上了这片美丽富饶的红土地，酷爱画画的他，劳动之余，就背着画板出去画画，画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在他眼里，这里的少数民族民风淳朴，服饰风俗有别，他们的生活就像民族舞蹈一样丰富多彩，鲜明多姿，处处流露着优雅和纯真。

一天，放工后，丁绍光拿着画板来到村东头的小山坡写生，突然觉得眼前一亮，只见离此不远处的池水里一个少女正在沐浴，齐腰的长发瀑布般从头顶流泻到腰际，一缕夕阳辉映在她那光滑细腻的皮肤上，把脸庞照得绯红……好一幅《美人出浴图》！丁绍光呆呆地站在那里，疑是自己碰上仙女了，传说中的仙女会在凡间找个幽静处沐浴，不曾想被自己撞上了，他下意识地拿起画笔，唰唰唰地画起来，他要用画笔留下这似梦似幻的一幕……

当他收起画架准备下山时，突然听见小径上有人喊“喂！谁允许你画的？”丁绍光回头一看，正是那刚刚沐浴的少女。只见她亭亭玉立，超凡脱俗，一头秀发被梳理得侧向一边，穿着傣族筒裙。丁绍光见她问自己窘迫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就像做贼被人当场抓住，少女见状指着他手中的画说：“你走吧，把画留下！”丁绍光看着自己一挥而就的作品，栩栩如生，那上面的少女美伦美奂，真的如仙女出浴。实在舍不得，可看着眼前少女嗔怒的样子也自觉理亏，毕竟自己是偷着画的，无奈之下只好把画给了她。少女拿了画也没再追究，很快便消失在山坡的后面……

每到“赶集”的日子，人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集市上的人群熙熙攘攘，村村寨寨的山民把值钱的货物都拿出来挑到市场上交易。市面上一片繁荣的景象。傣家有女初长成，豆蔻梢头二月初。傣族的习俗是姑娘到了该找对象的年龄，就在赶集的这天把烧好的老母鸡带到集市上，标志着自己可以自由地选择郎君了，聪明的小伙子如果有意就可以上前搭讪，姑娘若是相中了，那盆老母鸡就是小伙子的口中之食了。吃了鸡，一段姻缘也就算定下了。

话说这天逢集日，丁绍光吃过早饭闲着没事，也想到集市上转转，看看有没有自己需要买的东西。他一边走一边瞧，东张张西望望，突然觉得眼前闪出一个熟悉的身影，定睛一看，不是别人，正是那次画《美人出浴》图的画中人。而此时的她正望着这边微微地浅笑呢，丁绍光的脑子里立刻浮现出

那个新丽的夏日黄昏，平静的水面上铺满了晚霞，一个美丽的少女半裸着胴体露出水面，秀发瀑布般流泻下来……

想到这里，丁绍光鼓起勇气走到她身边问道：“还认识我吗？”姑娘红着脸说：“认识，你也来赶集呀？”“嗯，没事来转转哦。”“你身边的鸡是卖的吧？”丁绍光用手指着她身边的鸡问。“不卖，要饿了你就吃吧。”丁绍光听她这么一说又闻着罐子里飘出的阵阵香味，还真的感觉有点饿，开玩笑说：“我可真吃了？”“吃吧！”姑娘说着拿出一把小椅子让他坐着吃。绍光见状也没再客气，坐下就吃起来，姑娘见他吃得香喷喷的样子，心里可高兴了，忽闪忽闪着大眼睛看着他。丁绍光被瞧得不好意思，红着脸说：“你也吃吧，我一人吃不完。”“好哇”，姑娘脆生生地答到。他们俩旁若无人地在街上吃着聊着笑着闹着，开心极了。鸡吃完了，姑娘说：“天还早，我们到前面小树林里去玩玩吧？”丁绍光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离此不远处确实有个小树林，那里一片翠绿，远比这熙熙攘攘的集市上安静，高兴地应到：“好，我们去那里。”到了小树林，姑娘自我介绍说：“我的名字叫玉汉，是傣族的，你呢？叫什么名字？”丁绍光说：“丁绍光，是这里的下放知青。家在陕西固城。”各自介绍之后，玉汉便把傣族的订婚习俗对绍光说了，并说，“自上次见到你，心里一直忘不了，今天你吃了我的鸡，就等于和我有了婚约，对此你有什么想法？”

丁绍光一听顿时愣住了，天啊，原来这鸡是不能随便吃的？他哪里懂得这里的玄机，憋得脸通红站在那里不知所措。玉汉见状，明亮的眸子在浓密的睫毛下闪烁着，充满了柔情，秀美的脸庞被树梢上透进来的阳光映衬得光彩照人。绍光看着她那娉婷婉约的风姿，娇艳俏丽的容颜顿生怜惜，其实，他心里知道，从上次画她的时候起，他心里就暗暗地喜欢上了她。“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如此温婉美貌的女子就在眼前，又舍她而求谁呢？丁绍光不想隐藏自己的感情，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诚恳地对玉汉说：“我也喜欢你，既然吃了你的鸡，我会按照傣族的风俗对你负责的。”玉汉听后，一颗悬着的心放下了，两颗年轻的心紧紧地碰撞在一起，擦出了熠熠生辉的爱情火花。

有了爱情的滋润，丁绍光单调枯燥的知青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在那段甜蜜的时光里，他年轻的激情里燃烧着灵感的火花。在劳作之余他画了大量的白描，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玉汉的父母很快就知道了女儿和下放知青恋爱的事。玉汉在家是独生女，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从小到大从没让她受过委屈。如今女儿爱上了城里来的知青，哪还有好

结果？到时他招工返城了，玉汉怎么办？父母为了对女儿一生负责，怕她受伤害，坚决反对玉汉和丁绍光来往。玉汉知道父母的用心良苦，怕自己遭抛弃，但已经着了爱情的魔，无论如何也要坚持与丁绍光来往。父母无奈只好采取强硬措施，将玉汉锁在家里不许她出门。丁绍光知道此事后，急得坐立不安，他知道玉汉性格倔强，是不可能屈从父母的，他更知道玉汉对自己的爱有多深。情急之下他也顾不了许多，为了玉汉，他只好硬着头皮往玉汉家里闯。到了玉汉家他向二老保证，今后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辜负玉汉，即便是返城也会娶她的。二老听了丁绍光的表白，知道也拗不过女儿，再看看丁绍光长得也是一表人才，只好顺水推舟勉强同意了。但要丁绍光一定要记住自己的承诺，不可委屈玉汉。在爱情婚姻上，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斗争，胜利永远是属于子女的，玉汉当然也不例外。父母当即解禁了女儿，两个年轻人紧紧地相拥在一起，像经历了生离死别，玉汉伏在丁绍光的肩上委屈地放声大哭，丁绍光的眼睛也湿润了，小声附在她耳边温存地说：“没事了，你父母同意我们交往了，放心吧，我会爱你一辈子。”玉汉听丁绍光说父母同意了，破涕为笑，为了与心爱的人在一起，她在与父母的较量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为了缩短与丁绍光之间的距离，玉汉让丁绍光教她识字，日积月累也能看懂报纸和信件了，这让丁绍光很高兴，他越来越爱玉汉了，她不仅人长得漂亮，心地善良，勤劳智慧，对自己一往情深，更可贵的是她有一颗上进的心。有时，吃过晚饭，他们俩一起爬上村东头的小山坡，坐在山岗上看月亮，满天的星星眨着眼睛注视着他们，这一对心心相印的人儿相依相偎在一起，情意绵绵，说着永远说不完的悄悄话……有了绍光爱情的滋润，玉汉越发出落得楚楚动人；有了玉汉的爱恋，丁绍光的生活充满了明媚的阳光。这对甜蜜的爱人，迎来了多少羡慕的目光？引来了多少人的嫉妒。寒来暑往，恋爱中的日子过得像飞一样。一转眼，丁绍光下放已有三年了，这天，老支书拿来一张招生表格让丁绍光填，说公社推荐他去考大学，丁绍光听了高兴得蹦得老高高，他梦寐以求的就是考美术学院，这下终于机会来了，填完表，他一口气跑到玉汉家，把这一喜讯告诉了玉汉。玉汉听后高兴地笑着，眼里却含满了泪水。她心里清楚，丁绍光这只鸟，迟早总会冲天一飞的，只是不知道时间来得这样快。三年来，两人形影不离，好得像一个人，眼看就要分开了，心里真是受不了。丁绍光见她这样，想着要离开心上人心里也很难过，一把将玉汉揽入怀中，深情地吻着她说：“玉汉，你要是不同意，我可以不去考大学，永远留在你身边。”“不，你应该去，那才是你该去的地方”，玉汉急急地说。丁绍光说：“放心吧，无论我走多远都会回来娶你

的。”玉汉点点头：“我会等着你回来。”接着又说：“从现在起，你什么事也别做，一切由我来安排，你一心一意复习考大学就行了，争取考上，奔自己的前程。”看着玉汉如此通情达理，绍光感动得一句话都说不出，只是紧紧地抱着她不肯松手，生怕一松手她就会飞走似的，心里更加坚定了决心，如此深明大义的姑娘哪里去寻？

复习、考试、等待，时间在焦躁不安中一分一秒地过去。终于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盼来了录取通知书，是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丁绍光从小就酷爱画画，多年一直坚持不懈，今天终于梦想成真实现了自己的心愿。

晚上，他约玉汉到他们第一次幽会的小树林，兴奋地拿出录取通知书给她看，让心上人与他一起分享此刻的快乐。玉汉捧着通知书，深情地凝视着丁绍光喃喃地说：“绍光，这不是做梦吧？”丁绍光拥着她笑着说：“这不是梦，是真的，我要上大学了。”玉汉双手搂住丁绍光说：“我早就知道你会考取的，你的画那么好，就连专业的也不会有你画得好，我只希望你不要忘了我们的婚约，这一生我只爱你一个人，无论你走多远，我的心永远跟着你，至死不渝。”

丁绍光见玉汉眼里泪光闪闪，说着说着已泣不成声，一股暖流涌遍全身，捧起玉汉美丽的脸，望着天上高悬的明月说：“玉汉，我对着月亮发誓，今生今世我丁绍光非你不娶。哪怕走到天涯海角，我也要回到你身边，娶你为妻。”说完，两人相拥而泣难舍难分。玉汉从颈上摘下一块贴身佩戴的翡翠玉观音，郑重地递到丁绍光手心里说：“这块翡翠观音是我妈妈给我的护身符，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它能够驱邪避灾，逢凶化吉，今天，我把它送给你，就算是我给你的定情物，让它保你平安。”丁绍光觉得这份礼太重太重，简直重得他承载不起，正在他犹豫不定时玉汉拿过玉佩戴在了丁绍光的颈上，凄凄地说，今后你看见它就像看见我一样，我们两人永不分离。

丁绍光翻遍了全身也找不出像样的东西送给玉汉，最后从上衣口袋里抽出钢笔，这支笔是读高中时爸爸从美国寄回来送给他的，已经陪伴他六七年了，他把这支笔交到玉汉手里，说：“这支笔是我最心爱的钢笔，今天把它送给你，到时候你用它给我写信。”“好！”玉汉高兴地收下了，并用随身带的红丝线在笔管上一圈一圈地绕起来，然后在笔帽处打个暗扣，留一截线头把笔挂在胸前，也像带玉佩一样贴身挂着。

2. 放飞理想

一眨眼的功夫，到了该上学的时候了。这天一大早，寨子里鞭炮齐鸣，锣鼓喧天，男女老少都站在路口欢送丁绍光，玉汉泪眼婆娑地站在人群中向

丁绍光挥手告别，丁绍光挤进人群拉着她的手说：“等着我回来！”玉汉双眼红肿早已泣不成声，紧紧的抓住他的手不放，一个劲地点头。

新学期开始了，丁绍光对新生活充满了渴望。他像一块海绵，在这所学校里拼命地汲取着营养。他的绘画功底好，有天赋，画出来的画又独具匠心，富有民族特色，很快就得到教授专家的赏识，成了专业上的佼佼者。

在紧张的学习之余，他就给远方的玉汉写信，写他的学习，写他的生活，写他的思念……一封封信件像雪花般从北京飞往大西南，飞往云南的大山里——西双版纳。可是每封信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回音，得不到玉汉的只言片语，丁绍光的心在思念中备受煎熬。半年过去了，假期中学校又要组织到外地采风，毫无办法，丁绍光只有把思念埋在心底，想玉汉了就拿出翡翠观音，遥祝远方的玉汉一切平安。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一年一度，转眼间四年过去了，丁绍光毕业后要求回到云南，被分配到云南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谁曾想刚刚千里迢迢地赶到云南，却接到了来自美国的一份加急电报，电文是“父亲病危，速来美国”。也许世上的事都是老天注定的，尤其是姻缘离合，就在丁绍光欣喜于很快能见到朝思暮想的玉汉时，来自美国的一份电报使他不得不改变计划，为了能见父亲最后一面，他只好决定先去美国看望病重的父亲。

3. 漂泊海外

丁绍光来到美国，父亲已奄奄一息，交代了身后事，老人便撒手人寰了。初来乍到的他，在美国人生地不熟，多亏了父亲生前好友陈先生的帮忙，才得以将父亲的后事料理好。

丁绍光在美国小住了一段时间，处理好了父亲生前的公司财产和身后的各项事宜，准备回国。可不幸的是，中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丁绍光不得不滞留在美国。他的回国梦破灭了，对祖国对玉汉的一腔思念之情被搁浅了。他痛苦、彷徨、失落……这种有家不能归，有情人不能相见的日子让他度日如年。

他每日把自己关在家里，没事就拿起画笔，画、画、画，画美丽的云南，画他心中美丽的姑娘，他用绘画来抒发内心的思念，来排解心中的郁闷……好心的陈先生见他日渐憔悴，很是心疼，经常喊他到家里吃饭，做中国菜给他吃，并劝他别着急，把眼光放远些，好男儿志在四方，只要努力哪里都有用武之地。要他重振旗鼓在美国干一番事业，不要辜负父亲对他寄予的厚望。

面对现实，绍光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他拿起画笔认真作

画，画着画着，玉汉的影子总在眼前晃动：她那迷人的身姿，俏丽的脸庞，柔美的秀发，馨香的气息……他的每一幅画中都有玉汉的影子。玉汉已深入他的灵魂，植根于他的心里了。爱让他不能自拔，爱又赋予他前所未有的灵感。一幅又一幅富有民族特色的重彩画从他的笔下诞生。

这天，陈先生兴冲冲地来到他的画室，告诉他一个特大喜讯，说美国一家公司要承办一次规模很大的画展，展出的都是一些名画家的优秀作品。让丁绍光也选几张拿去试试。

画展开始了，展厅里人山人海，画廊里都是一些有一定成就的画家作品，丁绍光的画被放在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落里，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与那些大师比，还只是个一文不名的青年。可事情往往出人意料，画展结束后，爆出了一个天大的新闻：丁绍光的三幅中国画最早卖出，而且售价最高，人们为画中那诱人的高原风光和富有灵性的人物素描而倾倒。各大媒体竞相报道，一时间，丁绍光成了大红人。

这次画展的成功，不仅使他一夜之间成了名人，也为他以后的成功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丁绍光的作品中，渐渐融入了西方现代艺术的特色，他努力把东方的古典艺术和西方的现代艺术相结合，形成了独有的个性特色，他把大型壁画《美丽、富饶、神奇的西双版纳》献给了北京人民大会堂，之后又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艺术系任教。

丁绍光来美国十几年了，在事业上有了一定的成就，可终身大事却迟迟没有解决，这事成了陈先生的心病。陈先生的女儿与丁绍光同岁，也毕业于洛杉矶分校艺术系，人长得很漂亮，性格又温柔，看得出来，女儿很喜欢丁绍光。陈先生看着两个年轻人都已是年逾三十的人了，始终相处得彬彬有礼，不温不火，实在憋不住了，只好亲自出马挑明了此事，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其实，丁绍光何等聪明，他当然知道陈先生的千金对自己有意，也知道陈小姐的人品学识没得挑，要不是因为玉汉的缘故他可能会爱上她。于是，情急之下他只好对陈先生合盘托出自己的苦衷，陈先生听后很是感动，更加认准了他。这样一个重情重意的人，女儿若能嫁他真是一生的福气。

在陈先生的竭力撮合下，丁绍光与陈小姐终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婚后，两人相敬如宾，和睦相处，没有燃烧的爱情，没有甜蜜的情话，平淡地过着日复一日的时光。婚后第二年，他们有了心爱的女儿，丁绍光的心里有了一丝安慰。

丁太太温文尔雅，成熟娴静，对丈夫一往情深，这些丁绍光都明白，可

每当与之相处时总是有点心不在焉……丁太太知道他心里还藏着另外一个女人，可从不说穿，总想以自己的温情感化他。每当看到丁绍光站在窗前遥望着远方发呆，她就知道他又在思念故土故人了，便不声不响地沏上一杯热茶递到他手中，以冲淡他的思乡之情。每当看到丁绍光拿出随身佩戴的翡翠玉观音在手心抚摸时，她就会知趣地离开，给他一个空间，绝不打扰他那时的心境……丁绍光知道自己欠妻子的太多太多，妻子是天下难得的好女人，他告诫自己要对她好一些，再好一些。

20世纪90年代末的一天，在法国留学的女儿打来电话，说第二天上午回美国，让爸爸妈妈去机场接机。夫妻俩都很高兴，终于可以见到出国四年的女儿了。第二天一早，妻子到公司处理事情，说是办完事打电话让丁绍光开车到公司去接她一道去机场，丁绍光答：“行，到时我去接你，我们一起去机场。”

九点半，妻子打来电话，让丁绍光去她单位，他洗完澡穿戴整齐来到车库，开着高级轿车向妻子单位驶去，可开着开着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劲，心里有一丝不安，好像有什么东西落在家里没拿，左右看看又没落下什么，心里很惶惑。想来想去终于发现玉汉送的玉佩在冲澡时摘下忘了戴，这块玉可从来没离开过他呀，正准备调回车头回家取，不料妻子这时又打来电话，问他到哪里了，她在楼下等他，没办法，他只好告诉妻子“车子很快就到。”

接到妻子后，两人坐在车上，一路上说了很多话，似乎把结婚这么多年的话都说了，女儿要回来了，两人心情都前所未有的好。侧望副驾驶座上的妻子，穿一袭米色风衣，保养极好的皮肤细腻光滑，齐耳的短发被风微微扬起，看上去显得神采奕奕……丁绍光打量着妻子，发现她是这样美丽，笑容是这样亲切，结婚二十多年了，由于自己总是放不下初恋情人，忽视了妻子的诸多好处，想到此，心里顿生一丝歉意，他发誓，今生已经对不起玉汉了，再也不能辜负妻子了，她们都是生命中最好最好的女人。女儿回家后，一定要好好珍惜家庭，正想着，妻子突然轻声说：“绍光，把车停一下，我想喝水，下车去买瓶饮料。”“好”丁绍光边答边把车停下。对坐在车里的妻子笑笑说：“你等着，我到公路对面去买。”他穿过公路走到一家商店，正准备买水，突然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巨响，回头一看，只见一辆货车撞在了自家的红色小轿车上，惨案发生了，丁绍光只觉得头“轰”的一下，便什么都知道了。当他从昏迷中醒过来时，看见女儿痛哭不止，妻子已去了另一个世界。

事情来得太突然，丁绍光接受不了这一打击，女儿更是责怪他没能好好

保护妈妈，说他平时对妈妈太不关心，女儿哭着说：“妈妈这么优秀的女人嫁给你真是亏了她，一生都不幸福，你心里一直装着另外一个女人，从来都没珍惜过她！”女儿一针见血的话，深深刺痛了丁绍光，他愧疚、后悔、悲痛欲绝。可是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后悔药。

办完丧事，女儿提出要回法国定居，离开这片伤心地，她无法原谅父亲对母亲的半心半意。一切都不可挽回，丁绍光更无回天之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弃自己而去。

他一个人在美国度日如年地生活了六年，背负着失去亲人的痛苦。他常常一个人的时候，拿出玉汉送给他的翡翠观音，对着它诉说衷肠，他相信这块玉真的能给他带来平安，真得能够避凶驱邪，他后悔妻子出事那次没能把他戴在身上，他真得好后悔啊，为什么从不离身的玉佩那次就忘了戴？难道冥冥之中真的有天意？又想：妻子已到了天国，玉汉现在是否还活着？要是还活着也有六十多了，她过得好吗？

也许是心有灵犀，出国几年的女儿又从法国回到了他身边，在外面经历的事情多了，人也渐渐成熟了，她慢慢理解了爸爸，原谅了爸爸。她对日渐苍老的父亲说：“爸爸，这么多年，你一直有个心愿就是回中国，回云南，这次，女儿就圆了你的梦，陪你到中国去寻找玉汉阿姨，你已经对不起妈妈了，若能在余生找到玉汉阿姨，你还可以补偿她，为自己赎罪。”丁绍光觉得女儿说的在理，自己一生中欠两个女人的太多，在国外漂泊了这么多年，如果能在华发之年回到梦魂牵绕的云南，回到玉汉身边，哪怕是看她一眼，也算是一件幸事。

4. 重回云南

旅美画家丁绍光回到云南，受到政府部门的热烈欢迎，丁绍光的名字上了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有专人专车陪他游览云南的名胜风光，云南翻天覆地的变化让绍光大受震撼，感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果。住了几天，他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提出到当年下放的地方——西双版纳去看看。

来到日思夜想的西双版纳，触摸到这片高原的红土地，看到沿途扑入眼帘的如画风景，他仿佛又回到了四十年前。弹指一挥间，如今的他已是一位苍苍老者，来不及拍打满身的仆仆风尘，他踉跄着急着要寻找玉汉的家，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找到玉汉的住址，现在已是人去楼空，到处是残砖破瓦杂草丛生，几片凋零的残叶被风一吹在敞开的门窗上翻飞沉浮，进得门去，尘埃遍地，蛛网满目，昔日的欢歌笑语，昔日的温馨美好，今日荡然无存。站

在那里，他仿佛又一次看到了玉汉甜美的笑靥，听见了她那银铃般的笑声……他追问道：“人呢？人现在住在哪里？”

看到丁绍光如此追问，村干部只好直说，“对不起，丁先生，玉汉阿姨住在山洞里。”丁绍光听说在山洞里，差点晕倒，大声疾问：“什么！山洞里？在哪个山洞快带我去！”村干部一行人带着丁绍光来到一个离村寨不远的山岗上，绍光一眼看出，这就是当年他和玉汉第一次邂逅的东坡，也是他当年经常作画的地方，这里居高临下，放眼远眺，一切尽收眼底。走着走着发现山腰上有个用石块磊起的山洞，见此，丁绍光疯了般奔向洞中，洞内空无一人，只有几处草木灰痕迹，丁绍光站在洞里，嘶哑着嗓门大喊：“玉汉！你在哪里？我是丁绍光，我回来了！”……空寂的山洞回荡着他的声音。空旷的山野萦绕着他的余音。“玉汉！玉汉！”随行的人也齐声呼唤起来，山谷里一片“玉汉玉汉！”的回音却不见玉汉的影子。这时山风骤起，只见树丛中走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杵着棍子颤颤巍巍地向这边走来，一位眼尖的村民用手一指说：“快看！那不是玉汉吗？”随着手指的方向绍光看到了一位衣衫褴褛，两眼深陷的老太婆，她的满头白发在风中肆意飞舞。他真不敢相信，这就是他那朝思暮想的初恋情人，他的玉汉，他心中的女神？此时的丁绍光再也控制不住自己，自责、愧疚、惋惜，各种感情交织在一起，他踉踉跄跄地奔向她，一把抱住她放声嚎啕……语无伦次地说：“玉汉，我是绍光，你睁开眼看看，我是你的绍光呀，我回来了，回来找你来了，我要娶你！”在场的人都哭了，那瞎老太婆表情木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任他怎样哭诉也无动于衷。原来她已经疯了，是个什么也不记得的疯子。“我知道，你已经把我遗失在河的对岸。黄昏的暮色渐渐深浓，田野苍翠，山岗上的桃花绽放。就这样，带着良辰美景，你终于抵达彼岸。你在出发的时候，记得抚摸我的发丝了吗？我怕你找不到我的气息，一整夜我都抱着你。当我们相见时，即使已经非常苍老，你也会记得我。我为你穿上过河的衣服，送你过河，我们所做过的一切，都是捕捉的风，手里注定一无所有。没有什么东西因为不舍而获得怜悯，所以我们放开手。我的船还没有过来，时间蒙住了我的眼睛，让我猜？我的眼睛已经盲了，只能在回忆里凝望你。”后来丁绍光得知，当年离开云南后，寄往云南的信件全由玉汉的父母扣押了，没敢让玉汉知道，他们固执地认为丁绍光是飞出去的大鹏，不可能再回到这小山坡里来了，劝玉汉死了这颗心，在寨子上重新找一个门当户对的。玉汉听了死活不肯。常常一个人跑到邂逅丁绍光的小山坡上去等，一天一天，一年一年过去了，“文化大革命”那会儿，由于与丁绍光之间的恋爱关系她还受到

了牵连，说她是里通外国的特务，挨过批斗。再后来，父母年岁大了，相继离开了人世，可怜玉汉一个人孤苦伶仃，从早哭到晚，她哭逝去的父母，哭负心的绍光，哭自己的命怎么这么苦？她还是到小山坡上去等，去盼，眼泪哭干了，眼睛哭瞎了，头发盼白了，还是见不到心上人的影子。万念俱灰的她再也撑不住了，精神崩溃了，疯了。

丁绍光将玉汉接到北京，住在一所医院里，他发誓，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哪怕是倾其所有也要为玉汉治好病。绍光天天到玉汉的病房去陪伴她，喂她吃药，跟她讲话，当然更多的是他一个人倾诉，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倾诉换回玉汉的回忆。时间一天天过去，玉汉还是没有恢复的迹象，丁绍光依然每天陪在她的床前，喂汤送药。这天，他握住玉汉粗糙干枯的手在自己脸上摩挲，眼泪禁不住地往外流，刹那间，他想起了一件事，迫不及待地胸口掏出玉汉送给他的翡翠玉观音，放在玉汉的手心里：“玉汉，这是临时时你送给我的玉佩，我一直戴在身上，你摸摸，你摸摸呀。”突然，玉汉的手下意识地握住了玉佩，脸上泛起了从未有过的红晕。呆滞的脸上浮上了一抹笑意。丁绍光见状大喜，连忙叫来了医生，把刚才的情况告诉了医生，知道有了好转，医生都很高兴，治疗了这么长时间终于有了起色。

当晚，丁绍光一直握着玉汉的手，让她抚摸那块玉，讲他们年轻时的故事给她听，玉汉很安静，很温柔，嘴角挂着一丝微笑，好像听懂了丁绍光的话。一直陪到很晚很晚丁绍光才离开。

第二天一早，他就迫不及待地赶往医院，当他兴奋地推开病房的门，惊呆了，只见玉汉的床头一片红光，映着透过窗棂的太阳，温暖而祥和，走进一看，原来是一只用红线缠绕的钢笔，是40年前丁绍光送给她的定情物。丁绍光握住那只笔，看看躺在床上的玉汉，当年的情景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在眼前闪现……他的一生，一直在不停地行走，一边走一边让时光和美从灵魂中刷刷掠过，好像在风里行走，明知一无所有却心存不甘。现在，面对玉汉，他终于选择了停留，不是欲望，不是诱惑，他仅仅是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一种发自远逝了的责任。不幸的是，现代医学也不是万能的上帝，就在玉汉的病情有所好转的时候她却突发脑出血而命赴黄泉。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事，丁绍光一腔赎罪的热情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而浇熄。玉汉没有给他机会，他心有不甘却无能为力。

在清理玉汉的遗物时，丁绍光发现，在她病床的枕头下面，平平整整地铺着一张画，那是第一次见到她时丁绍光为她画的沐浴图。几十年了，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唯有丁绍光送给她的两样东西一直陪伴在她身边，直到

去世。

现在，丁绍光已回国定居，在云南大学的寓所里挂着为玉汉作的沐浴图。他的大名在云南家喻户晓，他以玉汉的名字为贫困山区捐款捐画，现在的云南有玉汉小学、玉汉中学、玉汉公司、玉汉宾馆……总之，他的一切捐赠统统都以玉汉的名字命名。

他与她今生注定无缘，只能期待来世牵手。

（四）良师善诱影响深远

张光宇是丁绍光敬佩的艺术家，深深影响了他的绘画风格和创作观。张光宇一向研究民间艺术和传统艺术，并且大胆吸取西方艺术的表现手法，融会之后转而呈现新的构思。他向丁绍光和其他学生传授突破文人画传统的观念，提倡研究古代雕塑、壁画、青铜器、陶瓷器、木刻版年画等的装饰构图、造型方法和表现技巧。最早引起丁绍光浓厚兴趣的，是庞薰棿表现西南少数民族生活的创作，其中尤其以描绘苗族妇女的画作带给他最深的印象。我们仔细体味丁绍光的一些作品，还可以感受到庞薰棿的潜在影响。

张仃在艺术思想方面，影响丁绍光至深至远。他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创作者和博学多才的艺术教育家，从1957年开始担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后，主管教育和理论课程，对学院的建设做出重要的贡献。应该说，在大陆的美术院校中，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自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一直保持着较活泼开放的学术思想，以及宽松的创作设计环境，坚持学习传统、学习民间、学习西方观念，各科系都有新的建树。这一切和张仃院长的领导以及他的学术理念密不可分。张仃在艺术上具有远见卓识，爱护人才、支持学生和教师的创新探索，在艺术上没有门户之见，主张兼容并蓄，博采众长。丁绍光是幸运的，他遇到了这样好的老师，不仅在学业上获得指教，探求中不乏支持，特别是在遭到非难和打击之时，受到有力的保护，使丁绍光的艺术成长没有受到摧残，而是在艰难中得到发展和壮大，这也正是丁绍光为什么对这些老师们一往情深的缘故。

三、艺术成就

（一）艺术情结

云南是丁绍光在艺术上的生活基地，也是他的第二故乡，而西双版纳则是他生活基地中的精神家园。

云南对丁绍光的一生具有重要影响，西双版纳更是他梦魂萦绕之地。还

在大学就读的时候，丁绍光第一次来到此地，当时，大陆经受着饥馑年月，而在西双版纳这块世外桃源之地，丁绍光强烈地感受到置身于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另一个世界，感觉到与中原迥然不同的情调，原始、自然而质朴的美。这种深沉的美感在吸引、召唤着他，他在这儿找到了脱尘超俗、回归自然之地，也找到了自我的位置。西双版纳从此成为丁绍光艺术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和起始点。

在丁绍光的心目中，西双版纳是神奇的土地、艺术的圣殿。这里阳光明媚，树木繁茂，色彩丰富而绚丽，处处充满生机。在这里居住生息的少数民族，都是那么地具有特色，千姿百态的民族舞蹈是质朴、优雅和简洁的，充满了变化和突出的特色，展现在丁绍光的眼前，震撼着他的心灵。

丁绍光此行西双版纳的六个月生活，对他以后的艺术道路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这里种下了他独钟云南的情结。

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丁绍光为先驱者，一批优秀的美术院校毕业生陆续分配到昆明工作。他们聚集在一起，切磋画艺，研讨理论，进行交流。甚至在“文化大革命”的风雨中，有时夜晚还讨论着艺术的问题。这批青年艺术家以丁绍光为首，他以对艺术的热情和创新探索的精神，影响着周围的青年。

（二）装饰风格

丁绍光的作品具有强烈的装饰风格，突出的形式感诉诸观赏者的视觉，所表现的感情是鲜明的，具有浓厚的魅力。

丁绍光的画作之所以形成装饰风格，应该说是很自然的探索过程，是他广泛学习中国传统艺术、民间艺术以及西方古典和现代艺术的结果，也是诗意地理解生活的结果。

在丁绍光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广泛吸取了敦煌壁画、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以及历代青铜器的装饰构图，加上西方现代派画家的构图方法，形成了他的装饰性构图。而构图中，他大量采用中国的透视法，形成既传统又现代的独特透视风格。欣赏丁绍光的作品，确实使人感受到他在色彩方面的功力极为深厚，融合东西方和古今色彩为一炉，华丽繁复，达到了感人的境地，不愧当今世界的色彩大师之称。

丁绍光装饰画作的风格形成，确是经历了长期艰辛的生活和艺术上的磨练，一步一个脚印踏过来的。宋人王安石曾经写过这样的句子：“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丁绍光在苦心的探索中惨淡经营，他不追求奇

和怪，更不把作品画得令人难以理解。他追求平实、简洁、单纯的表现形式，而实质上借他的真情和爱心，使作品进入了内涵丰富、深邃、隽永的世界。

（三）艺术实践

丁绍光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丰富灿烂，艺术道路十分宽广，每种艺术皆可由人创新，走出一条新路。如中国的彩陶、青铜器、玉雕、漆画、木版画、剪纸、皮影、都有不同的艺术造型，其中可启发多样灵感，以达到深一层的造诣，而不应只局限于文人画一条路。重色彩的西方人虽已分辨与领略中国水墨画的境界，而西方画家各有其流派和风格，每家各树一帜，每个人皆能在创新突破中找出自己的风格。如果想在国际画坛上立足，得先以现代绘画的角度，吸取西方现代艺术，再回头反省自己的文化背景，立足在自己民族的基点上，然后再回到现代艺术，这样才可以走出活路。如果一直故步自封，保守地站在中国，不去欣赏别人的文化，不去理会人家的进步，是走不出路来的。”

丁绍光现任中外十余所大学名誉和客座教授，国际中国美术家协会会长，美国世界艺术家联盟首任主席。各国政府和社会团体颁发给丁绍光数十张奖状，包括荣誉市民、金钥匙、命名“丁绍光日”等。1996年，经中国文化部批准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丁绍光奖全国美术大展》。中国、美国、日本、法国、新加坡分别出版《丁绍光画集》。1995年日本NHK出版社出版的《丁绍光作品集》获世界文化交流金奖。

武旦大师·关肃霜

一、人物简介

关肃霜（1928—1992），女，原名关鹁鹁，满族，湖北荆州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专攻武旦。她出身艺人家庭，父亲关永斋是京剧鼓师。

关肃霜生前任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云南省剧协主席、省京剧院院长。

1950年1月在云南大戏院任演员。

1951年4月参加昆明举办的戏曲改进协会筹委会第一期艺人讲习班学习。

1951年11月任云南大戏院管理委员会委员。

1952年赴重庆参加西南文代会并演出《大英节烈》。

1954年任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团副团长，参加慰问演出活动。

1955年赴上海参加华东戏曲观摩会演，并带回一些剧本。

1956年经李建业、秦竹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艺术代表团，赴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奥地利和瑞士等国访问演出。回国后，留北京向苏盛琴、李丽芳学戏。是年，参加云南省戏曲会演，主演《战洪州》获演员一等奖。

1957年赴莫斯科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会，演出《泗州城》《打焦赞》，荣获两枚金质奖章。尔后应邀到前苏联各地巡回演出。

1958年云南大戏院改名为昆明京剧团，任团长。与徐敏初一起，主演现代京剧《白毛女》。

1959年任云南省京剧出省巡回演出团副团长，到北京、天津、武汉、南京等地演出。在北京参加庆祝国庆十周年献礼演出期间，经夏衍介绍拜梅兰芳大师为师。

1960年初和徐敏初结为百年之好，在昆明饭店举行简朴而又热闹的婚



礼。省市领导于一川、刘明辉等出席了婚礼仪式。

1960年6月成立于男生京剧院，任副院长、一团演员。

1961年到大理、临沧参加中缅友好活动，并慰问边防部队。

1962年8月参加昆明举行的纪念京剧大师梅兰芳演出。

1963年9月赴北京主演《谢瑶环》和《多沙阿波》，并应邀到周总理家做客。

1964年到潞西县三台山景颇族地区深入生活，赴北京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主演《黛诺》，受到戏剧界的重视和好评。同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64年底江青提出要关肃霜改编演出《战火中的青春》，到山东体验生活。

1965年6月江青来信，谈改编《战火中的青春》的创作问题，秋季赴广州，为广交会中外来宾演出，并到深圳为港澳同胞演出受到好评。

1969年到云南民族学院参加省级文艺团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被审查。江青指名调关肃霜到北京，安排在《红色娘子军》剧组，因种种原因关肃霜不愿留下来，二十多天后便返回昆明。

1970年初在云南省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学习班《海港》剧组任演员。

1975年赴北京参加全国文艺调演，主演《孔雀岭》。

1975年11月任云南省京剧团革委会副主任。

1976年8月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传统戏资料片，后因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粉碎，提前赶回昆明。

1977年7月参加六场京剧《豹子湾战斗》演出，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六周年。同年底演出大型新编历史剧《红灯照》。

1978年1月28日关肃霜丈夫、云南省京剧院著名演员徐敏初因病在昆明逝世。2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4~5月到湖南省汉剧院学习，移植京剧《闯王旗》。8月率团到禄丰县各公社演出。

1979年云南省京剧院恢复建制，在一团任演员，参加中央慰问团为边防部队演出。同年赴北京拍摄戏曲彩色艺术片《铁弓缘》，参加国庆三十周年献礼演出，主演京剧现代戏《佘山雾》，并获演出一等奖。11月，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这一年被评选为省劳动模范。

1980年任中国云南京剧团副团长，赴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等国访问演出，大获成功。同年，主演的电影艺术片《铁弓缘》，

荣获第三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戏曲片奖。

1981年1月经省委批准，任云南省京剧院院长，到西北银川、兰州等地演出，并收徒。宁夏电视台录制了其主演的《白门楼》《辛安驿》等剧目。同年9月，在昆明参加纪念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演出活动。

1982年2月《北京日报》报道关肃霜月月寄款义务赡养在北京的失子老人胡淑贞、冯琪的感人事迹。全国各地一些报刊也发表了类似的报道和评论。出任云南省京剧院艺术委员会主任。

1982年3月组团赴上海、苏州、南京长沙等地巡回演出。

1982年7月参加云南省戏曲现代戏调演，主演创作的大型京剧《娜蒂秀》。

1982年10~11月率队赴怀化、洪江、广州、深圳演出受到好评。《关肃霜表演艺术散论》一书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发表关肃霜先进事迹的长篇通讯，并配发短评。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向各地转发关肃霜先进事迹的报告，号召向关肃霜学习。年底被评选为省级文化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1983年3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1983年5~9月应邀赴大庆、齐齐哈尔、哈尔滨、牡丹江、长春、沈阳等地，为观众献艺。

1983年10月收长春京剧团的邢美珠、大连京剧团的侯丹梅、阜新京剧团的李晓玉为徒。同年，被评选为省劳动模范。

1984年7~8月进入中国云南京剧团任艺术指导，赴芬兰、瑞典进行访问演出，主演《打焦赞》《霸王别姬》。

1984年11月带徒赴武汉、江陵、沙市、桂林等地演出。

1985年1月应邀赴楚雄演出，并收楚雄彝族自治州滇剧团陈月娥为徒。

1986年3月参加中国文联代表团出访日本，在东京、箱根、精度、奈良、神户、大阪和仙台等地，进行了艺术交流活动。在全国第二届戏曲电视剧评奖大会上，关肃霜主演的的京剧《谢瑶环》电视片，被评为荣誉奖。

1988年3月率领云南省京剧团赴香港演出，主演《铁弓缘》《战洪州》等剧目，被报界誉为“京剧怪杰”。

1988年9月在云南省首届民族艺术节上作告别演出。

1989年3月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赴北京参加第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1989年4月当选为云南省戏剧家协会主席。

1989年9月经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被推荐为全国劳动模范表彰大会特

邀代表，赴北京参加大会。

1988年10月赴天津演出《铁弓缘》《白蛇传》《拾玉镯》《十八扯》《辛安驿》《花田错》。

1989年11月云南省妇联受全国妇联委托，向关肃霜颁发了全国“三八”红旗手证书。

1991年3月赴北京参加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纪念活动，领衔主演《盗库银》《战洪州》《伯牙碎琴》单个剧目，文唱武打，风采焕然，技惊四座。之后被聘请为全国京剧振兴指导委员会委员，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亲自授予聘书。

1991年10月被英国伦敦《剑桥世界名人传记》中心收入名录，并约稿撰写本人小传。

1992年2~3月在昆明参加第三届中国艺术节活动，先后演出《雷峰塔》《水漫金山》节目，接收最后一批弟子。

1992年3月6日在昆明家中急病突发猝然仙世。

1992年9月关肃霜被荆州博物馆列为江陵第二十三位历史名人，并为其树碑。

1992年10月生前演唱的《黛诺》荣获中国唱片总公司授予的我国第二届“金唱片奖”，云南省京剧院副院长毛云婷、关肃霜的女儿徐巧玲赴京代其领奖。

二、人物生平

关肃霜，原名关鹣鹣，为满族正黄旗驻防荆州旗人的后代。生于武汉，是京剧鼓师关永斋的女儿。

她自幼受到艺术熏陶，父亲教她唱《女起解》《贺后骂殿》，8岁开始练功，20世纪30年代末，她曾向雪艳香学艺，不到半年，这位启蒙老师因家庭所累，辞她而去。她15岁时，她正式拜京剧名旦戴绮霞为师，不但写了契约，还被改从师姓。从此，戴绮霞的丈夫王韵武教把武功、把子，跌打翻扑等基本功。戴绮霞教她文戏。她刻苦练功，不但学习花旦戏，还学习老生戏、花脸戏、小生戏、武生戏和老旦戏，并注意向话剧、楚剧、汉剧和杂技演员学习表演。她随师边学边演，经过勤学苦练，强识博采。

16岁在汉口第一次登台演出《虹霓关》，前演夫人，后演丫鬟，初露锋芒。1946年随师到上海搭班，在连台本戏《蜀山剑侠传》中扮演侠女，能唱能演，能翻能打。她的武打表演，在当时上海剧坛引起轰动。她以俊俏英

武的扮相、甜美圆润的唱腔、文武兼备的艺技崭露头角，蜚声艺苑。她不论在信阳城、还是在武汉、长沙或上海，都是文、武、生、旦，无一不演，每演必技压群雄。不论唱、念、做、打、舞俱可称奇绝。令人眼花缭乱的是枪、鞭、足、靠旗打出手的艺技，反串小生激昂苍凉、倜傥潇洒、举重若轻的情状，无不令人赞叹不已。1948年，这位挂头牌、挑大梁的“梨园怪杰”满师独立。从此，她在艺苑中恢复了自己的本姓。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正在昆明挑班演出的关肃霜从此扎根昆明，开始了攀登艺术巅峰的学习、钻研及探索创新。

1959年，她拜梅兰芳为师，先后向梅大师及程砚秋等大师求教，学到了许多表现少女内心的精湛艺术技巧，使她的舞台表演艺术得到了进一步升华。后来她演的《宇宙锋》《玉堂春》《霸王别姬》《人面桃花》《红娘》等戏，唱、念、做、打、舞，情真意切，喜怒哀乐发自内心，演技与早期相比，更高一筹。

关肃霜在艺术上勇于革新创作，多年来，她塑造了白素贞、小青、穆桂英、杨排风、陈秀英、谢瑶环、黛诺、叶娘、娜蒂秀等众多古代和现代及少数民族妇女形象，显示出她多方面的表演才能和独特的艺术风格。现代京剧《黛诺》是她主演的具有云南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主要剧目。传统剧目《铁弓缘》，集中体现了关肃霜的艺术成就。

三、个人作品

关肃霜演花旦口齿清脆、体态轻盈、表演细腻，饰青衣端庄大方、唱腔流畅、婉转自如、韵味隽永，她在艺术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以他人之长，补己之短，通过练、学、看、演，把各个流派、各个行当、各个剧种的艺术精华都化进自己的再创造之中，使之达到精、通、化的境界，从而形成了她自己的独特风格，建树了允文允武、婀娜多姿、明快、稳健、含蓄、自然的关肃霜表演艺术。

关肃霜的嗓音宽宏圆润，唱腔珠圆玉润、婉丽别致、亲切可人，台风婀娜多姿中又见英俊稳健。

她还擅长反串小生，她演《白门楼》，把吕布演活了。开始的〔西皮二六〕她唱得潇洒、倜傥，加上得意忘形、不可一世的表演，充分表现出这个有勇无谋酒色之徒轻佻狂妄的心理状态。后面，吕布身披锁链已成阶下囚，但表面上还很蛮狂。斥骂貂蝉，唱的也是一段〔西皮二六〕。这段〔二六〕与开始的〔二六〕在运腔使调上都有显著不同，这段〔二六〕吐字发音挺

拔、激越，唱出了吕布愤恨、恼怒、骄横的情绪，突出了他愚妄的性格。后边大段的〔娃娃调〕是这出戏的主要唱段，关肃霜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演唱才能。她那宽厚圆润的嗓音、刚柔相济、高低自如的演唱技巧，总是博得台下一阵阵掌声。最为难得的是她在唱念中毫无旦角娇媚的痕迹。她字字喷出响彻行云，高亢中带有凄厉，行腔时抑扬跌宕。〔导板〕后出场，猛见刀斧手的手中钢刀，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原先的狂傲一扫而光，把吕布色厉内荏、贪生怕死的本来面目刻画得淋漓尽致，使人物的内心活动也得到了充分表达。关肃霜在《白蛇传》中饰演白素贞，对“出手”也进行了突破。她改双鞭为剑，用剑打出手难度很大，她不但攻克难关，而且把出手处理得合情合理，惊险绝伦。她在《铁弓缘》《战洪州》等戏中扎大靠，创造的靠旗打出手也堪称一绝。

她创演的现代京剧《黛诺》，在北京“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演出时，受到了各方好评。

全国有十多个省、市京剧团学演《黛诺》，中国戏曲学校还把此剧作为本校的教材。首都京剧界名人张君秋、马连良、李和曾等也曾学唱，并给予热情鼓励。而剧中关肃霜演唱的〔南梆子〕“山风吹来一阵阵”，也在群众中流传开来。

关肃霜是京剧舞台上的一朵奇葩。她曾于1956年、1957年和1980年三次出国访问演出，在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演出中获金质奖章。关肃霜一生从艺48个春秋，当选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成为京剧界代表人物。

（一）关肃霜扎根云南

关肃霜身在云南，若想在京剧界占有一席之地，就要有新玩艺、新创造。她以他人之长，补己之短，通过学、练、看、演，把京剧各个流派、各个行当、各个剧种的艺术精华吸收过来，化进自己的再创造之中，使之达到通、精、化的境界，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树立了允文允武、婀娜多姿、明快、稳健、含蓄自然的表演艺术。1959年，关肃霜拜梅兰芳为师，学到了许多艺术技巧，使她的舞台表演艺术得到了进一步升华，演技与早期相比更高一筹。饰青衣端庄大方，唱腔流畅，婉转自如，韵味隽永。演花旦戏《红娘》等剧目，口齿清脆，体态轻盈，表演细腻。反串小生，扮相英俊，风流倜傥，唱得潇洒，在《白门楼》一剧中，演活了吕布。她在唱念中毫无旦角娇媚的痕迹，字字喷出响彻行云，高亢中带有凄厉之声，行腔时抑

扬跌宕，颇见功力。

关肃霜长期生活在云南边疆，她经常下村寨体验生活，搜集少数民族素材，先后创演了《多沙阿波》《黛诺》《佤山雾》等反映彝族、景颇族、佤族少数民族生活的剧目，在其中的表演、开打颇多创造。

20世纪60年代早期，关肃霜率团在上海演出。在《白蛇传》一剧中，关肃霜饰白素贞，文唱武打一人演到底。在《盗仙草》《水斗》两折中的“打出手”有新的突破，一改仅用左右脚踢枪的老程式，加上前翻身、后翻身、侧身踢枪的绝技。

（二）靠旗出手

关肃霜技艺超群，全面发展，可谓“文武兼备，通才名伶”。她擅长武旦、刀马旦，亦擅文戏青衣、花旦、花衫，反串小生、净角也别具一格。

特别是表演《铁弓缘》《战洪州》两剧，关肃霜创造了“靠旗出手”的武打绝技。8杆枪在空中朝她飞来，只见她沉稳迅速，用靠旗接枪，再用旗杆打回，或接枪后挑起来旋转几圈再打出去。左右开弓，前打后挑，惊险万分，让全场观众兴奋异常，跺脚叫好。今日，各地院团的武旦演员在踢枪打出手时，都学习运用了关肃霜的“靠旗出手”技艺。



《铁弓缘》集中体现了关肃霜的艺术成就，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成影片，并获第三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戏曲片奖。

关肃霜主演的《黛诺》，1964年在北京“全国京剧现代观摩演出大会”演出时，受到各方面的好评。全国有十多个省、市京剧院团学演《黛诺》，中国戏曲学院还把此剧作为本校教材。首都京剧界名伶马连良、张君秋、李和曾等也学唱《黛诺》中的名段。一时间，关肃霜演唱的〔南梆子〕“山风吹来一阵阵……”在戏迷中流传开来。

一代红伶关肃霜演技出众，引起戏剧家、专家的关注。1962年，郭沫若在昆明观看了关肃霜演出的《水漫金山》，题诗赞曰：“舞姿轩昂回落照，歌喉嘹亮遏行云。身披铁锁温侯（吕布）活，水漫金山白氏真。”

许多青年旦角慕名投帖，拜关肃霜为师。关肃霜经过严格筛选，一生收近50人为弟子，其中最具有成就的传人是邢美珠、李静文、侯丹梅、李佩红。桃李满天下，关肃霜的艺术流派形成了气候。

1992年，云南省在昆明举办第三届艺术节。在闭幕式上，关肃霜领衔压轴演出经典武旦戏《水漫金山》。两个月前，她就带领全团演员投入紧张的训练。在每一次单练、合练、走台和排彩时，年逾花甲的关肃霜从不缺席，也不用他人替代。事必躬亲，处处以身作则。3月3日晚上，在鼓乐声中，《水漫金山》开演，只见关肃霜扮演的白娘子率领众水族，与法海差来的天兵天将拼死搏斗。这天，关肃霜太累了，但她强打精神，在谢幕后仍为100多名观众、演员签名。最后站立不稳，躺在长椅上请人帮她卸妆。



3天后，3月6日凌晨，关肃霜终因劳累过度，突发心肌梗死，与世长辞，享年64岁。她为京剧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三、代表剧目

关肃霜戏路宽广，技艺方面，她长于武旦和刀马旦，反串小生、净角也别具一格。代表作有《打焦赞》《扈家庄》《战洪州》《白门楼》《周瑜归天》《铁弓缘》《辛安驿》《白蛇传》《穆桂英挂帅》《霸王别姬》等等。她长期在云南边疆，先后演出了《多沙阿波》《黛诺》《佤山雾》等反映彝族、景颇族、佤族少数民族生活的剧目，在中颇多创造。

关肃霜的弟子有邢美珠、李佩红、李焕弟、李丽、林燕、赵琳、李静文、吴艳华、李萍等近五十余名，分布在各省市、各剧种之中。她不但不遗余力地指教、关怀这些入室弟子，而且对任何青年演员都予以提携帮助，可谓桃李满天下。

孔雀公主·刀美兰

一、人物概况

刀美兰，1944年出生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1954年进入西双版纳自治州民族文工队。1959年调入云南省歌舞团任舞蹈演员。1961年调入北京东方歌舞团任舞蹈演员。1970年“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下放至云南省建筑机械厂当描图员。1972年调入云南省歌舞团任舞蹈演员。1978年当选为云南省政协常委。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当选为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当年被评选为云南省劳动模范。1986年当选为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舞协常务理事。1990年当选为云南省文联副主席、云南省舞蹈家协会主席，1997年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第九届委员。2000年当选为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国家环境使者、中国文联委员。2003年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现为中国舞蹈家协会顾问。



二、人物生平

(一) 童年经历

小时候，每当和奶奶到佛寺里唸佛的时候，幼小的刀美兰就常常被佛寺里丰富多彩的美丽壁画吸引住。老人们在虔诚地唸佛，幼小的刀美兰常独自一人呆立在壁画前，一面看，一面想，一面模仿壁画中各种栩栩如生的姿态，一举手、一投足地比划起来，并记在脑海里。“那时在草地上玩耍，到澜沧江沐浴都要跳一阵子舞，比划的动作就是从佛寺壁画里学来的。”已经60岁的刀美兰回忆起童年的往事时还记忆犹新。“那时，家很穷，母亲主要给人织布、刺绣、剪裁衣服。在傣族的织锦中，上面都要织有许多美丽的图

案，有大象、孔雀、佛塔等，心灵手巧的母亲织的傣锦最漂亮，各种各样孔雀的绣图，让我爱不释手，在以后艺术生涯中形成的‘美兰味’，很多就是从中得到的启迪。”

（二）传奇人生

1954年，云南省民族工作队到各村寨挑选文艺苗子，筹建西双版纳州文工队。刀美兰被选中了。那时，文工队虽然条件简陋，训练却一点不含糊。由于太辛苦，加上风俗不同，家长们纷纷把孩子拉回家。一起去的伙伴，最后只剩下小美兰一个人。在改编自傣族民间传说《召树屯》的舞蹈《召树屯与南吾诺娜》中，刀美兰扮演了“孔雀公主”。这不仅开创了女子孔雀舞的先河，还对表演形式做了革新，去掉了面具，显出了“公主”美丽的真容。

一个美丽的地方，总是容易诞生美丽的故事，而刀美兰的传奇故事，则是在1956年的中缅边民联欢大会上开始的。联欢会先在国内的德宏举行，后来又到了缅甸。周恩来总理也来了，宴会时就跟刀美兰一桌，让她喜出望外。当时，刀美兰穿着一件布拉吉，周总理就问她：“今天是你们的节日，为什么不穿民族服装呢？”事先毫无准备，小美兰倏地脸就红了。当小美兰跳完了独舞《种菠萝》，周总理带头鼓掌；在接见演员时，他鼓励小美兰说：“今天的舞蹈跳得不错，你要苦练基本功，还要向老艺术家学习。傣家人把孔雀当作吉祥幸福的象征，你这个小孔雀要高飞，飞遍全中国、全世界。”时隔多年，刀美兰对当时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刀美兰因为跳孔雀舞而小有名气，不久就到北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从那以后，国家领导人每次到昆明考察或陪外宾访问，都要看她跳的孔雀舞。因为《召树屯与楠木诺娜》的传说在泰国、缅甸、老挝、印度等国家都是老百姓熟知的。1957年，刀美兰所在的云南省歌舞团被指定随同周恩来总理到缅甸访问演出。那年，刀美兰刚好15岁，汉语都还不会讲，在台上穿孔雀服的时候很漂亮。演第一场时，缅甸17岁的王子跟他父亲就坐在台下的一个包厢里。王子一看见刀美兰在台上的表演，就被迷住了。王子托人打听到演“孔雀公主”的人名叫“楠蝶提娜”（“楠”是皇室里公主的姓）。王子马上提出要娶刀美兰。王子找到了当时缅甸总理吴努，请他出面找周总理，谈娶刀美兰的事情。周总理诚恳、委婉地说：“‘孔雀公主’年纪太小了，还是一棵刚刚冒出来的嫩芽，晚一点，再过上几年，就可以了。”王子听到这样的答复很担心。还要等上一两年，不能等了。他们决定按照傣家民间抢亲的习俗处理这件事。时

间和地点就定在第二天歌舞团演出的仰光郊外。有人把抢亲的事儿汇报给周总理后，周总理立即安排人当天晚上用专机把刀美兰从仰光送到昆明，“孔雀公主”换给另一个人演。那天，王子派的人马什么事情都弄好了，就预备到现场动手抢，可里里外外地找了个遍都没有找到刀美兰。几年后，刀美兰又到仰光去表演，王子还一直在打听刀美兰，可刀美兰已经结婚了。

后来，刀美兰被调到了云南省歌舞团。1957年，刀美兰扮演“孔雀公主”，在北京首届全国少数民族音乐舞蹈汇演中一举成名；1959年，她参加国庆10周年献礼演出，表演了《少卜少》《赶摆》，第一次走进了人民大会堂，还受到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不久，东方歌舞团成立。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刀美兰来到北京，并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担任部分章节的领舞。

（三）铸就辉煌

1978年，春风吹走了阴霾，刀美兰重新回到了梦寐以求的舞台。在那年的国庆节，刀美兰的独舞《金色的孔雀》在老舞蹈家刘金吾的协助下，紧张地排练了两个多月后，终于登台演出。伴随着清泉般的音乐，匍匐在草地上的金孔雀渐渐醒来，朝霞射进了森林，鸟儿在自由地飞翔，金孔雀也情不自禁地翩翩起舞……当音乐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时，剧场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之后，刀美兰又表演了《水》，刀美兰以傣家女子特有的身体造型，配上解发、洗发、甩发、晒发、抖发、挽发、梳理等一连串表演，再次赢得观众的好评。1980年，在大连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单人舞、双人舞、三人舞比赛中，刀美兰的《金色的孔雀》《水》都得了奖。最能体现“美兰味”的是1982年在北京、上海等十大城市上演的“刀美兰独舞晚会”。刀美兰每到一处都涌起一阵热潮，她还应邀到世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演出。刀美兰的舞蹈以她独特的艺术魅力倾倒了一代又一代观众，被誉为“金孔雀”。原舞蹈协会主席吴晓邦尊称她为“舞神”；非洲人民称她为“非洲之神”。这只从澜沧江边起飞的“金孔雀”，成为享有国际声誉的东方舞蹈家。竹楼里的祝福在竹楼里，乡亲们为迎接刀美兰归来，摆好“茂欢”（神桌），请来佛爷和寨子里的老人，他们要按照古老的习俗，为刀美兰举行拴线仪式。刀美兰身材匀称，双目清澈，在乡亲们的簇拥下虔诚地跪在为她制作的神桌前，聆听佛爷为她念诵《沙比滴约》祝福经，然后老人们边为她拴线边唱起了古老的歌谣。

三、艺术成就

刀美兰虽未涉足舞蹈学校专修，但她却在社会大学的艺苑中采花酿蜜，编织出诗一般的五彩花环。从20世纪50年代的《孔雀公主》《少卜少》《赶摆》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金色的孔雀》和《水》的表演，都以迷人的艺术魅力向世人展示了她那独特的艺术风采，在海内外舞坛上散发出民族艺术的芳馨。

1956年，刀美兰在傣族舞剧《召树屯与楠木诺娜》中，饰演了孔雀公主的角色，从此结束了千百年来孔雀舞由男人扮跳的历史，成为了中国舞台上第一个“孔雀公主”。

1957年刀美兰在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音乐舞蹈会演中扮演“孔雀公主”获奖。

1957年，全国第一届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调演，傣族舞剧《召树屯与楠木诺娜》被云南省选派到北京参加汇演。同年，刀美兰所在的云南省歌舞团被指定随周恩来总理到缅甸访问演出，引起了轰动。那年，刀美兰刚好15岁。

1961年的傣族泼水节，刀美兰表演独舞《种菠萝》，获得周总理赞赏。

1964年，刀美兰参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录制，担任花环舞的领舞，受到了毛主席和刘少奇副主席的亲切接见。

1980年第一届全国舞蹈比赛中表演的傣族独舞《水》《金孔雀》获优秀表演奖。

1982年由刀美兰主创并表演的《刀美兰独舞晚会》受到国内外专家和广大观众的高度评价。

以灵舞者·杨丽萍

一、人物概况

杨丽萍，1958年生于云南，大理洱源人，白族，自幼酷爱舞蹈。1971年进入西双版纳州歌舞团，九年后调入中央民族歌舞团，并以“孔雀舞”闻名。1992年，她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位赴我国台湾表演的舞蹈家。1994年，独舞《雀之灵》荣获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作品金奖。2003年，杨丽萍任原生态歌舞《云南映象》总编导及主演。2009年，编导并主演《云南映象》姊妹篇《云南的响声》。在2012年央视春晚以舞蹈《雀之恋》，再展舞蹈诗人的风姿。



杨丽萍式的舞蹈风格，最大胆和成功之处在于她将舞蹈中原本动态的艺术表现形式，转化为静态的，而且她的舞蹈风格又大多源于自然和真实的生活。在杨丽萍的意识中，大自然是最美、最真实、最深刻的体现，通过感悟，她力争用自己朴实的语言去构架人类最美的梦想。所有看杨丽萍舞蹈的人，都会进入她构架的如诗如画的意境，都会情不自禁被她所表现出来的美所动容。

二、成长经历

可能是因为出生于云南白族的小村庄，杨丽萍浑身散发着一股大自然的味道。她说，村子里的人都喜欢跳舞，婚丧嫁娶、种收庄稼、祭祀神灵等无不跳舞，她自然也从小跟着祖辈、父母一起跳。她喜欢观察大自然，看云朵如何变化、孔雀怎么开屏、蜻蜓怎么点水……天资聪慧的她把这些看来的美放进自己的舞蹈中，很快就成了全村舞跳得最好的姑娘。13岁那年，杨丽萍被云南西双版纳州歌舞团看中并招收入团。

入团后，她开始了游走于云南这片土地上长达7年的访演生活。每次巡

村访演，演员们都是自己背行囊，徒步行进。而村庄之间没有路，几乎都是原始森林。演员们经常得跨过冒着热气的大象粪便，躲过乱窜的蛇、吸血的旱蚂蝗前行……每次访演的时间至少长达3个月，演员们跟村民们同吃同住，白天帮村民收庄稼，晚上演出。这个村子待一段时间，就接着去下一个村子演。这样，她走访了许多村落，见识了许多民族，学习了多种舞蹈。

这种“送戏上门”的经历对杨丽萍来说是宝贵的，也为她后来的艺术创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杨丽萍看过各个少数民族的舞蹈后很感动，她认为，作为舞蹈者的自己不应局限在只跳白族的舞蹈，而应是集各民族舞蹈的大成者。杨丽萍留一头长长秀发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漂亮，而是



看了佤族人的舞蹈后受的启发。佤族人把太阳奉为神灵，也崇拜由太阳照射产生的火。他们无论男女，头发都是披散着，从来不剪，跳舞时用甩动长头发的方式来表现火，以此表达对太阳神的崇敬。因此杨丽萍身上有了佤族人这一标志性的舞蹈动作元素。她看到傣族前辈毛相、“孔雀公主”刀美兰所跳的孔雀舞太美了，所以，她选择了傣族舞蹈作为自己舞蹈的主要表现方式。她吸取了两人不同风格的孔雀舞的特点及其他民族的舞蹈元素，同时加入自己的感悟，创造了独树一帜的“杨氏”孔雀舞。

1980年，杨丽萍进入中央民族歌舞团，之后很快以“孔雀舞”闻名。可是，在这期间，杨丽萍觉得这里古板的芭蕾式训练并不适合自己。所以，她毅然离开了中央民族歌舞团，回到云南继续钻研民族舞蹈。于是，她又开始了走村串寨与村民同吃同住的生活。但与原先访演的经历不同，这次是为了舞蹈调研。杨丽萍的弟子虾嘎就是她在调研中发掘的。哈尼族的虾嘎所住的村子没有路，因为哈尼族是居住在深山半山腰的，通往村庄的唯一道路就是一团团的大树根，人只能攀踩着树根到达村落，用杨丽萍的话说：“活像电影《阿凡达》的场景，树根就是梯子，十分有趣。”

二、个人作品

(一) 舞蹈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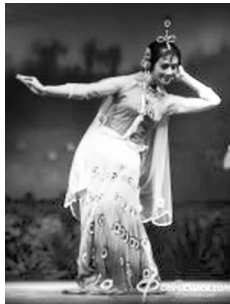
1. 大型舞剧《孔雀公主》

主演：杨丽萍

2. 《雀之灵》

编舞 主演：杨丽萍

这个题目体现了创作者对作品内涵的高度要求。举手投足之间，看似孔雀“迎风挺立”“跳跃旋转”“展翅飞翔”，但它远远超过了形态模拟，而是舞者——“孔雀”的灵与肉的交融、呈现。



3. 《舞之魂》编舞 主演：杨丽萍

4. 《版纳三色》

编舞 主演：杨丽萍

5. 《埃及舞》

编舞 主演：杨丽萍

6. 《孔雀》

编舞 主演：杨丽萍

7. 《瑞雪》

编舞 主演：杨丽萍

8. 《两棵树》

编舞 主演：杨丽萍

传说中两位相恋的人不能相爱，死后也没能葬在一起，但他们的坟墓却同时各长出一棵树并紧紧地缠绕在一起，这就是人们传说的连理枝。杨丽萍崇尚那种灵欲交融的爱情，她创作的《两棵树》被评选为中国最受欢迎的舞蹈。

9. 《月光》

编舞 主演：杨丽萍

杨丽萍一直以为女人就如同月光一样有形和无形，所以她用抽象和变形的肢体表现了她的感情和月光的圣洁，我们在其中会看到舞蹈家是怎样张开她那想象的翅膀。

10. 《雨丝》

编舞 主演：杨丽萍

杨丽萍运用十个手指的巧妙颤动，象征连绵不断的春雨，这一动作设计被誉为独特的创编。

11. 《珠穆朗玛》

编舞：苏东梅、何浩川、赵明珠

主演：杨丽萍

你耸立在人们心中，你立在蓝天之下。啊！圣洁的珠穆朗玛！

12. 《火》

编舞 主演：杨丽萍

生在自然里的佉族人，对火有着原始的崇拜，他们认为火就是太阳，太阳给大地带来光明，点燃起人们对生命的所有欲望。杨丽萍将用她的手指、脚趾身体乃至她的心，点燃起生命之火。

13. 《绿色》

编舞 主演：杨丽萍

14. 《拉萨河》

编舞 主演：杨丽萍

藏族人每年有个沐浴节，他们每年那一天将在拉萨河里沐浴，接受河水那母亲般的呵护祝福，从而得到一个纯净的灵魂和一个无限的生命，这个舞是杨丽萍最新的作品。

15. 《红色诱惑》

编舞：何浩川

主演：杨丽萍

她，似一团红色的雾，令憨哥们迷迷糊糊；她，像一把炽烈的火，叫壮汉们失魂落魄。

16. 《女儿国》

编舞 主演：杨丽萍

女人不去吃苦，日子哪会过得甜？天上没有个女人，天就不会亮；地下没有个女人，地就不长草。

17. 《心之翼》

编舞：苏冬梅

主演：杨丽萍

改编：何浩川

心之翼托起古老又年轻的情感，大凉山因此而青春浪漫，索玛花才有了新的传说。

18. 《荷花度母》

编舞 主演：杨丽萍

19. 《牛铃铛》

编舞 主演：杨丽萍

20. 《催生》

编舞 主演：杨丽萍

21. 《幻觉》

编舞：杨丽萍

主演：杨丽萍、小彩旗

22. 《云南映象》

艺术总监 总编导：杨丽萍

23. 《藏谜》

艺术总监 总导演：杨丽萍

《藏谜》由杨丽萍、容中尔甲历经数年精心打造，是一台涵盖了中国各藏族地区不同风格而且丰富多彩的纯藏族大型歌舞乐，也是国内首部全景式展现藏民族文化的歌舞乐。

24. 《云南的响声》

艺术总监 总编导：杨丽萍

在2012“春晚”，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群众中的目光。

25. 《雀之恋》

编舞：杨丽萍、王迪

《雀之恋》征服了挑剔的观众，杨丽萍分析说，这个节目之所以成功，是因为相对于大家熟悉的《雀之灵》，《雀之恋》在舞蹈语汇和包装上都有了颠覆性的创作。杨丽萍说，《雀之灵》基本上以民间舞蹈元素为主，但《雀之恋》的表现形式并不是纯民间舞，而是在模拟孔雀的动作基础上有了再创造。

26. 《春》

编舞：杨丽萍

表演：杨丽萍、小彩旗

27. 《孔雀》

总导演 总编导：杨丽萍

美术总监 服装造型：叶锦添

副总编导：高成明

总策划：王焱武

编导：念云华、李鸿钧

音乐总监：黄荟

视觉总监 平面设计：王涵

灯光设计：冯国基

领衔主演：杨丽萍、王迪、小彩旗、虾嘎

主演：杨伍、岩金

舞剧《孔雀》的故事围绕生命和爱这两个永恒的主题展开，用舞台形式演绎人类共同的情怀，向观众传递着艺术家个人成长过程中对艺术和生命的思考和感悟。剧中的“孔雀”，是鸟，也是人，是有情世界的芸芸众生。

舞剧《孔雀》汇集了杨丽萍四十年舞蹈艺术的精萃和一代舞神传奇艺术生涯的提炼汇结，是一代舞神穷尽半生功力，对生命的终极叩问。杨丽萍表示：“《孔雀》是会让人感觉奇妙的舞剧，它讲述了一个关于自然、生命、成长、人性和爱的故事，以及生命与天地自然的相互融通。它在我身体里涌动、流淌，有感而发地表现出来。”

杨丽萍表示，《孔雀》之后，自己将告别舞台，退居幕后创作，把舞台留给年轻人，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因此媒体都称这次《孔雀》是杨丽萍的“谢幕巡演”“收官之作”。

（二）影视作品

电影《太阳鸟》

独舞《雀之灵》

艺术片《诺曼底王朝》

电视剧《射雕英雄传》

（三）摄影作品

“心动——肖全镜头下的杨丽萍”摄影作品于2010年12月25日在北京798艺术区布鲁姆画廊开展。人物，特别是女性人物，是肖全镜头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肖全镜头下的著名女性之一，舞蹈家杨丽萍是肖全成为自由摄影师后第一个拍摄对象。她对于舞蹈的执着以及与自然的亲近、对美的敏感都深深打动了肖全，肖全的镜头也向世人展示了最为真实的杨丽萍。

肖全从1992年开始至今先后多次拍摄杨丽萍，他对杨丽萍的拍摄，已

不仅仅是摄影师与拍摄对象的关系，而是作为“观者”与“舞者”在精神深层的心灵交流与互动。肖全说，杨丽萍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一个“仙人”，她身上有一种“仙气”，任何人都可以和她很近，但你会又有一种遥不可及的距离感，我想这应该是灵魂的距离。也正是这样的“顿悟”，让他在心灵碰撞后产生的艺术作品，注入一股清新的“精神暖流”。这股暖流在精神信仰缺失，而导致普遍浮躁、迷惘的今天，是极为可贵的。这组名为“心动”的展览，就是肖全从为杨丽萍拍摄的众多摄影中挑选出的精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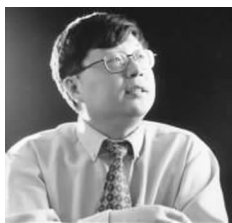
伟大的摄影作品最动人之处，在于能够瞬间凝固住对象精神深处复杂的部分——这个对象不管是人物还是自然，对于这种瞬间即永恒的捕捉，也是其他艺术形式难以企及的。肖全正是一位能够在瞬间把握住拍摄对象精神深处的摄影艺术家。他认为杨丽萍的舞蹈具有唯一性，在他的眼中，杨丽萍的舞蹈就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用来传达人与自然之间的情感。他说：“杨丽萍是在用舞蹈寻找快乐，而我是在用镜头寻找快乐。”

杨丽萍的穿着风格一向偏民族风，这段时期，其穿着更是成为大家口耳相传的话题之一，网上也有部分负面消息传出。虽然说个人喜好无容置喙，但公众人物走在时尚的尖端，穿着风格某种程度上代表其品位、审美的高低。这一事件的发生，杨丽萍并未做出任何解释，但一组清纯唯美的写真曝光在网络上后，瞬间打破了一切负面消息。照片上的杨丽萍美得不可方物，犹如幻化人间的真孔雀，让人不能呼吸，也许前世，杨丽萍真的是孔雀精灵，在今世才能将孔雀舞得如此逼真！就连任何一个造型，都觉得是一种美！

竹楼追梦人·刘晓耕

一、人物概况

刘晓耕，原名刘红军，1955年生，云南禄劝人，国家一级作曲家，教授。云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名誉院长，云南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云南省高校学术学会委员，曾任第十四届 CCTV 青年歌手电视大赛评委、第八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合唱比赛评委、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开幕式》、2001年中国国际旅游节开幕式《走进云南》大型文艺晚会作曲及音乐总监。曾获国家级奖（中宣部、文化部、广电部等）颁发的二十多项，省级奖二十多项。他几乎涉猎过所有的音乐体裁，他让一切可能凝结的意向和造型流动起来，赋予他们音乐的灵魂。



1982年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音乐系。独唱作品《背太阳的哥哥》获1990年全国《民族之声》一等奖，合唱《牵着长江共欢庆》被选为第三届中国艺术节会歌，钢琴独奏《撒尼幻想曲》被选为1997年香港钢琴大赛曲目。童声合唱《山童》《撒尼的春天在哪里》分别获1988、1989年全国广播新歌创作奖。舞蹈《土地》在全国少数民族舞蹈（单双三人舞）比赛获作曲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音乐总监及作曲。担任大型民族舞剧《泼水节》作曲。合唱与打击乐首演于第十八届亚洲作曲家联盟大会开幕会。

二、主要艺术成就

从学生时代到现在，刘晓耕共创作了数十部不同体裁的音乐作品，其中有的发表在国家级刊物，曾获国家级奖（中宣部、文化部、广电部等）和省级奖各二十多项。

(一) 主要获奖作品

《Double Trapeze A'chang Shootthe Sun》《Fantasia in 2000》等器乐曲、舞曲多次在美国、西班牙、日本、新加坡、韩国演出，赢得极高声誉。

交响乐《多沙阿波》，圆号独奏《景颇短曲》，大型民族轻音乐《长刀祭》1985年由云南省政府赠送给英国女王。

歌曲《撒尼的春天在哪里》《山童》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广播新歌》”创作奖；

歌曲《背太阳的哥哥》《阿果情歌》分别获文化部“全国《民族之声》”一等奖和优秀奖；

舞蹈音乐《土地》获文化部“全国少数民族舞比赛”作曲奖；

歌曲《太阳没有哭过》获辽宁省“华鑫杯”银奖；

歌曲《牵着长江共欢庆》当选为文化部“第三届中国艺术节”会歌；

歌曲《牵着长江共欢庆》获文化部“全国第三届群星奖”铜牌；

童声合唱《春米歌》获文化部“第三届国际合唱节”创作奖；

歌曲《我爱祖国的边寨》获中国武警总部“武警文艺奖”三等奖；

歌曲《阿卡拉》获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全国优秀电视音乐节目”金奖；

民族器乐曲《竹楼梦幻》获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全国优秀电视音乐节目”银奖；

大型文艺晚会《共有的家园》获'99世博会闭幕式音乐统筹荣誉证书；

舞蹈音乐《水中月》获文化部“全国第十届孔雀杯”一等奖及2002年“荷花杯”作曲铜奖；

舞剧《泼水节》获“第六届中国艺术节”优秀剧目奖；

电视剧《一个生命的倒计时》获中宣部“全国电视金鹰奖”一等奖及“五个一工程奖”电视综合奖；

歌曲《牵挂》《走进美丽，走进神奇》获国家民委、中国广电总局、文化部“新歌创作奖”；

舞蹈音乐《水中月》《网调——追月》获文化部音乐创作铜奖和音乐奖；

歌曲《爱做梦的高原》获中国广电总局“十大金曲奖”金奖；

钢琴独奏曲《撒尼幻想曲》被选为1997年香港钢琴比赛曲目；

舞蹈音乐《土地》获得文化部颁发的全国少数民族舞蹈比赛作曲奖；

合唱组曲及合唱作品《高原的二十五颗星》《竹楼梦幻》《秋千》等连

续三次被特邀参加中国国际合唱节；

混声合唱《竹楼·月亮》获云南文艺奖基金会“首届云南学艺术创作奖”一等奖；

器乐曲《竹楼梦幻曲》获云南省文化厅“首届云南民族艺术节歌唱美丽的云南”创作奖；

歌曲《流不尽的瑞丽江》《玛露情歌》《大写的人》分别获“六城市舞会创作歌曲”一、二、三等奖；《昨夜我等着你》《苦刺花开漫石岩》获“六城市舞会创作歌曲”创作奖；

歌曲《放羊山歌》省教委“云南少儿音乐创作”二等奖；

混声合唱《水之恋》获省文艺基金会“第二届省文学艺术创作奖”一等奖；

歌曲《在一起不分离》获云南省文化厅1996年云南省“文化长廊之歌”二等奖；

舞剧《神奇的勐巴娜西》获“第五届滇西民族艺术节”一等奖；

舞蹈诗《神奇的勐巴娜西》获云南省文化厅“98新剧目展演”一等奖；

花灯舞剧《白龙泉》获云南省文化厅“98新剧目展演”二等奖；省委宣传部“第一届省文化精品”优秀作品奖；

舞蹈诗《乌蒙之路》获云南省文化厅2000年新剧目展演一等奖；

器乐作品《幻想曲——2000年》获省文艺基金会“第三届省文学艺术创作奖”二等奖；

歌曲《中国船》获省文艺基金会“第三届省文学艺术创作奖”三等奖；

舞蹈诗《母亲河》获云南省文化厅“2002年新剧目展演”一等奖；

歌曲《与希望同行》获省文化厅、省文联、宣传部、云南电视台“云南省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新作品奖”新作品奖；

歌曲《法治的春天》、民族歌舞剧《抢婚》分别获云南省《法治之春》文艺调演金奖、银奖。

（二）主要出版作品

音乐作品《景颇短曲》《撒尼幻想曲》《背太阳的哥哥》《大观楼长联》《山童》刊登于人民音乐出版社《音乐创作》；

音乐作品《撒尼幻想曲》《跳月调》《跳乐》刊登于云南科技出版社《云南民族钢琴曲集》；

音乐作品《走进美丽，走进神奇》《爱做梦的高原》《背太阳的哥哥》

《阿果情歌》《流不尽的瑞丽江》《玛露情歌》刊登于首届“全国歌手唱云南”电视大赛组委会编出的《云南歌曲100首》；

音乐作品《走进美丽，走进神奇》《爱做梦的高原》刊登于云岭歌声编辑部《唱云南》期刊；

音乐作品《Tattoo》刊登于第十八届亚洲作曲家大会《人声与亚洲乐器》。

（三）出版的VCD及磁带

1995年前，刘晓耕承担了20多盒盒式带、VCD的作曲、配曲、指挥、录制工作（由云南音像出版社和中国音像总公司出版）；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集成——彝族音乐》（云南少数民族音乐之一）、《中国少数民族音乐集成——傣族景颇族音乐合辑》（云南少数民族音乐之二），由摇篮唱片有限公司制作发行；

《歌声中的云南》之一《高原云雀》、之二《滇池回响》、之三《蝴蝶泉边》由云南教育出版社、中华文艺音像出版社出版；

《乌蒙之路》（大型舞蹈诗）由云南民族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

《唱云南——云南旅游歌曲》，由云南民族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

（四）电影、电视音乐创作

电影：《金沙水拍》《生的狂欢》《路》《石月亮》等；

电视：《一个生命的倒记时》《百年企盼》《军魂》《寻呼妈妈》《景颇汉子》《野玫瑰与黑郡主》《地火》《西街女》《葫芦情》《太阳部落的女人》《彝州渡》《梁金山传奇》《解泉》《大黑山》《水之祭》《珠源颂》《秋天里的报告》《勐巴娜西》《红嘴鸥的故事》《大理有条洋人街》《走过年轻》《西南联大启示录》《楚玛的歌》等。

泸沽有骄子·曹新华

一、人物简介

每当曹新华那熟悉的旋律响起，父老乡亲以他为骄傲，赞誉他是飞出大山的雄鹰；作曲家因他而振奋，惊叹他的声音饱蕴大山之灵气；音乐家为他作评说，肯定他是当今国内艺术歌坛难得的超级男高音；欣赏者喜爱他演唱风格独到，歌声里感受得到浓郁的民俗民情；诗人则形容他的声音来自彩云之间，是泸沽湖酿成的一杯让人心醉的美酒。他就是大山之子曹新华。



曹新华，普米族，云南省政协委员、云南省歌舞剧院国家一级演员、云南民族乐团现任团长。

1955年10月1日，在新中国庆典的礼炮声中，曹新华诞生于云岭高原的泸沽湖边。睿智的父亲给他取了一个寄寓极深的名字——贡，普米语的“贡”，就是春风吹又生之“草”的意思。绿嫩的草，永远是大山生命的象征。

1971年，年仅15岁的曹新华唱着《东方红》考入了丽江宁蒗县文工队，成为一名专业文艺工作者。舞台为他打开了探索艺术世界的一扇窗口，也让他从此开始了艺术之旅执着而艰辛的跋涉。

学而后知不足。1978年曹新华到昆明师范大学进修以后，第一次随云南代表团到北京演出并获得了好评。1981年，他又考入高等艺术学府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师从著名声乐教授，开始系统全面的专业学习，他用努力与勤奋逐步树立起自己的人生目标——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山之子！

大学毕业，出色的专业成绩把曹新华送入云南省歌舞团，此后曹新华便常年活跃于国内外艺术舞台。他带着大山的深情厚意，唱响了全国城市乡村；唱遍了半个世界诸国；唱红了十几个不同民族的声乐作品。

他演唱的《大山给我好歌喉》《神鹰颂》连连在全国获奖，《怒江人》

继全国获金奖后又在中国国际音乐电视比赛中再获金奖。他多次在“中国艺术节”“北京亚运会”“上海艺术节”“云南艺术节”“云南世博会”等大型活动中引吭高歌。在多个大型歌舞剧《爱的足迹》《阿诗玛》《东方彩霞》《啊，傣傣》《泼水节》《蓝月亮》《母亲河》的演出中担任主唱。在《五朵金花和她的儿女》《比鲁岩堡》《金沙水拍》等多部影视片中演出主题歌。2006年，曹新华获云南文学艺术贡献奖。

曹新华如今能够熟练运用多种民族语言表现不同民族的作品内涵；能够利用丰富经验积累帮助作曲家挖掘民族作品精华；能够用歌声立足艺术舞台并广获赞誉；能够游历各国胜任艺术使者重任。人们从各种晚会和大型文化活动中熟悉了他；从各种媒体和广播电视节目中认识了他，人们用鲜花和荣誉向他表示爱戴与崇敬；他用自己的专题、专辑和更多的歌曲新作予以回报。

二、大山的歌者——普米族歌唱家曹新华的故事

也许是具有大山的气质和风度，还是像山一样剽悍和纯朴，不管是家乡的父老乡亲，还是他的朋友同行，热爱他的观众，都叫他“曹大山”以表达对他的爱戴、关怀、仰慕、崇敬与惊叹。

家乡人以为他为骄傲，赞誉他是飞翔在小凉山的山鹰；作曲家为他振奋，称他的声音得于大山之灵气，是当今国内民歌坛上难得的超男高音；专家评说他是具有独特个人演唱风格和浓郁民族之情不可多得的人才；诗人说他的声音来自彩云之间，是泸沽湖酿成的一杯让人心醉的美酒。

他自称“大山之子”，好一个大山之子！

他有一副大山给他的好歌喉。笑起来地会抖三抖，唱起来山会和他一起吼三吼，他的歌喉是从小迎着山风喊出来的，放牧牛羊吃喝出来的，他有大山一样剽悍的体魄。

从小吃凉山上的苦荞长成一米八的大个，虎背熊腰、大手大脚。十几岁以前没有穿过一双鞋，靠着一双铁脚板跑遍了家乡大山上的每一块岩石、每一片红土，少年时在修建公路时一口气能打出十几个炮眼。

山赋予他一腔山里人的豪情，生性粗犷奔放、耿直。大声说话，大碗喝酒，对父母，对亲人，对朋友灼热感人，对大山，对故土，对祖国赤子之情清澈见底。

有人说他命注定要成为一个大山的歌者，普米的祖先在娘胎里就给了他一副金子般的嗓子，是天命让他从一个大山的牧羊童成为把三万多普米族

的深情厚意唱响全国，唱遍半个世界的使者。

天命也罢，使者也好，曹新华的歌唱之路充满了神奇的色彩。

“拉垮”——一个看得见老虎的村寨。

“拉垮”很小很小，“拉垮”很远很远。它仅仅是一个有百余户人家的普米村寨，坐落在云南滇东北的群山之中，是云南丽江地区宁蒗县最小的一个行政区域，是从丽江到泸沽湖的必经之路。尽管今天泸沽湖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每天有无数张大小车辆经过拉垮村翻过丫口就到了泸沽湖，但却很少有人把目光投向静静地伫立在山脚下的“拉垮”。因为她太普通了，这样的村寨在云岭高原上比比皆是。但据说在宁蒗县的普米族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普米人知道北京的人不多，但却都知道‘拉垮’。”因为“拉垮”飞出了一只山鹰，一个唱着歌把普米人带到全国带到太平洋彼岸的普米族自己的歌手——曹新华。

普米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传统的古老民族，相传是从北方迁徙到彩云之南的某个民族的一支大系。每每以天子自居，普米族见面都爱问：“你布祖阿丁？”译成汉话就是：“你是天子吗？”由此可见一般。

普米族人的村寨都有一个十分贴切、有趣的名字。地名其实也是一部活生生的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字典，从中窥视出民族的历史渊源。“拉垮”之意就是看得见老虎的村寨。听到这个地名你就对这个村寨的位置、地形有了一个百分之七八十的了解了。

曹新华就生长在这样一个神奇美丽的大山上，与虎相伴的山村里，一个真真切切地地道道的大山之子。

也许是他的父亲钟爱那山寨后漫山遍野的大草坪，所以当这位普米族的哲人“汉归教”的“汉归”老人在为自己的小儿子诞生的做祭祀时毫不犹豫地给了他一个与山与地为伍的名字——“贡”，“贡”者草也，希望儿子像自己一样，永远扎根大山，像草一样，永远郁郁葱葱，绿了家园，绿了村寨，绿了群山。

童年的曹新华就像绿草一样顶着滇西北的寒风冷雪坚韧地长大了。在人们的记忆中他是从小没穿过一天鞋的放羊娃，清晨，只要听见几声脆亮的吆喝声就知道这娃娃又上山放羊了。

不是因为重男轻女，实在是太穷了，贡的两个姐姐两个妹妹没有读过一天书，贡读书了，在上小学的第一天报名时，碰见了一位极有智慧的老师，他对贡说：你命好，十月一日和国庆节一天生日，就取个读书的大名叫曹新华。从此贡就有了一个很响亮很有意义的汉族名字。读完了三年的初小必须

到离家七八里地的乡完小去读高小。每天天刚亮鸡叫头声，母亲就忙着烧几个洋芋当早饭，再烤几个荞麦粑粑就着山中的泉水就是午饭。走山路怕裤子弄脏就挽起裤脚，到了学校再放下来。苦啊！但对他的姐妹来说他是很幸运的了，在拉垮村能到乡上读完小的也好歹是个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了，贡很满足了，每天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父亲不惜一切想把自己当“汉归”的一切本事、当记分员的所有知识都传给他，希望儿子能接自己的班，父亲向他敞开了知识的宝库，及时启迪他音乐的天赋，因为普米族没有文字，一切历史、传说、文化、知识都在父亲的歌声中。令父亲没有想到的是儿子对唱歌有着天生的敏感，多难的古歌一教就会，更有一副嘹亮好听的歌喉。不仅学会了祭祀时的古歌、开天辟地歌、过年歌，连母亲唱的儿歌、摇篮曲、劳动歌、山歌也倒背如流，甚至连大人唱的情歌也唱得婉转悦耳。他的歌声成了父亲的骄傲，母亲的微笑。火塘边一唱一合成了全家幸福的乐趣。

和所有山区的孩子一样，小学毕业后曹新华再也无法到县里唯一的一所中学去读书了。十二岁的小曹当上了农民，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修地球、修水库、修公路俨如一个真正的男子汉面对生活、面对未来。

一个人的命运永远在社会的潮汐中沉浮。“文革”这一段让人永远难以忘却的历史为各民族的文化艺术蒙上了阴影，一切民族传统的宗教、音乐舞蹈都被视为“四旧”打入冷宫，父亲只有偷偷地但仍是坚持不懈地教导儿子，在那“什么都属于公社，只有歌声才属于自己”的特殊日子里，只有靠歌声来消除一天的疲劳和苦闷，靠音乐去忘记曾经有过的理想和希望。

小小的曹新华当时对这些并不太理解，天生爱唱的他不论在山上在田间在工地还是由着性子放声大唱，山歌不能唱就唱“老三篇”，情歌不准唱就唱“不忘阶级苦”，即使在几百人的民兵队伍中他的声音也盖过众人。飘在心上最多的时候他会约上几个小伙伴爬上山顶，对着茫茫云海敞开歌喉尽情吼上几声：“玛达咪……啊咧咧！”歌声长上了翅膀在群山之中飞翔、飞翔！

小小曹新华就这样艰辛地在歌声中长大了，他的童年少年时代成为他人一生中永恒的记忆，取之不竭的艺术源泉。

第四编

民族骄子——民族文化人才传承者

民俗燃灯者·白庚胜

白庚胜，男，纳西族，文学博士，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1957年2月14日生于云南丽江的一个农民家庭。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理事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分党组书记，国际纳西学学会会长，国际萨满学会副主席。



从1980年起，从事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先后11次在我国云南丽江、香格里拉、宁蒗及四川、江苏、浙江，日本山形、和歌山、牛久、金泽、冲绳等地从事民间文学及民俗学田野调查。从1981年起，先后发表有关论文、译文、一般文章240篇，先后11次在全国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的评奖中获奖，先后有20余篇文章被国内外有关刊物转载。从1993年起，先后在中国内地及中国台湾、日本出版专著、译著、编著《色彩与纳西民俗》《东巴神话研究》《云贵高原文化》《外国文学三百题》等24部。从1988年起，先后参加国际东方学者会议、国际彝语学术研讨会、国际东亚民俗学学术会议，国际萨满学会第6次学术会议等。主持国际侗族稻作文化及祭祀学术研讨会及国际萨满文化研讨会、国际东巴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参加主持中日合作项目“江南民俗调查研究”“汉族及其周边民族的民俗文化——纳西族、彝族民俗调查研究”及中国瑞典联合项目“中瑞萨满文化考察研究”。

1998年，被中国文联授予“全国优秀青年文艺家”称号；1999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称号；2000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自1980年起，白庚胜一直从事少数民族文学、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研究，已发表《〈黑白战争〉象征意义辨》《揭开玉龙第三国的秘密》《江南稻作起源传承研究》《东巴神话象征论》《外国文学三百题》《云贵高原文化》等著作、译著18部，主编“灿烂西部”丛书10部及《金沙万里走波澜》《玉振金声探东巴》等10余种。

云南也有梦·纳麒

一、人物概况

纳麒，男，回族，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1952年2月生于云南开远。现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兼任云南省哲学学会副会长、云南省高校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云南省东南亚南亚研究院院长、云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云南社会科学》主编、《华夏地理》杂志社社长、兼任云南省民族学会名誉会长、云南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回族学会副会长、云南省回族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纳麒曾当过知青、建筑工人、企业宣传干部等。1980年1月毕业于云南大学政治系并留校任教。1987年12月调任云南大学马列部副主任，1992年1月调任云南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8月任校长助理兼校办主任，1996年12月任云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后历任云南省高校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2001年10月任现职。1997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师从著名科学社会主义专家李会滨教授攻读博士学位，2000年6月获法学博士学位。

二、出版专著

纳麒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理论和政策的教学与研究。曾为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开设哲学、民族理论与政策等课程10余门。主要著述有《哲学的时代性与非时代性》《马克思主义著作与学说史》《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论》《UIS：塑造大学之魂》《传统与现代的整合——云南回族历史·文化·发展论纲》等九部；《建党执政兴国的伟大纲领——从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深刻领会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的指导意义》《肩挑“两个世界”：云南回族伊斯兰文化特征透视》

等五十余篇论文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其总编的2002—2003年“云南蓝皮书系列”6本丛书即《云南民族地区发展报告》《云南经济发展报告》《云南文化发展蓝皮书》《云南宗教情势报告》《东南亚报告》《南亚报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

三、所获荣誉

1986年获“云南省社会科学研究现实问题理论文章”四等奖；1987年获“云南大学教书育人理论文章”一等奖、“省教委优秀论文奖”；1987年、1991年两次获“云南大学教学优秀成果奖”；1992年获“省教委高教研究优秀论文”一等奖；1994年获“省政府1990—1992年社科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其所创的“双T教学法”受到全省高校教师的关注。先后入选《中国少数民族名人辞典》《中国青年社科教授概览》等书。

对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发展与建设，提出了“抓改革、促开放、建支柱、保重心、造名家、推精品、稳人心、创辉煌”的二十四字方针作为社科院建设与发展的指导思想。同时提出了社科院建设与发展的双重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力争经过若干年的努力，逐步把云南省社科院建设成为“四个基地”即云南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研究基地和宣传阵地；云南省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决策咨询的重要基地；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的重要基地；云南省加强人文社会科学同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基地；第二个目标是要推进社科院职工的全面发展，以推进全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前进与发展。

科技界的精英·彭金辉

一、人物概况

彭金辉，男，1964年12月出生，彝族，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云南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2013年当选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1992年毕业于昆明理工大学，获博士学位，1994年9月—1996年9月获德国巴登符滕堡州和卡尔斯鲁厄研究中心博士后奖学金，在德国从事博士后研究，1999年6月—2000年6月获英国皇家学会博士后奖学金，在英国从事博士后研究。1988年—2003年，在昆明理工大学历任副教授、教授、冶金系副系主任、副书记、材料与冶金工程学院院长、校长助理，2004年1月—2013年8月任昆明理工大学副校长，2013年8月起任云南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2014年，获得全国第五届“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荣誉称号，受到刘云山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2014年10月，获得“云南省科技领军人才”称号，2015年，进入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名单。



担任第六届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科技部“十二五”863计划资源环境技术领域主题专家；国家教育部2013—2017材料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金属材料工程与冶金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料学部专家评审组成员；国家博士后流动站专家评审组成员。入选国家级新世纪百千万人才、云南省首批科技领军人才、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和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担任《Transactions of Nonferrous Metals Society of China》等杂志编委，同时任澳大利亚莫道克大学兼职教授。

先后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973课题、欧盟项目、科技部国际合作、企业委托等70余个项目。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1项，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云南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项，云南省教学成

果特等奖和一等奖。荣获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提名奖，“十一五”国家科技计划执行突出贡献奖，全国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霍英东青年教师奖，云南省五四青年奖章，入选“十一五”云南十大科技人物，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发表论文 438 篇，被 SCI、EI 收录 164 篇，出版专著 5 部，授权专利 62 项；指导博士后、博士生和硕士生 50 余名。

民族学的领军人·和少英

和少英，男，纳西族，中共党员，云南丽江人，法学硕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学理论与方法、民族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曾任云南民族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现任云南民族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云南民族研究所所长、云南省民族文化研究院院长、《云南民族大学学报》主编等职。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兼任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云南大学等校客座教授，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专家，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CAES）第16届世界大会国家组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暨云南省民族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西南民族学学会副会长，纳西学研究会会长。



1986年7月毕业于中央党校理论部科社专业并获法学硕士学位；1988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美国约翰·霍普金斯（The Johns Hopkins）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获两校校长共同颁授的文凭。之后，曾多次负笈欧美，先后担任英国伦敦大学政经学院，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福尔曼大学、康涅狄格大学以及挪威卑尔根大学等名校的高访学者或客座教授，并赴俄罗斯、意大利、日本、韩国等20余个国家以及我国台湾、香港等地从事学术交流活动，多次担任国际学术会议的主持人或主旨发言人。

领衔成功申报了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实现了学校办学层次的新突破和新跨越，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多项科研成果曾获国家级、省部级奖励。被评为“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并荣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称号。

公开出版《生存在全球化时代》（英文版）、《云南研究》（英文版）、《社会文化人类学初探》《人类学一百年》《逝者的庆典》《纳西族文化史》（入选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重新把握人类学》

《云南：联结印度与扬子江的链环》《拉祜族文化史》《守望国境线上的家园》《云南特有族群社会文化调查》《云南跨境民族文化初探》以及《人类学/民族学简明教程》等著、译10余部。在国外期刊以及《民族研究》《人民日报》等国内高级别刊物上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近百篇。主持完成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大自然协会、日本文部省等资助的国际合作项目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十余项。担任“社会文化人类学丛书”“云南民族文化史丛书”及《第34届国际汉藏语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等丛书和论著的主编。同韩国国家电视台（KBS）及大真大学等机构合作，策划并摄制完成民族学/人类学影视资料片10余部。领衔申报的2012年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项目“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获准立项，经费高达1200万元，这也是云南民族大学建校以来首次申请到的经费最多的项目。目前主持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文化多样性与构建和谐世界研究——以大湄公河次区域为例》研究。

担任《云南民族文化史丛书》（共25本）及《第34届国际汉藏语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社会文化人类学丛书》《云南民族文化丛书》等丛书、论著的主编或副主编；参与组织了《云南民族文化知识丛书》（28本）等大型丛书的编撰工作；同韩国国家电视台（KBS）及大真大学等机构合作，策划并摄制完成民族学/人类学影视资料片10余部，其中《沉默的家园》《吉祥格布》以及《永恒之路》等多部影片已在日本、韩国等国家播映，并参加国际电影节受到好评。

自2001年至今被聘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暨云南省民族研究院（设于云南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云南大学民族学专业博士生导师；领衔成功申报了我校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实现了学校办学层次的新突破和新跨越，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多项科研成果曾获国家级、省部级奖励。其中，在《民族研究》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天主教与滇南苗族传统文化习俗的嬗变》获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一等奖；参撰的《中华文化通志》获全国优秀图书最高奖项——荣誉奖；领衔完成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探索与实践”获云南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具有学术魅力的大学校长·张桥贵

一、人物简介

张桥贵，男，白族，哲学博士，二级教授，1963年12月生于云南剑川。现任大理学院院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云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云南省中青年学术与技术带头人，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哲学社会科学专家，省委组织部代中共云南省委管理联系的专家，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基地《云南跨境民族宗教社会问题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和负责人，云南省省院省校合作项目——社会学负责人。



1987年7月张桥贵于云南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毕业留校从事少数民族宗教的调研工作，曾长期在独龙江、怒江、金沙江和南盘江等流域做民族宗教的田野考察，先后任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科研处处长、院长助理等职。期间，1991年9月—1996年7月在四川大学攻读宗教学硕士学位（导师陈麟书教授）、博士学位（导师卿希泰教授），1997年3月至1999年3月到元谋县挂职锻炼任副县长。2002年1月始任云南民族大学副校长。现任大理大学校长。

二、工作经历

1987年8月—1991年8月，在独龙江、怒江、金沙江、南盘江流域长期从事民族宗教的田野调查。1991年考入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师从著名的宗教学专家陈麟书教授，攻读宗教学专业宗教学理论研究方向的硕士学位。1993年提前攻博，师从国际知名的道教学者卿希泰教授，攻读宗教学专业中国道教研究方向博士学位，1996年6月四川大学宗教学专业毕业获哲学

博士学位。1996年11月任云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副所长，历任元谋县委副书记（挂职）、科研处处长、机关党总支书记、校长助理。2000年破格晋升教授，从2002年1月始任云南民族大学副校长、校党委委员。2004年开始兼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专业宗教社会学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宗教学学科评审组专家，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云南省中青年学术与技术带头人，云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云南省首批十个社科研究基地之一《云南跨境民族宗教社会问题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和负责人，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哲学社会科学专家，省委组织部代中共云南省委管理联系的专家。

三、科研成果

（一）课题类主要成果

（1）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多元宗教和谐相处的经验和对策研究》，项目主持人，2011年立项，在研。

（2）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云南宗教文化与旅游研究》，项目主持人，2008年立项，2010年以“优秀”等级结项。

（3）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抵御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对策研究——云南跨境民族中的宗教渗透与反渗透》，项目主持人，2005年立项，2007年以“优秀”等级结项，并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成果要报》的形式报党和国家领导人，以资决策参考。得到刘延东等首长高度评价、批阅，并亲自调阅了成果原件。

（4）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宗教问题的性质、特点、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项目主持人，2003年立项，2004年结题。

（5）亚洲开发银行招投标项目《大理—丽江铁路区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能力建设研究》（TA4455—PRC），项目主持人，2007年立项，经费15万美元，结题。

（6）国家教育部重大招标项目《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子课题《少数民族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子课题主持人，总负责人方立天教授。

（7）国家教育部青年基金研究项目《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宗教现状调查研究》，项目主持人，2002年立项，已结题。

(8) 国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2005年立项。

(9) 云南省中青年学术与技术带头人研究基金项目《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宗教问题的现状及对策研究》,项目主持人,1999年立项,2002年结题。

(10) 云南省省级重点建设学科社会学学科带头人、课题组组长,2001年立项在建,经费110万。

(11) 云南省省校合作重点建设学科《社会学》,云南民族大学学科带头人、课题组组长(合作方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学科带头人为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郑杭生教授),2003年立项在建,经费50万。

(12) 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项目名称为《我国少数民族基督教研究》。

(二) 在中国社科院所办学术刊物和《光明日报》理论版等上发表的论文类主要成果

(1) 《民族之间通婚影响多宗教和谐共处的研究》(第一作者),载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6期。

(2) 《云南多宗教和谐相处的主要原因》,载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2期。

(3) 《宗教旅游的类型、特点和开发》(第一作者),载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2008年第4期。

(4) 《道教传播与少数民族贵族对汉文化的认同》,载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2期。

(5) 《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的现代价值》,载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3期。

(6) 《道官初探》(第一作者),载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4期。

(7) 《中国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伦理道德简论》,载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4期。

(8) 《宗教的社会性及其现实意义》,载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宗教文化》2004年第2期。

(9) 《宗教衰落与祭祀危害》,载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宗教文化》2003年第1期。

(10) 《浅谈宗教工作与反宗教渗透》,载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世界宗教文化》2007年第4期。

(11)《生态·人际与伦理——原始宗教的主题与发展》，载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

(12)《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与人口、婚姻家庭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2006年7月日本东京国际学术会议大会发言交流论文。

(13)《中国古代道官制度初探》(第一作者)，载2005年7月5日《光明日报》理论与学术版。

(三) 著作类主要成果

(1)《云南跨境民族宗教社会问题研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2)《道教与中国少数民族关系研究》(独撰)，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3)《独龙族文化史》(独撰)，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出版。

(4)《宗教人类学——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考察研究》，张桥贵、陈麟书，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5)《民族社会学概论》(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6)《宗教社会学通论》(参著)，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7)《中国原始宗教资料丛编·傣傣族卷》(参著)，中国社科出版社2000年出版。

(8)《中国道教史》四卷本(一、三、四卷部分参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四、获奖情况

(1)2009年《云南跨境民族宗教渗透与反渗透》获云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专著类一等奖。

(2)2006年《道官初探》获云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3)2005年《道教传播与少数民族贵族对汉文化的认同》获国家民委优秀社科二等奖。

(4)2004年《中国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的现代价值》获云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5)2002年被表彰为云南省首届“十大杰出学术科技标兵”。

(6)2006年被表彰为“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哲学社会科学专家”。

云南藏区的经济专家·王德强

一、人物概况

王德强（藏族名绒巴扎西），男，藏族，云南香格里拉县人，法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1985年7月参加工作，198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云南民族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副会长，云南省藏学研究会副会长。1985年7月于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到云南民族学院工作，先后任民族研究所副所长、民族语言文学系党总支书记等职，期间，1987年9月—1990年7月在中央民院经济研究所读硕士，1996年1月—4月，在泰国清迈大学作访问学者，1997年3月—1999年6月在中共德钦县委挂职锻炼，任县委常委、县委副书记。2002年1月任云南民族大学副校长，2002年5月任校党委委员。2014年，入选为“2014年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并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



二、部分著作

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云南藏区跨越式发展研究》等8项国家和省部级课题，其中4项重点项目；主持完成8项横向课题；出版专著《香格里拉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云南藏区可持续发展研究》；在《民族研究》《中国藏学》等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其中3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论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民族关系和谐的实证研究》获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4）；论文《云南藏区维护社会稳定经验述要》获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11）；调研报告《云南藏区民族关系现状调查》获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2013）。

2010年1月受邀参加美国经济学会少数民族经济专题，并赴明尼苏达

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访问讲学；2010年9月，2011年12月两次到新西兰林肯大学访问讲学。目前主持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云南藏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族际交往的实证研究》；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重点课题《青藏高原山水文化·云南卷》等研究工作。

云南本土文化的坚守者·王四代

一、人物概况

王四代，男，彝族，云南勐腊县人，文学学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1982年参加工作。现任云南民族大学副校长、民革中央委员、民革云南省委副主委、云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云南省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西南民族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歌研究会副会长。1998年至今当选为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二、主要著作及荣誉

出版专著《诗性的智慧——云南民族文学》《古道边的歌谣——阿昌族女性》两部，主编《云南民族文化概要》，参编撰《中国风俗辞典》《中国风俗大观》《云南少数民族生活志》等著作10余部，在《世界宗教研究》《民间文学论坛》等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主持完成大型国际合作项目“云南民族艺术教育研究”；担任云南省大型项目《云南民族文化知识丛书》（28本）项目主持人和副主编、主要撰稿人；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级奖2项，省级奖6项；发表散文200余篇，参与完成佤族题材的电影剧本《司岗里的女人》《部落的木鼓》的创作；参与调研并撰写重要调研报告两个。2006年被云南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文联授予“四个一批”人才奖——“云南文学艺术贡献奖”。此外，从1989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以来，积极建言献策，参政议政，曾多次接受中央电视台、云南电视台、香港卫视（中文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多家电视台以及《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文汇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等多家媒体专访。2008年，被授予第一届（亚太地区）民间艺术家最高奖——“金飞鹰奖”终身成就荣誉称号。

三、始终坚守着云南的民族文化

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1955年出生于云南西双版纳易武，做过公路局测量工人，1978年恢复高考后，以优异的成绩，全县首个考入云南民族大学，2006年担任云南民族大学副校长。踏入民族大学至今，晃眼已30年，他说：“我守望了民族大学30年，也为民族艺术坚守了30年。”

（一）忧公路碾碎山河

作为5位彝族全国政协委员之一，王四代浓厚的“民族情结”与养育他的热带雨林密切相关。西双版纳丰饶的物产、纯朴的民族风情，让童年时的王四代，在三年自然灾害中远离饥饿；神奇的热带动植物，丰富的民族习俗，成了他日后文学创作的重要来源。猎野味、捉河鱼的他，是唱着民族歌曲，跳着民族舞蹈，喝着自家酿制的米酒长大的。“而如今的热带雨林，销声匿迹的野生动植物，受污染的山川河流，及逐渐被吞噬的民族村寨，让我有种山河被公路碾碎的感觉。”王四代说，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有一件事让王四代记忆犹新：一位日本学者访问云南民族大学时问他中国人是怎么过生日的？这个看似不起眼的问题，犹如当头棒喝，强烈地震撼了他的心。“中国孩子过生日，唱的是西方的生日歌，吃的是西式的蛋糕，却没有自己独特的生日习俗。”王四代痛心地说。

1994年，王四代赴美国考察时惊奇发现，西方的艺术教育虽然早已自成体系，却融入了大量的外来艺术元素，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而中国的艺术教育过于西化，无论是艺术创作、艺术史还是艺术理论的教育，都基本追随西方的体系，毫无自身特点，他做了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中国的艺术花园里盛开着西式的鲜花。”

（二）推行艺术本土化

本着多年来对教育的潜心研究，王四代认为，要想拯救当今的中国民族艺术，必须通过“教育代代相传”，也就是推行“本土化教育”。

早在5年半前，王四代便着手推进建构《云南本土民族艺术教育》，他开设民族艺术讲座，并先后邀请文化艺术方面的权威专家、本土民间文化艺术家进行文化艺术讲座。他还由此产生了创建民族艺术“基因库”的构想，打算用5年的时间，走遍云南的村村寨寨，发掘尚存的民族艺术元素，建立一个收揽各少数民族独特人文风情的资料库。

2001年8月，王四代带领民族大学1999级舞蹈专业的学生，首战大理、建水，寻找到大量白族舞蹈及当地民间音乐素材。之后的5年，他率领一批又一批的大学生，通过文字记录、摄影、摄像、录音、搜集当地文献等方法进行田野调查，涉足云南20余个州、市、县，整理收集包括大理南涧打歌，烟盒舞在内的白、彝、傣、景颇、纳西、哈尼等数十个民族民间舞蹈、音乐，民族工艺……民族艺术“基因库”的设想初步实现。

此后，王四代迅速与云南省民族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昆明市博物馆、大理市博物馆等联系，实现了资料的交流共享，为云南本土化艺术教材编写提供资料保障。

滇旅、滇民引领者·花泽飞

一、人物简介

- 1953年10月生于上海；
- 1970年，从上海赴云南西双版纳当知青；
- 1978年，毕业于云南大学，曾任学生会主席；
- 1981年，任云南大学团委书记；
- 1983年，出任共青团云南省委学校部部长、省学联秘书长、团省委常委、省青联副主席；
- 1990年，在深圳锦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艺术中心任总经理；
- 1992年，创建云南民族村，经营效益以每年40%递增。1996年任昆明市旅游局局长，带领全市旅游行业创建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并获得成功。1997年策划并组织了春城旅游节，被省政府充分肯定。
- 1992年，创办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任管委会副主任兼云南民族村总经理；
- 1994年，被评为昆明市首届优秀青年企业家；
- 1996年，云南大学旅游学院研究生毕业；
- 1996年，被评为云南省杰出青年企业家；
- 1996年至2000年，担任昆明市旅游局局长任期内昆明市创建为中国首批优秀旅游城市；
- 2000年至2002年，被选拔为云南世博集团副总经理兼昆明世博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同时任昆明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 2002年，任云南世博集团总经理；云南省旅游行业协会副会长兼旅游景区分会会长；
- 2005年，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卓越企业竞争力提升总裁研修班结业；
- 2007年，任云南大学工商管理旅游管理博士生导师；云南财经大学客座教授。



二、弘扬滇商精神

“莫道今年春将尽，明年春色倍还人。”

2013年初，花泽飞从省文化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被聘为省政府参事。按照省长对省政府参事提出的要求：“讲真话、察实情，加强对当前发展中重点问题、前瞻性问题、重大决策落实情况的研究”，他将目光聚焦到了民营经济上。当选为云南民营企业家协会执行会长后，他倾情投入省民营企业家协会，搭建政企桥梁，创建民企之家，努力将其建成云南最强的协会。

（一）经历决定眼界

作为知青，花泽飞从上海来到云南艰苦创业，他先后担任过深圳锦绣中华云南民族饮食文化艺术中心总经理，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副主任兼云南民族村总经理、党委书记，云南世博集团总经理兼昆明世博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在担任云南民族村总经理、党委书记期间，云南民族村在短短几年内变为了旅游胜地，由于在云南民族村的成功运作，花泽飞于1996年被评为“云南省杰出青年企业家”；调任云南世博集团副总经理兼昆明世博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后，他策划提出了“'99世博会，永久世博园”的理念和“静态与动态相结合，观赏与参与相结合，好看与好玩相结合”的发展思路，世博园逐渐走上发展快车道，场馆得到了充分利用，游客纷沓而至。2002年，花泽飞担任云南世博集团总经理后，公司利润每年按两位数递增，被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评为“2005年、2007年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企业”。2006年8月，“世博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A股股票成功上市；同年9月底，世博集团出资2.55亿元，作为控股股东与省国资委、省国资经营公司共同组建云南旅游产业集团，后来整合为云南世博旅游投资集团。2008年世博集团利润达10680万元，资产翻了一番，达50亿元人民币，创造了新的经营奇迹。由此，花泽飞被评为云南省第十一届优秀企业家。

2008年11月，中央领导在视察昆明世博园后，感慨地说：“世博集团在大型国际活动后场馆的后续利用和发展上，探索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把办展会的资源转变为企业化经营。”

（二）弘扬滇商精神

在协会换届时，花泽飞得到了协会内外的充分肯定，出任云南省民营企

业家协会执行会长。

花泽飞将协会的主要工作定位为“弘扬滇商精神，抢抓桥头堡建设战略机遇”“着力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和“帮助民营企业家培训提升”等工作上。

“云南民营经济仅占GDP的44%，全国平均水平是60%，与江苏、浙江的90%以上，有很大的差距，可喜的是2012年我省民营企业的注册资金已经超过了我省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注册资金的总和。”在花泽飞看来，云南民营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我们要竖起云南企业家的一面旗帜，要营造和培养属于云南企业家自己所特有的滇商精神。”在花泽飞看来，探寻历史，滇商靠智慧和勇气走出了一条茶马古道；回望现实，可以看到云南的民营企业，从数量到质量都有了一种可喜的变化，云南的企业家们肩负了“滇商精神”所赋予的内涵和使命，面临着更大的发展机遇。尤其是云南建设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发展机遇为滇商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云南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进程，铸就了‘滇商’坚韧、包容、诚信、睿智精神，孕育了云南人‘敢为天下先’的卓越品格。‘滇商’的这种精神和品格，具有历史的传承性，它是无数‘滇商’前赴后继、孜孜以求而积累的精神财富。这种精神和品格是中华民族卓越品格和云南的高原情怀、大山品质的具体诠释，正是我们今天实现中国梦所需要的。”

花泽飞表示，省民营企业家协会将围绕桥头堡战略机遇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定》，乘势而上，除了从各个方面给会员提供服务外，将花大力气帮助云南的民营企业打造国际品牌，借桥头堡战略的实施，鼓励协会的会员单位走出国门，到东南亚市场上打拼，做出一番成就来。

据花泽飞介绍，省民营企业家协会最近将与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富滇银行、华夏银行、招商银行等6家银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帮助协会会员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

“协会的功能是提供服务，会员单位是协会工作开展的基础和支撑，我们有信心为民营企业做好融资服务。”在花泽飞眼里，省民营企业家协会不仅有信心为民营企业做好融资服务，而且有信心把省民营企业家协会办成团结广大民营企业家，帮助民营企业做强做大，成为政府联系民企的桥梁和纽带，积极推动民营经济大发展、大提升，为建设开放、富裕、文明、幸福新云南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明代刘伯温曾预言，“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来自江南的花泽飞对云南省民营经济的发展充满信心。

小语种撒播者·杨光远

一、基本情况

杨光远，男，傣族，生于1952年1月。1999年—2002年任云南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主任、民族文化学院院长；2003年至2011年任云南民族大学东南亚南亚语言文化学院院长；2000年9月在南开大学文学院攻读博士学位，2003年7月获得南开大学文学博士学位，2002年评为教授，2003年选为云南省第九届政协委员，2004年受聘为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2007年至2012年受聘为教育部高校外语指导委员会非通用语种（小语种）分委员会委员、云南省社科院东南亚南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高校第六届学术委员会委员，于2008年荣获云南省政府特殊津贴，2010年被评为省级教学名师、国家二级教授，2011年被选为中国泰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2011年8月受聘为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2013年7月在泰国清迈接受了泰国王子授予的泰语荣誉博士学位。目前是云南民族大学正处级调研员。



杨光远教授的故乡在德宏州陇川县章凤镇，那是一个边远而不封闭的社区，距缅甸洋人街仅四五公里路。离镇中心地段那四棵大青树二三百米的地方有一个叫老寨子的傣族村庄，村里有一个戏台、四口井。边寨是端庄和平的，按理，杨光远可以无忧无虑地在那里长大，但是，他三岁就没有了父亲，哥姐弟三人全由母亲一人抚养。每当提起母亲，杨教授总是带着敬意和深情，“我母亲真不容易，一辈子摆小摊，经常头鸡叫就动身，挑着担子到28公里远的城里……”在这样的家境条件下，母亲仍然要子女们坚持上学。杨光远从小学到中学，书包里经常装着绳子和柴刀，每天放学后都要扛一捆柴回家。回到家，他要么挑水，要么喂猪，总是赶着把家务做完，争取时间看书、做作业，或者到戏台下听傣戏。傣戏除了本民族的传统节目，还有很多汉剧经典译作，对他的未来发展影响很大。

在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期间，他如饥似渴地读书，几乎把所有的名著都读了。他时时感到母亲的目光在催促他奋发。毕业前他到五华山找景颇族老乡玩，偶遇云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傣语编辑，觉得他声音好文化高，便叫他试音，但他不懂傣文，电台的老师就把汉文稿交给他口译，这个工作逼着他自学了傣文。别人要实习一两年才能上岗，他3个月便成了正式播音员，第一次播音600多字一字不差。他用心向故乡大地，向国内外傣族同胞报道新闻，传递文明，感觉很充实，曾打算一辈子做新闻工作者。不料，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考试，他动了心。历史就是这样把个体卷进去的。但是，他外语没考好。怪谁呢？那段“不会ABC照样干革命”的历史已成过去，必须迎接新的开始。他继续一边工作一边复习，第二年终于如愿以偿，成了云南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的第一个研究生。

二、学科专业建设取得很大发展，人才培养工作成绩显著

2003年8月杨光远担任云南民族大学东南亚南亚语言文化学院院长以来，在学校的支持和全院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院的学科专业建设取得了很大发展，办学规模不断扩大，教学质量有了很大提高，学院由原有的泰、缅、越三个专业发展到老挝、柬埔寨、马来、印尼、印地等8个本科专业，本科毕业生千余人。硕士学位点由原来的“亚非语言文学”提升为“外国语言文学”一级硕士点，增设了“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和“翻译”专业硕士点。为国家和我省的“桥头堡”发展战略提供了智力支撑。

由杨光远组织学院泰语专业教师翻译的《泰国经济贸易法律选编》，作为《东南亚经济贸易法律研究丛书》的子课题，全套丛书荣获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特等奖；他的学术专著《十三世纪傣泰语言的语音系统研究》荣获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07年，他主持申报的“非通用语种群（泰、缅、越、老、柬五个本科专业）”成为国家特色专业，2010年，他主持申报的“基础泰语”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这是我国非通用语种唯一的精品课程

2009年“搞好特色专业建设，为国家和我省的发展战略服务”获得云南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2010年评为云南省级教学名师。

三、一棵挂满果实的树

2008年，杨光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西南边疆项目“印度阿萨姆阿洪傣族编年史——《阿洪姆兰基》翻译与注释”，已结题。主持与北京大学合作

项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的云南省的东南亚语言文化人才问题研究及对策”省院省校合作项目，已结题。主持云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傣语中的汉语新词术语研究”，已结题。组织翻译的《泰国经济贸易法律选编》荣获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出版的学术专著《十三世纪傣泰语言的语音系统研究》荣获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发表学术论文多篇，最具代表性的论文是《台语“给”的用法》（民族语文，2006年第六期）、《十三世纪泰国素可泰时期坤兰干亨碑文声母考》（民族语文，2010年第三期）。

从教30年，杨教授已经培养了一大批本科毕业生，近百名硕士研究生，数名博士。

杨光远与巫凌云教授合著《傣语语法》，获国家民委、国家新闻出版署第二届中国民族图书三等奖、云南省新闻出版局“滇版民文图书一等奖”；完成德宏古傣文《沙萨纳芒鉴》的翻译整理，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获省新闻出版局第7届云南图书三等奖；应邀参加云南省重点社科课题《东南亚各国》，承担《泰国经济贸易法律编译》的组织工作。另完成“新平花腰傣语言研究”和“云南少数民族语言选用问题”两项省教育厅课题。1997年他被评为云南民族大学的首批学科带头人，并任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主持了“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民族古籍”省级重点学科的建设工作。2000年考入南开大学，2003年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98年以来他应邀参加由日本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主持的重点科研项目“中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大陆跨境民族文化动态研究”工作，此间，他每年应邀到国外参加一次国际会议，所发表的论文均收入国际会议论文集中。2000年申报省院省校合作项目，与南开大学合作建立“云南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基地”，获得成功，现在该课题取得丰硕的成果，已圆满结题，得到专家组的高度评价。2002年12月，荣获云南省教育厅、人事厅、科技厅、经贸委颁发的“云南省省院省校合作先进个人”称号。2001年负责主办了云南民族大学与南开大学共同举办的教育部项目“第六届现代语言学高级研讨班”，邀请江蓝生、王士元、戴庆厦、孙宏开等14位国内外著名语言学家在研讨班授课。学员来自日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的高校，有80多人。本届研讨班的主题是语言学理论、语言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汉语方言学、少数民族语言比较研究；课程以基础理论和专题讲座相结合，内容包括汉藏语言比较、汉语方言学与音韵学、近代汉语研究、汉语句法研究、汉语虚词研究、语言类型学与认知语言学，大大开阔了我省语言学界的视野，对于提高语言

教学和研究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

2001年，杨光远负责主办了云南民族大学与南开大学共同在昆明市举办的“第34届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国际汉藏语会议每年召开一次，中国是汉藏语的故乡，但在此前中国仅仅举办过2次。第一次是1982年由北京大学等5个单位举办，第二次是1997年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等5个单位举办。第三次由云南民族大学和南开大学举办，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位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是此前在我省召开的语言学会议中规格最高的会议，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接着主持编辑了将由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的80万字的《第34届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论文集》。2004年12月，经省委宣传部批准，云南省社科院和云南民族大学共同举办了“傣泰民族及文化国际研讨会”，杨光远代表学校参加会议筹备领导小组并发表论文。2005年4月，杨光远应邀参加北京大学和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举办的为庆祝中泰建交30周年、泰国诗琳通公主50诞辰的“全球背景下的中泰关系”会议，发表论文并作为中方代表在总结会上发言。2005年4月23日，杨光远教授负责主办云南民族大学首届“中国——东南亚艺术节”，泰国、缅甸、老挝、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6国驻昆明总领事应邀出席，他们全都在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高度赞扬云南民族大学开办泰、缅、越、老等语言文化专业有远见。2004年9月上海师范大学批准他具备该校汉语言文学博士点兼职博士生导师资格。

我们定睛打量杨光远教授时，很难对他做一个概括。他给人的总体印象只能用“一棵挂满果实的树”来形容。

四、扎根于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

乡土、民间文化是杨光远教授成长的摇篮、为人之基和学术背景。傣泰汉文化的滋养，使他柔中有刚，谦和友善。他是一个感恩者，母亲不慎摔伤卧床8年，他感激姐姐守候母亲8年。多年来，他家的阳台上摆满了双层床，供养了七八个求学的亲戚家的娃娃。妻子向静和他一同照料他们，使他们一个个圆满完成学业。他对学生和同事同样充满深情。曾经有个叫陈雨的毕业生在泰国出版了两本文学作品集，他请人指点，为其宣传，鼓励陈雨更上一层楼。最近，当他听说老同事晨宏生病住院，立刻倾尽口袋里的500元钱，请工会的同志转交。尽管同事们感到他的成就难以企及，他的效率难以想象，但他没有任何一点隔山隔水，冷漠孤傲架势。他说为人做事要对得起良心。

平实而儒雅，朴素大气似乎可以算他的一个特点。

他同样做家务，改作业，他搞学术的时间完全是挤出来的。他不认为自己是天才，但他承认自己在时间管理上分身有术。在办公室，只要有可能他都会拿出他的“作业”，要么查单词，要么修改，要么记上一二个概念。他熟练掌握泰国语、老挝语、西双版纳新老傣文及德宏新老傣文、缅甸掸邦傣文等，多是在忙里偷闲的情况下习得的。

民间文化的血肉联系永远割舍不断。他从母语的窗口向汉藏语中的诸多语族语组进行专题进军，在壮侗、傣泰语里徜徉，古籍、古歌、古韵，从微观到宏观，从宏观到具体，他在一笔一笔地做。从学生培养到学科振兴，他在倾注心血。不知是否是当年干崖土司、辛亥革命先驱刀安仁带着一群傣族青年跨海求学的壮举感染过他，还是面向现代化的自觉意识催促着他，他48岁还毅然动员并带领几名中青年教师赴南开大学考试，攻读博士学位。2003年秋，民族文化学院破天荒出现了4人同时获得博士学位载誉归来盛况。

他指出：近二三十年来，国外语言学界非常重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设在美国的世界少数民族语言学院，目前有一百多个成员在我国调查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我们如不加紧进行调查研究，将来就会出现到欧美国家的图书馆去研究云南少数民族语言的尴尬局面。

三十多年来，他起早贪黑，精力全都放在拓展民族语言文化的路程上。这一路，变化的不仅是时间，但他那类似农夫的躬耕影子不变，个头也没变，只是直了点；发型没有变，只是花白了几丝；乡音没有变，只是更通俗，更思辩，更能深入事理的腹地。讲坛在他的心上，学生在他的心上。他带着雨衣，骑着电动车奔走。博学深厚了他的性情，挖掘了他的潜能。真正的学校就是岗位和工作。他是走出大山的追梦者，也是寻根派。

双语领头雁·刘劲荣

刘劲荣，男，拉祜族，中共党员，1964年1月生于云南省澜沧县，1980年澜沧二中高中毕业，1980年12月参加工作，先后在澜沧县会计辅导站，云南省计经委，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等单位工作。1984年考入云南民族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拉祜语专业学习，1986年毕业留校任教，师从著名语言学家常竑恩先生主攻拉祜语言文学，1996年考取云南民族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研究生，1998年毕业。历任拉祜语教研室主任、校团委委员、团委书记、党委委员、教工党支部书记、系副主任、党委书记等职。1999年8月破格晋升为副教授，2002年8月破格晋升为教授，2002年12月选为校级骨干教师。2004年考取南开大学文学院“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云南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



现任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院长、民族语言研究所所长、云南省高校语言教学研究会理事、云南省民族学会常务理事、拉祜族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会员、中国双语学会常务理事、云南省翻译协会理事、教育部科研基金项目评审专家、云南省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民文教材审定专家、云南民族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云南民族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等职。

主要研究领域为民族语言与文化。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彝缅语言比较语法话语材料数据库建设”、国家民委科研项目“拉祜语四音格词的结构及其形成机制”等项目，现为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第一类特色专业”负责人、“省级优秀教学团队”带头人、省级重点学科“云南民族语言文学”带头人、新增博士学位授权学科“民族学”方向之一“民族语言与文化”方向带头人。曾在《民族语文》《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南开语言学报》《暨南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公开出版《拉祜语四音格词研究》《汉拉简明词典》《太阳地》等专著、合著、译著8部。

2009年“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探索与实践”获云南省人民政府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全国双语教学先进个人、论文《拉祜语、傣语四音格词的比较研究》获云南省第十二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在刘劲荣院长的带领下，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立足云南民族地区，服务边疆少数民族，促进云南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以及民族团结进步和边疆稳定；以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为主，突出云南特有民族语言文学教育和双语教育专业；在办好现有12个语种方向的基础上，根据民族地区社会发展需求，适时增加语种方向，确立研究型、复合型和应用型并重的多元化培养目标；培养能从事与语言、文学、编辑有关的人文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形成以本科教育为主体、研究生教育为主导的办学格局等5个方面作为学院基本定位。

培养一支高水准的创新型学术队伍，产出一批具有重要显示度的标志性成果，使学科特色更加鲜明，学科优势更为突出，学术队伍更富活力，对外学术交流更加活跃，成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具有突出特色，深厚实力的民族语言文学优势学科，以此带动和推进学院整体学科建设及各项事业发展，真正把我院建成少数民族的高水平创新型人才培养基地和民族发展问题高层次研究、咨询基地，在较短时间内成为博士点授权单位为奋斗目标。

学院将认真总结近58年的办学经验，秉承“立足云南，服务边疆，辐射东南亚，为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各民族高素质人才”的服务定位，充分发挥民族类学科在教学和科研上的优势，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民族政策，深化教学改革，以为各民族地区培养合格人才为己任，积极拓展对外合作办学的渠道，为边疆稳定、民族团结发挥无可取代的作用。

第一代佤族专家·赵岩社

赵岩社，佤族名艾色·赛梭，云南沧源人，民族语言学者。1962年1月26日，赵岩社出生在阿佤山区的一个佤族寨子。1971至1978年，他在沧源勐省农场走出了求学的第一步。1978至1981年，他考进临沧中等师范学校学习。中师毕业后，赵岩社在阿佤山区的一个小学勤勤恳恳地当了两年多的教书匠。1983年，他走进云南民族学院的校门继续求学。



两年后，他圆满地完成了学业并被留校任教，主要从事民族语言的教学和研究。赵岩社一边教书育人，一边不断学习，提高自己。1987年，他被学院派到北大中文系深造。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赵岩社的专业能力出现了质的飞跃。回校后，他一连给专科生、本科生和硕士生开出了一系列课程。其中较重要的如“语言学概论”“现代佤语”“语言学调查与研究”“佤语语法”和“翻译理论与实践”。1995年夏，赵岩社又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为自己的学术研究的深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在佤语和佤族文化研究领域，赵岩社硕果累累。许多年来，他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很多文章。《佤语修辞研究》《佤语音节研究》《佤语词范中的外来词》等论文都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佤语语法》则是他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凝聚着他的佤语语法研究的最新成果。此外，他还有一本译著《佤族农村实用技术》和一本合著《班洪抗英纪实》。现在，赵岩社应邀任《中国少数民族辞典·佤族卷》副主编，为佤族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现任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副院长。于1997年8月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同年为校级学科带头人；2001年8月破格晋升为教授；2006年1月至2007年5月任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副所长；为政协云南省第八、九届委员会委员、常委，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和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是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会员，云南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员，教育部科研基金

项目评审专家，云南省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民文教材审定专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编辑委员会委员，佤族研究会副会长。

先后被评为校级优秀班主任、优秀工会干部、工会积极分子，1997年被省教育厅等单位授予优秀教师称号；2000年被授予“首届云南省青年五四奖章”；2000年获云南民族大学“伍达观”优秀教师奖；2003年12月授予“昆明市优秀文明市民”称号；专著《佤语语法》2000年获国家民委、新闻出版署优秀图书三等奖；译著《佤族农村实用技术》获1998—1999年西南西北四省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个人传略及业绩被载入《云南人才库》等。是第一代佤族硕士，第一个出版《佤语语法》和《佤族生活方式》《佤语概论》的专家，也是第一个对佤语修辞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专家，多年的理论素养可以从多角度、多层次地深入研究探讨孟高棉语言文化，并取得了成绩，奠定了在孟高棉语研究中的地位，研究成果在本研究领域有一定的影响。

曾先后给本科生、研究生、外国留学生讲授“翻译理论”“佤族文学”“民族语言调查研究”“云南民族语言概论”等课程。在科研方面，出版专著、合著、译著《佤族生活方式》《佤语概论》《佤语语法》《云南民族语言文字概论》《班洪事件纪实》《民族理论与民族发展》《佤族农村实用技术》等。发表学术论文《佤语的前置音》《中国孟高棉语描写语言学的现状与展望》《佤语的音节》《佤语骈俪语的语言特点》《佤语布饶方言与阿佤方言比较研究》《佤族木鼓文化探析》《佤语音节的配合规律》《佤语词汇中的外来词》《佤语修辞研究》《必须重视民族语文工作》《缅甸语的音变词》《关于佤族地名、姓名翻译的若干问题》《莽语与佤语比较研究》《云南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的发展总趋势》《话说佤文与赖撒拉》《佤汉双语教学比较研究》等。

中华武术的弘扬者·李德祥

一、个人简况

李德祥，云南省红河州绿春县人。生于1960年12月，哈尼族，中共党员，教授，研究生学历，硕士研究生导师，教育学士学位，中国武术八段，国家级武术裁判，二级警监，正处级调研员云南警官学院警察体育学科带头人，警察防卫与控制、擒拿格斗、武术健身教官，教学名师，教授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云南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云南省高等学校李德祥名师工作室，全国公安高校警察技能专业教学指导委员，聘请为公安部警务技能战术研发基地研究员，曾担任全国公安部武术擒拿格斗特聘教官，全国公安部警察体育理论研讨会专家评委，全国大学运动会武术比赛云南省武术队教练，全国跆拳道比赛裁判长，云南省大学生运动会武术比赛总裁判长，云南省武术散打比赛副裁判长；2005年至今被聘为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云南民族大学体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并任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云南农业大学、昭通学院、文山学院、武警昆明指挥学院、红河学院、浙江警官学院、湖南警官学院等12所高校客座教授；云南省高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云南省武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武术段位制指导员、中国武术段位制考评员、曲靖地区太极拳研究会名誉会长、玉溪地区武术协会专家顾问、曲靖市陆良县武术协会专家顾问、普洱市武术协会专家顾问、云南省哈尼族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武术分会委员、国家武术管理中心太极拳专家。担任公安部职称高评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同行专家评委及鉴定专家，云南省高校职称高评委，云南省教育厅教育基金课题专家评委，云南社科规划办专家评委，云南省政府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专家评委等。担任云南警官学院对东盟国家、东南亚国家禁毒警察培训的武术教官，2002年到香港参加公安部组织的公安院校青年教官研



修团，2003年参加云南警官学院组织赴缅甸、老挝教育考察团，2009年被云南警官学院指派到泰国皇家警察尉官大学担任中国武术和警务实战教官，曾对美、英、日、法等30多个国家到云南的留学生及华裔教师进行武术教学。先后在国家级和省级刊物发表论文近90多篇，主持参与国际、国家、跨省院校级以及云南省教育厅、科技厅等重点基金课题项目研究25项，出版著作近29部。校级获奖表彰共34项，省级获奖表彰共31项，州级获奖表彰共4项，省政府获奖表彰共4项，国家级获奖表彰共9项。培养了各行各业大批的人才，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受到了社会、上级领导、同行专家、师生的认可与一致好评，在体育学科特别是武术专业领域国内外享有一定知名度。

三、武术生涯

中国体育科学会会员，全国高校运动医学教学研究会会员。国家一级武术套路、散手裁判，1977年获云南省武术比赛棍术第一名，长拳第三名，1979年获全国西南大学生武术比赛棍术、通臂拳各第三名，1983年云南省武术比赛获枪术、剑术、长拳、翻子拳4枚金牌，1984年获全省武术剑术冠军，枪术第三名、翻子拳第二名，1986年在徐州代表云南省参加全国武术观摩赛获大会雄狮最高奖章，1983年以来先后评为云南省优秀武术辅导员、红河州优秀教练员、优秀体育教师、云南省优秀体育教师、优秀教练员一等奖，获省优秀论文奖，获云南师范大学伍达观教奖金三等奖和云师大教学成果三等奖，获1996—1998年第五届云南省优秀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云南省武术比赛优秀裁判员，2000年担任云南高校大学生武术队教练参加全国第六届大学生运动会武术比赛取得较好成绩。从1983年至今所带武术队在云南省武术比赛中曾获100多枚金、银、铜牌，多次获团体总分第一名和评为精神文明运动队，并培养了大批国家一级武术运动员，向云南省武术队和高校培养输送了许多武术尖子。曾对美、日、法、英、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到云师大的留学生、外籍教师进行武术教学。担任到云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培训的泰国、老挝、缅甸等禁毒执法警察学员的武术教官。2011年9月获中国武术段位制指导员资格证和中国武术段位制考评员资格证。多少年来，无论在基层、云南师范大学和云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自己一直热爱武术事业，为中国武术的发展每时每刻都在努力地学习工作，在今后的工作中决心为公安的教育事业，为中国武术走向世界、造福于人类贡献自己的一切，被《中国当代武术名人志》等20多家辞典收入。

三、著作情况

- (1) 《武术学习指南》(第二主编),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出版。
- (2) 《现代健身娱乐与观赏》(副主编),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 (3) 《体育探索之路》(第一主编),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出版。
- (4) 《云南民族文化大观·哈尼族文化大观》(参编),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出版。
- (5) 《太极拳竞赛套路全书》(编著之一),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 (6) 《青少年近视眼的自然治愈疗法》(参编),科学普及出版社1999年出版。
- (7) 《哈尼族体育》(著),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
- (8) 《跆拳道快速入门》(主编),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 (9) 《跆拳道实战绝技》(第一编者),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 (10) 《中国少数民族大辞典·哈尼族大辞典》(副主编),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出版。
- (11) 《云南少数民族体育产业化》(编著之一),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 (12) 《跆拳道裁判必读》(编著),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 (13) 《大学实用武术教程》(主编),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 (14) 《警察技能训练教程》(参编),中国长安出版社2004年出版。
- (15) 《公安民警预防艾滋病教育概论》(参编),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 (16) 《中华武术》(独立编著),上海交大出版社2006年。
- (17) 《公安院校普通体育理论与实践教材》(主编),上海交大出版社2006年。
- (18) 《警察擒拿格斗》(主编),群众出版社2008年。
- (19) 《中国警察体育》,载《全国第八届警察体育理论研讨会论文选》,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
- (20) 《大学体育》(主审),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出版。
- (21) 《普通高等学校教育教程》(主编),中国出版集团现代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

- (22) 《孙式太极拳》(编创及执笔人),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出版。
- (23) 《大学生体育与健康教程》(第二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2010 年版。
- (24) 《现代大学生体育实用教程》(第一主编),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10 年出版。
- (25) 《警察防暴棍实用教程》(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2 年出版。
- (26) 《大学武术》(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2012 年出版。
- (27) 《武术擒拿格斗》(第一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2013 年出版。
- (28) 《警察防卫与控制》(第一编著),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13 年出版。
- (29) 《武术汉语·汉波版》(著), 伊朗德黑兰出版社 2012 年出版。

傣傣学创始人·满希阿哆

一、人物简介

鲁建彪（傣傣名满希阿哆），男，傣傣族，1970年出生，中共党员，云南武定人。1993年7月从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政治系毕业分配至云南民族大学任教至今。云南民族大学傣傣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云南省民族学会傣傣族研究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和丽江傣傣文化研究会总顾问，首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中青年学者高级研修班学员，兼任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学位论文评审专家，云南民族大学副教授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委，云南农业大学特聘硕士生导师，云南省民族学会傣傣族研究委员会常务副会长，丽江傣傣文化研究会总顾问，云南省委组织部公开选拔领导干部考试命题专家，云南省人社厅国家机关录用公务员考试权威辅导（命题）专家，中国民族伦理学会理事，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会理事。2007年破格晋升教授，成为中国第一个傣傣族教授。



鲁建彪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民族学、民族社会学、社会保障、人力资源、政治理论、宏观经济学等。

二、主要科研成果

多年来，鲁建彪先后在《思想战线》《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经济问题探索》《集团经济研究》《云南行政学院学报》《学术探索》等核心期刊以及《思想理论教育》《云南青少年》《民族学调查研究》《继续教育研究》《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等一般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有两篇论文分别被中国人民大学《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民族问题研究》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鲁建彪撰写的学术论著及参编教材共有十余部。其中专著两部：《傣傣

族社区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民族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傣傣族社区发展研究》一书,首次以社会学“社区”的视角研究傣傣族的发展问题,填补了国内傣傣族研究的空白。同时,积极呼吁和倡导构建“傣傣学”学科理论体系,使傣傣族研究走上系统化和规范化的学科发展道路,并积极组建傣傣学研究团队,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以傣傣族为研究对象的学术研究机构——云南民族大学傣傣学研究中心。他主编的《傣傣学创建与傣傣族发展》(德宏民族出版社,2009)是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专题会议的理论成果,同时也是云南民族大学傣傣学研究中心的理论基础;主编系列丛书《傣傣学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出版第一辑;2011年出版第二辑)是研究中心刊物(以书代刊)。

参著(编)的论著和教材有《周恩来的领导艺术》(重庆出版社,1993)、《思想政治教育史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研究与探索》(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邓小平理论与新时期统战工作》(云南美术出版社,1996)、《21世纪教育大论坛》(学苑出版社,1998)、《走向新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和《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傣傣族研究》(内部资料)等。

三、鲁建彪与傣傣学

鲁建彪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2009年7月27~31日在中国昆明召开)上成功申报“傣傣学创建与傣傣族发展”的专题会议并担任专题主席,极大地推动了傣傣学研究与国际学术舞台的接轨并第一次公开提出“傣傣学”概念。负责由云南师范大学伍雄武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课题的子课题“傣傣族哲学与社会思想”及各级课题10余项。

鲁建彪带领云南民族大学傣傣学研究中心全体同仁,以“整合资源、合力做事、文化立族”为宗旨,努力团结傣傣族精英层以及所有关心和致力于傣傣族发展的各界仁人志士,并身体力行四处奔走,宣讲傣傣文化,倡导“天下傣傣是一家”的和谐理念,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先后创建全国第一个傣傣族文化研究基地、傣傣族文化传承基地和云南民族大学傣傣学研究中心网站——傣傣学网站(www.lisuxue.com),为传承、保护和弘扬傣傣族文化做出积极贡献,成为傣傣文化研究的领军人。

后 记

本书是另一本《云南国际型民族文化人才培养研究》（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项目子课题研究成果，2014年10月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姊妹篇。编著此书的目的，一则有感于云南众多致力于民族教育、文化、艺术、科技等方面的研究和传承的诸多研究者专家及大师的辛勤耕耘、成果丰硕，他们都是云南各民族的精英和代表，是国家最为宝贵的财富，在各自的领域都享有较高的名望，出版此书为了彰显他们在云南民族文化研究、教育科技领域的优秀成果和卓越成就；二则云南已成为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怎样自动融入和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关键在人才、关键靠人才、关键在文化的融会贯通；三则为让后来相关民族文化研究者和民族文化爱好者在学习、研究过程中少一点辛苦，少走弯路，为学习研究者提供基本的线索，从成功者的成功之路中得到启迪。总之，本书的出版有利于民族文化的继承、弘扬与创新，有利于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为此，我们决定将在课题调研过程中搜集、采访到的民族文化代表人物的简介、代表作等基本资料汇编成一本有关云南国际型民族文化人才选编，以便后人查阅。

由于研究者能力、见闻和资料的限制，本书所入选的人才仅仅是云南省国际型民族文化人才队伍中的一部分，还有一些人才肯定没有入选，有所遗漏。另外本书也难免有内容阙失、编撰体例不合等问题，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不吝赐教。

ISSN 978-7-5482-2385-6



9 787548 223856 >

定价：35.00元